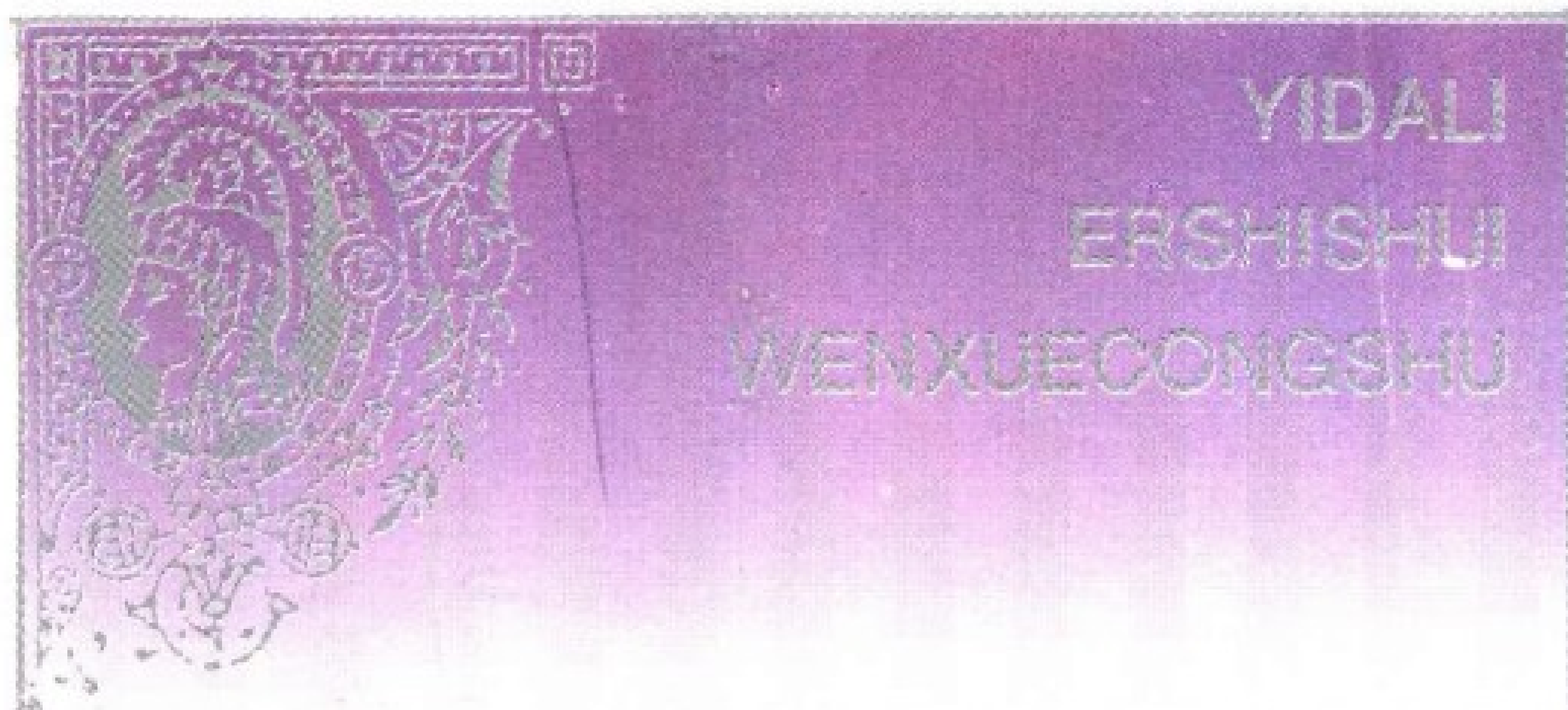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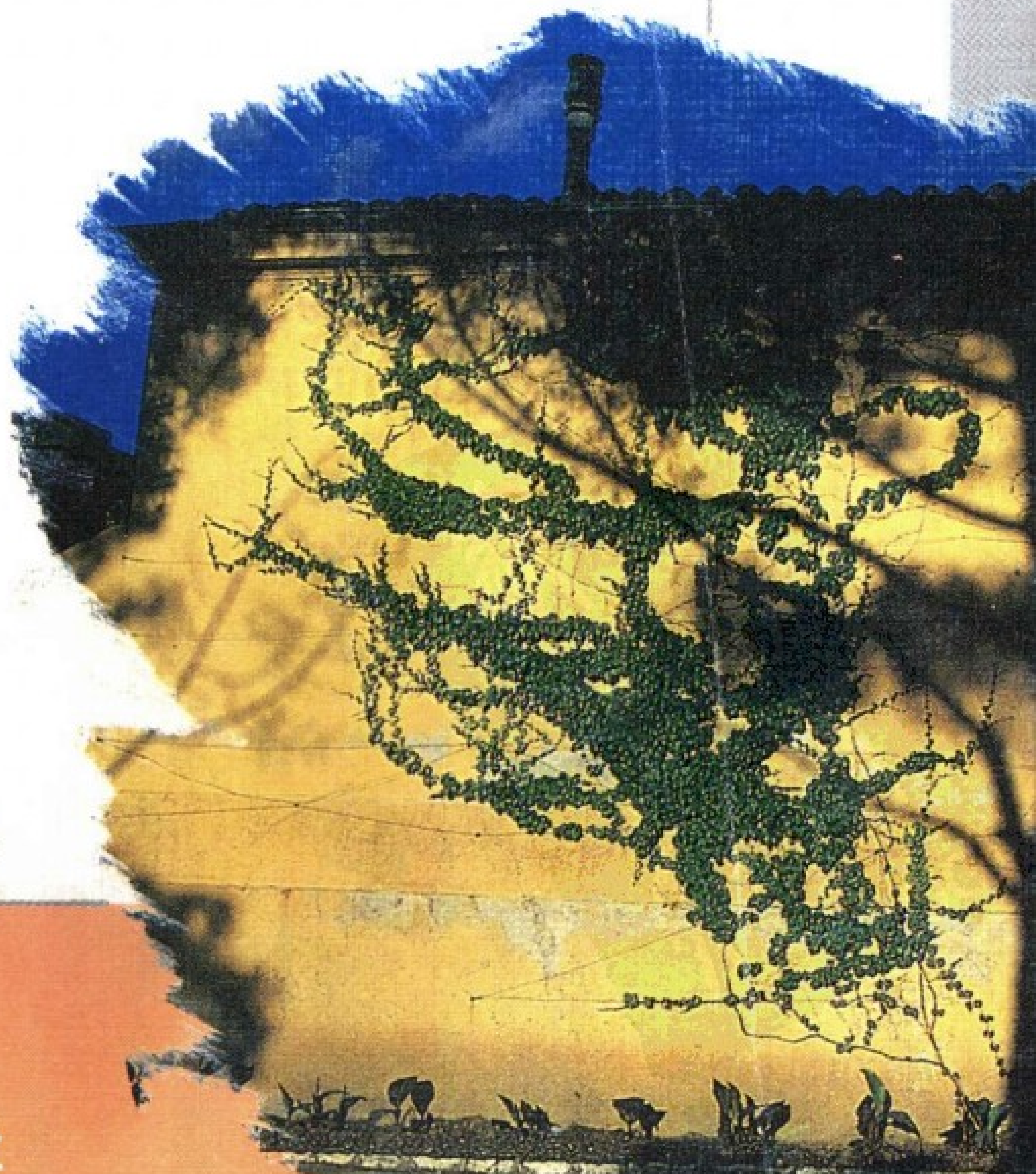
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吕同六　主编



卡不里岛来信

索尔达蒂　著





周智韵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卡不里岛来信

吕同六　主编



责任编辑：林　敏
装帧设计：丁　明

ISBN 7-5396-1353-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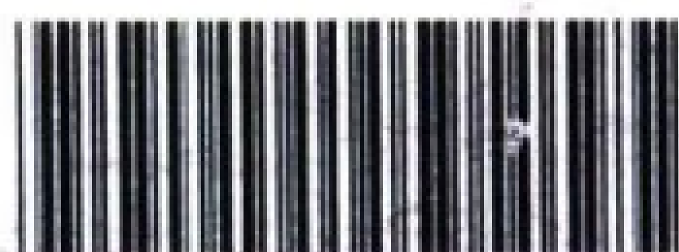


ISBN 7－5396－1353－X/I・1250
定价：7.40元

卡不里岛来信

索尔达蒂 著
周智韵 译

吕同六 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04号

意大利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卡不里岛来信　　吕同六　主编　　索尔达蒂　著
周智韵译

责任编辑：林　敏　装帧设计：丁　明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7.375
插　　页：2
字　　数：187,000
版　　次：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
标准书号：ISBN7—5396—1353—X/I·1250
定　　价：7.40元

抒写情感的高手
编织故事的大师

吕同六

一

在二十世纪末的意大利文学界，索尔达蒂无疑是一位十分惹人注目的作家。

纵目今日意大利文坛，那些从二十年代起便叱咤风云，赫赫有名的文学大家，如蒙塔莱、莫拉维亚等，已长眠于九泉之下，连稍后才跻身名家之列的卡尔维诺、夏侠、布扎蒂等，也已先后谢世。只有索尔达蒂是硕果仅存，成了唯一健在的、几乎跟本世纪同龄的知名老作家。

索尔达蒂长期两栖于文学、电影界，他的文学艺术创作素以丰产和多面手著称，无论是当作家，还是做电影导演，他始终孜孜不倦地追求艺术的美，力求让读者或观众获取艺术的审美愉悦。

1906年，马里奥·索尔达蒂出生在都灵。外祖父是位作家。马里奥因此自幼便获得良好的家教，受到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的熏陶。他先在耶稣会学校读书，写了不少习作。十八岁那年，他根据圣经故事写出一部三幕剧《彼拉托》，一炮打响，获都灵天主教公会的奖赏；这部剧作可说是认识三十年代社会、道德情状的艺术文献。

嗣后，他怀着将来献身缪斯的满腔热忱，入都灵大学文学系攻读。他广泛涉猎意大利和欧洲文学，熟读阿利奥斯托、曼佐尼、普鲁斯特的作品，但他尤其喜爱英国、法国的浪漫派作家，他觉得这些浪漫派作家的倾向和趣味同他的追求和特性更加贴近。二十一岁时，他大学毕业。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又驱使他随即进入罗马艺术史高等学院深造两年。

1929年，索尔达蒂发表短篇小说集《沙尔马契》，显露出了写作小说的才华。但他没有立即进入职业作家的行列，却于同年收拾行装，飘洋过海，赴美国进修他热衷已久的艺术史，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意大利语言、文学。

1931年，索尔达蒂返回意大利。他决定投身电影创作，据说这是为了维持生计的缘故。他集编剧和导演于一身，冶文学与电影于一炉，以制作艺术精品为己任。他从意大利和欧洲文学经典中汲取素材，予以艺术的再创作，尤其注重细致微妙的心理刻画，用精巧、富有美感的电影形式，去探寻和表现小资产者和公职人员生活的环境。索尔达蒂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高手如林、竞争激烈的意大利影坛别树一帜，赢得了一席之地。

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索尔达蒂执导了近四十部影片和近十部电视片，其中大多是文学经典作品的改编，如根据十九世纪意大利富有神秘色彩的著名作家福加扎罗小说创作的同名影片《小小的旧世界》(1941)、《玛伦布拉》(1881)，根据巴尔扎克名著创作的《欧也妮·葛朗台》(1946)，根据意大利十九世纪作家萨尔加里小说改编的同名影片《海盗女儿》(1952)，根据莫拉维亚小说创作的《外省女人》(1957)等等。

大约在影坛站住脚跟的时候，索尔达蒂便开始重新拿起笔杆，在两条战线作战，在编导电影的同时，继续从事小说创作，相继出版了三十余部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和散文集。

《美利坚，最初的爱》(1935)，是索尔达蒂充满浪漫的奇遇的美国之旅的产物，书中流露出对美国社会进行勘探和发现的强烈愿望，既有洞察入微的探究，又不乏激情的跃动。索尔达蒂拓宽艺术视野和创作路子的尝试，在《莫塔事件的真相》(1941)中获得了体现，这是作家用超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推理小说。《同爵士共进晚餐》(1952)，系一部由三个中篇组成的集子，表达了一种无法作为自由人，而只能按照陈旧的观念来判断价值的强烈不安。这部作品出色的构思和结构，赢得了评论界的一致的赞美。

索尔达蒂对于自己生活过的环境，常常给予一种或动情的回顾或苦涩的反思。1964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双城》，是站在大都市这个视角上，以自身的经历为线索，以及他同都灵、罗马这两个城市的关系为聚光点写的。工业化都市都灵和首都罗马，是不同的生存态势和意识形态态势的象征，是展示人生的、道德的、历史的、环境的寓意的舞台。书中对人物的剖析，化作了历史，化作了风俗史，人物成为刻画本世纪意大利资本主义现实的基本要素。

文艺圈是索尔达蒂长期涉足的环境。他耳闻目睹，种种感受和体验溢于心怀，流于笔端，于是写出了长篇小说《演员》(1970)。小说以一位电视导演为主人公，用第一人称来展开叙述，表现生活的不可捉摸，从而无法透过人们的虚假、伪善和羞耻来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世人。这部小说是索尔达蒂把情节的巧妙构想，同人物的心理刻画紧密编织在一起的代表作，获得了当年的康彼埃洛文学奖。另一部以艺术圈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火》(1981)，通过一个画家的遭际，探讨友谊、情欲、金钱同现代人的关系。

二

《卡不里岛来信》首次发表于1954年。除了开头的部分章节，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主人公哈里第一人称向他在罗马遇见的一位导演朋友所作的坦诚的叙述。

乍一看来，这颇像是一部写三角恋爱的作品，哈雷是位美国新闻记者和研究艺术史的学者，他因战争的缘故来到意大利，邂逅年轻的女同胞琼。哈雷自认为真诚地爱着她，因此闪电般同她结了婚。谁知哈雷同时又跟一位名叫朵拉的罗马姑娘发生恋情。于是，哈雷一方面怀着对妻子的尊重，对孩子的眷恋，另一方面又抑制不住心头燃烧对朵拉的炽热的情爱。他被钳制于这两种尖锐的冲突的情感之中，难以也许也不愿意作出选择。

琼平时带着小孩住在远离罗马的城市。一次，她来罗马，含泪向哈雷披露，在他们相识的最初年月，她曾跟一位罗马青年阿尔多有过关系，她还从卡不里岛给阿尔多写过六封信，但始终没有得到回音。哈雷原谅了琼，也许是为了不使事态更加复杂，他隐瞒了自己的婚外情。琼和丈夫开始寻找那些信件。但不久琼即在返回美国的旅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不幸身亡。哈雷找回了那些信件，原来事情很简单，这些信件寄往了一个错误的地址。哈雷决定同朵拉结婚，并带她同去美国。

朵拉成为一名出色的家庭主妇，跟哈雷的父母和孩子和睦相处。恰恰在这个时候，哈雷反倒觉得失去了往日的激情，对朵拉的情感日益淡漠，就像从前他对待琼一样。于是，他又飞往罗马，他要寻找能够维系情感平衡的另一个朵拉。他在罗马遇见了当导演的朋友，请他帮助随便找一个什么工作，以便能在罗马呆下去，去追寻新的情感或爱

情。

《卡不里岛来信》出版的年代，正是新现实主义走向衰落的时候。意大利文学正处于分化的阶段，过渡的阶段。但是索尔达蒂没有去追随某个什么流派，也没有去追赶某种什么时髦。同现实建立积极的、直接的关系的愿望，始终是他创作的驱动力。透过上文转叙的曲折有致的情节，不难发现，索尔达蒂在《卡不里岛来信》这部小说中依然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子。

对情节纠葛明显的兴趣，对叙事技巧和心理分析异常的重视，对接近和表现现实世界和情感世界热切的意愿，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高度的投入，这便是贯串《卡不里岛来信》和索尔达蒂小说创作的主要特征。

索尔达蒂是抒写情感的高手。《卡不里岛来信》整部小说是建筑于爱情与情欲、虚伪与背叛、暧昧与做作等复杂的情感冲突之上的，而在主人公情感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波澜，又都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而最终又归结到凸现理性与情感的冲突。

哈雷与琼的结合，更多地是出于互相尊重，而非真正的爱情。他们不由自主地陷入了由热诚的渴求、失落的忧伤、移情的欣悦、无奈的追悔等种种情感织成的罗网。这张罗网是如此的紧密，以致他们只能徒劳地在其中挣扎，而别无出路。哈雷和琼的心态都恶化了。他们都犯下了情感迷误的过失，既相似又不相同，但都是不可避免的情感过失。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各自的情人，不啻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他们不仅发现了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情感因素的不可靠性，感受到了对虚伪的痛苦感知，而且寻觅到了幸福的感觉。

索尔达蒂把他笔下的人物的行为，他们最隐秘的、最受压抑的欲念和尝试，把他们通常暗藏在意识最深层的东西，予以真切、活跃的展示，并把他们置于道德评判的天平上。这是罪过？是善，抑或恶？是

真，抑或假？我们应当认定谁对，谁错？我们应当同情谁，嫌弃谁？作家带读者一起认识，一起思考，一起在内心作出评判。

在这部小说中（在其他几部作品中也是如此），索尔达蒂在描写像哈雷这样的知识阶层的人物时，常常是昭示其尴尬的、有时甚至令人厌恶的道德上的堕落。这些有教养的资产者，有着过多的欲念，但这些欲念始终无法得到满足。相反，他却赋予那些普通人（包括情人、妓女）以真诚、力量，赋予他们以强烈的生命力。这些普通人是幼稚的，但他们显示出是自己更坚强、更真实、更健康的。正是社会层面和人的品格层面上的这两种冲突，决定着小说中的生存态势和心理态势，构成索尔达蒂小说的全部情感生活的骨架。

《卡不里岛来信》是一部极富艺术特色，尤其是叙事艺术特色的小说。

索尔达蒂堪称编织故事的大师。他对"事件"的偏爱，对跌宕起伏的情节的建构，对悬念的安排，是他的叙事的基本要素。

叙事，对于索尔达蒂来说，就是编织情节，或者说穿了，就是编织圈套。他把现实世界和情感生活的方方面面，把它们的朦胧的底蕴，统统装进了情节和圈套。在索尔达蒂看来，现实生活本身既是戏剧性的情节，又是供这些戏剧情节表演的舞台；作家善于让他笔下的人物，带着自己的故事，在这个舞台上活动起来，让他们既当演员，又充任导演，既是评论家，又是旁观者。

索尔达蒂把哈雷同琼、哈雷同朵拉等几条主要情节线索编织得既微妙又紧凑，若明若暗，在对它们的动态描写中，让"事件"像一根在某个特定的时间会砰然弹跳的弹簧，突然之间达到高潮，爆发起来。于是，小说的情节，不管是异乎寻常的，或者是近于荒诞的，还是貌似无关紧要的，便像磁石吸铁般地吸引读者。读者于不知不觉之中任凭长袖善舞的作者牵着自己的鼻子走，同作家一起去细细品味和分析人物的情感和心态。读者被迷惑了，失去了矜持，而一旦觉醒，便

发现自己已陷入难以挣脱的情节的圈套之中。

索尔达蒂的叙事机制复杂，不可捉摸，但运作起来却完美无缺，每每出现意想不到的行为和情节，但它们又严格地遵循内在的、连贯的逻辑联系。艺术家的激情与直觉，火花般闪现的灵感与长期孕育的思考，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当代社会现实的多层面，当代人情感现实繁富多姿的多侧面，在多形态的构思和布局之中，在以制作工艺品式的精雕细琢的叙事之中，获得了鲜活的表现。

索尔达蒂的文风优雅，文字清明，故事的进展富于节奏感、匀称感、意外的结局安排得既敏捷又漂亮。他对哈雷、琼、朵拉的心理刻画，细婉熨贴，情愫绵绵，又善于把一件件普普通通的事情描写得情趣隽永，令人玩味，因而使小说具有一种柔美的内秀。

《卡不里岛来信》出版时，索尔达蒂正值四十八岁。小说立即蜚声文坛，获得当年意大利很有影响的斯特零加文学奖。随后，该书陆续被翻译成世界三十多种语言，风靡世界。

一

去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经过玛尔古达大街去一家电影译制片厂。这间厂规模不大，坐落在一所古老的院子里。宾丘坡下和玛尔古达大街之间有许多这样的院子。在垣墙、楼梯、栏杆和大、小房舍一片杂乱之中，这些院子就是意外的静土了。

玛尔古达大街一边朝阳，一边处荫。上午十一时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一过中午，时间的车轮便滚滚向前。似乎是为了不让中午时刻很快过去，罗马人往往将午膳时间拖到两点，甚至更迟。然而最活跃的时刻始终是上午十一点。我沿街而过，两边是店铺：手艺人的作坊，镜框制作店，木工坊；还有一家看来像是祖传的旧铁匠铺改建的机械修配厂；再往前是一家酒店和一间熨衣铺。工人们竟自在大街上干活。街上堆放着他们干活用的工具，一边还停着汽车和摩托车。劳动着的人们干得很欢，过分起劲地敲打着木块和金属板，互相吆喝着，有的还哼着歌。我走着，走着，渐渐放慢了脚步，想在去制片厂工作之前，从这欢乐的气氛中受到一点感染。

骤然间听到有人喊我，转身一看认出了我的美国朋友哈雷。他拖曳着长腿，迈着大步，急急忙忙几乎是跑着撵上了我。

有好几个月，或竟有一年多没有见过他了。他变了，比往常更为苍白的脸上，一双浅褐色的眼睛流露出疲乏的神情。头发没有梳整，脸也没有刮过，那像头发一样淡黄色的胡子稀疏地长在孩童一般细嫩的下巴上。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没想到他会落到如此模样。似乎是发生了什么事。战争时期我们同在一个美国电台工作，是同事也是朋友。然而一见面就猝然问他，是否发生了什么事，似乎有些唐突。我

们的交情尚未到这种程度。

哈雷以他惯有的热情与我相迎，脸上带着他特有的、略带伤感的微笑。在与我拥抱的时候，我背上感到了他手中拿着的牛奶瓶。

我们互相诉说着别后的种种：我解释由于工作关系几个月无法与朋友们相聚；他则说到常常不得不往返于巴黎、伦敦和纽约之间作公务旅行。这时我发现他的衣著也不同往常。战后他脱下了那身虽然潇洒然而不失单调的美军制服，换上了庄重的双排钮黑白格子呢西服。一身打扮都与新的高级职务相称：他是教科文组织的官员。总部虽在巴黎，却经常往返于伦敦与罗马之间，组织美国与欧洲之间的现代、古代艺术展览和交流，几乎每天必须以外交官身份会见重要人物，参加各种会见及有关会议。

因此，当我见到他身穿一条法兰绒西裤，敞开衬衣领不系领带，上套一件开扣的羊毛外套时，不由得非常惊讶，然而他这副不修边幅的潦倒样子却与脸上古怪的神情十分相称。虽然我和他的交情还不能询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他手里的牛奶瓶和这身打扮却给了我提问的借口：

“我看你是在休假。”

“是的，永远休假了。”他苦笑了一下，过于急促地回答我，脸上带着苦涩的微笑。

“这怎么说？你不在教科文任职了？”

“感谢上帝，不再在那儿干了。我选择了自由！早已厌倦这一切了。外交不是我之所长。我更喜爱艺术史。而且只喜欢贾科波·托里尼(Jacopo Torrini)和彼埃罗·卡伐里尼(Piero Cavallini)！”

大战前他就来意大利研究这两位十三世纪的罗马画家，还写过几篇关于他们的文章，然而却从未发表。

“我一切都放弃了，巴黎使我无法再忍受，不记得是谁说过，那儿

的人们活着就像生命永远不会完结似的。在意大利就不是这样，这里死亡总是不远的，只要上帝愿意！我再也不干什么了；再也不想见任何人了。每天去特拉斯戴维莱(Trastevere)研究唐纳·雷吉那(Donna Regina)的壁画。

“那你还不满意吗？”

“怎么不呢，当然非常满意，”他又苦笑了一下说，“可是，有点儿困难。我无法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过不了多久，钱用完了就得回到美国去，所以一见到你，我就从后面赶上来。曾想给你打电话，可是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丢了。只有你能帮助我，你是个君子。”他说完更是笑了笑，一只手搭在我肩上，佯装庄重而又戏谑的样子。似乎不是在向我求助而是赐予我什么，说：“你的出现是天意啊！”

我一直对他颇有好感，很喜欢他。但听到这句话感到心头微微地抽搐了一下。(上帝，该怎么办？又是一件麻烦事！)即使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要求帮助或借钱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我们尽量把脸上流露出来的自私表情化为一种忧郁深情的样子，然而这是徒劳。回答突然开口告借的朋友最初的几句话总是吞吞吐吐，结结巴巴的。谁有慈悲为怀的本性？也许只有圣者。

而哈雷是聪明人，他很清楚我不是圣者。因此见到我的窘态毫不意外，而是继续他的话题。他无论如何不愿回美国去，要留在意大利，而留在意大利就需要钱。我记得他是有家室的人，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为了赢得时间，我问起了他家里。

“哦，孩子在美国，”他回答说，“在费拉达尔非亚和外祖父母在一起，他们挺好。我原也可以在那里工作，普林斯顿大学总有个教授的位子留着给我。但如果回去就一切都完了，懂吗？是精神上的末日。我需要生活在这里，需要这些古迹，这些人，和这里的阳光。”环视四周，玛尔古达大街这时正是古老世界、古老意大利的最佳表现：古老而有生机。我问道，

“你需要钱为什么离开教科文组织呢？”

“一言难尽，下次我再和你详谈，现在你要帮我挣钱。”

“为什么不写文章，不寄些通讯稿到美国的报社去？”

“写一些，你如果不是专业作家不受重视，稿酬也十分微薄。不，只有你才能帮助我。”

“你想干什么？”

“凡是你愿意让我干的。你是导演，最清楚。电影业中有许许多多事我都可以干：演员、助理导演、剧本改编、翻译、配音……我并不需要很多钱。”

他说在这附近他以相对不太高的租金租下了一间画室。如果我能在制片厂给他一点工作，再加上写文章所得的不定收入，他便肯定可以维持下去了。

“上去喝点儿什么，这样你就会了解了。”

看了看表，我谢绝了他的邀请。要赶到制片厂去配音，已经迟到了。我们一路走着，我向他解释：到下部片子开拍之前，即到明年夏天，我无法给他任何工作。所有的位置都已有人，所有的职务都已分配完了。

他一直送我到制片厂，没有为我所说服，仍坚持己见，说也许可以写个脚本。他知道一个脚本的价钱足够他在罗马住一年用。我告诉他卖脚本是件碰运气的事。以我为例，在电影界工作这么多年，少说也写了有五十来个脚本，却从未成功过。不过既是件碰运气的事，就未尝不可一试，从我这方面则可保证提供一切帮助。

说着，我们已走进了院子。配音演员和身穿黑围裙的技术人员都在小小制片厂的大门前一边抽烟，一边聊天。我以为他们在等我，便急忙为迟到而道歉，但录音负责人笑着对我说，不必着急，是停电了，至少要半个小时以后才能开始工作。

哈雷趁机再次邀请我：画室就近在咫尺。

我们又回到玛尔古达大街，往前走了几米后，走进一间大门。

经过一条极长的、阴暗而狭窄的过道后，我们登上了一边有铁栏杆的石梯；穿过一个肮脏的平台，地上铺着磁砖，由于年久失修，几乎每块砖都是破碎、开裂的，而且互不相连。平台四周是：画室的磨砂玻璃门窗，种满番茄、香菜和各种植物的阳台以及工匠、布尔乔亚们的住房。一个穿着内衣的女孩在晾晒衣服，神情漠然地望着我们。又经过一个过道和一架楼梯，最后到了一个三面围着住房和玻璃门窗的小院子，向着我们的一面正对着高耸、茂密、郁郁葱葱的宾丘，我不禁停了下来看看这迷人的景色。

“多美啊！”我说。

“没见过这些画室吗？”

“附近其他一些类似的见过，但这里却从未来过。”

哈雷捏了捏我的手臂，说：

“知道吗，”他低声说，“假如我在明尼苏达的湖上有一座艇屋，或在怀俄明的森林里有一幢打猎的房子，那也许还会喜欢住在美国，可是普林斯顿，费拉德尔非亚！还有纽约！不，不去。”

他沉默了一会，然后慢慢转过身来，指着我们身后略高出一头的小平台对我说：

“那就是我的家。”

一条狭窄的石灰石楼梯通到那间屋子，我们向它走去。哈雷立刻又停下来，再一次紧紧捏了一下我的手臂，默默地含笑凝视着我。然后向上看看那个小平台，又犹豫了一下，悄声对我说：

“有件事要告诉你，不知怎么说好。你就要见到的那个，那个女人，不，不是佣人，就是这件事。”

“你把我当傻瓜吗？那么说，是意大利女人啰？”

“乔恰拉人，”哈雷带着他特有的苦笑回答说，但这次笑得苦涩而狡黠。乔恰拉这个字本身似乎就给他一种痛苦的欢乐。

二

在踏上短短的石灰石楼梯时我暗自庆幸：刚才向他问及家人时本能地未提到他夫人，只问了问孩子们。几年前在英国领事馆的招待会上，我曾见过他妻子两、三回。是一位娇小的长着褐色头发的女人，不美也不丑，生得纤瘦，非常文静。一缕秀发经过精心整理后蓬乱地披在前额。眼睛十分机灵。她的面容、表情、以至整个身心都显得高雅、矫健、聪明。当时我就知道她和哈雷之间常有争执，早在那时哈雷就提到过分居。

哈雷一打开门，那位"不是佣人"的女人便拖长着音调喊道：

"哈雷！"甚至不是"哈雷"而是"阿雷"，没有发出 H 的音，"你买牛奶买到哪儿去了？快点儿呀！"

"来了，亲爱的。"说着他便跑过去，消失在隔板后面。

这间大房间的一边用黑色的木板隔着。和玛尔古达街上许多画室一样，这是一间画家的工作室，进门的一侧有很大的落地玻璃窗，将宾丘的景色框在其内。另外两边墙上支着一个三角形的阁楼，阁楼架在很粗的桁上，阁楼和桁也都像隔板一样漆成黑色的。可以猜到，阁楼上有一张双人床，室内的布置是为外国知识份子极为欣赏的放荡的罗马女人的普通陈设：半旧的沙发椅，弹簧长沙发，几个裂了口的垫子，贴印花墙布的四壁，一张大餐桌和一架笨重的仿古雕花餐柜。杂乱，多尘，肮脏。桌上在玻璃瓶和菜碟之间放着书、报和一台打字机，还有插着百合花的玻璃杯。

哈雷立即从隔板后面出来了，领着那个女人。

她高窕、健壮、丰满，臀部浑圆，乳房坚实、高耸。一头乌油油的黑

发，平直光亮，在脑后挽成一个古典式的发髻。浅绿色的大眼睛非常美丽。鼻子是古典式的，鼻梁笔挺。嘴十分性感，一身长得像个模特，特别是脸庞，简直是卡伐里尼(Cavallini)的作品。我一见到她便觉得似曾相识，但一时却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是怎么认识的。再一想也许这种感觉是由这女人的外表所引起。它是如此咄咄逼人，带有挑逗性，甚至是一种猥亵的相貌，使人不由地想入非非。即使看来端庄，也有一种希望不再下海的从良妇女特有的外表。

她腰间系了条布围裙，向我稍稍走近几步，用围裙擦着手说：

"您好，对不起，我正在做饭，不跟您握手了。"

"喝马丁还是杜松子酒？"哈雷走到桌边问我道，举起一个瓶子对着阳光看了看还剩多少。正要打开盖子，突然停下来，转向那女人说：

"朵拉，对不起，我没问你喝什么。"

"哦，就要你喝的吧。你知道，我什么都一样，对你们这些饮料，我一窍不通，你也最好别喝，对身体不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都喝过成千上万次的马丁酒了。还不会调酒吗？试试！"

"试什么试！我都不知道是些什么玩艺儿，"对我则说，"您的朋友可真是的，您对他说吧，他总不信，我们意大利女人是不讲究这些的。"

"哈雷很清楚，"我说，"他喜欢这样，爱开玩笑罢了。"

哈雷在调杜松子酒，笑着，看来很满意。

"请原谅这里这么乱，"朵拉又开口了，"说是个家，可哪儿像啊！不过地点好，离市中心近，又挨着人民广场。"

我们啜着马丁酒。哈雷提醒朵拉，说我就是以前他多次在谈话中提过的那个人。

"你不认识她，"他向我解释说，"可她认识你，见过你多次。也在电影小报上见过你的相片。还跟你合作过，当过你的配角演员呢。"

那女人说出了电影的片名。于是我想起来了是在哪里见过她的，这当然纠正了刚才认为是她的外表让我觉得面熟这一个念头。哈雷说：

“要是你需要配角演员，我们现在有两个了。为什么不请我们呢？要是不需要我，单请她也可以。”

说着含笑凝视着我，我也盯了他一眼。我已看出来，也感觉到，他爱着这个女人。但在这一瞬间我看到和感觉到的是另一种东西。哈雷是个性格高傲的人，如果在她的面前屈尊而向我求职，甚至为她求职，做出一种将这个女人相让于我的姿态，这决不是迫于经济上的拮据，而可能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

因此，我相信，假如我敢于向朵拉献殷勤，由于同样的原因，既会使他痛苦，又在某种意义上会解脱他。应该说，这种暧昧的处境很吸引我；而那女人的本身又令我十分喜爱，于是我便陷入一种危险的游戏之中。这样，在回答哈雷的时候便给予了他较大的希望。

“我不能允诺什么，但可向你保证一定尽力而为。相信十五天以后会有消息。把你的电话告诉我，这是我的电话。”

我站起身来，该走了。这次朵拉向我伸手握别，裸露着的手臂很粗壮，但手却并不大，带着表链的手腕也很细。在和我告别的时候神情很冷淡，没有笑容，以极一般的客套话向我表示了谢意：

“非常感谢，但请不用费心了。我下星期就要离开这里，哈雷也要走了。不知道我们十五天以后还在不在这儿。”

她似乎在纠正哈雷暧昧的冒失行为。仿佛在对我说：“亲爱的先生，看清楚了！如果你想打我的主意，那就错了。也许看来我像个轻佻的女人，但却不是这样，因为我喜欢哈雷。”也许，说得更坦率些：“我曾经是个轻佻的女人，今后背着哈雷还会是那样，但要是我跟你有了什么，哈雷就会知道。你是哈雷的朋友，这就会毁了我。因为哈雷是我所有的客人中最慷慨的一个，他给了我一个妥善的安置，这是

任何人所不能给予的。

我立即就明白了这一切，也许正因为我明白了，才在握手告别时故意将她的手指在手掌中多捏了一会，比一般男女之间正常的握手多了几分之一秒，但这已足够使她惊觉了。为了向我示意，即使是如此短暂的一刻拖延亦已为她所觉察；她转过手腕，从我的紧握中猛地挣脱出来，然而极有分寸，丝毫不让哈雷感觉到异常，而却能让我知道她的意思。

“再见，”同时用她那绿色的大眼睛瞪着我说，“非常高兴认识了您。”瞪着我的时间也和我握手一样，比正常时间稍长了一会儿。

哈雷将我从迷宫似的建筑中送到楼下。

我们走到大门里面最后一个幽黑的前厅时，停下了。他犹豫了几句便向我借钱。

当然，他需要用钱。同时显然也看到了我喜欢那个女人，所以就鼓起了勇气，但更主要的是他在向我借钱时感受到一种屈尊的乐趣。

我身上没有足够的现金，要开支票。拿出了支票簿，正当摸到西服背心小口袋里的钢笔时，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再见一下朵拉，想让她看到我如何把钱给她的男人。于是说：

“可是，我没带笔。”

“那很抱歉，还要你再上一次楼。”他说。

我们跑步上了楼，我立即受到了惩罚。哈雷到厨房去找她。我在桌子的一角故意慢条斯理地开着支票。哈雷回来了，可是朵拉再也没有出来。

“是真的吗，”把支票递给哈雷时，我问道，“真的过几天你们俩都要离开这儿？”

“根本不是。”哈雷带笑回答说。

“那为什么她这么说？”

“她怕太麻烦你。”

“这么说你和她都不走?”

“不,朵拉想走,”他压低声音说,“她想让我回美国去,并跟我一起去。不理解为什么我在这里受穷。她不可能理解。我怎么向她解释呢?这你是知道的,是吗?可是她想去美国都快想疯了。也许她并不爱我,也许她的爱是和‘去美国’这一固定的想法连在一起的。

“意大利女人是这样的。”我指出。

“你是说她这一阶层的意大利女人?”

“不,我想不仅是她们,其他的也都这样。”

“她们什么也不懂,不过女人都是这样的。”

哈雷笑笑做了结论。

这样,朵拉,或朵萝苔娅,始终没有出来。我不能再等了,悻悻离去,随即为自己而感到羞愧:哈雷的恶习似乎也感染了我。

三

尽管我很想去看望哈雷和朵拉,但在分手后的最初几天是不可能的。哈雷给我挂了几次电话,对我说,根据我的建议他想写一个电影脚本,已在进行了,有机会见面时他将跟我讨论。我鼓励他写,但尽量不使他抱过多的希望。我想,借钱给他作为预支的脚本费无论如何要比给他一份工作或委托一个职务要容易得多,也谨慎得多;尽管在经济上我付出的代价要高,甚至可能对我构成完全的损失。

六月初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哈雷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和朵拉一起去海边。适逢我无事可干,面临着孤独的一天;除了忧伤的回忆,丢弃的抱负和早已杜绝了的愿望之外一无所有的空洞的一天,于是便接受了他的邀请。

他们驱车前来接我，坐的是一辆旧吉普。我上车坐在前面，哈雷开车，朵萝苔娅挤在我和他之间。她黑色的头发上缠着一块红色的薄绸头巾，使她容光焕发，绿色的眼睛更显妩媚。身穿一件布质沙滩服，也是红色的，上面印着大朵的黄花。肩膀、后背和腹部全都裸露着。

在阳光、炎热、凉风的伴随下，在越来越能感到的海水腥味中，我们渐渐远离罗马。朵拉半裸着的身躯和我相挨着。她的一条手臂压在我的手上，大腿不时与我相撞。她今天的情绪——不知为什么——轻松愉快，不时打趣，对我远比上次见面时友好，这一切很快使我陷入了令人痛苦的兴奋状态：一方面隐约感到有寻找欢乐的可能；另一方面是责任和良心的呼唤。

当我们到达距目的地海滨还有三十来公里的时候，哈雷想跟我谈谈脚本的事。他已开始动笔，但后来诸多疑虑又使他停了下来。想跟我谈谈他的这些疑虑，征求我的意见。

可是朵拉笑着反对：今天是休息日，天空那么晴朗，阳光那么灿烂，不应该讨论什么问题而要舒舒服服洗个海水浴和美美地吃一餐。

“我不愿听你们谈论工作！生活是那么美好！”在吉普车的隆隆声中她喊叫道。她的皮肤是天然的棕褐色，光洁得像海水冲得光溜溜的卵石。两只手腕上戴着宽宽的镀金镯子。

哈雷这次对她表现活跃有些恼怒。朵萝苔娅愈是嬉笑、饶舌，他就愈是严肃、沉默。但结果适得其反。朵拉仍是不停地说笑，玩笑频频向我袭来。

“我今天觉得挺美的，肯定很上镜头，”她说道，“为什么您不给我试试？我还会朗诵呢，知道吗？到了海边我就给您念！”

哈雷冷冷地打断她说：

“行了，这就够了！”说完一言不发，怔怔地望着前面的路。

有一种自然的直觉使我很理解哈雷。从一开始我就发现在他对这个女人的感情中有一种扭曲的双重性。那次朵拉举止端庄，他几乎

要将她相让于我；今天对她带挑逗性的愉快情绪却十分嫉妒。

过了圣·罗连佐塔（在拉维尼诺和海滨之间一条直路中间），我们停了下来。把吉普车放在一条小路上，带上哈雷和朵拉准备的食物盒，穿过一大片荒芜的松林，向海边的沙滩走去。

尽管是星期天，这里却游人稀少。远处拉维尼诺海边的更衣室隐约可见。几百米以外稀稀拉拉地竖着几顶游泳者的帐篷，还有些农村的临时设施，这一切使这里更像一个荒岛的岸边。

哈雷像所有的美国人一样，一有机会就会作出一副鲁宾逊的样子。他从沙滩上找到了些丢弃的木杆，把它们拾掇好，打进地下，搭了个棚架。干得很认真，一言不发；要我在一边帮手。朵拉则俯卧在附近的沙滩上。哈雷肯定在回忆他少年时代在米纳索达(Minnesofa)森林里那些有组织的野营。如果他那由于朵拉对我表示过分亲昵而引起的不快和为对我进行无声警告而表现出来的严肃神情能够在我眼前消失，那就好了。

他让我跟随他到松林，打开一把弹簧刀，砍了一大堆松树枝。让我抱一把，自己也抱一把，回到了沙滩。

朵萝苔娅站起身来，伸伸懒腰，打了个哈欠说："我都快烤熟了！""现在下水去，谁爱我谁就跟我来。"

我什么也没说，因为见到哈雷双眉紧皱，望着我和她。

"你想去就去吧，"他回答她说，"我们先要把这里拾掇完。"

我们把树枝铺在架顶上搭了个凉棚。我一边干一边用眼梢瞄着女人慢慢走向海边的身影。她穿着浅绿色针织泳衣，丰满的身段更加突出了。我收起目光对哈雷说：

"要是愿意和我谈谈脚本，现在……"

"不，我不想再谈了，今天不谈。今天要好好娱乐，不谈别的。明天一点钟我给你打电话，我们约个时间。你这么诚心诚意帮助我，我要让你看到我是在工作，也在考虑。

“如果你还需要钱，只管对我说。我们以后可以把脚本卖掉；万一不成，等你有了再还我。”

我伸过手去拿上衣，取出了钱包，想消除我们之间的任何不快。我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选择了最好的时机：朵萝苔娅离我们很远，什么也不会觉察到，也许这一天中再也不会有别的机会了。此外，我提出借钱给他，即使他暂时不急需，但如接受了就可表示并没有生我的气。

他正是这样做了。终于又向我露出了他那特有的微笑：柔情而又伤感。

“谢谢，你真够朋友。”

这种笑容和目光是那个女人在场时没有向我展示过的。

我们到海边赶上了她。然后一起上来用午餐，抽几支烟，闲聊，休息。三个人的表现都不同于早晨。大家都感到，如果还是那样就会不欢而散了，于是朵萝苔娅不再那么挑逗，哈雷不过于敏感，我则不太注意她了。

我竭力想分散注意力，尽量看别处。但每次当我的目光落在她身上时，就仿佛摄下了一张快速相，等独自一人时可以把它放大、再现。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久久不能入睡。身上感到太阳的灼热，眼中——假如我在黑暗中闭上眼睛——似乎有一个由太阳、沙滩、天空、海洋等混杂而成的金色火圈。在这个火圈中，摄下的快相一张张地放大了，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看到了朵萝苔娅从水中出来，宝石似的棕色皮肤上闪烁着无数珍珠似的水滴；看到了朵拉的背影，她撑着一只手靠在沙地上，姿态自然、优美，像一尊塑像。我似乎奇迹般地有幸欣赏一幅名画的背面——Delacroix 笔下的土耳其皇帝的姬妾。我又见到她用手抓着一只鸡腿、一块火腿贪婪地大嚼的形象。我无奈地对自己说，即使是这样粗俗、自然的她，我也喜欢。最后，我喜欢她的睡态，仰卧着悠闲地摆动一条腿；她眼睛里宝石似的闪光；她抬手的

姿势；甚至她那在沙子上上下蠕动，涂着红色指甲油轻轻摇曳着的脚……

第二天，我意外地接到通知，几天后要去巴黎。这种突然的决定在制片工作中是司空见惯的。我下一部影片要在那里开拍，大约要离开罗马两个月左右。

将近一点钟时，哈雷如约打电话来制片厂找我。不知为什么我没有提到出差的事，尽管行期已近。只推说那天我有事不能见他，第二天也不行。挂上电话，我明白了为什么没有告诉他要去巴黎的事。因为，突然间，几乎是不自觉地，我在酝酿着一个计划。

四

我知道哈雷每天晚上八点至十点去新闻处收集信息，从而给纽约的报纸不定时地发些通讯稿。我想在去巴黎的前一天晚上，就在这段时间，去玛尔古达大街哈雷的寓所碰碰运气。

是巴黎之行给了我勇气。万一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人一走也就了之。如果事后我感到有负于哈雷，至少有两个月时间不会见到他，离别可以平息我的内疚。

如愿以偿之后溜之大吉是风流韵事最理由的做法。谁溜不了，谁因工作关系而迟迟不走，有时甚至会使后果逆转。溜走不应是事情的结果，而是一种机会，要事出有因。要寻找机会使事情一完就有理由走开。

另一方面，我喜欢朵萝苔娅。最后一次在海边我觉得她也并不讨厌我。我喜欢哈雷，也尊重他。虽然我做得不那么漂亮，但这又有何妨？在终于决定去行事的那天早晨，我在刮脸时又产生了疑虑。但我

对自己说，风流韵事，瞬间的欢乐，与对朋友的尊重和友谊又有什么相干？我又不会损害朵萝苔娅。如果不是我，就会有别人找她。最后我甚至说，为什么别人都可以，而我却不行？

当然，也会想到反面。说实在的，即使不去找朵萝苔娅，也不会得所谓的相思病。为什么要为如此短暂的欢乐而受长期——即使并不太严重——内疚的痛苦呢？为什么要伤害我与哈雷之间迄今为止一直都十分完好的友谊呢？

于是，魔鬼又在反驳了：如果你的好奇心得不到满足，那个女人总会在你们两人之间。这仅仅是好奇，并不是爱情。正是为了拯救友谊，你应该稍稍地背叛它一下。

再说，凡是男人都知道，我们对反对强烈的欲望是强者；至于那些小小的愿望，就不值得去逞什么英雄，做丢失良机的好汉。

六月那一天的下午是多么漫长！玛尔古达大街的尽头夜晚迟迟不愿来临！

在浅蓝色温馨的空气中洋溢着一片欢乐：燕子最后的啾啾声，孩子们在车库门前玩耍的叫嚷声，以及行人的寒暄声、欢笑声。罗马正是圣·乔万尼周。罪恶不复存在，古代的圣者随着夏天初次吹来的微风再次显灵。万家灯火，勾划出种种轮廓。路人的眼睛发出喜悦的光芒。狭窄的街道上过往着零星的车辆。各种叫唤声，欢笑声，告别声；以及人们的姿势、目光，一切都似乎有着同样邪恶的寻欢欲望。如果我曾有过疑虑，都在不知不觉中全都消失了。当见到哈雷高大的身影从大门口出来，坐上吉普车朝阿里普特大街隆隆驰去时，我点上一支烟，毫不迟疑地向前走去。暗自庆幸世界属于善于抓住时机的人。

我走进大门，径自往里走去。一架收音机发出刺耳的噪音，下面玛尔古达大街上传来摩托车的发动声和邻近的喧闹声，这一切打破了周围的安静，但厚厚的墙壁使这些声音听来似乎很远。一盏残灯照在楼梯和破裂的地砖上，打破了黑暗。我经过迷宫似的许多楼梯、院

子、过道上去时，里面的寂静和黯淡使人颤抖，从而有一种神圣的感觉。

她来给我开了玻璃门，并立即笑着把我迎了进去。

“请进，坐吧！哈雷出去了，但很快就会回来的，(我知道，这不是实话。)请坐，对不起，这儿很暗，中间的大灯刚烧坏了。”

的确只有桌上那盏红色的小木台灯亮着。桌上有台打字机，旁边放着一堆纸；还有一把茶壶，两个杯子，杯子压在另外一些纸和报纸上面。

朵萝苔娅的穿着十分朴素。一条黑裙子和一件无袖的浅蓝色布衬衫。两条棕色的手臂一直裸露到肩膀，头发像平时一样在后脑挽个髻，梳得整齐光溜。

她请我喝了茶，吃了一块点心，是扁圆形面上撒了糖珠的蛋糕。糖珠有白的、蓝的、绿的、黄的、红的和紫的，混在一起形成奇特的色彩效果。这种点心硬实、香甜，十分可口，是家制甜食，古老文明传统的象征。

“是我做的，”朵拉笑着说，很高兴我如此评价，“是我们家乡的甜食。”

“这就奇怪了，”我说，“佛罗齐诺内我去过多次，却从来未曾见过，更没有尝过这种甜食。”

“这和佛罗齐诺内有什么关系？”她奇怪地问。

“佛罗齐诺内是乔恰拉的省会呀！”我有点窘迫地回答说，因为在罗马提到乔恰拉人，人们总带有一种轻蔑的神情，“您不是那儿的人吗？”

“才不是呢！我是普利亚人。这种甜食是普利亚的甜食，我们叫作‘斯卡契拉’。”

想到哈雷弄错了朵拉的籍贯，不免好奇怪。我们经常会把身边的人，心爱的人的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搞错！

普利亚人。我看着朵拉，觉得色彩缤纷的糖珠和“斯卡契拉”的香甜使她的美貌更增添了魅力。尽管是举止轻佻的职业妓女，仍不失其古风；仍是一个教徒，一个农民。

“我是来，”我靠近她在弹簧长沙发上坐下说，“向你们告别的。因为明天就要走了，去巴黎，要在那儿呆几个月。”我故意将离去的时间说得长些，为使想给她的那笔为数不少的钱更有理由。我拿出了一叠一万里拉的钞票。当然没有当着她数，但却设法使她一看便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朵萝苔娅的脸色沉了下来，就像我第一次来时那样，木然不动。

一阵尴尬的沉默。

“对不起，我就这么拿出来给您。”我说。

“那儿的话。”她冷冷地回答。

我把她看成十分贪婪，所以准备了现钱而不是支票，以便她可以背着哈雷方便地花。

现在她严肃的神情使我很狼狈。我原来深信她一看见钱就会像普通妓女那样笑逐言开，那么事情也就成了。可是她怔怔地望着前面，一言不发。我不知说什么好，沉默变得十分令人难堪了。我开始谈到我们那次去海边的旅行；谈到她如何上镜头；谈到很可能让她在我下一部片子里扮演一个角色。

“我从巴黎一回来就给您试镜头，看吧，你看吧，会行的……”为了博得她的笑容我急切地许着愿。

“谢谢，不过哈雷会不高兴的。”

“怎么会呢？是他自己说的，很愿意我请你参加工作。”

“他是说笑，其实并不愿意。”

“朵拉，你今天是怎么啦？”我凑过身去搂着她裸露着的臂膀，抚摸着她说，“为什么那么闷闷不乐？”

“那是因为感到失望，我以为您是哈雷真正的朋友，但看来并不

是。”

突然，我有了希望。现在她已经明说了，我的恐惧便不复存在。我只是在策略上犯了错误，没有别的。我这种无声的进攻，骤然在一笔数目过大的款子之下遮遮盖盖的进攻，是带侮辱性的。朵拉突然变得沉默是为了不立刻允诺；是为了不使我把她想得太坏，如此而已。我应该做得委婉些，感情上应有所表示，于是我立刻改变了方式：

“别说傻话了，朵拉！我对哈雷的友情跟这又有什么关系？上星期他什么也没觉察到，我还以为他觉着什么了呢。您不知道自我见到您之后，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您……”如此等等，我尽量避免听来太虚伪的字眼，这也是能做到的。因为我确实很喜欢朵拉，也确实好几个夜晚都想念她，于是力求不虚伪地向她表白我任性的爱情。

但没有奏效。

于是渐渐地我的声音提高了，而且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愈来愈大胆。我把她紧紧搂住，最后，当情欲已难以控制，再也无法以语言表达时，我企图吻她。

她猛地站起身来，挣脱道：

“不，我跟您说了我不愿意。显然您从未因这类事情而有过痛苦。我有过一个未婚夫，我们都快要结婚了，可是他为了我的一个朋友而抛弃了我。我痛不欲生，发誓不使世上任何一个人为了我而遭受我所经历过的痛苦。而哈雷是我所爱的人。”

“可哈雷是怎么也不会知道的呀！”我无力地争辩道。

“这并不重要。是我自己不愿意。我会总是在想这是在做一件有损哈雷的事，是对他的伤害，从而不会感到任何愉快。”

这番话她说得很诚恳，说话时正视着我的眼睛。

我生气了。

“那么说，”我恶意地说，“您也许可以和别人，任何一个男人；之

所以不愿和我，仅因为我是哈雷的朋友！”

“这是我的事，与您无关。我喜欢哈雷，不需要任何其他人。”

我本能地把手放到了留在桌上的那包钱上，想拿回来，或至少拿回一部分，但立刻感到了这一做法的卑鄙。错了，就应付出代价；哈雷得益是合情合理的，这样更好。于是把手抽了回来，让钱留在原处。站起身说：

“让哈雷今晚给我挂个电话。我可能回去较晚，还要整理行李，很晚都不会睡。什么时候来电话都可以，一定要把我找到。”

我深情地向她告别，久久地吻着她的手。她也同样深情地让我吻着。

“一路顺风！”她一直把我送到平台上的楼梯口说，“从巴黎给我们寄张画片儿来！我从来没有去过，非常想去……”

半夜三点，哈雷给我来了电话。我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就寝了。他首先充满激情地感谢我的借款；然后将两次借款的数目准确地加起来，对我说，这笔总数就作为出售脚本的预付款。

“感谢你，”他向我解释说，“不仅是为这些钱，尽管我非常需要；更是为了因此而必须认真地写作。如果写出的脚本以后不能卖出，你不必担心。我在美国有些很富有的亲戚，这你是知道的。迟早会把钱归还给你。”

“你迟早会回去工作的。”我对他说。

“我想不会。一切都令我生厌。我还什么都没有对你说呢。我们还没有好好谈谈。这种生活我已过了一年了。你不知道……”

他向我询问了巴黎旅店的地址。想一写完脚本就寄给我。也许在巴黎我会比较容易找到买主。

我们非常热情地互相道别。我又想起了朵拉。离开她下楼的时候（一路上我像个小偷似地跑下去，不走玛尔古达大街而钻小胡同，怕碰上哈雷）我对自己说，是的，也许是真的，她非常坦率、诚实，

确确实实爱着哈雷。可是现在却不那么深信。很可能她心里有算计，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有算计，也有真诚。总之，我感到困惑，也还有些恼怒。

几小时以后，当巴黎的火车从特尔米尼火车站开出的时候，我再也不去想这些了。

五

我在巴黎逗留的时超过了原来所预料的。原来只计划在那里将故事改写成剧本，然后回到意大利开拍；后来却在那里的 Joinville 制片厂开始工作了。对朵拉说的谎言，不想竟成了事实。

第二个月的月初，我收到哈雷发来的一份电报：

请于明晨九时亲自前往 Gare de Lyen 车站找罗马来车，向 4 号卧厢列车员取脚本打字稿。谢谢。拥抱你。

为什么不邮寄呢？

列车员交给我厚厚一打整整齐齐包好、捆好的文稿，还有一封信。

“泼金(哈雷的姓)先生说，如您需要和他联系可以通过我。我将很乐意为您效劳。明晚二十一点我回罗马，您如有事可以打电话到巴罗特路 3 号，‘现代’旅店找我。我叫鲍鲁索，认识泼金先生多年，我们是老朋友了。您是可以信任我的，再说，信上也写了。”

我不无诧异地望着他：为什么如此审慎？这是个粗壮的汉子，黝黑的皮肤，从外表和口音看来像是卡拉勃里人或是西西里人。胡子很长，两颊苍白，肌肉松弛，像赌场里收钱的或是报纸印刷厂的工人那一类睡眠不足的人。

“您是什么时候见到泼金先生的？”我问他。

“昨天上午在火车站，火车快出发的时候。他身体不太好。”

“病了吗？”

“我想是的，肝病。但问题还不在这里。我知道您是泼金先生在欧洲最好的朋友了……”列车员迟疑了一下，脱下棕褐色的帽子，拿出手绢擦擦渗出汗水的前额。“可以请您喝杯咖啡吗？我先去取下东西，两分钟就回来。”

他又上了车。于是我打开了哈雷的信。从英文译过来的意思如下：

亲爱的马里奥：

你不要因脚本篇幅如此之大而吃惊。同时请你原谅我让你到车站来取。我想星期天你有可能去，不致太麻烦。

读了脚本后你就会了解为什么我不能冒邮局可能万一错投的危险。另一个原因是：这是唯一的原稿，直接打出的，为尽快发出而没有复写。

你会发现，叙述的内容尚未结束；下一部分你回罗马时将会看到。

这是我仅用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写出来的。自从我决定不撰写脚本而将近几年来个人的生活如实写下来之后，工作得十分顺手。

开始我只想以我的经历、我的问题为依据，塑造人物，创作一部电影文学作品，但没有任何进展。我不能将所经历过的，目前仍使我感到痛苦的种种作为脚本的情节来描写。因为所受的创痛太深，不能将回忆和内心的悔恨掩饰起来进行创作。我只能忏悔，这就是我想说的。

叙述中的人名、日期、地点亦都是真实的。你看看是否有用，能否由此而编写一部电影。即使不能，那也无妨。一年来，我反复回忆、思

考所发生过的一切。它犹如磐石一般压在我的心上，十分沉重。不仅有向朋友，也有向自己倾诉的需要。唯有倾吐出来才能使我轻松。我感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

拥抱你。

你的哈雷

P.S.（自火车站）

列车员鲍鲁索，我自1938年就认识，是我可以完全信任的人，这次的文稿就托他带去。如你要给我回信，也请让他带回，不要邮寄。因不放心朵拉。你知道，见我打字她自然以为我是在工作，不会好奇多问；再之，她英语程度不高，也读不懂，可是信她是会打开的。

哈雷

又及于车站

鲍鲁索背着挎包，拿了一个小箱子和一大包东西下了火车。他坚持要请我喝咖啡，我们就去了车站的餐厅。在对我说起哈雷时充满友情，几乎有一种父爱般的情份，而这正是我所不喜欢的。他对我说，泼金先生经过那次不幸的事，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人都衰竭了。他以为我什么都知道，而我也不能对他说什么都不知道。最后，经过一番踌躇之后，他终于道出了请我喝咖啡的真正目的。他曾多次借钱给哈雷，共有五十万里拉。至今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事。我是第一个。他相信哈雷是个正派人，知道他在美国的地位，还知道他有富有的亲戚等等。从不怀疑他会归还这笔钱的。但是他，鲍鲁索，在罗马有一家老小：妻子和四个孩子。尽管收入不少，五十万里拉毕竟不是一笔小数目。

我答应他说，我会尽一切力量帮助哈雷，也相信他一定会偿还的。

"您应该劝他回美国去,"列车员最后说,"他在罗马干什么?你看,事情似乎有些荒唐,一个债权人劝债务人离去……可是我再次对您说,我是了解泼金先生的,只要他有钱就会还给我。但他只有回到美国才会有钱。这是肯定的。我这么说不仅为我自己,也为他好。您信吗?"

回到旅馆我立即开始看稿。以英语将之原原本本翻译如下,并纠正了哈雷在匆忙中的一些笔误。

哈雷的打字稿

我每日每时,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琼。但如果要我说出自我们第一次相会一直到最后所发生的种种,我觉得无法原原本本说得很清楚。因为那令人痛苦的一刻,——甚至仅是一瞬间,——总是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为生动地展现在我眼前,不断令人痛苦地闯入我的记忆之中。

这就是她那一瞬间的目光。我们最后一次来到罗马的第二天,在大旅店的房间里,琼在听电话,当我随便问了一声"是谁?"的时候,她那一瞬间的目光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阴沉、憎恶的神情。当时我未能完全明了它的含义。

我认识琼已有五年了。她已当了我四年妻子,是我两个孩子的母亲。我认为她是个无可指责的贤妻良母,而我却是个极不称职的父亲和丈夫。

我总是能将自己的过错瞒过她,或是我自己总觉得能够这样,如:经常发生的小小的不忠行为;每次去意大利堕落的恶习,以及我和朵萝苔娅的关系。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我正是在认识琼没几天后,通过她而认识朵萝苔娅的。

那是1944年的夏天。6月4日罗马光复了。在一位上校朋友所

征用的一所罗马别墅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琼。她是那么娇小，柔弱，敏感，聪明，备受痛楚的样子。我觉得她需要保护。一开始我就是在一种单调、忧郁、正直、乏味的感情驱使下接近她的。这种感情使我回想起对母亲的爱，是一种苦涩的责任感。既没有爱情的甜蜜，也没有令人陶醉的欢乐。

自那天晚上起，我就带着一种平静而怀有责任感的心情每天去看望琼。

我喜欢和她在一起，向她讲述我的童年，我的家庭，我的生活；诉说我的感想，谈论我的观点；和她一起去听古典音乐会，甚至可以对她谈论我艺术史的专业，并和她一起去看画展，因为她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绘画艺术有一种天然的判断力。但是在最初的日子里我从来没有将她抱在怀里的愿望。一直到一天的夜里，从博尔盖塞公园坐马车出来。我们已沉默了一会，仿佛沉醉在轻柔、宜人的夏日和风中。我沉思着，为我尚未成熟的感情感到痛苦、懊恼。这么说，这还不是爱情！这还不是我所追求的唯一的女人！谁知道，也许我也像有的朋友那样，为一种莫名的焦躁所驱使而结婚。不管什么样的婚姻，只要快结婚！我也像他们一样向现实反抗。在我对琼那种奇怪的、侠义般的感情支配下，我对自己说：喜欢她是我的责任。我瞟了她一眼，但并不扭过头去。看到她挨在我身旁，靠在坐椅背上，随着马车的节奏忧郁地摇晃着。娇小、瘦弱、敏感，是弱者和不幸的化身。我又一次明白了，我并不喜欢她；然而不幸的是我也第一次懂得了，正因为我不能喜欢她而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使她令我喜欢。这似乎是突然向我敞开的一种可能性；一种危险的、不幸的可能性。以前我总是喜欢，而且只喜欢身材高大，体态丰满的女人。现在，我注视着琼瘦小的身躯，略呈圆形的腹部，我对自己说，这也许是口味问题。有一种喜欢尝试不喜欢东西的口味。喜欢尝试正是因为不喜欢。主意一定便像弹簧似的跳了起来。突然我喜欢上了这个略呈圆形的腹部。我带着苦涩的欢乐

向她转过身去，紧紧搂住她纤细的腰肢，把她抱过来对着我，几乎像咬噬似地痛苦地吻着她，可怜的琼!

但她不愿与我作爱。那天夜里不愿意，在罗马整个夏天的任何一夜都不愿意。第二年，1945年，当我们在巴黎重逢时也不愿意。直至最后在纽约，我们订婚后仍是不愿意，甚至结婚以后也不愿意。我们是1945年12月在费拉特尔非亚结婚的，琼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就在那天夜里坐马车游览博尔盖塞公园后的两、三天，下午一点钟光景，我走进了罗马市中心的一家小饭馆，在那儿找到了琼。她坐在桌边和一个意大利女人在一起用餐。这个女人非常抢眼，似乎成了这个小饭馆里众多男士们的注意中心。

我第一个印象是:她是个妓女，或和当时的意大利人学外国人不准确的发音所说的，是位“细姐”。这些“细姐”通常是瘦小、憔悴，有些神经质，外表面黄肌瘦，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而这位却与众不同:威风凛凛，近乎庄严。她本能地看着周围的男人，向他们频送秋波。她的每一种表情变化，或严肃、或嘲讽，都使人想到房事;似乎都在暗示性爱。在她高高的前额上，线条优美的侧影中，闪烁发光的眼睛里，和在唇间的褶皱中都有一种古典式的、果断的、优胜者的神情;有一种允诺，一种神秘。只要一使眼色便可与这些男人之间确立一种关系。

见到琼在这种小饭馆里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自然使我非常惊讶。我们一般上午是不见面的。我总是晚上七点钟去旅馆接她，在外面吃饭;然后在一起散步、跳舞，参加晚会，直到深夜十二时。当时她向我解释说，是一个士兵把朵萝苔娅(那个女人的名字)带到医院来的，她需要进行一种非常简单的治疗。为了向琼表示感谢，便请她吃饭，要她尝尝真正的意大利菜。她说，朵萝苔娅是那么谦恭，是那么诚心诚意地请她，竟使她无法拒绝。可是我在听琼说这番话时心不在焉，只是想看朵萝苔娅，想怎样才能设法再见到她，并没有在意琼的话。

朵萝苔娅袒胸露臂穿着一件花色鲜艳的绸子衣服，黝黑的皮肤

晒成了古铜色;在欢乐的聒噪声中,在小饭馆温暖的角落里,她身上的一切:眼睛、牙齿,以至手上的镯子,都闪闪发光。一束阳光从对着胡同那扇敞开着的大门射进来,恰好斜照在她桌上的桌布和杯子上,照到她那桌布下面穿着黑漆皮鞋和涂着红趾甲的脚上。她脸上的线条是古典型的,目光中有一种胜利在握的性感表情。自我第一眼见到她便立刻强烈地感到需要她;这是一种使我颤抖,使我迷茫,使我惊恐,使我绝望的感觉。我惶恐地觉得自己不般配,但尚能思考的那部分意识却指出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女子。如果我是意大利人,我也许会说这是个对我胃口的女人。

我坐下和她们一起用餐,尽量不让琼发现我心神不定。琼坐在我面前,和朵萝苔娅紧挽着,这更加增添了后者的魅力。也许这是一种对照:几乎是神圣的爱情与亵渎的爱情二者典型的对照。也许因当时无法向朵萝苔娅表示我的爱慕,也不可能和她约会,因而使第一次的印象如此深刻。朵萝苔娅从来没有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使我倾心。当时我对她一点也不了解,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

然而,我却极为容易地在第二天就找到了她。还是在那个小饭馆,还是那个时刻。

那天晚上我没有和琼在一起……

六

从那天晚上直到六年后的今天,朵萝苔娅是我唯一真正喜欢的女人。

但我总羞于承认。对她的身份我一直都很清楚,从未受过蒙骗。一开始我就知道她是妓女,甚至当我决定和她一起生活的时候,她仍

然过着妓女的生涯。

开始，有好几年，我总避免和她一起出去。不仅是怕琼知道，而是由于她那独特的外表。我甚至不愿陌生人见到我走在她旁边。至今仍是这样，所不同的是现在我几乎是以欣赏的目光看待这种羞于她的感情。

也许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些年来，从第一次见到她直到不久以前，我和朵拉的关系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总是不时地分开。只有1947年春天例外，那年她陪我去意大利南部和中部旅行，而琼则带着孩子在卡不里岛上。

只要一有可能离开她，我就立即离她而去，直到按耐不住时又回去找她。通常是十五天，最多一个月的分离后便又想回去找她了。如果我在纽约或巴黎，知道不能立即去罗马，对她的欲望便会急骤增强，达到顶峰，直到下次见面得到满足。但即使是欲望极为强烈达到顶峰的时候，我的审视能力仍是清醒的。朵拉那时对我至高无上，犹如女神一般；但同时我仍然知道，她只不过是个最普通、粗俗、贪婪的女人。她的神力并不是常在的，不是属于她，而似乎是我的愿望所造就的。

也许因为这个缘故，直到不久前我从未和她谈及过琼。在第一次见面的那个遥远的夏天，我没有告诉她琼是我什么人，只是说才认识的。后来也没有告诉她我不断见到琼，更不用说告诉她我已与琼结婚了。我害怕假如朵拉知道了，会在我非常需要她的时候作为武器向我勒索。我小心翼翼地将与琼的生活和与朵拉的生活分开，注意使任何一方不和另一方即使是在十分细小的问题上发生任何关系。每一次离开琼要去找朵拉时，我总是在琼面前准备好无懈可击的借口；而每次离开朵拉回到琼处时，总要留意不使朵拉看出我婚后生活的迹象。朵拉在罗马从不知我真正的住址，从巴黎、伦敦、纽约，我总是只给她办公室地址。

今天当一切已了结的时候，我又想到那些极端审慎的做法。我明白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我怕琼知道我和朵拉的关系，或怕朵拉知道我已有了琼，而是由于一种更为深沉、更为隐蔽的思想感情：在我内心深处同时存在着对两个人的爱；既爱这个又爱那个。我使她们相信，自己也相信，当和她们其中的一个在一起时，我只是自己的一半：我和朵拉在一起时，我力求表现出是个独身汉，浪子，酒鬼，赌徒，旅游者，艺术家，不负责任的浪荡汉；和琼在一起时便一切相反：是诚实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忠于职守，热情工作，品行端正，好学不倦，意志坚强。

然而，我对朵拉那种周期性的冲动开始时并未引起我的重视，或可说毫不重视。认为她只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每十五天使我喜欢一次，仅此而已。我邀她的开始几次，在作爱的前后总要花几个小时跟她一起谈话、散步，但很快就发现这是无益的仪式。如果在事前进行则肉体受折磨；如果在事后则精神上受到痛苦。我感受到一种如哥德所说的谎言的欢乐。相信只要愿意便可以沉溺于这种欢乐；任何时候也都可以放弃这种欢乐而不受惩罚，因为并没有使这一享受变为恶习的危险。我面前的生活十分清楚：我爱着一个值得爱的女人，这便是琼。她是我的伴侣，我的妻子，我孩子的母亲。朵拉则是一种消遣，一种非常令人愉快然而是肤浅的消遣。只要愿意便可以放弃，所以可以毫无顾忌，毫不内疚地纵情沉溺其中。就像抽烟、喝酒这种从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就沾染上的习惯一样，相信任何时候都可以戒掉的。但事实是，往往想戒的时候就会发现已经太晚了。

1944 年 10 月 15 日，琼的医院转移到法国去。这是我们认识后的第一次离别。汽车纵队晚上从拿波里出发，第二天上船直开马尔西略(Marsiglia)。

琼出发前不久，我去战地医院和她告别，医院在去加西亚(Cassia)路上的一幢别墅里。

虽然我们的医疗队伍组织完善，但在转移的最后一刻，混乱也是不可避免的。琼无暇顾及我，拿着箱子、药包，在卡车之间跑来跑去；每次经过我面前就对我甜甜地一笑，眼睛里含着泪水。

我坐在吉普车里，也透过泪水注视着她穿着合身的蓝色制服的瘦小身影。但我的痛苦中掺杂着焦急，像鸡尾酒，苦涩而令人陶醉。是两种成分的混合体，正因为混合才有力量。一种是离开琼的痛苦；另一种是期待朵拉的欢乐。终于可以整夜和她在一起了。在这以前我从来不敢。因为从琼成为我朋友的那天起，我就请求她接受在夜间任何时刻都可以打电话给我的权利，而在旅馆是不能接待女客的。尽管琼从未实行过这一检查，但现在她的离去使检查突然变为不可能而使我感到自由。看到琼离去，不知何日才能重逢，我感到痛苦；正是这种痛苦使我在想到很快便能拥抱朵拉时有一种特殊的感受，而一切又增加了我与琼离别的痛苦，我已将她看作是未来的生活伴侣了。

在激动中我走出了吉普，开始在营房、帐篷、救护车和准备出发的卡车之间徘徊。

突然，我转身向后，因为觉得看见她了。透过营房的窗户似乎见到她在里面。那是她！正在打电话，只能见到她的侧面。她看不见我，因为我在暗中；她则是在有灯光的营房里，尽管灯光很微弱，只有一盏汽油灯。她在专心致意地打电话，神情非常激动，因此也就更不可能看到我。我透过窗户上发黄的透明纸，在微弱的灯光下看着她。她踮起脚尖对着过高的话筒在讲话，这使我觉得她更娇小，更需要保护，比平时更加可亲，于是我心里充满了柔情，万分激动。

我的琼是一个多么值得敬慕的女人！

我的精神是多么贫乏，而与之相比，我的肉体又是多么强壮。

精神、肉体，这些只是当时我不停地抽着烟，一边看着琼，一边又想着朵拉，在十分激动的时刻对自己所说的话。事实是既没有精神也没有肉体，仅是一种需要：需要爱，也需要憎恨和痛苦。

琼终于笑盈盈地向我走过来了，一边整理着从军帽下掉出来的一缕秀发。她给谁打电话呢？给一位神甫，她的忏悔神父，向他告别。我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作告别的拥抱。不自觉地把她干瘦有酒精味的身躯与朵拉高大、丰满、富有弹性并带有浓郁香水味的身体做比较，从而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但这还不是最后的告别。琼脸上堆起了满意的微笑，因为此刻她的工作任务已经结束，上校准许她乘坐我的吉普沿着去拿波里的路走几公里。

我们走在汽车纵队的前面穿过了罗马城。天色已晚，也许是最后一次在一起看这座古城。我们曾在这里相识，并一起度过整整一个充满爱情的夏天。环视狭长而迂回的街道以及矗立在夜空中高大阴森的十七世纪的建筑；它们从来不向天空仰望而只是俯视人群。这些纷杂的人群像是东方的闪米特人，只是更加忧郁，更加固执；有如他们的语言，软弱而富进攻性，但在某种意义上仍不失过去的伟大。

在店铺的广告灯下，在柜台前乙炔灯的火焰中，有小商贩、做黑市交易的、乞丐、导游、拉皮条的、男女娼妓、龟客……这是那天晚上和琼缓缓行驶在吉普车里再次见到而又要即将离去的那个世界。这是朵拉所熟悉的世界。尽管我对自己说，我会回来的，而且不用过多久便会不顾一切地一头扎进这里，但此时此刻我似乎感到和琼一样在向这个世界告别，要离之而远去了，又似乎觉得仿佛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世界……

在夜间的微风中，我们在一个高地上停了下来，这是一条路的拐角处，刚过阿里恰的地方。附近没有树，我们的脚下是一块平地，四周向下斜去，一直到无际的尽头，仅从我们来的方向有一段可以隐约见到下面罗马的灯光。头上是星光灿烂蓝色的夜空，星星在闪烁着。迎面扑来的凉风带着近处海上的腥味。

我拥抱着琼，把她紧紧搂在怀里，久久地热烈地吻着她，一时间（几个小时来第一次）忘记了朵拉。我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那样想占

有琼，我想琼在那一刻也有同样的愿望，至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接近这一愿望，然而却没有可能。我刚一解开她的衬衣，第一次用手指触到她瘦弱的身躯上细嫩的皮肤，就突然听到了汽车纵队经过阿里恰附近拜莱桥上时发出的隆隆响声。我们还未来及分开紧紧吻着的嘴唇，便转向那个方向驰去，看到了车队前面几辆救护车的前灯。已离得很近，现在一切都晚了。

别了，琼；别了，我的爱！她跳上了一辆车（几个女同事已经在上面了），在汽车的隆隆声中，在人们的一片喧闹中，在长长的车队扬起的一片尘土中，消失了。我伫立在吉普车旁边的草地上，没有思想，没有感情，默默地看着她离去。

最后几辆车也已渐渐远去，它们红色的尾灯消失在黑暗之中。琼随之向南而去，不知何日才能重逢。我上了吉普车慢慢向罗马驶去，心里仍思念着琼。

经过几公里之后，当罗马的最初几幢房子映入眼帘时，我才想起了朵拉，最初的念头并不是欲望。这怎么可能呢！我竟把她忘了，而且此刻没有任何需要她的欲望，这使我感到无限惊讶。我自由了，可以去她那儿了，她正在等着我（我事先打电话通知了她）。

可是那天夜里我并没有去找她。我感到幸福，就这样感到幸福，因对琼的爱和痛苦而感到幸福。我紧张的神经在令人欢快的折磨中振动，将每一种感觉都予以夸大，像被一股热流在这群星闪烁的微风之夜系在车队上，沿着海边慢慢向拿波里而去。

如今，我冷静地、自嘲地对自己说，那天夜里我那么爱琼正是因为她要离我而去。这是一种痛苦的幸福，我所爱的，我想占有的琼，就在那一刻消失了。我以为我之所以幸福是因为找到了可做我妻子的人；而实际上是因为有一种感情（也就是对琼的感情）使我摆脱了对朵拉的需要而使我感到满足：我因为独自一个人而感到幸福。

我没有去朵拉那里，也没有打电话通知她。驱车上葛莱高利安诺

(Gregoriano)路到了你的寓所。我亲爱的导演，你窗户的灯还亮着。我停下车大声喊你。贾科莫也在你那里，还有一个匈牙利人，名字我忘了，是一个官员，我在P·W·B的同事。他们在下棋，你记得吗？

我没有睡意，痛苦而又幸福，因为相信是在爱着。下一盘棋，和有教养的文化人相伴，正是我当时之所需。

于是上楼到了你那儿，喝威士忌，下棋，一直下到了天明。匈牙利人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下累了，贾科莫便以他那热情的嗓子朗诵海涅的诗句。当然，诗很美，朗诵也很精采。然而如何区分诗句的美和我在聆听朗诵时的幸福感呢？又如何区分那几个月里我们美国人和那么多可爱的欧洲人之间友情的价值和战争、胜利、光复在我们身上激起的豪情呢？

我就寝时有些疲乏，然而平静而充满信心，似乎在将一个宝库急急忙忙藏起。这个宝库就是琼；是深信琼对我的爱和我对琼的爱。

入睡时朦胧之中还听到贾科莫朗诵的声音，好像在给我催眠。

七

琼的魅力能持续多久？

当然，琼在远处时比在身边更有吸引力。可是，在第二天的阳光下，我立刻沮丧地感到，我对她的爱已不如昨天晚上。

一束阳光从半掩着的护窗板之间闯进来，照亮了昏暗的房间；外面传来了各种来往车辆的隆隆声，夹杂着汽车喇叭声和流动摊贩的叫卖声。Bottijaro！一个欢快的嗓音一声声重复地叫唤着，渐渐远去，溶入到一片喧闹之中。这一切犹如一出戏的引子，一看便知道是部好戏。罗马十月份平静而温暖的一天就这样向我宣告开始了。看着那

一束金子样的阳光，听着外面嘈杂的喧闹声，我明白了。在这太阳的温馨中；在这来往的车辆和那叫唤着的嗓音中，有一个美味硕果清甜而坚实的核心，这便是朵拉。我见到了床头柜上放着的一张纸条，这是昨夜临睡前给琼拟的一份电报，电文是：

"琼，我的爱，如愿嫁我立即回电战后结婚拥抱你。"

我重读了一次，没有勇气在打字机上打出来发走，为之而伤感。

但几个月之后，还是将这份电报发出去了。世界在一次离别的痛苦和冲动之中，但不是在罗马。头一天上午在萨瓦和琼告别，走了一整天，午夜十二点到了尼斯。P·W·B，即我所属的部队机关设在一家大旅店内，同时还有几个指挥部，所以那里有一个工作效率极高的邮局，但最关键的是因为我在尼斯，而不在罗马。那里没有朵拉。

当我驱车离开琼后，一路上接连几个小时都想着她。而且越走对她的思念越是深切。因此一到尼斯，便跑步穿过旅店大厅径直走到接待处，那里挂着个醒目的牌子"邮局"，我便把电报发了出去。

只是一个放了几个月才发出去的电报，仅此而已。但为什么放了那么久？是考虑我应做出的决定？考虑婚姻的意义和重要性？

相反，我是在尽可能避免思考这个问题，就像对一件注定要发生的不幸事件那样。如一个年迈病危的亲人，我们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尽可能推迟它的到来。想他将会死去是恶意的诅咒，似乎会促使死亡的来临，于是便装着这不会发生，忘记它，这便是推迟它到来的办法。

最初的三个月我便是这样做的。尽管每天都想琼，因为每天都给她写信，却装着不知道这样做最后的结果便是和她结婚；我的每一封信，每封信上的每一个字都是跨向这注定命运的一步。假装是徒劳的，因为我感到任何犹豫、任何考虑和分析都将减弱我这一出自本能的、无根据的结婚愿望。

后来我多次自问，直至今天我仍然自问，那种疯狂的真正的原因

是什么？我见到一些朋友，有美国人也有欧洲人，都以同样盲目的固执，同样荒谬的自我谴责而走上了结婚的道路，是青年时代结束后在真正的严肃的成年人生活面前的懦怯？是急于要考验自己的力量，或摧毁这种力量？是对不能给予和不可能给予我们任何新鲜感而变得机械、重复，并不可避免导致罪恶的性行为的厌恶？

我想还有更多其他的或好、或坏的原因，总之不只仅因为这些。

人对不幸的需要至少是与对幸福的需要相等的。

几个月前我离开那些朋友时，他们还是自由自在，心境平静的；现在却见到他们愁眉苦脸，语不成句，并不时深深地叹息，禁闭在不久前作出的倒霉的决定中。

我很清楚，我的经历很可能看来是奇怪而与众不同的，这你以后慢慢会了解。因此，我坚持至少在结婚这个问题上应和欧洲、美洲与我地位相当的同龄人相似。结婚是一件有普遍性的事，所以结婚的理由也应有普遍性。我可以毫不费力，很自然地问我的朋友，从而揭开他们怪异的行为，但既然这是这么多人所共有的，也就不该称之为怪了。我可以说，他们生活中那些为我所不知的方面，虽然大家认为是平静、正常的，很可能其复杂和矫饰的程序并不在我之下。

这样，在那三个月里，我一方面虽然准备和琼结婚，同时却又经常不断地与朵拉幽会。

和朵拉在一起只要对她没有欲望就兴趣索然。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故意推迟满足欲望的时间，以求不致过早地感到扫兴。这样做我认为还有道义上的用意；有一种高尚的、有情意的目的。我对自己说，推迟或有时取消做爱是为了使朵拉不受委屈，但实际上我很清楚，朵拉并不在乎，她有她的算计。如果一个晚上我只是带她去小饭馆吃饭，再到电影院里在黑暗中温存一番，然后给她几千里拉却并不去她那里过夜，那她就有可能多赚一个晚上的钱，因为第二天晚上我几乎肯定是要去的。之后如一切听其自然发展，或说一切正常，就会

有一段时间即不打电话给她，也不去找她。每一次，不是她而是我觉得受辱，甚至由于朵拉在做爱的最后一刻之后的一刹那突然一瞬间对我变得无所谓而十分意外。这是如此的奇怪，我几乎觉得是不可能的，于是每一次都固执地希望这种现象不要发生。怎么跟你解释呢？

琼在罗马的那些日子里，我从未和朵拉在一起度过一整夜。我对自己的解释是：要早早回旅馆，怕琼打电话来，于是急于匆匆忙忙回去。所以在性欲得到极度兴奋以后，我不能安静地留在朵拉那儿和她的灵魂有所交流。在她那庞大的身躯内，灵魂总该是有的，即使是笨拙、粗野、渺小和可怜的。

然而，当这第一夜来到的时候（我想正是琼从罗马出发的第二夜）等待我的却是失望。回想起来，失望是因为使我惊讶的正是一点也不觉得惊讶。这不是玩弄词藻，下面是我的解释：

那天，直到最后的失望发生前，我一整天都充满了幻想。早上醒来，从半掩着的护窗板见到阳光，听到罗马的喧闹；下午给朵拉打电话，晚上和她一起到特拉斯戴维莱的一家小餐馆去用餐。然后坐着马车慢慢回家。打开大门，在昏暗的门厅里紧紧搂着她柔软的腰肢，进到她那间充满低级香水味苦涩而温馨的房间。当脱去了衣服，躺在床上，终于感到她贴着我的皮肤时，我幻想着——一整天都在想着——这一令人痛苦的无止境的不断起伏的欢乐应该永远享受不尽：一夜，第二天一整天，甚至整整的一生。为什么不可以？过去我从未有过这种经历。在这以前每一次刚得到满足我就会立刻想到琼，不是朦胧中的琼，而是实实在在的琼，想到我应尽快回到旅馆，因为琼可能来电话。在焦急与不安之中，我跳下床来，穿衣，付钱，道别，出门，跑向旅馆。所以对于朵拉的灵魂是否也令我感兴趣；我是否也能够，也可以对她有些爱怜的表示；我对她全部肉欲之情是否也有可能加上人情和友情的色彩；是否和她也能沟通等等一系列问题，我从不试图了解。因为，在做爱之前，从我这方面只是一个爱慕者发出的求索的自

白，即使在请她抽支烟和喝杯水时也是如此；从她那方面则是另一种自白，是偶像特有的语言。而我听来就像迷人的歌曲，即使只要一杯水或要一支烟。同时，桌下大腿的相碰，脚尖接触，使这种双重性的独白充电似的兴奋，犹如祷告跪凳的硬木和祭坛的大理石将祈祷者的痛苦变为无法言状的快乐一样。

事完之后也没有话说，或说事完之后说的是比较实际的片言只语，尽可能简短，我似乎要删去这偶像的存在。

"这次我只给你五千里拉，因为还没有领工资。"或是，"明天我去拿波里，咱们不见面了。"或是，"别起来了，没关系，我去旅馆里洗。"如此等等。偶像则是很聪明，她一动不动地在床上抽着烟，一声不响。即使很热也将赤裸的身体遮盖起来，直到下颔，似乎揣猜到了我突然希望她消失的愿望。

但那天夜里不是这样，那天夜里我幻想着希望着，相信这一欢乐是无止境的。幻想着各种方式……静静地在朵拉旁边吃饭时，我自言自语重复着可能在房间里的黑暗之中对她说的疯话，想象着那无穷无尽的享受。激动得几乎没有进食，那少数的几口也要她喂了我才吃。面包和肉要她先咬了才给我，水要从她喝过的杯子里喝。朵拉甜甜地笑着，几乎有些神秘地做着这一切：每次不转动脑袋，带着固有的笑容，用一双大眼睛慢慢地左右环视，看到没有人注意，便很快地放到我嘴里。

当我们赤身在床上拥抱时，我也像以往一样，为所感受到的幸福而惊叹，这是无法形容的，最强烈、最完美的幸福。贴着她的肌肤，紧搂她的躯体，在她的体温中得到温暖。突然停下，一动不动地紧紧拥抱着，似乎我们的躯体已合而为一；然后又活动起来，又以另一种方式感觉到分开了，从而再一次得到结合的乐趣：她在我之中，我在她之中，是一种神秘的，意想不到地令人陶醉的游戏。这次也不断地重复着。

隐约感到是在干什么禁事，是多年不信会有勇气干的事；而现在似乎是为这勇气而感到意外、惊讶和幸福。

这次我也想，我的幸福是不会完结的，一生如此，至死如此。在那一刻我几乎希望朵拉对我说，向我提出荒谬的，过于贪婪的要求。如要一大笔我无法满足她的金钱；或甚至要我娶她为妻。我会设法弄到这些钱，会和琼解除婚约的，因为在那一刻琼对我已无关紧要，琼已不复存在。但我一刻也没有想到由我首先向她提出钱和结婚的事，因为我作出的牺牲，不论是什么牺牲，必须是由她提出，由她要求的，而不是我主观想象的，唯此才会使我高兴和满意。真正的神是非常苛求的，我对自己说。

但她却像平时一样，没有说什么，只说了几句我教过她的，或暗示过她的话。

在那最高潮的一刻，尽管我非常渴望能使这一刻永远不会完结，然而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没有任何意外，也许这没有发生的意外就是意外，像过去一样仅是一次庸俗的狂热。琼在远处，在旅途中，在海上，谁也不会打电话到旅馆去。我绝对自由。但像往常一样，突然间我变得十分沮丧；疯狂地痛恨自己，厌恶朵拉，厌恶她那在我身下的棕色的肥胖而柔软的身躯。在瞬息之间，我敬之若神的同一件事物使我厌恶得颤栗。同样由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水味，顷刻之前使我陶醉，现在令我作呕。

那天夜里我发现了，对琼的思念，怕她来电话等等一直只是我自己内心深处一种下意识的借口。在那一瞬间的高潮之后，似乎有什么东西从我内部毫不留情，很快地分离出去，将我带到了遥远的回忆中：派克斯峰那边丹佛科罗拉多上的大草原，父亲在矿场当职员时我度过的童年；大西洋上的一个夜晚，我仰面躺在船舱口的帆布上，静静地望着天上的星星，吸着烟和啜着威士忌，听着身旁的友人在黑暗中平静的语声。我发现我内心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激情将我分成两个

不同的自我。有一种需要，一种令人痛苦的需要，使我感到要将他们协调起来，联合起来，熔为一体，使他们永远合而为一。

那天夜里的种种就鉴于这种需要而来，虽未达到目的却仍不认输（以后仍不断地有这种需要）。想到这整整一天以及晚上在小饭馆里的种种兴奋和狂热，我迫使自己留在朵拉身边，并破天荒地故意对她说那些友情、人性等等虚伪的谎话。我完全有意说谎。说什么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是一种对她甜蜜的柔情，开始爱上了她等等。这种谎言使我自己也十分痛苦，但仍是说着，我希望由假装而慢慢会变成真的。然而说着说着，我却渐渐地对这些谎言感到厌倦了，甚至开始也讨厌起身边的朵拉来，突然一下停住：我疲惫已极，睡着了。

过了不多久我又醒来，立刻感到不同，与刚才判若两人。我又恢复了肉体上的要求（虽然是微弱的）。在那一刻是去是留完全取决于我，可以毫无留恋地离朵拉而去，对她的需要和回旅馆好好洗个澡的愿望是相等的。但我愿意试试，留下来再试一次。希望刚才没有出现的奇迹现在能出现。

整整一夜都留在这里。在这里也看见了朝霞，看见从护窗板的缝隙中进来的太阳，也听到了逐渐增大的城市喧闹声和小贩们的吆喝声，但这一切对我再也没有前一天早上的魅力了。只是对前一天上午，当对爱还抱有希望的时候所曾有过的一切，有一种怀旧之情。现在一切都相反：只有失望、苦涩，和不可能的爱。阳光灿烂，罗马在苏醒，生活在继续。我在这杂乱的床上，挨着这古典美人丰腴的身躯——我曾如此爱怜，至今仍十分欣赏的身躯——凝视着射向房间阴暗处的一缕阳光，倾听着街上的喧闹声。和以前一样，犹如被滚滚的浪涛所拍打交替地被抛向奴役和自由两个极端；不可抗拒的诱惑和无法忍受的厌恶轮番地支配着我。尽管竭尽全力固执地痛苦地希望将这两方面联为一体，融在一起，但却从未做到。

常常是，只要想到朵拉就会使我想到琼；反之，想到琼就会使我想到朵拉。那年圣诞节在罗马就是这样。

朵拉和她的房东邀我一起到圣·彼得教堂去做午夜弥撒。然后去蓬刚巴诺路，到她们家里吃便饭。尽管她们一再邀请，我都没有接受，以是新教徒为藉口而推辞了。弥撒和天主教使我想起琼，宁愿独自留在家里想她。

圣诞之夜来临了。午夜前不久我送达莱·麦克阿多回家后返回旅馆(他是我的同事和朋友，也许你还记得)。达莱住在圣·阿妮埃塞教堂附近。我一个人开着吉普走在诺明堂纳大街上。在皇后大街路口，我正欲刹住车，好让一辆出租车过去，它突然从右边过来，向相反方向驶去。车内坐着一个女子，穿着与琼一样的美国军装，模糊中她的脸看来竟也有些像琼。这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她，她在法国，今天早晨我还收到她的来信。然而这件事却使我心潮起伏，难以平静，感到无法再回旅馆了，于是将车转向荒芜、寒冷、阴森的博尔盖塞公园，在几个妓女面前，没有企求，没有愿望地缓缓开着。想打电话给麦克阿多，去找他。但知道这时他早已和女朋友上床了。去找彼得·托姆金斯？这时他可能在哪里？他曾告诉过我要去参加意大利朋友的一个晚会，但我忘了是哪些人。后来我明白了，我并不希望和彼得或达莱在一起，而是想跟朵拉做伴。由于出租车窗口里琼的形象而使她的形象不可抗拒地重新出现在我面前。

于是去了圣·彼得大教堂。

大教堂中挤满了人群，空气中充满了潮湿的气味，还有阵阵的脚步声和叽叽喳喳压低了的谈话声；更有管风琴和合唱队不协调的和声。人群表情迥异：有神情漠然的，有感到厌烦、无聊的，有好奇的，有虚伪、表里不一的，也有十分虔诚的。虽然他们来此的原因和表现是如此的不同，但他们都是教徒，能互相容忍。

在如此众多的人群中要找到朵拉和她的房东非常困难，或竟是

不可能的。我开始在教堂里转，先从右边再到左边，想从入口到后殿来回走一遍。忏悔祭坛上正在献祭，一串串的电灯和大、小蜡烛交相辉映。信徒们，或非信徒们则在暗处。我一边走一边向后看着中殿的中间一行行跪着的人们，以及不规则地，夹杂在中间站着的人，看是否能见到朵拉。

我很幸运，没过多久就找到了她。

她一见到我，就很高兴地向我做了个手势，当然是诚心诚意的。没想到会在这里看见我，知道我是为她而来的，为此而幸福。

她跪在房东旁边，两人头上却戴着四褶的白头巾。在那个老鸨婆房东布满皱纹、涂了脂粉的脸上，白头巾显得太简朴了，一看就使人觉得不相称，是偶然的装饰，但朵拉戴着却非常合适。她那古典式的脸庞，直视前方的炯炯的目光，和披在前额的白色三角形非常协调。似乎用魔法把这位放荡的“小姐”变成了十足的古代乡村妇女，变成了 Corot 时代的典型人物。

我接受了她们共进晚餐的邀请（和她们一起回家）。尝了朵拉亲自做的家乡甜食“斯卡拉”。我这次是由于突然见到与琼相似的人才来到这里的，然而对此并不感到后悔，至少并不比其他任何一次更感到后悔。

圣诞日那天我下午一点钟醒来，意外地发现自己在朵拉床上。

八

战争结束了。七月中，我在巴黎赶上了琼。之后是几个星期幸福的日子，在周围一片真正的狂热之中看来是幸福的。最后决定回美国去。

目标很明确：我将她介绍给我的父母；她把我介绍给她的父母，然后尽可能很快结婚。

她的家是信天主教的。琼是在费城的奥索里奈修道院受的教育，而且宗教的实践从未停止过。但不可能仅是宗教的原则使她执意拒绝和我发生爱的关系（无论是在巴黎或是罗马，以及最后一个战时的冬天我去萨瓦找她时都是如此）。因为从天主教的观点看，我们每天晚上分手时那极其刺激、过分的、令人极为快感的接触、拥抱、亲吻、爱抚，都是严重的罪过（与婚前成为情人是一样的）。

我在和琼谈话时从不提到这件事，但她极为聪明，不可能不知道。有一次当我涉及到这一话题时，她似乎作出了有顾虑和羞怯的样子，以思想的保守作为解释。从修道院出来后，她进入了大学，就在大学里，和许多美国女孩子一样，有了一次经历，但事后非常后悔，现在希望我们之间的爱不会像那次所发生的那样。

从我这方面则非常乐意接受这一解释，很乐意不去寻根问底，不去说服她做即使是很自然的事。也许我想，放弃这种最后的决定性的试探，可以人为地使结婚增添乐趣。结婚的前途使我暗暗担心，要使这件大事至少保留一定的吸引力和新鲜感。我是为蔑视我之所好，甚至为了对抗我之所好而坚持结婚的；如果没有新鲜感的吸引就会减弱决心，就会临阵改变主意。

这样，每晚我们分手之前，在旅馆大门口或她的房门前透过泪水和微笑握着手久久对视时，一个小小的、苦涩的声音在我内心说出了真理：如果我真的需要她，便不可能等待；放弃爱的自然要求的这种相对的幸福标志着我的爱是不完美的。

但我需要的正是这个，这正是我下意识地用各种微妙的方法企图得到的。

譬如，我与朵拉过了一夜回到旅馆后，便开始回忆那长久的痛苦和失望的沮丧，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爱琼，只爱琼……朵拉是逢场作

戏，是次要的欢乐；尽管常常去，尽管要求强烈。就像有人喝酒、抽烟一样，如不节制会危害健康，但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意义。我只希望我的生活意义是：有琼为妻，为生活伴侣，为我孩子的母亲。朵拉只是一个陋习，我忧郁地对自己说。这一陋习对我没有任何危险。每次事后，性欲的魅力便化为乌有；一切又回到理智的光辉之下，琼便是这光辉的源泉。此外我确信，随着时间的消逝，对朵拉的迷恋也会渐渐减弱，去找她的次数会愈来愈少；渐渐地，会离最后一次幽会愈来愈远，离解脱了的未来愈来愈近。我对自己说，这是肉体上的需要，没有别的。从此对朵拉不予重视，虽然后来在美国、法国，由于没有她，由于她的长期不在而使我十分痛苦；虽然无论什么方法也不能摆脱对她周期性的、着魔似的需要。

在罗马和巴黎时，我曾试着去妓院和找街上的妓女，临时补救，聊胜于无，但效果适得其反。几小时之后对朵拉的需要达到了不可抗拒的程度，似乎将她与不熟识的妓女比较之后，我就更有意于她，几乎要屈服于她了。记得有一次，那是1945年的夏天，在法国，我送琼回旅馆后已很晚了，想起了朵拉。当然，她在罗马，当晚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去她那里，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我在巴黎的林荫道上截住了一位女郎。一刻钟之后从肮脏的小旅馆出来，跳上一辆出租车跑到机场，找到一架军用飞机，中午十二时以前已经在蓬刚巴诺路的二楼，和朵拉一起在床上了。

那位可怜的街边女郎给予我的短暂的欢乐带来的是深深的厌恶，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决断的疯狂，我在机场给琼挂了电话，把她从梦中叫醒，告诉她因公务关系突然要去罗马。我的声音在颤抖，幸好琼在半睡状态中。如果不是那街边女郎如此刺激了我，决不至于说出那些谎言。

去年冬天，我却相反逃离罗马的朵拉，而跑去萨瓦找琼。这我已和你说过。

那时她在阿尔克河和伊赛莱河汇合处的圣·皮埃尔岛，那是战地医院的扎营地。

前一天的夜晚我是在朵拉家度过的。在她那幽黑的房间里，在她的大床上，紧搂着她的时候，我又进入了幻想。没有任何离开罗马的愿望，甚至幻想永远不再离开罗马了。一边爱抚着我那谜一般的偶像身上丰腴的棕色皮肤，一边暗暗想，我不走了；与此刻的欢乐相比，琼算什么？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如果我是诚实的，就不要去见她，永远不再去见她。这不仅是为我，也是为她自己。

然而，一切又像平时那样结束了，比任何一次不太疯狂的希望结束得都早。在冬天朝霞里的寒冷中我感到幸福，幸福地独自一个人开着吉普，在隆隆声中沿着阿乌莱拉的柏油路向北驶去。海是黑色的，推着泡沫滚滚向前；高高的天空是灰色的，近海的沼泽地一片绿色。我的全部自由都在于疯狂地走向另一种奴役中。

阿尔克峡谷在欢迎我。它在浓雾弥漫的岩石间，由于下雨而仿佛在朦胧之中。

我们从小旅馆的玻璃窗向外望去，看见了在雨雾中沉静、空旷的车站广场。食物精美可口，炉火燃得熊熊。楼下的大房间里最后一班铁路职员们在打牌，一边啜着陈酒。我们久久地相对而视(琼的眼睛在栗色的短发下甜美、明亮)，而膝盖则在桌子底下相碰着，似乎那轻轻的磕碰是我们至高无上的乐趣。

琼和我第一次一起渴望着一种正常的、平静的布尔乔亚式的生活。想象这一切是非常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我们将来在普林斯顿家里的生活模式。

但这神圣的幸福梦比我和朵拉一起做的世俗幸福梦更为荒谬。

在普林斯顿，我认识了她的家庭。他们住在契斯纳特山丘，地处市郊。一幢红砖楼，宽敞而有气派，四周是一年四季都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地和高大而名贵的树木。她父亲、兄弟和叔伯都是纺织工业

家，同在一家家族集团公司里工作。

当琼把我作为未婚夫介绍给他们，并同时宣布圣诞节将结婚时，我想不会给他们留下什么好印象。只有琼的母亲，一个性格温柔、开明乐观的人，对我甚为客气。她的父亲、兄弟和一个偶而在场的叔父（她有三、四个叔伯），则是以冷淡而彬彬有礼的态度，几乎带有几分讥讽的样子，接待了我。他们的讥讽是通过我而指向琼的。他们把她看成一个固执的小疯子；要是不想使事情更糟，最好是顺着她的意。琼想出嫁吗？唯一能使她改变主意的做法是同意她。反对只能使她提前结婚的日期。当然他们是对的，但却不善于将这种想法，这种秘密的愿望，表现得隐匿些。表面上他们对琼说好，并向我伸出了红色的、骨骼粗大的手，但在金丝边眼镜后面的眼睛里和薄薄的嘴唇上却一直对我们露出一种讥笑。似乎在说，好啊，孩子们，你们干吧；小疯子琼，你干吧，能够幸福你们就幸福，但我们知道得很清楚，甚至已经看到了，这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母亲的性格则和琼一样，热情到固执的程度，但温柔、文静，感情极为细腻。她出身于一个爱尔兰信奉天主教的家庭。一生崇拜两件事：音乐和古老的欧洲。第一个爱好每天弹一曲 Steiway 便可得到满足；去欧洲旅行则是年轻时，结婚初期的一种习惯，甚至是一年一度的典礼。但后来便较稀少，去的时间也愈来愈短，也愈来愈难成行了。琼的父亲是个严厉、缺乏感情的商人。对这些旅行从来不好眼相看。他爱妻子，但不爱妻子之所爱。无论对音乐还是欧洲，他都没有好感。第一种爱好，他看成是女人消磨时间的方式，无伤大雅，可以容忍。对于第二种爱好，则从不能分享妻子的热情。

“再见了，亲爱的……”每次将妻子送到纽约轮船码头的前一天晚上，他总对她说，“三个月后再见，痛快地玩玩儿吧！你知道我多么遗憾因公务而不能陪你同去。我遗憾的只是不能在你身边，不是别的。我不赞成你每年都要去英国、法国、意大利的这种癖好。在我们

美国，甚至不出这个州，就有许许多多风景如画的地方，非凡的城市，有很多兄弟民族，你全然不了解。真是非常可惜。你看，要是你愿意在美国旅行我可以陪着你。”

那时不像现在乘飞机旅行，每次到欧洲去，来回路程加上逗留的时间就要两、三个月。

到琼一够年龄，父亲的告别演说就向母女二人同时发表了，直到母亲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上得以战胜丈夫的大美国主义：将琼送到瑞士蒙特雷斯 Montreux 寄宿学校就读。这既是因为偏爱和强烈的信念，也是为了更有充分的理由每年去大西洋彼岸。琼本人为得到父亲的准许，也确曾竭尽全力斗争过、哀求过。最后父亲之所以能同意这种极端行为（似乎我们这里就没有好学校！可有的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学校！多少人到斯密史大学来，到瓦撒尔来，欧洲许多女孩都来这里受教育！）是想到女儿和母亲如出一辙，想要改变她是徒劳，还是让她去吧，听天由命。使他感到安慰的是两个儿子，都十分像他。于是集中精力教育他们，果然不出几年便可以将他们吸收到公司里来和自己一起工作了。

然后是大战，琼在欧洲服役时，母亲自然不能离开费城到欧洲去。战后她很想恢复以前的老习惯，但父亲已经高龄，确实老了，即使一个星期也离不开她。

我尽管是纯血统的美国人（父亲、母亲均是），和琼的家庭一样，但却给这个家庭留下了是欧洲人的印象。母亲对我的印象很好；父亲、兄弟、叔父则很坏。我和琼在普林斯顿度过的几星期不可能改变这种印象。我是个地道的美国人，但由于他们那种单纯的好恶论，使我成了欧洲人。因为我没有偏见，不习惯将美国看成世界的中心（这要感谢我的父母，美国人）；因为我重视艺术，以及与艺术有关的一切；因为我完全不喜欢谈论除了音乐、美术、文学以外的东西，于是我便是欧洲人。

我相信这些单纯的人们是正确的。尽管我是数代纯血统的美国人，但我是欧洲人。

我父亲是第一个教我这些道理的人。父亲是工程师，也一直干工程师的工作。从不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旅行，但却十分热衷于绘画。直到六十五岁前，不管什么天气什么季节，每星期六下午都带着色彩盒和画板到乡间去。

我幼年时每当临睡前去向父亲吻别晚安时，总见他坐在椅子上嘴里衔着烟斗，在一片蓝绿色的烟雾中完全沉溺于比萨罗 Pissaro 或柯勃特 Courbet 的复制品中。在烟草的色调和气氛中，柯勃特比平时更为精采。我不声不响地站在他身旁，等着他弯下身来吻我。他虽已看见我，听到我进来了，却仍一言不发，只将一只手臂搂住我的肩膀，看着梦境般的法国风景画。画面在他膝上展开，像幻想中的窗口。他透过烟斗散发出的烟雾，眯着眼睛看画，默默地让我也和他一起看，始终沉默着。我听着父亲平静的呼吸声，感觉到他的体温，嗅着身旁好闻的烟草味。那边，母亲在饭厅和厨房里安详地整理着餐具和餐巾。有时，在这黑夜的寂静之中传来近处火车如诉如泣的鸣叫声和碰击声，火车使我想起旅行。夜间在暖和的小床上又听到了这一叫声。为什么在深夜的黑暗里，如此痛苦地叫唤着离去？为什么？我无法知道。

父亲希望我成为一个画家，很满意能将我引上从事艺术史研究的道路。在学院毕业后，便将我送到纽约，在纽约大学奥夫纳教授指导下从事研究。

奥夫纳教授建议我立即确定课题，提议我研究十四世纪锡耶那的画。二十六岁时我去了意大利，此后便几乎一直留在那里，总是转辗于锡耶那、佛罗伦萨与罗马之间，直到大战爆发前不久。

我回到美国时，父亲早已不在厂矿工作，现在，那些工作对他已太繁重了。有一家公司了解他为人十分正直，便在芝加哥的公司里给

了他一个小小的职位。

于是我便将琼带到了芝加哥，介绍给我的父母。1945年12月27日圣诞节后的两天，我们终于在普林斯顿结婚了。

琼和她母亲一样是天主教徒，所以结婚都按天主教的仪式进行。

然后我们去了尼加拉瀑布，故意做了美国中产阶级常规的蜜月旅行。大战期间和战前，我们二人都多年远离美国：琼在瑞士念书，我在意大利从事研究。现在，利用结婚的机会，我们感到有一种愿望，几乎感到是一种社会义务，去遵循一切最普通的美国习惯。可以说这对我们简直是一种娱乐；混杂着无聊、开心和虚伪。我们一面无情地讥笑我们同胞的天真无知；一面学着他们做，以此取乐。

但这仅仅是为时很短的一段时间。奥夫纳在普林斯顿N·J美学系给我留了一个副教授的位置。

每周的课时并不多，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因此不需要我住在普林斯顿，而普林斯顿离纽约又不远，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继续住在纽约租下的一套“乡间”住宅里，等待大学大多数课程的开始。

琼想留在纽约，但我装作嫉妒，或相信真是嫉妒而表示不同意。于是我们在那所小而闻名的大学里，一种闭塞的、有选择性的、狭隘的小圈子里，隆重地开始了我们的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

九

这从一开始起就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情，几乎是自然而然的。只要按蜜月旅行的闹剧继续演下去就是了。当然调子不如上次那么夸大，要模仿的虽也都是些白痴，但并不那么粗俗。

在尼加拉瀑布，我们是一对小职员。在普林斯顿则力求表现得与

我们的同事们完全一样。他们的夫人们把我们称作哈雷·泼金教授和教授夫人。可惜这次有某些方面还是真的：我们真是泼金教授和夫人，我真的上课，有学生，常去系俱乐部等等。于是从这部分真的开始，渐渐地，我们也为这种伪装所俘虏了。

现在，当我回顾这一切的时候，谁又能说，尼加拉的闹剧不已是隐藏的萌芽；是一种企求得到严肃的（为我所不取的），正常生活的不自觉的初步尝试？谁能说，不是早在圣·皮埃尔岛或早在罗马，在我与琼初次相识的一刻，我就有迎合潮流的需要；就感到对平静的布尔乔亚生活，对秩序井然的家庭、固定的工作和子女绕膝的天伦之乐有着怀旧的情绪？谁说这不是一种弱点，一种懦怯，一种对于冒险的放弃，对于我所追求的更深的生活情趣的放弃？

这正是懦怯的欲望的一种伪装。这些欲望最初悄悄地袭击我们，不让我们警觉，为了容易使我们接受而巧妙地伪装得很轻松。由于我们的理智对此十分抵触，于是便利用我们的虚荣心。我们总是那么自负，自信能抵御那些欲望，所以很乐意嘲弄它们，装作也有这些欲望的样子，以愚弄它们而达到道德上的满足。但就在这么做的时候，在我们自己身上试验、品尝着它们的特色和美味的时候，渐渐地，不知不觉地习以为常，最终成了它们的俘虏。

终于有一天我们的理智也突然逆转了。那些过去我们一直视为低级、荒谬的激情突然变得高贵，成了真理。我们郑重其事地对自己说，找到了光明大道，尽管是自我安慰的欺人之谈：我们也和所有其他人，所有的正经人一样，是普普通通的人。于是终于松了一口气，再也没有疑问了。事情是那么简单，只要谦逊一点就够了。我们相信自己是谦逊的，于是从那一刻起我们就毁了。

谦逊是这样一种美德，有的时候却相信没有！

医生对琼说她怀孕了的那一天，我们相信自己是谦逊的。当然，我们对这一消息有思想准备，在期待着它。但只有当我陪着琼去纽约

看医生回来的路上，开车经过长长的哈得孙隧道时，我们才觉得自己是两个几个月后就要有第一个孩子的普普通通的父母。

我们忧虑，激动，甚至感到幸福；但与此同时我又仿佛有一种屈从的感觉，直觉地感到被迫接受一种命运。也许不是我的命运，而是预示着一件事情的失败。其结局、方式、后果尚不得而知。我记得隧道里曲折的墙壁，千千万万发亮而肮脏的白磁砖，像一个走向未来的恶梦；还有那震耳欲聋的响声，那飞快的车速以及和我们相迎或超越我们的其它车辆。我开车时，琼将手伸到我臂下，我不时在肘子和肋骨之间夹一夹她那纤细的小手。我夹她的手是为了更好地感觉它，为了和她交流，为了以这种方式对她说些什么。说什么呢？说我喜爱她吗？不是。是说我就在她身旁，也在想着她，希望她知道。

一出隧道便走上霍博肯高地，重新看到了朦胧的夜色、天空，和远处河上轮船的灯光。我打开车窗，吸一口新鲜空气，点上一支烟，打破了沉默对琼说：

“琼，你说我们今晚该不该告诉突斯夫妇？”

米哈伊尔·突斯是年青的考古学教授，和夫人一起住在我们附近的一所小别墅里，至今已有四个来月了。我们每星期二、四、六晚上从八点到十二点一起打桥牌。

来普林斯顿后，在社交关系中，我们的虚伪行为最大限度地表现在与突斯家的关系上，因为这块土壤最为合适。

他们夫妻二人都很讨人喜欢，彬彬有礼，然而精神十分空虚。

男的颀长身材，脸色红润，一头金发。他全部生活目的就是摆弄那一小撮浓密的胡子；收藏几个烟斗和欣赏西服式样。这三件事足以使他全部奢望得到满足。虽然是美国人，虽然以美国人自豪，看来却更像英国人。她妻子则不仅空虚而且十足是个蠢货。桥牌对于她就是生活的一切。他们没有子女。

不过突斯家的夜晚是美妙的。在绿色的桌旁，漫长的春天之夜催

人欲睡。对浪费时间的内疚，中断的研究工作，弃置一边的阅读材料，几乎是那美妙中最令人愉快之点。在打牌之外的平静的时间里，所有的回忆、悔恨、愿望、期待、希望和懊丧都一笔勾销。淡淡的激情——与搭档的配合和与对手的斗争——则是这平庸、乏味的夜晚的一种点缀。威士忌的瓶子和高脚杯，绿色的地毯，彩色的纸牌，米哈伊尔讲究的西服式样，突斯太太灰色带黑白小圆点的衣服，小小的钻石耳环，整齐而对称的金色卷发，琼那娇瘦的手和戴着手表、镯子(是我结婚时送她的白金镶蓝宝石的镯子)的纤细的手腕——这一切构成了全部现实。除了它们，什么都不再存在，没有任何东西打扰我们。终于我们也成了蠢才；终于我们也幸福了。

然而我和琼之间，我和琼之间又怎样呢?

我内心有一种隐隐的、固执的、绝望的愿望要去爱她。

我对你说过，结婚前琼从不是我的，第一次发生关系在尼加拉瀑布。如果发生在此以前，谁知道我还会不会和她结婚。

失望吗?这个字太简单了。我从来没有希望过，没有想过要像迷恋朵拉那样迷恋她。既然我对琼的爱是理智的，是感情上的，那么和她发生的肉体之爱就仅仅只是一种机械行为。感情与理智始终凌驾于其上而不会消失在其中，不会与之融为一体，很容易想象，这一行为在最初会使我觉得其激烈程度甚于与朵拉。但事实远非如此。

但琼与我在一起的感觉当然犹如我之和朵拉，这一想法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就这样使我每次能足够地兴奋。

我和朵拉在一起时，全身都沉溺于对她的钟爱之中，从未想到过我自己，和自己的身躯，即使想也是极为短暂的一瞬间，带着自卑和自鄙的感情。

和琼在一起，我靠在温暖的床上，想的只是我自己而没有她。如果不是那短短的必要的一会，如果不是激动而引起的抽象的需要，我甚至不愿意碰她那瘦小的、发红的、神经质的、皮肤干热的身躯，甚至

觉得她不存在。我只想到我自己，想到琼是多么需要我。有时甚至将自己看成是朵拉在远方的延伸。想到琼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朵拉的延伸，使我一时感到陶醉。

快感是十分短暂而爆发性的，几乎是苦涩的，痛苦的。我的身躯在这不是所爱的躯体上叹息；为这没有魅力的人而叹息。任何时刻，在任何渴望的高潮中，我的脑子都是清醒的。

我想着琼，她是多么聪明，多么善良；是个多贤惠的妻子，又是多么爱我。

这些想法在我们的身体融合为一体时使我感动，几乎每次都感动到流泪。我打开灯，想看看她此刻的眼睛，期望至少在这一刻能攫取到一丝爱。看着她的时候，我也想象着在爱着她，即此刻我也感受着爱情的洋溢，感到鱼水交融之乐。我对自己说："我从琼的肉体感到愉悦，而琼也是我尊敬的人，是我柔情相爱的人，因此我对琼的爱情是完美的，既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

我可怜见的！我竟不懂得爱情正在于不可能如此理智地去判断；爱情是不能有肉体和精神之分的。

我打开灯，凝视她的眼睛；她半闭着的蓝灰色的眼睛也望着我。在极度欢乐之中那迷茫、痛苦、濒于一息的眼神似乎在对我说："你是我的上帝，随你怎么处置我都可以！愿意的话可以杀了我。"

就像我在高潮时望着朵拉所想的一模一样。在和朵拉做爱时我眼睛的表情就和此刻琼的眼神一样。

朵拉的眼睛又是怎样的呢？每次我都焦急地，以最大的狂热注视着她。朵拉绿色的大眼睛就像金子的颗粒一样，没有任何表情，至少没有任何我能懂得的表情。我觉得它们是一个谜，然而又有些严峻而悲愤的样子。但如果进一步追问就会发现这里并不隐藏任何谜，也没有任何严峻、悲愤可言。一切都是我的想象，我喜欢它们是谜一般的、严峻的、悲愤的，于是便成了这样。不管怎样我都爱之若狂，我已溶入

其中，忘掉了一切。我觉得可以久久不倦地一直望着这双眼睛，事实上，我以前正是这么做的。

现在我和琼在一起时，我的眼神对于她犹如朵拉之对于我。

我的手臂在琼的身下被压得发疼，但直到关节僵硬时，我才抽出来。

为什么要这样？爱情像勇气一样是不能给予的，但我总对自己说琼爱我，她是幸福的。我觉得愧对于她，想努力掩饰我的冷淡。但我忘了，如果双方都感到同样满足的时候表现是很简单的：各自转过身去，安静地入睡。

和琼在一起总是缺少些什么：一种自然的需要和愿望得到满足后的自然的快感。我不愿意承认这点。固执地一次又一次想方设法发狂似地想使它实现。

最后倒在床上备受苦楚也令人痛苦。我挨在她身边，思想却离之很远。焦急地等待着进入梦境，这才是我唯一的乐园，但睡意却迟迟不来，还不知要等多久！

在美国乡间寂静的深夜里，我又听到了火车凄凉的哀鸣，使我回忆起童年时代的夜晚（那时就像现在一样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使我心里一阵阵抽搐）。童年时代总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少年时代只留下依稀的记忆；青年时代也几乎已过去了。而今，几个月之后，我的第一个孩子就要诞生。难道这就是生活？那种宁静，那种正当的乐趣呢？既然上帝给了我这种愿望和想象的能力，我觉得我有权利得到。为什么永远不能尝试？是的，我朦胧中觉得是永远不能了。原本是可以见到那光明，可以尝到那甜美的滋味的，但再也不能得到了。我觉得天空像铅一般压下来，阻挡了我的未来，空气令人窒息。火车又在下面更远的地方鸣叫。我永远不会幸福。

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一命运。我对自己说这只是我的过错，我做错了。如果我有勇气娶朵拉而不是琼，一切不就都解决了吗？这不是惩

罚而仅是一种错误，当然是不可挽救的，但只是一个错误而已。这样想使我得到一种安慰。

夜间向自己和琼掩饰的痛苦，白天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来，我无法避免。极小的争执也是口角的理由。窗户的开和关，地上的一张纸片，菜的凉热，甚至去突斯家琼换衣服稍慢一些，都会使我火冒三丈，大发雷霆。不过我从没把激怒和晚上的不快联系在一起，更没有发现也许是因为我的过错而使琼变得神经质和令人讨厌。我总有现成的理由解释：夫妻生活就是这样的。

用餐时就更糟了。有时我无法忍受她吃饭的样子，只得把目光朝下或看其他地方。但如果她嚼生芹菜，吃苹果或咬硬面包皮，那发出的声音简直对我是折磨。于是我想到了朵拉，尽管她受的教育远不如琼，在桌上就餐时也不太文明，但她吃着番茄酱拌面条时，嘴巴不仅从未使我讨厌过，而且还很爱看她那种健康、自然、粗犷的样子。

一天，琼穿了件新衣服回来，是一件宽松的由两片料子合起来的绸子衣服。我们美国人称之为孕妇服，是专为掩饰妊娠状态而为孕妇设计的。

衣服我既不喜欢也不讨厌，无所谓不置可否地看了一眼。令我生气的是第二天晚上我们换衣服去突斯家时琼满不在乎地说的那句话：

"亲爱的，你觉得我穿那件孕妇服好吗？"

我再说一次，她在说孕妇服时绝对地自然，没有加重语气，没有把它放在引号里。这就是说她已完全接受了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们的习惯，也成了一个普通的美国女人。

总之，她说话的声调使我生气。但我没有对她说，而只是取笑她的衣服，将之与普林斯顿那些中年妇女去市中心大旅店打桥牌时相比。

琼气得满脸通红，臭骂我，打开衣橱将衣服撕成碎片，最后嚎啕

大哭。去不成突斯家了，我给他们打了电话说头痛。夜深了，琼仍在不停地哭骂我，但后来我们终于和好了，并不比以前争吵的时候更糟。我对自己说，如果我的讥讽使她感到那么委屈，那琼该是非常爱我的。

对两个不和睦想改善处境的父母来说，一个并不期待的孩子的诞生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相反只能使这些冲突隐蔽起来，变得更深刻，更复杂。

不过在怀孕的最初阶段和产后的头几个月，也许是一种新鲜感的作用，我们的关系表面上改善了。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们决定如果是男孩就起名叫杜卓；是女孩就叫唐娜黛拉。没办法，无论是我还是琼心里都还装着意大利。

1946 年 11 月 2 日杜卓出世了。我们在费城琼的家里度过了圣诞节，然后回到普林斯顿。到四月又开始了烦恼、急躁和争吵，直到一天晚上奥夫纳从纽约给我来电话：

"哈雷，你想去意大利吗?"

"什么时候?"

"马上。"

"可我现在有妻子，还有一个五个月的孩子。"

"带上他们。"

"那普林斯顿这儿的教学呢?"

"全由我安排。"

是奥夫纳自己接受我来普林斯顿的，现在又信赖地委我以重任。本是邀请他去的，他不想去，也没有时间。这项工作要为我们政府去跑遍意大利半岛，逐个地区准确地检查一个个文物(包括艺术品、雕塑和画)，了解意大利艺术遗产在战时受损的情况。

第二天我去纽约奥夫纳的办公室见他。他坐在堆满纸张和照相复制品的书桌后面；矮小，干瘦，似金黄又似银白的头发；短胡髭，齿

间咬着个小烟斗;眼睛炯炯发光,潇洒、矫健、彬彬有礼。我觉得他似乎是出现在我命中的守护神,是现代的巫师。只消他那粉红色上面露出青筋的细嫩的手一挥动,薄薄的嘴唇一露出笑容,就能决定我的命运。

"你知道什么是教科文组织吗?那是联合国在巴黎克莱勃路一个很大的机构,要是你这次在意大利干得好——我相信你能干好的——,那以后就会在教科文组织有一个位置。你总不想在新泽西呆一辈子吧?"

"不,奥夫纳教授。"我激动地回答说。

他说的英语很蹩脚,带着德语的喉音和法语的颤音,但有着犹太人、奥利地人和阿尔萨斯人的魅力。这位矮小的老巫师给我布置了个别任务。为调查战争所造成的损失则首先要到华盛顿,国家的部机关去,那里可以了解到详情。但我应为他个人了解以下方面的情况:由于战争而散失的一些私人藏画的去向;某些壁画目前的状况;及有些画的准确尺寸等。因为他正要出版的一本目录,其中缺少这些数据。意大利学者已给他寄来了,但他信不过。最后还有些照相复制品要让专门的摄影师按一定的要求上色。

我努力地记录着这一切,情绪愈来愈激动,我将会是最完美的执行者。但当他说到我应该去意大利哪些地方并逐个念出地名时,我已经在想朵萝苔娅了。即使琼与我同去,她带着孩子也不可能跟着我到处跑。她可以住在罗马或佛罗伦萨,我也许就可以带着朵拉旅行了。一直以来都没有给她写过信,怕有把柄落到她手中而遭勒索。一年多过去了,我还能找到她吗?她仍然住在蓬刚巴诺路吗?想着久别后的第一次相见,在长长的离别中我没有期望过能再见到她。听着奥夫纳的声音,像在听最美妙的音乐。看着他笑盈盈的脸,但再也不明白他说话的意义了。我的思想已远去,我已看见了罗马的太阳,春天蓬刚巴诺路上郁郁葱葱的树木,驶过的无轨电车,商店,人行道上门口放

着金属小桌子的酒吧，黑色的大门，肮脏的楼梯，朵拉在二层上的房间，嗅到了她低级的香水浓郁的香味……奥夫纳立刻发现我不在听他说了。他去准备一份备忘录，把一切要求都准确地写上。一星期后我从纽约乘飞机出发前来取这份备忘录。

晚上在普林斯顿，琼很高兴。真是太好了，简直不敢相信那天的电话是真的，但现在再也没有疑问了，的确要走，要回意大利去了！

我立刻对她说我去了之后为奥夫纳和政府的工作要经常在外奔走。

“你和孩子就住在佛罗伦萨或罗马；或两地都住些日子，也可住在锡耶纳。我只要有可能就去看你们，至少一星期一次。”

“我哪儿也不去。不去罗马，不去佛罗伦萨也不去锡耶纳，”她定着眼神，若有所思，声音坚定，胸有成竹地说：“我和杜卓要去卡不里岛。”

十

卡不里岛对一个六个月的婴儿是不合适的，特别在那个季节。琼一说完，我立刻就想到了这点，但见她如此坚决，我不敢马上提出异议，以免争吵。我们都很高兴，为什么要破坏情绪？琼从未去过卡不里，很想去；我要离开她几个月，至少应该让她自己选择去的地方。总之，现在我对她的固执已有所领教，只要反对她便适得其反，于是我沉默不语。一到罗马就背着她，给要为孩子作检查的琼斯医生打电话，征求她的意见。

琼斯医生证实了我的忧虑：卡不里岛的大气放射性太强，对婴儿不合适，根本不应该把孩子带到那里去。而且，时值焚风（西洛可风

——撒哈拉吹向地中海的风）季节，不断地有著名的“南风”吹来，空气中充斥着非洲沙漠的灰沙。我比较放心了，因为明天医生给孩子检查之后会说服我妻子的。

一到罗马后，背着琼还打了另一个电话。我们住进了大旅店的两间房间里，几分钟后杜卓啼哭不停，琼急忙去为他准备奶瓶。我借口机场的行李未到而下了楼。

电话号码我记在脑子里，进了电话间，关上了门。心突突直跳，能找到她吗？她还愿意见我吗？

我从电话间的玻璃门向外望去，旅馆的大厅里十分安静，只有一些常住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再过一瞬间也许我就能听到朵拉的声音了。透过玻璃隐约见到的大厅、会客厅、地毯、吊灯、鲜花、匆匆而过的侍者，和坐在我前面小桌旁的大堂副理——一切都是那么庄严，意气不凡，就像在等待着奇迹的出现。一切都充满着朵拉，充满着我急切的心情，尽管是如此急切，我却不能不观察周围，似乎处于激动状态下紧张的细节能在空间伸张，具体化并得到确认。勃克逊曾分析过这种心理现象，但并未解释清楚。也许就像思想仅是一种思维的语言一样，激情也是空间、时间、接触、感觉和物质而已。

不是她而是房东的声音，是那个自称是护士其实是鸨婆的老妇人。朵拉向她租用了一间房，并和她合用厨房。实际上她们俩是好朋友，相依为命。我听出了她的声音，她也立刻听出了是我。朵拉不在，这时不在家，但她在罗马，感谢上帝还是住在那里。

“上校先生，你可真是的，从来没给我们写过信。我们连你的死活都不知道。朵拉呀，上校先生，她都生您的气了。您知道她多生气！委屈极了。我们每天都念叨您，上校先生。朵拉想是再也见不到您了。可是我总对她说，‘你看吧，上校先生会回来的。你不急着等他，他就回来了。’去年冬天我们真不好过啊，上校先生。前天我和朵拉还在圣母面前祈祷您回来。圣母保佑啊，上校先生。”

一开始我喉咙口就堵住了，现在竟可笑地想哭出来。

“朵拉什么时候回家？”

“谁知道她呀，这可怜的孩子。您知道她得工作，挨家去做裁缝。现在生活程度是这么高，您也觉着了吧？什么都涨价，生活难以维持呀！”

“我几点钟打电话能找到她？”

“我怎么对您说呢，上校先生……您明天上午十二点钟的时候打来试试吧，因为十二点以前，她，可怜的孩子，得睡觉。”

我当然什么都明白了。做裁缝做到早上凌晨四点！

“要让她给您打电话吗？要是您留下电话号码……”

“不，谢谢了。我是路过罗马，不知道在这里停留多久。也许今晚就走，马上就走。”

“不看看她就走？”她毫不客气地说，“那您打电话来干吗，上校先生？”

“我走了还回来，肯定回来。您对朵拉说，我在欧洲要呆些日子。再说，也可能不马上走，还说不准。希望明天中午十二点能给她打电话。”

明天十二点正是该带孩子去琼斯医生那儿检查的时间。

这是个美国儿科医生。看到我们侨民迅速大量地增长，无疑会有许多人求诊，战后便在罗马定居了。我们来此之前，在纽约有许多朋友对我们谈到过她。

杜卓由于路途的劳顿而病了，是重感冒，不愿进食，琼斯医生并不认为情况严重，但当琼提到卡不里岛时，她不同意带孩子去，至少暂时不能去。

琼不认为如此。令我吃惊的是她以无法解释的固执，一回到旅馆便把门卫叫到一边（这个门卫名叫古里埃莫，是个能干人，我们前几次来已认识），在他手里塞了一笔可观的小费，让他设法去找罗马最

有名的儿科医生。于是这位门卫便去打电话，在电话机旁说了一刻多钟的话之后，终于与医生约定了，在当天下午就诊。

这位儿科医生对琼说的正是她愿意听到的话。对于琼斯医生的反对意见，他超然地笑笑。说卡不里当然不是对婴儿特别合适的地方，但也别太夸张。孩子不一定会在那里生病。他认为带去并没有任何严重的危险。于是开了处方，嘱咐要特别小心；并介绍了一位卡不里岛的儿科医生，名叫古奥莫，据说特别擅长医治婴儿。最后祝琼旅途愉快。琼一边感谢他，一边说明天就要走。我从未见过她如此兴奋；而且自从我们到罗马之后，她判若两人：双颊潮红，两眼发光，似乎是在发烧。

可能我也在发烧，我还没能与朵拉通话呢！也许正因为这样，琼举止的异常并没有使我深省。

下午我出去买了辆汽车。这次出行，车是必须的，而明天就可以开着这辆车去拿波里。我当时有可能给朵拉打电话，但仍怕她不在，同时也不愿让房东起疑。现在知道她在罗马，我就安心了，最好谨慎些，保持沉默，让她们相信我已走了，不至到旅馆来找我。要找我是很容易的，打几个电话就行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此谨慎。朵拉和我在一起从来都是很得体的，丝毫也不让我感到讨厌。即使在向我要钱的时候（这种情况十分罕见，一般总是我主动给她），也是非常有礼貌，没有丝毫有可能勒索的迹象。

然而她的形象总呈现在我眼前，这足以使我产生一种恐惧感。又见到她匀亭的身材，穿着漂亮的衣服：黑色无领的套装或白底红花的丝质衬衫；头发梳得油光光，腕子上戴着沉沉的金镯子；手上留着长指甲，嘴唇和眼睛都化了妆；脚上穿着漆皮鞋，步态咄咄逼人，眼睛露出淫荡的目光。想到她会知道我结了婚，而且妻子也在罗马，我便十分害怕。同时更怕那个房东，她和朵拉不同，实实在在是个粗俗、危险

的人。

我们早上九点前就出发去了拿波里，因为要赶轮船。于是第二天我也没有给朵拉打电话。从卡不里打电话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会让朵拉知道我的地址，而且会使琼即使没有朵拉的告密也立即知道一切。此外，卡不里住着几百个游手好闲之徒，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陋习，互不相同，变化无常，但却有一个共同的不可救药的毛病：生理上和道德上的软弱。这些半死不活的可怜虫感到自己的生命已没有任何活力，于是便去操心别人的闲事，即使那些"别人"也并不比他们更好。表面上看来他们很活跃，无非是为满足好奇心和搬弄是非在忙碌。这两件事是他们生命的最后立足点。另一方面有当地人（卡不里人或几代落户在卡不里的拿波里人）的挑拨。他们不知疲倦地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伺机而动，在背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议。这样做有些是为了经济上的原因，因靠招徕外国人为生；然而也有些是出自本性。因为这是些正在堕落和已经堕落的人，有：流言蜚语的传播者，探子，变节分子，骗子，小丑，歇斯底里者，糊涂人，和诡辩家。总之和地中海南部许许多多人一样，是一群深深堕落和不幸的人。

饶舌的中心是有三个咖啡馆的小广场。这里任何时刻都是人群拥挤。而情报的主要来源则是邮局和电报局。在当地人中最得到这两个局负责人信任的是一个名叫唐·拉菲尔的前警察局官员。这是一个乐于效劳的人，但也是一个奴颜婢膝之徒；是个有眼力的人，但又是个不可靠的人。我们认识的门卫古利埃莫曾向我们推荐过他。

现在如果我给朵拉打电话，琼通过唐·拉菲尔和电话局当然立刻就会知道。我不希望由于只能带给我短暂的、片刻欢乐的不慎行为而危及整整一星期在意大利幸福的旅行。在美国长时期的守斋之后，我如饥似渴地盼望着那一刻，所以决定耐心等待。

唐·拉菲尔接到古利埃莫的通知后，来到大海滩笑盈盈地迎接

我们。他是一个五、六十岁的男子，相貌不俗，干净利落；不留须，长长的白发梳得十分整齐。从蓝蓝的眼睛到法兰绒西裤，他的外表很像大不列颠人，然而只要一张口说出那含糊不清又不准确的英语，或只稍稍露出地中海人的奸笑，就会使这一判断立刻发生疑问。

唐·拉菲尔在卡不里岛是个宝。怎么说呢？因非他莫属。我们向他请教吗？好极了。他立刻让我们明白，在卡不里我们再不能向别人询问任何事情和任何问题了。他会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保护我们，我们应在他手掌之中。他领我们去看了几间出租的别墅，向我们提出建议，并几乎是把最后的决择强加于我们。然后他给我们派女佣、厨师、花匠（三个都是卡不里人），因为在远离广场几乎有二十分钟路程的别墅里，要把生活安排得稍为舒适些，这些人是必不可少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下榻在圭西撒那，第二天下午就签了合同住进别墅了。

别墅名为鲁比尼，在进门的两条柱子上，一边写着是"别墅"，一边写着"鲁比尼"。不知这个鲁比尼是否是别墅第一任主人的名字。但也许是因墙上和房子正面点缀着的老鹳草、紫藤和其他的红花而起的雅名。鲁比尼的意思是"红宝石"。

唐·拉菲尔千方百计向我们捞钱：房租、工钱、洗澡用水费、花园淋水费、电费、煤气费，每天的海鲜等等。另有众多零星的收费名目，都是他精心安排的；这些都是收附加费的借口，但我们要佯装不知，给他付钱。

不过应该承认，多亏他的张罗，几天之后一切就绪了。但是我仍下不了决心，离开琼去开始我的旅程。这次我的责任感与暗中求欢的欲望发生了冲突。良心使我一再犹豫，从而推迟了行程。我的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琼确有些神经质，非常激动而且十分消瘦，总是带着一种我在罗马时见到的发烧似的样子。同时经常无端争吵，对杜卓很不耐烦。夜间孩子啼哭时，她再也不能忍受，不能平静对待。需要找一位保姆，于是唐·拉菲尔便去行事。他及时在拿波里找到了一位专

门从事婴儿看护的瑞士人弗朗琳女士。琼终于可以稍稍休息了，我则开始去意大利的行程。

我乘坐清晨五点的船走。起床时天色还未亮，在琼睡意朦胧、泪水未干的怀抱中……不，不，我记错了。我想起了三年前那个遥远的清晨。看来我的叙述有些混乱，可能与事实不符。

我不是以当时的眼光来写与琼的告别，而是以今天的感受来写。当时在卡不里岛，我是抛下琼和杜卓，一心一意急着要去看朵拉。

是的，琼在拥抱我的时候是两眼惺松，流泪哭泣的，但能说我当时发现了这拥抱有什么异常吗？当我在黑暗中走出杂乱的卧室去吻别隔壁屋里与保姆同睡的儿子，而后沿着羊肠小径在寒冷中向广场走去的时候，我想过琼之所想吗？

当时我十分激动，充满内疚，深感自己的罪过，为我的虚情假意而自责。我把琼看成是一个应该责怪我的人，是我痛苦爱情的象征和激情的对象；尽管这种情不同于使我挣脱羁绊大步跑上石阶以赶上轮船的那种激情，但也是一种真正的激情。

琼躺在床上，我向她弯下腰去，闻到一股自然的，仍是少女一般的幽香。她纤瘦的臂膀紧紧搂着我的腰和背部，就像苦行僧穿的刺衣一样在惩罚着我，在回忆中仍继续惩罚着我的罪过。

曲折迂回的小径在花园和菜园外延绵不断的矮墙之间顺石级而上。从矮墙里伸出仙人掌，龙舌花，橄榄树，圣栎树和乳香黄连木。我听到了自己急速的脚步声，心跳的速度不在步速之下。就这样离开了琼和杜卓（这是杜卓出生后的第一次离别！），我几乎感到生理上的痛楚，胸口有沉重的压迫感，但愿发生什么事情使我必须返回去。即使再见他们一面，见一下我应该关心并负责的两个人；两个无依无靠，我爱得同样深切的人。再回去看他们一眼，和他们在一起再呆一天，然后再走。甚至想错过这趟船。错过轮船？我胡说些什么呀！疯了吗？我无论如何不能再不见到朵拉了，多耽搁一天也不行！上星期就

已暗暗决定不能迟于今天见她。错过轮船？坏了！我看了看表就跑步向上走去。就这样跑着远离琼而去的时候，我觉得，适才沉重的心情开始渐渐舒散，再过一会，仅一会儿，就不再痛苦了。

在特拉加拉家第一幢房子门前，我停下来闭上眼睛，喘了一口气，突然旁边冒出一个声音，虽然口气平静，却令我一惊。

"上校先生，今天起得早啊？您没睡多久吧？"

是我们的园丁萨尔瓦多，其实是唐·拉菲尔的探子。他从开着的门洞里望着我，披着衣裳，手里拿着剃刀。此时此刻他那平静的样子，就像恶意的审度，激怒了我，使我看了生气。他说话时为了让我容易听懂用的都是原形动词，而我的意大利语无论听说都比他高明。至于"上校先生"则短短几天卡不里岛上全都这么称呼我，因为我忘了事先告诉古利埃莫，而他在给唐·拉菲尔打电话时就是这么称呼我的。

我随便答了一句去拿波里，怕赶不上轮船，便又跑了起来。

"轮船?！别跑啊，上校先生……还早呢，还有半个多小时！"

鬼奸细，你这么说就是故意要让我赶不上船，想着便跑得更快了。

可不是，我刚跑到广场，去海边的缆车已下去了。

一个职员和一些无所事事的人七嘴八舌地劝我等等，说坐下一班缆车完全可以赶上，船还不会开。可我已见它停在港口，就像上了发条的玩具船，随时都会开走。港口的海水一片青灰色，像一块铁板。周围的一切：寒冷的空气、群山、大海、一幢幢房子，以及站在山腰上的游手好闲之徒，都是静止的，无生命的，不可信赖的，并对我的远去都抱有敌意。我要在中午之前赶到罗马，在朵拉醒来和出去之前到达她那儿。我决不能错过这班船，一分钟也不能停留！广场尽头停着一辆旧的鱼雷型敞篷汽车，是为错过缆车的人准备的。汽车的主人，也就是司机，是个肮脏的大胖子。他那副长相就像没落皇朝被解放的奴隶，非常突出，曾引起过我的注意。通常对岛上人很和善的唐·拉菲

尔也指责他吝啬和为人不义，建议我不要雇用他。但我这时丝毫也没有考虑他的劝告，坐上敞篷车，让胖子立即把我送到海边。

胖子上车坐在我旁边，汽车一路下坡发出隆隆的响声。他在拐弯时也不减速，每次都撞到我的臂膀。

“对不起，上校先生。”

“没关系。”

“去拿波里吗？”

“对，拿波里，然后去罗马……以后还要转遍意大利。”不知为什么跟他攀谈起来，这在我是很少有的，特别是对下层的意大利人。也许是因为胖子飞快地送我去目的地而使我对他产生好感；也许是由于对唐·拉菲尔的憎恶；他显然不会喜欢胖子。

他自然很高兴，便找些话与我闲聊。

“去很久吗？上校先生。”

“不知道，一、两个月吧。”

“夫人呢？”

“什么？”

“您夫人哪！她留在卡不里岛上吗？”

“是的。”

“这就好。”

“为什么？”

“空气，岛上的空气，太阳对她有好处。她瘦多了，可怜见，唉，她瘦多了……”

“什么瘦多了？”我觉得挺可笑，“您以前从没见过她，怎么说她瘦了呢？”

“怎么没见过她？我可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三年前，1944年，对吗？”

我相信琼在这之前从未来过卡不里，她自己也这么说。所以不明

白这是怎么回事。沉默了一会，想了想，装作想起来的样子说：

“哦，是的，1944年，是战争时期？”

“怎么不是？卡不里岛是休整基地。太太那时穿着军装，可神气了。她来过两、三次，住那么一星期、半个月的。谁也没认出她来，可我拉过她很多次，一见到她，我就认出来了。我特能认人，错不了。”

给琼写的第一封信中我就问她，为什么没有对我说真话。她回信说，卡不里是如此负有盛名，由于好奇而使她总觉得它是个新的地方，想说服我同意她去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想回到熟悉的、喜爱的地方去看看。由于回卡不里岛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以对我说了谎，请求我原谅。我在信里几乎没有责怪她。

汽车在大海滩旁边，防波堤的进口处停下了。身穿漂亮的米黄色西服上衣和法兰绒西裤的唐·拉菲尔刚巧就在那里。见到我从敞篷车上下来，而且和胖司机客气地道别，他在远处不高兴地看着我，几乎是斜着眼恶狠狠地瞪我。直到我离他只有两步远的时候，才堆起了那惯有的笑脸。

“出去吗？上校先生。”说着，接过了我手中的行李，和我一同向船那边走去。船停在防波堤的尽头。

我担心他也去拿波里，那就得和他在一起，一路聊天。而我想独自一个人不受干扰地品尝渐渐减弱的对琼的怜悯，和愈来愈强烈的对朵拉的需要，这样可以更好地领略将得到的乐趣，使之更深沉而达到顶峰。

我也害怕这个魔鬼般精灵的人特有的狡猾和好奇。如果和他一起轮渡到拿波里，肯定会怀疑我的精神状态从而猜测到一些真相。

和他并排走向渡船时，我如坐针毡。我真想张口问他是否也去拿波里，然而控制了自己。谁知道，也许一问反而引起他的疑心从而决定和我同行。

幸好他没有下船。他的身影不久便慢慢地消失在防波堤的后面，

再也没有任何威胁了。只是淡淡的一个黑点，天边升起的那满是岩石的黑色大岛上的一个小小的点。

天色一片迷茫，不知将会是晴天抑或是云层密布的阴天；不知太阳是已在云层后面还是尚未升起。灰蓝色的海水微微飘起浪花，船飞快地破浪向前。

我看着这黑色的、冷漠的岛。在它那杂乱、陡峭的边上某一点上有着琼，正在酣睡的琼。

我对琼和杜卓的爱是我全部感情之所在。现在我要暂时摆脱这些感情，把它们留在那里，不再去想念，就像埋在岛上一样。

我幻想着，如果留下的不是琼而是朵拉，我会有什么感受呢？或者，假如琼死了，后来我娶了朵拉。朵拉成了我的妻子，我儿子的母亲。我也因公务外出而把朵拉留在卡不里岛上。（为什么不把那天早上的想法写出来？为什么犹豫？）

于是一缕柔情渐渐与一股激情汇合，达到不可置信的，从未领略过的融合，使我在幻想中朦胧地感到空虚和惆怅。突然，太阳出现了，披着金色光辉的拿波里，好客的拿波里，已全部呈现在我眼前，在我的周围。

我跑到埃塞索(Excelsior)旅店的车库，取了存放在那里的汽车，出发去罗马。

关于路上的种种我已完全记不清了。当时我一定是飞快地开车，只记得愈加大油门，愈觉得汽车走得慢。不停地看着计程器和时间，焦急不安地等待下一次路标的出现。觉得两个路标之间的距离愈来愈大，只有当路标终于飞驰过去的一瞬间，我才觉得轻松。

我会怎样见到朵拉？她将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我面前？我控制着自己不去想它。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同样的幻觉面前，像发高烧时在昏迷中。一个人大声说话，时而轻声自言自语；时而大声喊叫，说些荒谬的疯话，那些我该对她说而又没有勇气说的话。也许我是该对她说

的。

虽有强烈的吸烟愿望,但整个旅途我却没有点燃一支烟。也许是因为不愿减低即使是一秒钟的速度(有可能因迟去一刻而见不到她,而那天上午如不能见到她我觉得是会发疯的);也许正是为了不想减轻我有罪恶感的痛苦,为了要保持高涨的情欲需要。

将车停在她房间的窗下。百叶窗紧闭着。看看时间,是十二点差五分。也许还在睡觉,她以前有这习惯。我走进大门,上了肮脏的楼梯,就像在普林斯顿苦涩的夜晚无数次想象的那样,当时并没有丝毫希望使之成为现实。

按门铃,房东出现门口:

"哦,是您!"她几乎嚷起来。

"朵拉在吗?"

"在,"她说,"在睡觉呢。"

"别叫醒她,"我请求她说,同时立即压低了嗓音,"别去叫她,我等她醒来。"

现在我已来到了这里,朵萝苔娅已在咫尺之间;就在走廊的尽头,房门里面。那房门我认出来了,看到了。当知道再也不会失望的时候,我想无限地延长享受这等待的乐趣。

"好吧,"房东笑着说,"您亲自把咖啡给她送去,这就煮好了。一会儿就到十二点了,她听到十二点的汽笛声就会醒来,她总是这时候醒的。上校先生,您知道吗,我们都不愿再等您了!"

我跟她走进厨房,等咖啡煮好后,我端着摆好咖啡和糖的托盘,踮着脚走到房门口,扭动把手,进去,随后关上了门。

房间里很暗,暖和得几乎叫人窒息,满屋是她那浓郁的香水味。

朵拉睡着,棕色的背脊赤裸在外面,直到胸脯下都没有盖被单。她向右边侧身躺着,睡得很恬静。脸朝着我,一条手臂压在颊下,另一条弯曲着放在胸前,腕子上戴着通常的金饰。

我纹丝不动地看着她，手里拿着咖啡。窗户关着，城市的喧闹声不能直闯进来。

汽笛声响了，朵拉开始慢慢活动。她睁开眼睛，打了个哈欠。见到我，揉揉脸，平静地笑着对我说：

“你这个无赖来了！嗯？这么久都没有音讯给我们！”

我向她走近去，轻声说，

“朵拉……”

我停住了。托盘的杯子在我手里发出叮叮的响声。

“手发颤吗，嗯？”她笑了，“要是我说以后再也不跟你睡觉了呢？”

我想我的脸色一定变得很苍白，因为她马上急着安慰我，怕我会晕过去：

“别这样，傻瓜，你当真了？”说着猛然甩去身上的被单，像以前一样赤身裸体呈现在我面前。

我没有行动。

她及时制止了我。

“等一等，看来你真是美国人，我的孩子。先要喝咖啡，咖啡不趁热喝就没有味儿了。”

十一

我把朵拉带着一起走了。尽管自奥夫纳建议我去意大利的那一刻起我就想这么做，但心里始终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首先，我认为自己不会有勇气那么做；其次，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只要热情一旦平息下来，几天之后，别说想她，甚至连见都不愿见她。我从卡不里到罗马的第二天就要去托斯卡纳，从那儿开始我的旅行，直到最后一刻我都

发誓一个人走。

然而我却带着朵拉走了。这是突然决定的，也许是因生气而作出的决定：因将近两年的远离之后，我又感到失望而生气。当然这并不是意外的事。是一种执拗，就像过去和她在一起时一味延长时间以企求得到永恒的欢乐的那种执拗；是一种过分的企求，是自己与自己打赌。要通过和朵拉共同生活几星期，看我的本性是否排斥夫妻幸福，我想以后不会有更好的机会：因公出差，琼因婴儿而不能同行。

如果这次旅程之后，我会因此而中断习惯已久的甜蜜的关系，从而感到痛苦，那也无妨。但愿能如此！我将回到与琼共同生活的那种苦涩的柔情之中。但永远感到安慰的是：这不是命运的裁决，也不是被迫的，因此也不是一种不应该的放弃，而是自由的，几乎是英勇的决择。

总之，我想试着和朵拉一起生活一段，看看我是否眷恋她，她是否依恋我。特别要看这一种在我们原有的关系中产生的新感情是否会减弱原始的火焰。

没有必要对你讲许多细节，我立刻将这一试验的结论告诉你：即我和朵拉生活在一起时发生的，或说我认为发生了的事情。

朵拉虽然仍像过去那样带着一种神秘的，几乎是残酷的镇定与我做爱，这正是我所最喜爱的，然而却对我有了感情；就是说开始关心我的身体，尽量在日常生活中帮我干事。熨手绢，整理行李，准备洗澡水，在餐厅里订菜，建议我吃有益于身体的食品；参观教堂和博物馆时给我拿着复制品的清单、书和相机；早上我还懒洋洋地躺着的时候，出去给我买报纸；有时晚上我累了，我们留在旅馆里，她甚至还小心翼翼地给我装烟斗。这些事琼从未做过。

而每当看到这种关怀时，我心里感到恼火，不舒服，讨厌，有一种莫名的烦躁，似乎是羞于过分的幸福。这种感觉只在晚上熄灯之后才能消失。白天，当朵拉小心翼翼，深情地，在我身旁侍候我的时候，我

觉得，怎么对你说呢，对了，就像是受到了包围，各方面的包围；有一种窒息感，压迫感。不是因我受到奴役而有压迫感，因为做主的是我，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她的顺从使我有压迫感。总之，无论白天、黑夜，这样或那样，我再也不得安宁了。因为她不仅漂亮，而且善良，我得为她考虑。这很快就使我无法忍受，也许比和琼在一起更糟。和琼在一起虽不能给我欢乐，却可让我独自沉溺在不能向她忏悔的忧伤之中。

我有什么可以责怪朵拉的呢？什么也没有。她惊喜，谦逊，兴高采烈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她不过分自信，想到自己只不过是个妓女。

我虽然感到讨厌，一个月来仍还是带着她从托斯卡纳到艾米里亚，再到伦巴底和威内托。因为晚上在她深深的谦卑之中肯定能找到我之所需。

我所羞于太过幸福的感觉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第一次感受的那种极大的平静我会觉得是一种罪过。难道是我想琼，想杜卓，想在天主教神父前作过的神圣誓言？完全不是。除了每两、三天写信和发电报的短短几分钟外，琼和杜卓已在我思想中消失，再也不复存在了。并不是我感到有错，并不是内疚，而是相反，在我觉得是正确的时候，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像缺少空气窒息一样，几乎是不可忍受的。

经过在六月的阳光下一天艰苦的工作后（经常是，在没有柏油的二级马路上开很长的路；爬上一个山头去照一张倒塌了的小教堂；访问一个布满尘垢的小博物馆，记下馆长诉苦的清单，检查它的真实性并予以驳斥），外省小城市的傍晚显得特别宁静。终于夜幕降临了，舒舒服服洗个澡，美美地吃上一餐。而后，在林荫道下或古堡上安静地漫步，在咖啡馆的小桌旁喝上一杯白兰地，或像两个恋人一样在下面的树丛里，在灯光下乐队的奏乐声中依偎着。意大利是美丽而神圣的。在小旅店深夜的寂静之中，朵拉使我幸福无比。而我却自问：就是这些了吗？再没有别的了？我现在已没有愿望，而我生来习惯于企

求。于是我感到空虚、失措、渺小，首先是渺小。我完全缩到了原来的自我，只是那么一点，一个庸才。

渐渐地，白天也开始有痛苦的自我渺小的感觉，如果我一时冲动本能地对朵拉表示柔情，如在大庭广众场合对她表示亲热；或当她向我微笑时，望着她亦报之以微笑；捏她的手，搂她的腰肢……而她总是那么顺从，这使我恼怒，然而又不能对她明说。

有一次用餐时，除了预订几道菜之外，她坚持要我吃两个有柠檬和胡椒的鸡蛋黄，即意大利人所谓的牡蛎蛋。她盯着我，一定要我吃，用意明显地对我笑着。她的想法、眼神、微笑，使我又高兴又生气，几乎要发怒，因为这一切都让我喜欢。这么说，就像她使我感到满足一样，我也使她满足？我第一次感到这一点。使我沮丧，因为她已不再是偶像，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我从未向她提到过琼，也没告诉她我已结婚了。每当我要写信，发电报或打电话（这是极为罕见的）去卡不里时都非常谨慎地不让她知道。尽管我们在旅馆里睡在一起，但总是要两个房间，而且是不相邻的。现在我对朵拉有可能勒索我的恐惧感应该说已毫无根据，也许那只是为了使愿望保持活跃的一种不自觉的诡计。

威内托之后按计划该去马尔凯，但我在罗马有个约会：H·L·G 先生在那里等我。你认识他，这是教科文组织的一位重要官员。我今秋将去巴黎到教科文组织上班，H·L·G 先生路过罗马想会见我。也许你还记得，我和 H·L·G 先生就是那次到电影城参观制片厂并与你共进了午餐。

我在罗马要停留两天，于是便在大旅店下榻，朵拉则回家去了。和 H·L·G 先生在一起，安排很紧张。这两天我和朵拉都没有见面，想第三天早晨一同出发去安科纳。

第二天下午，我把 H·L·G 先生送到强比诺机场，他要回巴黎去。飞机起飞晚点，到黄昏时分，我才独自一人回到卡斯特利和罗马

之间的平原上。时值七月初，谁曾在那里亲身经历过那个季节，那个时刻的气氛，就会了解我当时的心情。在辽阔一望无际的，深沉而晴朗的天空中出现了最初的星星；远处的佛拉斯加第在夕阳的余辉中仍清晰可见。在这种充满柔情蜜意的气氛之中，独自一人呆着简直是荒谬。甚至两架飞机——一架正在降落，另一架在静静地滑翔——似乎也参与了这迷人的气氛。我给你打了电话，想约你在卡斯特利找一家小餐馆，在露天一起进餐。你不在家，还在工作。谁知你什么时候才回来。我走进酒吧，喝了几杯威士忌，不知去哪里好。不愿如丧家之犬回到罗马，在大旅店的餐厅里独自用餐；也许还会碰上几个同胞熟人，这些人，我既不能不与之打招呼，但又实在无法容忍。犹豫了一下，到夜幕完全降落时，给朵拉打了电话。为什么不一起吃饭呢？而且可以把出发的时间改在夜里而不是原定的第二天早晨，晚上赶路更好，夜间天气凉爽。在安科纳我们可以一直睡到下午，然后去洗个海水浴。安科纳附近有海滩吗？应该有的。

朵拉回答说，她很乐意，不过已另有约会。没想到我会去，已和姐夫相约在一家小饭馆吃饭，谈些家常事。我生气了。这是第一次，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我对她态度这么坏。也许是以此发泄整整一个月来的不快。朵拉非常难过，她对我说，要是早些知道就改期了，但现在已无法通知他，姐夫没有电话，又住得很远。约好在饭店等她，这时肯定已出门了，她自己在接到我电话的时候也已准备出去了。

“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最后她犹豫地说，“我介绍给你认识，他是个很好的人，有家室，在电影界工作，是火焰效果专家。你知道吗，每次要表现火灾，要烟或要火焰总是找他的。

朵拉从未对我说过有个姐姐。

“我从未说过，因为我姐姐已死了多年，他又重新结了婚，有四个孩子在拉迪斯波里海边。你来吗？要是愿意你就来。我们在哥里巴尔第路，特拉斯台维莱的彼萨小吃店。

“我去接你。”我生气地说，感觉自己无法独自捱过这个夜晚，却又没有任何兴趣去结识这个姐夫。

但她不要我去接，说已叫了出租，这已经迟到了。使我吃惊也使我喜欢的是，她以使人意外的坚决重复了几次确切的地址后，就断然挂上了电话。

我对琼是绝对信任的，但朵拉的一切都使我怀疑。在回罗马的路上，我想了想之后得出了结论：这个人绝对不是姐夫，她千方百计在我之前赶到约会地点是为了争取时间通知他，以便蒙骗我。现在我当然有兴趣认识这个假姐夫了。朵拉的谎言让我发生兴趣，并使我激动。我立即有一种恐惧和希望混杂在一起的感觉。也许这是一个形迹可疑之徒，是一个特殊的嫖客。

他是个脸色苍白，身体肥胖，无发，秃顶的男人。长着一个大鼻子和一双浅蓝色湿润的眼睛，亲切而机智。衣着相当讲究，然而不系领带。使人颇有好感。外表看来像是个拉皮条的，但也可能是个老嫖客。他和朵拉坐在一张桌边，我一眼就看到他们了。周围的桌子都坐满了人，他们坐在院子的尽头，四面是旧房子高高的红墙。还有一个长得很帅的年青人和他们在一起：褐色的皮肤，高高的身材，一头光亮的卷发和一双亲切、水灵的眼睛。他没穿西服，但穿着丝质的套衫，露出了结实的胸膛；手腕上戴着金镯子和金表，手指上有个沉甸甸的金戒子，脖子上戴着有坠子的金链子。

朵拉老远就看见我了，向二人稍稍示意，似乎是说：看，他来了，在这儿，这就是他。二人随即站起身来。年长的，姐夫——不管是真是假——向我迎上几步，在桌子隙间走过来，以手势、微笑和鞠躬尽可能向我表示完全的诚意。

不用说这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他津津有味地吃着，不断殷勤地向人让菜敬酒，时而夸奖，时而贬低这些菜肴；谈论着最新一部电影的种种趣事；说些通俗的笑话。用微笑表示他因这次的晚餐，因今晚能

和我们一起这样度过而感到幸福。我看着他那张没有胡髭的脸，忘记了一切，忘记了任何其他愿望。他的脸表现出来的是谦逊和罪人的善良。那个年青人则慎重得多。几乎从不说话，吃得很有节制，并装出一副很得体的样子，似乎是为了不在我面前丢丑，朵拉对我说，他是姐夫的朋友，也在电影界工作，是演员，扮演些小角色。我明白了，这家伙把我看得很了不起：是位先生，知识分子，而且又是美国人。可能有一定的意图，但也许并没有什么用意，就是要在我面前装个样子，所以说的，吃的，都很少。然而却不时卖弄他那只戴着金镯子、金手表和金戒指的手，至少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每次当我，朵拉，或她姐夫拿出烟放到嘴边时，他就拿出打火机——那也是金的——给我们点火，一直送到鼻子底下，有意炫耀他那只手。如果他自己抽烟，那就弯着那夹着烟卷的手停在半空中，要让其他桌上的人也来欣赏。当然，手很漂亮。一个男人的手能有多漂亮它就有多漂亮，但没有什么可以为那重复的动作和不停的炫耀辩解。

酒过几巡，那位姐夫，姑且这么称呼他吧，开始给我和朵拉使眼色，要开年青人的玩笑，但是善意的。

“漂亮的孩子”，他说，“你都不懂得什么叫葡萄酒了。”“对不起，上校先生，您虽精通意大利语，这儿可得留点儿神了。”

我惬意地笑了。在客人们的说话声和欢笑声中，在餐具的碰击声中，一个卖唱的拉着手风琴对一张张桌子挨着唱意大利民歌。在夏天的夜晚，置身于这一群富有人情味的粗俗、热情的人群之中，我觉得开怀；终于毫不迟疑地从最后的偏见中解脱出来，沉溺于这一类教徒的世界之中。这里所有的现实必须充满罪过和宽容。可不是突斯家的夜晚！

“我说，漂亮的孩子，”叫姐夫的继续对年青人说，后者露出笑容，尽力做出落落大方的样子，让他开自己的玩笑。“你再也不知道葡萄酒是什么味儿了。你蜕化了！您看见了吗，上校先生，他都干什么？把

冰块放在里面！你拍电影，和外国太太们干好了，喝威士忌，鸡尾酒，马丁酒，喂，give me a drink……是这么说来的吗，上校先生？唉，你的口味全给毁了。但愿仅仅只是口味。”

我听着，同时在想朵拉和这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两人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起初，也许是由于二人态度暧昧，同时又见到他们年龄差别太大（姐夫大概有50来岁，青年25岁），我觉得这两个人不仅只是朋友关系。但当这位老的开始礼貌地、友善而毫无醋意地和他开玩笑时，我明白是估计错了。他们之中二者之一，或两人都与朵拉有关系。我并不感到任何妒意（很乐意坦白地说出来，因为这是事实）。

我对琼有醋意（这也许是因为不爱她，或不太爱她，感到不能给予她所需要的），但对朵拉却从来没有，至少在那一段时间里没有。朵拉和别的男人，和所有的男人混，这是她的本性，是她本身的魅力。我除了给她钱不关心别的。她这个偶像也不屑于从我这里得到其它报酬，如果她不是这样，则会使我失望。所以我做梦也不认为对她有什么权利，完全不希望她对我是忠诚的。我想如果发现，她有情人我也无所谓，甚至会觉得受到挑逗。后来，有了虚荣心，问题就变得复杂了，一切都变了。那时就是这样，我并不羞于把这些写出来。

那个姐夫在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年青人为了显示那只手而抽烟；朵拉不时地用奇怪的眼光，谨慎而探索地瞟着我，不愿我发现她在揣度我，揣度我在想什么。我正在想那天晚上丢下她。

为什么？是嫉妒吗？

相反，认识那两个人，怀疑他们是她的情人，又重新燃起了我的热情，使我和她的关系得以恢复，而且变得更为活跃，使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可以中止一段时间而不会受到损害。如果在这之前我中断和朵拉的关系——在经过一个月共同的生活，热情渐渐冷却后，最终分手——我担心会永远失去对她的恋心。所以我想就在此刻：在我像最初那样需要她的时候；在我确信将来，在分离之中，仍将需要她的时

候，和她分手。

朵拉在揣度我。她很聪明，看出了些问题。譬如她看出了我知道那两个是她的情人；看出我并没有生气。同时我肯定她也从我脸上的表情看出了所作出的秘密的、突然离她而去的决定，但并没有完全明白，没能猜到（怎么可能呢？）我离她而去的微妙的原因。她不会调解使我激动的、对立的感情，而我却按自己的方式和解了。她认为我虽然高兴认识她的情人，却因此而感到恼怒。她害怕我的虚荣心，和由我所受的教育而产生的偏见，于是后悔把那两个人介绍给我认识。

假如她什么都知道又会怎样？如果她终于知道了她对我的力量之后，是否会作出戏剧性的姿势，以一个阴险女人落落大方的样子，（就像法国电影和法国小说中常见到的那样）和我残酷诀别呢？要是她站起身来，挽着那年青人的胳膊走出去，一边对我说："哈雷，咱们说好了，明天见吧。"或甚至说，"听着，哈雷！明天上午不走了，下午六点来接我，早打电话给我也没用，再见了！"我，又会怎样呢？

我想我是不会反感的，那些话正是我内心所愿意听到的。不，我不会反感。也许会从此更加爱她，直至进入地狱。

然而她不是那种奸诈的女人。

她只是一个聪明的姑娘，仅此而已。她担心她的前途；担心如何一天天挨过日子。

该走了。我提议把他们送到市中心。故意把他们三人都送到她门口，推托旅馆有人等我而离去，想做给朵拉看，我并无妒意。

可是朵拉起了疑心，她把我带到一边，那两个很知趣地走了几步退向一旁。

"你说过想晚上出发，凉快些，"她悄声说，"还想吗？我行李都是现成的。"

"不，谢谢，朵拉。"我犹犹豫豫地说，"我现在真是和那位先生有个约会。"

“你不是说他已经走了吗？”

“不是那个，是我后来遇见的那个。可能我们明天早上也走不了。”

“那我怎么知道呢？”

“我给你打电话。明天早上我给你打电话。不过不会在 10 点以前，你安心睡吧。”

说着，我以意大利的绅士们向女士告别那样，以夸张的姿态吻了她的手。想让她懂得——如果她能懂得的话——她是我的主人。

“你想什么就干什么吧。”我颤抖着细声地说，希望她能明白。

不明白，甚至完全想到相反的一面去了。她慌慌张张向那两个人看了一眼，然后不但不离去反而向我靠过来，几乎要碰到我的身体，她那低级的香水味包围了我。

“你怎么了？”细声问道，“我给你介绍了姐夫，你生气了吗？”

“哪儿的话？”

“就是为这个！”

“别胡说了，两个人都很让人喜欢，我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

我径直向那两人走去，很有礼貌地向他们告别。

回去后，我立即上了床，然而却无法入睡。一小时后，我起来穿上衣服整理行李。下楼时给门房一份市内电报，让明早发出去。电报中对朵拉说，我突然要乘夜班机去巴黎，大约一个月以后回来。再见。向她致谢。

实际上我当天夜里开车去了安科纳，继续我的工作。

十二

过阿平宁山之前，我在福利诺停车加油时，我看了看地图。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右边的，另一条是左边的。右边那条路稍近，但很窄；左边的路较宽，而且……经过耶西。这个城市的名称唤起了我的回忆：战争、严冬、一个女人。再想到以前，则是那个女人还是姑娘的时候。我当时二十四岁，在罗马，刚从大学出来，第一次到意大利。

当然，我选择了耶西这条路。想再一次经过这座城，经过一条两旁林立着黄、灰色大楼，宽阔、笔直，一直通到教堂广场的大街。再一次匆匆看一眼那幢房子，那大门，那二层楼上的窗户，这是一种思念，一个曾经做过的梦，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

她叫盖基娜，那是1938年底，我第一次到罗马的时候。当然，那时还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一份奖学金只能勉强维持严谨的生活。可是当时我只有二十四岁，对于生活在意大利感到如此的幸福！

我在意大利大街的一家公寓住了下来。房东是的里雅斯特人，名叫柯契，女佣是马尔凯大区耶西附近的卜达奈利人。就是她，盖基娜。二十一岁，皮肤黝黑，身材苗条，亭亭玉立，长得非常完美；品性文雅，彬彬有礼，几乎斯文得有些造作。意大利的女佣通常在街上见到立刻就能认出来，而盖基娜看来则像小康之家的千金，像个女职员。

我对她一见倾心，然而那时是很纯洁的。我们美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又是新英吉利人，可不像你们意大利人。现在也许不同，可那时，即直到第二次大战以前，很多人结婚前从未有过任何越轨行为。在大学交个女朋友，晚上一起出去看电影，有钱的时候就上剧院；然后——如果女孩子住在学校外面的公寓里（我们男孩子全部住校，因

为便宜)——就喝马丁酒壮胆，一起去参加 Petting Party；或甚至都去参加 Neeking Party，在那儿尽管柔情绵绵，却从没有过分的行为。因此尽管我向盖基娜献殷勤，尽可能多给她小费，后来竟甚至想给她送份礼物，然而作为回报的仅仅只是在早上她给我送咖啡的时候稍稍亲热一下。心想以后有的是时间，很乐意地每次把约会推迟到下一次。可是我很喜欢和她聊天，她说的意大利语是如此的漂亮、纯正：既不像托斯卡人那么粗俗，也不像罗马人那样过分的软绵无力。你们有个作家，名字我不记得了，曾写过一本关于意大利语的书，题名为《优美的民族语言》。从盖基娜那自然红润的嘴唇和洁白整齐的牙齿中吐出来的意大利语确实"优美"无比。

这时战争已迫近。领事将所有的美国人都召集去，建议我们作好准备，至少要考虑到有可能随时被迫离开。很多人因害怕而立即走了；另外一些像我一样爱慕意大利的人不愿相信这种危险，寄希望于侥幸而留了下来。

你也许会说，现在看到有可能会走，我就会对盖基娜"进行到底"了。可是并不。战争的危险对我有相反的作用。我认为，要是现在趁机向女孩进攻，则是一种恶劣行径。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甚至，对她的亲热比以前克制了。她把家庭的一切都告诉我，对我讲述在卜达奈利的家：他们是农民，妹妹们在耶西一家陶瓷厂工作。我们成了朋友，我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柔情和信任感。我这方面则有一种窘迫感，一种胆怯，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疑虑。

一天晚上，我十一点多钟回家，公寓里，大家都已进入梦乡。我像往常一样踮起脚以免发出响声。长长的过道通到我的房间，我连灯也没有开，因为盥洗室的玻璃门内发出的灯光照亮了过道。这扇玻璃门上平时装有浅色的涂胶布，可以透亮然而能挡住视线，但那天晚上却没有胶布，可能是公寓里那几天大扫除，取下来洗了。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向玻璃门望去。这是盖基娜经过一天劳苦工作后在洗澡。我

透过微微呈绿色的磨砂玻璃看得很清楚，她在浴缸里几乎纹丝不动，看到了一个黑点，那是她的脑袋；小小的椭圆形的脸，分不清五官，和水中苗娜的身躯。

我屏住呼吸看着她，不时向两边偷偷张望，怕见到公寓里有人从房间里走出来，直到盖基娜起来洗澡。然后，趁她洗澡时发出的声音，我蹑手蹑足回到自己房中。

但我并不脱衣就寝，仍在想象。

我脱了鞋在门口静听，等着盖基娜出来，想跟随她，在她关门之前就进入她的房间。我根本不可能贸然敲门，因为她的房间就在房东夫妇的隔壁。

倒霉的是就在盖基娜从浴室出来的那一刻，大门开了。那个埃及使官的随员晓里克偏偏在那时候回来。我对此人从来没有好感。在饭桌上我总和他辩论政治，之后又使我后悔，她不愿再理他。这是个亲法西斯分子，反英派，但对美国非常尊重，总要设法把英国人和我们加以区分，这更使我恼怒。

那天晚上我真想杀了他！不仅为了盖基娜，而且是因为几分钟之后，当我已摒弃杂念上床睡觉时，他又来了，听到有人敲门，起身的那一刻梦想会是盖基娜，但却是那个埃及人。透过半开的门，看到了他那张黑脸和带笑的厚嘴唇，那微笑的样子真令人作呕。他告诉了我一个十分令人沮丧的消息：希特勒进攻波兰，明天张伯伦要宣战了。

几天之后，我在拿波里上了船。临走前送了盖基娜一份重礼，费了很大劲才说服她收下。最后一刻我叫她来帮我收拾行李，并终于吻了她一次，仅仅一次。盖基娜流着泪。除了农民口中的清香，我还感到了她泪水的涩味。我将她苗条、结实、柔软的身躯搂在身前，腰肢是那么细，几乎用两手就可捧起。她闭着眼吻我，就像在吮着一种从未喝过的烈酒。猛然间，她挺起腰，用腹部顶着我（这是我意料不到的），要我接受她。

但过一会我们从拥抱中解脱出来之后，她自然非常感激我没有放任自己，含泪望着我笑，要求原谅。

也许你在笑我，在这部小说的其它部分，我相信我是相当玩世不恭的，因此现在不易使你相信我的感情是纯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纯洁的温情主义的。但是你还是相信我吧，特别要相信她的纯洁。在顷刻之前她毫无畏惧地奉献给我，而现在却毫无悔恨地感谢我对她的尊重。

大战时我再次来到意大利的时候，罗马刚刚光复。我开始寻找盖基娜。柯契一家回的里雅斯特了，公寓换了主人，现在叫雪莱公寓，谁也不认识她。

1944 年夏，马尔凯光复了，有时我想到盖基娜。在新闻商报上读到有关耶西和卜达奈利的情况，猜测盖基娜在战争发生后已回到那里了。但当时我很忙，不能离开罗马，而且已认识了琼和朵萝茜娅。

盖基娜是遥远的青少年时代纯洁而温柔的爱情，几乎像文学作品中那样，我思念她就像想着罗曼谛克小说中的人物。只有当想起那次在浴室里透过幻觉似的绿色玻璃门看到她裸露的躯体时的冲动，和回忆她的告别之吻时，才燃起需要她的欲望。

还是那年的十一月（十二月），去法国见琼之前，我所属的单位P·W·B委派我送三名意大利记者去前线，让他们在报纸上写通讯。

我们先访问所谓的哥德战线，即第五军的前沿，所以一直下到福利诺；然后再沿亚德里亚海上去到亚平宁第八军的驻地，这里大部分是英国军队，由李斯将军指挥。

非常偶然地我们要在耶西留宿。所有的饭店都已客满。两个记者住在意大利指挥部的营房：有一些意大利小组和我们一起战斗，几乎全是辎重部队。另一位记者和我在一家私人住宅找到了两个房间，是在穿城而过的主要街道上一幢二层楼房子里的一个单元。大门上

有个小小的门牌，上面写着名字，现在已记不清了，但那天晚上在福利诺加油停车，从地图上见到耶西时，我还记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意大利的小姓，很平常，不起眼的姓，是以一ini，elli 或 etti 结尾的。不知怎样才能记起这个姓来，但我觉得能很详尽地描述出这个家。这是个寒酸、洁净、充满悭吝和尊严的住所：地板上铺着六角形光洁的小红砖；房间的家具是十九世纪后期的风格；沙发和椅子都套着白色的布套；壁炉上套着玻璃罩的花瓶里插着绢花；高高的铁床上面铺着许多厚厚的毯子，上面是勾花的白色床罩。电灯还未启用。主人——想不起他的名字——是个高个子老人，很健壮，但已有些佝偻；脸色红润，秃顶。他给我和记者每人一支洋烛，小心翼翼，整整齐齐地插在带把儿的烛台上。烛台是金属的，涂成了浅蓝色。我们第二天清早要走，所以预先结了账。家具、摆设，各种东西都干净、整齐，只是冷得可怕。主人在家里也穿着大衣，围着羊毛围巾。他对我们说，因为太贵所以没有烧暖气。

我们出去吃了饭，然后回来睡觉。那幢整齐而寒冷的小屋对我有一种亲切感，因为从进门的那一刻起我就在想着盖基娜。现在，当我钻进那粗糙的床单后，便在床头柜上放着的烛光下，端详着这间小小的房间。我想盖基娜肯定离这儿不远，卜达奈利离耶西只有几公里；如果我晚上去找了她，也许她此刻就在这里和我一起躺在床上了。由于非常寒冷，看到呼出的气变成雾水冉冉上升，然后消失在黑暗中。在粗糙的被单下，我想着盖基娜的身躯，现在她该有二十六、七岁了，我已三十岁。六年过去了！

天未亮我就起身，立即出了门去卜达奈利。想再见见盖基娜，了解她的近况。当然我什么也没对那记者说，只告诉他我要去见市长，或是说了要到汽车场去，记不清了。和他约定八点整在意大利指挥部门口见。

一刻钟后，我开着吉普到了耶西。我还记得盖基娜的姓，现在也

没忘记，但不想写出来。她和意大利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同姓。糟的是就像我们中西部的小村子一样，由于没有更多的移居者前来，卜达奈利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是这个姓。但我借口买烟，到一间杂货铺闲聊了一阵，就不难找到盖基娜的踪迹了。她在，还活着；身体很好，很快要分娩了。一年前，德国人还在的时候结的婚，嫁了个能干的年青人，用卡车给盟军运输。我犹豫了：不知是否该见她。她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受到刺激，我决定离去。请店主人代表一个意大利大街的美国学生向她问好。

但我刚在车辙很深的土路上慢慢转弯，走出集居区向耶西的路上驰去时，听到后面有人欣喜地呼喊着我的名字，是盖基娜。她头戴一条红围巾跑着过来。我从吉普车上跳下来，腿在发抖。

当然，她是怀孕了，然而见到她仍是很高兴。她的眼神、微笑，还是像以前那样，只有一点变化：以前我只觉得她活泼、聪明；现在她却自然、大方。

“哈雷先生，您好吗？您来这里太好了！您知道吗，盟军一开始推进，我总是对妈妈提到您，说要是哈雷先生能来该有多好！我常去耶西的大街上看军车！我敢说一下就学会了区分英国人、美国人和波兰人。美国人来这儿的不多，我说出来让您笑话……我看着那些个美国人觉着人人都像您！”

“我是第一次被派到这条线上，要不然早就来找您了。”我随便地说，但避免流露出感情色彩，因为尊重她的新处境。“我也是，什么都没忘记，您信吗？我想过多少次：盖基娜现在怎么样了？”

“您一点儿也没变，哈雷先生。只是更魁梧了，是真的，但也许是军装……”

她操着一口漂亮、纯正的意大利语，态度自若，语气随便，几乎像出入社交界那样颇有风度，也许以此来掩饰她的胆怯，掩饰她的激动和惊讶，也许是出于一种虚荣心。附近屋子的门坎上和远处站着一些

妇女在看着，盖基娜很高兴让她们看到自己和一个美国军官在一起，也许以前曾和她们提到过。

“来，哈雷先生，”最后她拉着我的手臂说，“到我们家喝杯牛奶咖啡。我给你介绍我的丈夫。他还在睡觉，因为夜里很晚才开车回来。不过现在该起来了。也许您不喜欢喝牛奶咖啡，愿意喝杯酒？我们有自己酿的酒，可纯啦！”

我看了看表对盖基娜说，耶西有人在等我，已经迟到了。非常感谢她的盛情，但实在不能去，只要一有机会一定再回来看望她。

她非常失望。见我立即要走，确实很难过。

“要是我知道的话，”我一边坐上吉普一边说，“就给您带点什么，带点什么给孩子了……”

我车上有些食物盒，普通的军用食物盒，里面有糖、肉、豆子或碎肉火腿罐头等。我犹豫了一下，觉得她生活上并没有困难，如将那些我们美国人通常送给意大利姑娘的东西给她，会委屈了她的。

于是向她告别，并致以良好的祝愿后便上车走了。在拐弯时见到她仍站在我们分手的地方，摘下头上的红围巾向我挥别。

不言而喻，我没有再回去。这样做是对的，战争令人难以置信地使人的灵魂变得聪明。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恐怖、屠杀、死亡产生着很好的效应，阻止了感情的混乱，将每样东西放在应有的位置上。一位新嫁娘的微笑就是新嫁娘的微笑，没有别的意义，但也许是因为当时我还年轻，对朵萝苔娅的情欲和与琼的婚姻还没有毁了我。

我没有再回去。有时想到盖基娜，夜里临睡前想念她，于是对自己说，明天该记得去商店买点衣服、玩具、给孩子的礼物，寄个大包裹给他们，但我很懒，总忘了。我们仅为了客气要做什么事时，常常由于懒惰和健忘而置之一旁。

而现在，在这个夏天的夜晚，我却又走在去耶西的路上。不一会，在进入城市之前，我就会在右边看到卜达奈利的路标。

我看见它了，放慢速度看了看表，是三点半。继续往前走。又是三年过去了。盖基娜还在那儿吗？

一边想着她，一边驶进耶西。在回忆之中她并不是那天清晨见到的样子：新嫁妇，就要做母亲的人。而是过去在罗马，我紧紧地搂在怀里的样子。重又感到她腹部的冲击，我由于突如其来的需要而激动得几乎窒息。就在这一刻，到达了战时一个遥远的晚上，我思念着盖基娜而度过一夜的那幢房子前，不由自主地停在大门口。

还不到四点，淡青色的曙光已洒在无人的长街上。（战争结束已久）柏油马路很干净、平整。这时路灯熄灭了，现出了一幢幢大楼和住房完整的影景，那幽灵似的光线就像一个无人的剧场里透过玻璃射到舞台上的暗淡的日光。

我从车上下来。大门一边的石墙上靠门铃的一边有住户的姓氏牌。我立刻找到了那个当时还记得的姓名。没按铃，又回到车上坐下。有那么一刻我真想去按门铃，可那时才几点钟？难道我疯了吗？

在内心深处我找到了答案。没有经过认真思考，而是偶然间，像随便在抽屉里翻东西时找到的。是朵萝苔娅，是我前一天晚上以及整整一个月以来和朵萝苔娅在一起的不满足；是我对朵拉的失望；是因为她不是我疯狂地所希望的那样；是我对自己的憎恨。于是现在，今天，我想要另一个女人。我要盖基娜。我知道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真愿意要，她便会是我的，但是也知道，要劝说她到一间旅店来，到耶西的一间小旅店来，那就等于是犯罪。我是自私、堕落的罪人，但也是个胆小鬼，或者说还不是一个罪犯。

那将要开始的一天是星期日，天色很快就渐渐亮了。愈来愈白的光线使古典式的影景渐渐清晰。前面有一束阳光洒在教堂和上面的广场上。没有任何行人走过。我坐在车里迷糊了一阵，等着。

钟声使我醒来，路上已有行人，也许是去做早弥撒的人们。我开着车在市内主要的大街上兜转，想找一间酒吧，但全都关着。于是驱

车到火车站，喝了杯咖啡；又回到主街道上那幢楼的门口。看看二楼的窗户：还紧闭着。

七点半钟，我终于按了门铃。门呼地打开了，我走上了一个夹在两边墙中间的很陡的楼梯。房东站在二楼的梯口，他更老、更佝偻了。穿着一件羊毛的睡衣。我试图使他认出我来，但徒然，他无法记起来：战争期间曾把房子租给那么多的军人，有英国人，美国人。他说现在不再出租了。他夫人已死，现在独自生活，已退休，过去是法院文书。我不管自己的话听来是否离奇，径自对他说：要在耶西过一天，仅仅一个白天，晚上十二点以前就出发去安科纳。我从罗马来，开了一夜车非常疲劳，想休息一下。为了不打扰他，一直在汽车里等到现在。不想住旅店，因为对他这幢房子，对 1944 年 11 月我曾住过的那间房（我通过开着的门从楼梯口指给他看）很有感情。

他十分惊讶地看着我。

“不，我没有疯。”我尽可能平静地笑着对他说，“我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一个浪漫主义者。我是艺术家。”甚至说，“我是画家，您应该原谅我。”

“我很遗憾，先生。”他说的时候几乎要把我推出去，“但我不能接待您。今天是星期天，搞卫生的女人不来，我都得自己做饭，您知道吗？那房间是无法睡人的：没有床单，没有毯子，什么也没有。”

我说没关系，我在垫子上也一样睡得很好。最后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拿出一叠一万里拉的钞票。

“我给您一万里拉。”我对他说，我不拿两万，不是不想多给，而是怕数目大了反而使他起疑。

可怜的老人——他一个月的退休金也许仅仅比我给他一天的租金略为多一点儿——不由地睁大了眼睛，半张着嘴；盯着那张我递给他的大票一动不动，犹豫不决。

“给，这是我的护照，”我又灵机一动对他说，“看这照片，您检查

吧。我是美国公民。您可以拿着护照，等今晚临走时还给我。”

我把护照连同一万里拉一起塞给他。

“可这里没写着画家，”他发现，“这里写着 College teacher，我想意思是教师。”

“是的，因为我虽是画家，但也在美国一所大学教艺术史。”

“好吧。”他于是战战兢兢地折起钞票放进口袋，把我带到屋里，开了门，“请稍等一下，我去给您拿床单和枕套。”

我说不用了，但他坚持要拿，拖着便鞋走了出去，不一会便回来了。他要给我铺床，我谢绝了。

等剩下我一人时，便走到窗前，将窗户打开，因为房间里有一股关闭很久的气味。从半开着的百叶窗，我向下看了看已经苏醒的街道。然后倒在床上想最早几点钟去卜达奈利合适。

将近十一点光景，我出去了。先在耶西逛了逛，看是否能找到一家开门营业的商店，想给盖基娜的孩子带点礼物：玩具、衣服之类。这次不能空着手去。只有点心铺开着门，于是买了一盒糖和一个蛋糕。

我到卜达奈利时，人们已做完弥撒从教堂出来了。起初我把车停在住宅区外，为了不引人注目。但看到人人都发现我是外国人，好奇地打量着我，便明白自己是做了件蠢事。因为他们同样也会立即发现那辆车，我的谨慎反而引起怀疑。所以我又回到车上，公然把它开到教堂的广场上。还没有走到村子前，就有一个妇女赶上来招呼我，悄声问道：

“您是找盖基娜吧？”

“是的，”我惊愕地回答，“可是您怎么会知道的呢？”

“您曾来过一次。还在打仗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您是军人，美国人，开了一辆吉普车，是吗？”

“对了，可您……”

“没什么，我记得您。我是盖基娜的朋友，她总是提到您，战后，甚

至最近也常提到您。”

“盖基娜怎么样？”

“很好。她又生了个孩子。现在有两个男孩了。他们都很好。您来，我带您去盖基娜家，她会很高兴见到您的。”

我们离开大路走到一条横街上，然后转入一条土路。两边是菜园、葡萄园和新建的平房。白色的墙，红色的屋顶，绿色的百叶窗；住房和做奶酪的牛奶房都在一起。

“就在这儿。”那静静地快步走在我前面的妇女最后说，给我指了指比其他几幢略大，且较为雅致、气派的一幢。更不同的是它四周围着铁丝网，并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您就在前面等着，盖基娜这就来。”

“可是也许她有事要干，您对她说很抱歉打扰她。要是我能预先通知她……”

“没事儿，她确实有孩子，不过我可以给她看一会儿……”她好心而不无恶意地对我笑笑。一张红色的大脸上长着一双活泼、机灵、乌黑、聪明的眼睛。

几秒钟之后，盖基娜出现在住房的门口。她有些清瘦，梳洗得很整齐，几乎是一副城里人的打扮，穿着浅蓝色大白花的丝质开襟套装。也许因为今天是星期日，是刚从教堂回来。

“哈雷先生！”她向我冲过来，我几乎以为她要拥抱我，“我心里总想着还会见到您的！谢谢您来看我！”

“不知怎么你的朋友把我认出来了……”说着不知不觉用你称呼她了，而上次我是用您和她相称的；不知不觉伸出那只没拿东西的手摸着她的肘子和手臂。

“是我先看见您了，哈雷先生！”于是盖基娜红着脸，低下头对我解释说，“做完弥撒出来，我老远就看见您了，在广场中间一眼就认出了您。我觉得心里震了一下，喉咙里似乎有个结。在那么多人前我怎

么也不敢走上去迎您，所以就让我的朋友去找您。您知道，这是个小村子，人们都很狭隘的，脑子不开化，一有什么事便马上往坏里想。上一次是战争时期，大家都和美国人说话，我又怀着孕。哦，您知道吗，我又有个孩子，现在八个月了。哈雷先生，您要是能见到就好了，他多可爱啊。”

“您怎么会来的……”但她突然停口。我也静静地不出声，有一刻我想，也许我也该对她说，我也结婚了，现在也有个孩子，但害怕这样就会无法实现我此行的目的。这次我可不是那么温情了，所以没有说。我们互相望着对方的眼睛，面对面地站着；在七月的太阳下，在农村星期天的一片沉寂中。母鸡的咯咯声，孩子的啼哭声（也许是她的一个孩子?），远处另一个村子里提前敲打的午祷钟声，轻轻地、微妙地点缀着这一片寂静，然而却不惊动它。

“盖基娜，”我把手放在她的手背上对她说，这一接触甚于最甜蜜的亲吻，“盖基娜，我多么想和你呆久些……”

“我很遗憾，”她又低下了头喃喃地说，似乎经受不住我的眼光。“我很抱歉这次不能请你到我家去，哈雷先生。我丈夫不在，他今天上午出去了，开了卡车去弗佳，只剩下我和妈妈带着孩子在家。我对您说了，这是个小村子，稍有什么就会有流言蜚语。”

丈夫不在？什么时候回来？那么说，她可以走开几个小时，到耶西来？她从不去耶西吗？去，有时去的，特别是星期天。星期天晚上，把孩子安顿睡觉后，由妈妈照看着，她就和那个女朋友，要是丈夫在家，就和丈夫去看电影。

那么事情看来是可能的，看着盖基娜，我几乎高兴、激动得颤抖起来。她生了孩子，臀部变大了，原来就纤细的腰肢显得更细。乳房并不大，但突起，饱满、高耸。她的嘴，她的眼光在那一刻流露出欲望和希望交织在一起的深深的幸福感。

我把那幢楼确切的地址给了她。一切都对她解释清楚：我在百叶

窗后看着街上等她。她准八点应在大门前徘徊，让我看到。我便可以下去开门而不用她按门铃。我不希望房东看到她来，他会反对的。于是我将送给孩子的糖果包给了她，勉强克制住不去搂她的腰肢，趁还没有人突然来到，便跑步走开了。

我去一家小饭馆吃了饭。回来之后赤身躺在铺着一条床单的垫子上，在那间阴暗而闷热的小屋里足足沉睡了一个下午。我确信盖基娜八点钟一定会来。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她将是我的了。于是我觉得从来没有像在那间房子里那么幸福过。我明白了，坚持要在这里和盖基娜在一起并不是一种疯狂。这高贵、严峻、朴实的十九世纪末期的房间是一个舞台，是最适合于伤害一个年轻母亲尊严的地方；是对享乐的允诺和保证。如在其它地方，盖基娜品德的牺牲对我就不会如此珍贵。

镶在特大的雕花镀金镜框里的两张主人夫妇放大的肖像；带有黄铜球饰的铁床；硬木雕花梳妆台；洗脸池和水罐都很大的大理石盥洗台；小壁炉上乳白色玻璃的细颈凉水瓶和杯子，满是尘埃的玻璃罩下几乎无法辨认的假花；被虫蛀了的绣花毛毡和长毛绒毯；沙发上的白布垫套；没有水的圣水钵以及可能自上世纪以来就再也没有人祈求过的跪垫……这间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甚至陈旧的灰尘气味都需要，都几乎乞求着亵渎者的生命气息。

我早在八点之前好久就醒了。情绪激动，因等待而恼怒，同时因不再为朵拉而痛苦感到满意。对盖基娜的思念就像神奇的灵丹妙药使我恢复了青春。

我坐立不安，为谨慎起见不想出去，然而又没有足够的耐心，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去冒险那样异常激动：在房间里不停地来回踱步；在床上躺下，又立即站起来；认认真真将毯子和床单铺好，几分钟后又倒在床上。

七点半钟时，我开始从百叶窗向外张望，看她是否已来了。太阳

仍未下山，然而大街已完全在阴影之下。街上，在商店通亮的玻璃橱窗前，挤满了衣着讲究的人群，在欢快地、喋喋不休地交谈着。小城市的居民们星期天在溜达。

突然我发现了她，身穿深色的套装，拿着提包，戴着手套。她停在大门正对面的一个玻璃橱窗前，稍迟疑了一会，转过身来探看房子这边。我跑下楼去开了大门，仅仅打开一条门缝便躲在一边等着。几秒钟之后，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推开了大门。盖基娜进来了，投入了我的怀抱。

我们轻轻地踮着脚尖走上楼去，我怕遇见房东，那就危险了，至少会很窘，但他没有出现，也许是出去了。我们终于进入了房间，锁上了房门，我抱起了盖基娜，把她放到床上，吻她，急切地脱去了她的衣服。

“多久了，”我喃喃地说，“这一刻我等了多久了！多少年了！盖基娜！我的盖基娜！我的！我的！我的！”

她微笑着，闭上了眼睛，一副极度幸福的表情。我却盯着她，似乎想在这时候用目光看透她。在幸福之中，她那总是微笑着的脸上有一种讥讽和超凡的表情；涂得很漂亮的嘴唇紧闭着，两角微微上翘，像古代希腊、埃及的一些雕像中常见到的。

魅力是多么地短暂！

几分钟，也许仅是几秒之后，我怀抱中的只是一个汗水淋淋，气喘吁吁，洒着低级香水的女人，一张涨红着看来得到满足的脸。于是我再环顾了一下这间对我遥远的欲望是如此神圣的房间，——自盖基娜进来之后没想起来再看看它——现在这间古老的房间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只是一堆乱七八糟、满是尘埃的破旧家具。

“盖基娜，”经过一段很长的沉默之后，我对她说，“你知道吗，我也结婚了。”

她惊跳了一下，看着我，仿佛我突然使她受到很大的痛苦。

“是的，盖基娜，一年半以前我结婚了。现在也有一个八个月的孩子。”

她没有立即说话，爱抚地摸摸我，然后说：“是美国人吗？”

听了回答之后似乎得到些安慰。

“您做得对，”又重新用您称呼我说，“我很多次都想到您会结婚了……您满意吗？”

“不，盖基娜。”

“那她呢，爱您吗？”

“哦，是的，这是肯定的！”我兴奋地、肯定地说，“其实我也爱她，不过这完全不一样。”

“我知道，”她叹了口气说，“我其实也很爱我丈夫，也许和您爱您妻子的方式是一样的。是一种钟爱，就像母亲的爱一样。”

“正是这样，盖基娜。”

于是，这场我无法克制的风流韵事进入冗长、痛苦的尾声了。对可怜的盖基娜，我再也无话可说。我对她，或是我觉得对她，已没有任何感情可言。短短的几分钟，也许仅是短短的几秒钟之内我完全结束了、毁灭了长达数年的愿望。也许正因为如此之久而曾使我觉得它是那么重要，是永远也不会逝去的。

黑暗一步步吞噬了整个房间。盖基娜还没有走，她不能走，害怕出走大门时给认出来，或碰巧遇到同村的人（星期天村里有许多人到耶西来），想等到人们散去了，街上行人稀少时再走。那时可以悄悄把门打开，探身看看是否有人来，然后真的去电影院。今天上午我认识的那个女朋友在那里等她，十二点以后就坐末班车回家。

我饿了，很想出去，这当然不能对她说，也不能让她察觉。我穿好衣服，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一边抽着烟一边和她聊天，艰难地掩饰着失望、厌烦、饥饿和困倦。盖基娜穿着内衣躺在床上，靠着肘臂打量着我，仿佛在揣度我的想法。突然她向我要支烟，告诉我以前是从来不

抽烟的。笨拙地拿着烟，她自己也笑起来了。而时间过得很慢，愈来愈慢。

说着说着，突然话题中断了，又要另找话题，却不能一下找到。朵萝苔娅不可抗拒地又出现在我的幻想之中，想和她在一起。将现在的失望和每次跟朵萝苔娅在一起时有过的失望相比，那是另一种轻微得多的痛苦。

和朵拉在一起感到痛苦的只是我，然而看到朵拉做爱之后平静、漠然、几乎总是立即进入梦乡的躯体，就会使我完全摆脱任何的责任感，至少对她没有任何责任感。

现在，我却憎恨自己。看着在屋子那头的床上望着我的盖基娜仍然是那么柔情绵绵，仍然是急切地渴望着，我完全感到了自己的轻薄、自私和无能。

快到十点时，她终于从百叶窗后面看到行人已散去，于是准备走了。穿上外套之前，她拥抱了我，并用力久久地吻我。她穿着一件红色绣花发亮的衬裙，可能是她非常喜欢的衣服，也许希望以此在我记忆中留下一个放荡的情人，一个城里人的形象。

然后拿过皮包，掏出一个上等羊皮纸包装的精制小包来，是一条金链和一个有圣母像的坠子。

"我给您带来留个纪念，哈雷先生，"她说，"圣母是赐福的，我知道您不是天主教徒，可是一样会给您带来幸福。我并不要求您戴在头上，您放在哪儿都行，皮包里，抽屉里，只要答应我留下。"

我答应了，很受感动。在房间的幽暗之中，借街上透过百叶窗射进来的暗淡的光线，我看到盖基娜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或者，"她最后说，竭力忍住使自己不哭出来，"如果有一天您实在不愿再保存它，请把它给您的夫人，只给您的夫人。这您也答应我吗？"

"答应。"我说，并本能地补充说，"我夫人是天主教徒。"

我从百叶窗里看到她从大门出来，头也不回很快地离去，不再向上望一眼，永远从我生活中消失了。

我出去吃饭，然后便立即出发去安科纳，半夜十二点以前就到达了目的地。

旅店里有我的电报，头一天晚上就到了，是琼发来的，要我去接她。她要尽快离开卡不里岛，因为杜卓不太好。她宽慰我说并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只是医生建议换换环境。

十三

我们在巴黎奥戴尼尔租了一套带家具的寓所。每天早晨我驾车去克莱勃大街的教科文组织上班，在地下室的咖啡馆或附近的小饭馆吃午饭，下午六点回到奥戴尼尔。总之过的是职员的生活。薪金很高，工作不多，非常无聊。我管一个处，在五楼有个办公室，几间房间，二十来个属下，几名秘书。从我办公室的窗口可以看到巴黎烟雾迷漫银灰色的屋顶；和交替出现的太阳、云雾、细雨、和风。还有夹在灰色的房子中间像犁沟似的大街，有时黑色，有时绿色，依气候而异，一直通到因瓦利得斯(lnvaeides)的镀金圆顶下。巴黎还是可爱的，这充满生机的空气，变幻无常的天空和银灰色的阳光之中，究竟有什么东西能够淡化记忆，控制欲望，满足于幻想？

罗马总是唆使我犯罪；美国则让我克制，巴黎则二者兼而有之。

我中断了旅程，直接从安科纳赶到卡不里时，看到琼神情倦息，精神恍惚，所幸杜卓没有任何严重的问题，仅仅是羸弱和由于气候不合适而烦躁。琼承认自己坚持来卡不里错了，很后悔，想立即离去。甚至愿意直接回美国去，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我把她们送到了瑞士的一

个小山村，是那个季节对杜卓最理想的地方，然后又回去继续工作。匆匆完成了在马尔凯、阿布鲁佐和整个意大利南方的全部工作。将近八月底在帕勒莫结束了我的行程，卖掉了汽车，坐飞机到罗马。在罗马只停留了一个夜晚，是和朵拉一起度过的，在这以前一直未见过她。第二天，便乘火车去米兰，再转而去瑞士，九月初我们就在巴黎安居下来了。

琼有些忧郁，然而却很平静。瑞士山区对她也有很好的影响。每天回来，总见到她在照料杜卓。把弗劳琳也解雇了，现在什么都自己干，包括煮饭。只雇用一个妇女干些粗重的活计，以及我们外出和她早上去教堂时照看孩子。这是个新现象。琼一直是信教的，但过去没有像我现在见到的那样，每天早晨都去教堂。我问她是什么原因时，她说，一个人留在卡不里岛时，除了佣人谁也见不到，于是很自然便恢复了儿提时代和青年时期思索、祈祷和履行圣事的习惯。

又说，也许是杜卓的病使她受惊了。特别是那次，一个可怕的下午，就在她给我发电报到安科纳之前，杜卓突然肚子绞痛，全身绛紫色，像是要死去的样子。那天是圣·柯斯坦佑的节日，卡不里的大节，所以佣人都放假走了。弗劳琳两天前扭伤了踝骨不能行走。附近的别墅也没有任何人，都去广场看宗教仪仗队了。空中的炮竹声震耳欲聋，还能听到不断敲打着的钟声和奏着圣曲的乐队。她只得亲自跑去找医生。药房关了门，医生不在家，也过节去了。在这么多的人群和一片喧嚣和混乱之中怎么能找到他呢？她向人询问，是否见到过医生，有人回答说见到过，向她指了个方向，于是她便急急忙忙从人群中挤出去。但当她赶到那里，医生又不在了，这样时间白白过去，杜卓命在旦夕。最后在天色傍晚时，她找到了唐·拉菲尔。唐·拉菲尔说几分钟之前肯定见过医生，他坐车去上卡不里了。于是她要了辆车（就是那个胖子的汽车）去赶医生。可是在半山路上那辆老爷敞篷车抛了锚，这是常常发生的，在最陡的地方上不去了。就在上卡不里的

大岩壁下，半山腰上的洞穴里有个小小的白色圣母像。在胖司机修理马达的时候，琼下意识地祈求真福童贞玛丽娅，并向之许愿：如杜卓平安无事，她将重新履行一切圣事，并将恢复一切中断多年的宗教仪式。

在上卡不里的广场上终于找到了医生，便立即和他一起下去，一路跑到别墅。弗劳琳笑盈盈地站在门口，一切都正常。就在琼去找医生的几分钟之后，什么事也没有了。杜卓吃完了一瓶奶后便安静地睡去。弗劳琳等了一会见她还没回来有些担心，使派了个小男孩，牧羊人的儿子，去给她送个消息，显然由于乱哄哄的人群而未能找到。

琼后来自问道："难道我一许愿，甚至就在许愿的时候，杜卓就脱离危险了吗？"

但是想到时间和空间都仅是对我们而存在，并不是对上帝和天堂里的圣者；对于最接近上帝的真福童贞玛丽娅同样也不存在。于是她明白了，奇迹也可能发生在许愿之前，而且不是几小时之前，是几年，甚至几百年之前！因此人只要祈祷，奇迹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

以这样的逻辑解释了疑惑之后，她又想起了那几个小时绝望的焦虑。她对我解释道："当你爱着的时候，所爱的人突然有可能死去；那时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能干什么？难道我们能改变命运的行程？那时我们会感到自己实实在在的无能。然而爱给我们带来希望，让我们有信念，叫我们祈祷。上帝，上帝！您别让我的孩子死去！"她两眼饱含着泪水这么说着时，重又想起了（即使仅仅只是谈话中的假设）杜卓可能会死去，于是激动得颤抖起来，我相信她又在默默地祈祷了。

我虽没有祈祷，然而听着她的说话也像她一样激动，我理解她的心情。然而心里却暗暗忖思：为什么想到杜卓的死，就像想到我父亲的死，或琼本人的死一样，会使我立刻感到痛苦；然而对于朵拉的死讯我却相反可以漠然处之。

我当然也爱朵拉，但这是一种不同的，也许是相反的爱。我爱她，需要她，甚于世上任何一个人，深深感激她所给予我的生活中幸福的时刻，但为什么对她可能发生的不幸却丝毫也不使我不安和痛苦呢？是我的心肠异常的硬，还是有什么问题？有时候，当和她的约会因故而推迟的时候，我会难受得发疯，而对于失去她却毫无痛苦，毫不遗憾，也没有一点伤感。不是想到她的死，是想到她活着，我才会去祈祷。为什么呢？难道我自私到这种程度吗？

这个问题我自问过多次，但从未找到答案。愈是思索，愈是迷惑不解，最后相信我对自己无所了解。

琼重新变得虔诚之后，示意希望我改信天主教。她把罗马教廷最新的和最无偏见的作者所著的小说给我看，了解我的反应，我的观点，千方百计诱导我。

而我由于长期住在意大利以及由于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已非常习惯意大利人的习俗和信仰，自己觉得仿佛已是天主教徒了，但并不认为有必要正式进行改变信仰的仪式：进行补赎和吃圣餐。老实说，对于这些事情的神秘性，我是从来不信的。此外，我很不喜欢这种事情世俗、赶时髦的一面：最近几年对于美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天主教已成为一种时髦。此外，还有对童年时代所信仰的宗教一种深情而淡泊的回忆：在那冰雪之中的礼拜天；我父母经常去做礼拜的那个小教堂里唱诗班的歌声……如果在如此美好的记忆中背叛这一淡薄而纤弱的信仰，我觉得是一种既无谓又亵渎的行为。

对琼多次不断的要求，我总是婉拒，特别不愿参与那些宗教争论。而她却几乎每天希望辩论，说什么信仰的门即使用好奇的钥匙也能打开。

但在那梦幻似的秋天，不知为什么，没有什么能引起我的好奇。是新职务使我懒散了，还是单调、规律的生活，和教科文办公室温馨、舒适、安静的环境所影响，总之没有什么能激发我的好奇心。我开始

抽烟斗了。办公室在一个角落上,宽大的窗户朝东而开,向南向西也各有一排矮窗,因此只要是晴天,屋里总有阳光。我烟斗的烟萦绕于整个房间,形成一层云雾包围着我,裹着我,使世界上其他一切都不复存在。从早晨起就这样,我坐在太师椅里,面前是一张极大的办公桌,成了我与属下之间的屏障。他们来见我时——这是很少有的——在一片烟雾之中仿佛是在远处,模模糊糊依稀可见。办公桌上放着些纸,是报告、照片复制品之类,还有几本书。我装着在看书,在写东西,其实什么也不干。早晨一上班匆匆忙忙处理完少量的信件之后便像着了魔似地不着边际地幻想(这是在几天内很快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想象的中心总是朵萝苔娅。从来没有像那个时期那么爱抚过她,看过她,想象过她,研究她,爱她,并把她想象得那么好。我非常幸福,几乎满足于能这么想象,而忘记了现实;尽管那是我梦想的根源。

怎么可能在想象中会比在真实中感到更多的愉悦呢?

凡有过与我同样感受的人都会知道,这不仅可能,而且是正常的,合乎逻辑的。

任何一种现实,即使是最令人满足的性爱,总是穿插着一些不愉快的细节,充满各种矛盾和与那种快感格格不入的光线、声音和感觉,虽然能为记忆所洗刷。

我安乐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中,拿出了一张朵拉的相片——是我仅有的一张她的相片——凝视着。这是一张在罗马附近的海边照的相,朵拉穿着泳衣,照的是背影。她转过身眼睛对着镜头,露出一种淫邪的表情。

我久久地,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这张相片,以致能赋予它以内在的价值,仿佛它比所表现的那位遥远而不可及的女神更为重要;已成为我忠实崇拜的偶像,并能以某种方式给我以奖励。

不久偶像使我生厌了,便再也没有任何意义。我将相片重新放回抽屉里。又过了半个月,发现不借助任何东西,仅凭回忆和想象能更

好地思念朵拉。我想象着她穿着制作完美的衣服，连最好的宫廷裁缝师都望尘莫及；戴着价值连城的首饰，王公贵族们都无法将之赐予最宠爱的姬妾；或是想象着她赤裸着身体，但总戴着首饰。

头发乌黑、光亮、柔软，呈波浪形自然地微微飘动，特别在额前；前额威严、宽广、微微凸出；绿色的大眼睛在眼眶的阴影里金子似地闪烁发光；眼眶的皮肤由于纵欲而表现出凋谢的开始，是对色欲的允诺；双颊丰满，嘴唇肉感，牙齿坚实、洁白；肩膀和手臂像古代的塑像；背部宽厚、光洁，并且是棕色的，像阳光下一片平静的海，我可以永远不知疲倦地凝视着它，仅短暂的一瞥便可吸取无穷的力量和生活的乐趣；乳房丰满、坚实，沉甸甸的；浑圆的腰肢和大腿犹如巨人一般；腹部柔软光滑，膝盖像被流水冲刷得圆润光洁的卵石；小腿笔直，匀称；踝骨柔细，双脚坚实。

而两只手只能与踝部成比例：非常之小，然而并不瘦，只是纤细。我握手时几乎可以将之全部捏在掌中。

出于唯美主义的好奇心(不过这也是我职业的关系)，我不断地在艺术史中搜寻能更好体现朵拉的作品。

在翻看画册、专著和相集时，古代，我总是停留在古罗马没落时期一些画家的作品上；现代则是十六世纪某些仿古主义流派的艺术家，如安德烈·德·撒尔托，或是赛巴斯蒂亚诺·德·比奥姆波。

接替我在教科文组织工作的杰出的学者，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小小的图书馆和收藏的相集中——那是一般普及性的收藏——收藏着如此众多与赛巴斯蒂亚诺·德·比奥姆波的一切和一套他作品的完整的相册。

我找到了一张藏于柏林博物馆的“一个妇女的肖像”的复制品，将之装入一个古老的镜框中，挂在我办公桌的正对面。然而对朵拉的冥思如果不编造一些离奇的、不寻常的幻想几乎从来不可能，也不会使我满足。即是说，在冥想中要加上对我和朵拉未来会见的想象。每

次都不相同，总是有新的内容，总是曲折的、令人惊奇的，然而又是可信的：将来的相见，将来做爱的方式和姿态，以及将来和她相处的日子。有时我想象着将未来的全部生活都乐意地奉献给她。

譬如我想着，背着琼偷偷让她来巴黎，将她安置在一家小旅店。下班后从办公室出来，我不愿立即回家和立即中断几个小时幻想的自由。尽管我知道不会有勇气让朵拉来巴黎，但还是去寻找旅馆。

夜幕降临时我驾车兜逛，一边仍继续在梦想。在一家酒吧前，我停了车，进去，慢慢地啜着一杯美酒，把目光停留在马路对面一家没有多少人光顾的小客栈的招牌和窗户上，幻想着可以将朵拉安置在这里。

多少次这么遐想！终于有一次走进了这家旅店，看了几间房间，问了价钱，预约了后天入住，说再打电话来确认。姓名呢？考拉第小姐，我说了朵拉的姓！看着那肮脏的老人在黑板上写上了"考拉第小姐"，我感到无限的兴奋，仿佛奇迹已实现了第一步。

我达到了迷惘、平静、几乎幸福的境地。也许琼从我的表情觉察到了这个她陌生的梦，因而痛苦。然而她不能对我说什么，那一再发生的小小的冲突，虽无伤大雅，却更加剧了我们之间的互不理解。我们常争吵，有时争吵突然会变得十分激烈、尖酸，就像老夫老妻那样折磨自己。争吵的原因，或说是借口，都是微不足道的琐事：琼应穿什么衣服外出；给杜卓买什么玩具；怎样度过夜晚的时光：是去听音乐会，打扑克，还是留在家里。

就在那些使人丧气的夜晚，有一次我们驾车出去，经过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琼突然苦笑一下，柔声对我说(没有柔情，然而是平静地)，"亲爱的，我们这样生活着，你不觉得这是在互相诅咒对方的死吗？"

我否认，我竭尽全部的言论和思想予以否认，但她却不幸而言中。唉！是真的！就在我们沉默的那一刻，我正在想象着——不是愿

望——如果琼死了，我将如何与朵拉一起平静地生活！

琼又坚持在宗教问题上的意见，不懈地说服我改变信仰。如果不是每天梦想的习惯，也许我最后会妥协而去说那些更无稽的谎言，或至少会同意去认识著名的皮埃尔神父。

夜里我们几乎总是和好的，但即使是仿佛可使我们平静的性生活也是一种谎言，至少从我这方面是这样。朵拉整天在我脑海之中；在我的思想、感觉中几乎无处不在。在黑暗中搂抱琼的时候，尽管现实的感觉是不同的，我总是想象着拥抱的是朵拉，只有这样我才能够爱。当短暂的、自欺欺人的一刻结束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内疚和厌烦，唯有在睡梦的孤独之中才得以解脱。

琼觉察到什么了吗？感觉到我离她多么远吗？那时我说没有，因为这样我才安心。

后来我开始给朵拉写信，当然信是不会寄给她的，总是担心勒索。我写好信，重读一次，想象着是寄给她的，然后用信封封好，贴上邮票。

出去，一直走到最近的邮局。在信筒前犹豫了好一阵，然后回到教科文组织，将这封信和其他的一起锁在抽屉里。我去罗马的时候会把信都带给朵拉，让她当着我的面看。这样她就会知道我曾是多么思念她，多么炽热地想她。然后，当然，拿回来烧掉。

这些信都写些什么呢？在远离她的孤独之中所幻想的一切：赞扬她的美貌，吐露我的爱情；坦述最荒谬的愿望，最荒诞的计划。我对她说，我将抛弃琼和杜卓，将我奉献给她，像奴隶一样侍候她；像狗一样睡在她的床脚下。甘心忍受她任何的侮辱、欺压和残忍。活着像神一样崇拜她，直到死都在她身边，不做任何其他事情。我对她说：把我的一切都拿去，让我爱我的贫穷；因为我的贫穷是你致富的结果。我记得，在一封信里，我对她讲了一个常做的梦，是一个荒谬绝伦的梦：不仅我自己是她的奴仆，侍候着她；而且还有琼和杜卓——作为我所拥

有的最宝贵的财富。琼当她的女侍，杜卓则是她女侍的儿子，是她，朵萝苔娅，出于恻隐之心而收留在家的。

我知道我所想的和所写的这些荒谬的种种以及其他无法言状的一切，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实现的，所以坚信这对琼和杜卓不会构成任何实际的伤害。我想，这只是一种虚构，是一种无害的想象；而那些信则是习惯性的冗长的叙述，发泄我个人欲望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仅此而已。只是我需要，需要见到它们写好了放在我面前，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荒谬的文字游戏。如果今天再读这些信，会觉得是多么可笑，多么可怜，多么可悲！幸而都已烧毁——我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则是藏起来了，藏得连我自己也不记得是在哪里了。

那个时期我形成的另一个习惯是：在走过首饰铺前时不能不想到朵拉。很多次我凝视着珍珠、钻石、金饰、手镯、戒指、项链、耳环，把它们看作是赠给朵拉的礼物。有时琼和我在一起，她也很乐意久久地停在这些橱窗前。我一言不发地看着，琼在我旁边默默地凝视着，也许在想我是在为她挑选礼物。

我有一个叫柯姆巴的朋友，你不认识他，是意大利北方人，好像是皮埃蒙特人，是个天主教徒，也可能是基督教徒。有一天我们在街上漫步，他发现我非常乐意留连在首饰铺的橱窗前。我只得向他解释了原由，说是在思念一位爱恋的女人。

“我亲爱的，你在自欺欺人”，柯姆巴说，“你以为在想她，实际上你是个道德上的软弱者，只是想用一种新的方式刺激自己。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女人是谁，也不想知道。如果你热烈地爱她就不会觉得需要赠送给她什么贵重的礼物，一束鲜花，一个纪念品就足够了，甚至礼品的经济价值愈低，爱情的价值就愈高。”

从那天到如今已过去那么久了，其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然而至今我仍无法确定柯姆巴说的是否有理。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之后，禁闭在办公室里对着朵拉的相片冥想，

或在回忆中想象朵拉，或写不发出去的信和看那些想买给她而又从未买过的首饰……所有这些幻想和荒诞的行径，已不能再使我满足了。

我决定给朵拉打电话，即使是短暂的几分钟也要听听她的声音。但不好意思通过办公室的女职员要长途，她们可能会听到我对朵拉说的话，于是，等到下午一点钟，大家都去用午餐时，我直接到总机拨了一个罗马的加急电话。

时间一分分地过去，电话还没有接通，我如坐针毡，害怕朵拉不在家，这正是通常她去威内托大街散步和女友一起喝苦艾酒的时间。

但是一切都很顺利。经过这么多月的离别之后又重新听到了她的声音，有点低沉、沙哑，但热情、甜美、平静、果断。

"你什么时候才来看我？"

一口罗马腔，任何别人说都使我听了生气，然而出自她的口中却使我高兴，就像抚摸着她光溜的腰肢；她那柔和、光滑，和略为肥胖的棕色皮肤。

"我常常想你，"我那女神的声音继续说，"为什么不给我好好儿写封信？"

"我非常忙，朵拉，没时间。"

"要是我要求你呢？我要你给我写信，哈雷！"

我要，她说了我要。听到我要两个字心里仿佛紧抽了一下，感到无上的高兴。"我要"，这是她第一次向我要求什么。我突然问，为什么？刹时间闪过一个念头：她没有钱了，日子过得不好，需要我的信来勒索我？

"不，"我坚决回答，"我没有时间写信，再给你打电话。"

"什么时候？"她毫不犹豫地问。

"后天。"我答应，"再见，朵拉，我也常常想你。每天，每时每刻。"

"你这嚼舌的！"

“我向你发誓，亲爱的，每天，时时刻刻。”

“这不可能是真的，要不你干吗不写信？”

“实际上我给你写了。”

“真是该杀的！我连一张明信片都没有收到过！”

“我给你写过很多信，可是从没寄出，都在这儿的抽屉里。见面时我带去，你就会见到了。”

“疯子！”她亲昵地骂着我。由于通知时间已到，便说：“那我后天这时等你的电话，再见，哈雷。谢谢你给我打了电话，再见！”

我放下听筒，明白了，这短短三分钟的电话胜于我几个月的幻想，刹那间我看到了我长期以来耐心的错误和滑向荒唐的错误安排。

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不断重复着“我要”、“嚼舌的”、“该杀的”、“疯子”，这些生动、真实的字眼，是从一个真实的人口中吐出，而不是我臆造出来的。这几个月来我从未能想出这样的词来！我受到了真实生活浪花的冲击，突然对我的恶习感到厌倦了。立即不愿再去想朵拉，以新的眼光看着办公室的四壁；看着进餐完毕回来的属下们。整个下午我紧张地工作，五点钟回家。

路上我对自己说，后天再给朵拉打个电话，然后设法去趟罗马，要有个了结。是想抛弃琼和朵拉一起生活吗？做梦也没想过。我只是想和现实接触，以找到久已失去的平衡。在教科文的工作是混日子，相当一部分可做的事我都忽略了；所干的仅限于欺骗上级那部分必不可少的工作。我个人的研究工作亦早已完全弃之一边；夏天在意大利收集了资料准备写的一本有关十三世纪罗马画家和镶嵌艺术家的专著，第一章只写了一半就停下了。最后是我对琼的态度，这是不可原谅的。对朵拉幻想的恶习，整天以此为念直到乐极而忘我的境地，这些在我身上像毒药一样滋长着不满和怨恨，并不自觉地将之发泄在我最亲近的人，琼的身上。不知不觉地，随时都责备她不是朵拉；琼是我一切痛苦的首要原因，于是我报复她。

这是不公正的。因此，为了我对琼的爱，我要去罗马，或者另找一个女人代替朵拉。为了不再折磨可怜的琼，要经常在肉体上背叛她，而不总是只在思想上。

我在这种新的心境中回到家里，从琼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打乱了我的全部计划。生活中总是这样的，当你作出一个不仅与自己有关，而且也与另一个人有关决定的时候，总是这样的。

琼第二次怀孕了。她一直瞒着我。因为她说自己也希望它不是。主要的原因是杜卓还太小，需要很多照顾，所以一直没有说。但今天去看了医生，再也没有任何疑问了：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她想在圣诞节之前带杜卓回费城去，皮埃尔神父也建议她这样做，现在琼的一切都听从他的。孩子将在四、五月出世。

于是在我面前就有一段分离，我可以一个人单独在巴黎住几个月，可以随时见到朵拉，和她在一起。

然而，当期待已久看来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一旦变为可能时，即使不失去其诱惑力也变得对之不是那么急切了。

当我一个人在巴黎留下，可以在任何时候去罗马或让朵拉到巴黎来的时候，却一天天地拖延，迟迟不作出任何决定。同时养成了另一个习惯：每天上午将近十二点时从办公室给朵拉打电话，而每天晚上则漫步在巴黎的林荫道，随便找个妓女过夜，而且几乎总是每夜不同。我不愿失去朵拉；说得更确切些，是不愿失去对她的欲望；同时又想在如此众多各不相同的女人之中求得解脱，想在她们之中找到一个比较喜欢的，以期至少能短期地改变那根深蒂固的顽念。于是认识了蒙达邦的南方人伊逢；肥胖、矮小、激情、可爱的伊凡娜，她非常贪钱，并像所有的法国女人一样吝啬。

认识了西蒙纳，还有玛玛依、莉沙、达妮埃拉和蒙妮圭。每次跟在她们其中一人的后面——至少第一次是这样——提心吊胆地走在吱吱嘎嘎的木楼梯上，用手指紧张地拉开她们之中一人的旧衣服上的

拉链时，总是希望这次能遇上好运气，出现奇迹，找到那能使我忘记朵拉的女神。

目的何在呢？现在我问自己。即使找到了又怎样？为什么要找一个朵拉一类的女人来替代她？要一个像我不信任朵拉一样不信任的女人；要一个像她一样不可能成为我生活伴侣的女人来替代她呢？也许我带着莫名其妙的希望寻找的正是：在与朵拉一类的女人中找到一个同时又像琼的人。

我每天上午给朵拉打电话，但几次之后就不知该对她说些什么。不过仍然坚持。这每天的电话就成了一种仪式，一种信仰。我不能不听到她的声音。

我问她罗马天气怎样，答应想念她，给她寄钱。

到二月底我因公去了罗马，停留了一星期。下榻在大旅店，但睡在蓬刚巴诺路朵拉那里。

回到巴黎又开始过以前的生活：每天晚上如痴地漫步在林荫道；几天以后又开始给朵拉打电话。

5 月 9 日唐纳黛拉在费城出世了，7 月初，琼将两个孩子留给母亲和一个很好的保姆，赶到巴黎找我。她可以停留半个来月，将陪同我去罗马接受勋章——是意大利国家主席因我对修复战时遭到破坏的意大利艺术品所做的工作而颁发的。

这次旅行是以后一切不幸的起因。

十四

我们在强比诺机场从飞机上走下来，一群摄影师向我们走来；在摄影师的灯光下，我下意识地转身避开，以免挡住身后的“要人”。但

没有任何要人。摄影师们笑着喊道：

“我们是要照您，上校先生！”

“和您夫人！”

“夫人，对不起，请停一下，笑一笑！”

走在我前面的琼退后几步又走上一步阶梯，靠在我手臂上，腼腆地笑了。

我又背过身去，但这次是另有原因。我突然不无害怕地想到：明天照片就会登在罗马的一份报纸上，朵拉看见了就会知道我已结婚，那就糟了。

我坚决不照相，用旅行包挡着脸，说没有什么理由要上报，我又不是重要人物，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我非常感谢意大利新闻界，很受感动，但这样的接待出乎我意料之外。

当然在意料之外，否则我就可以避免了。记者们笑着，仍是想方设法给我照相；而且在我尚未想到要遮掩之前，还在飞机舷梯上时，至少已抢拍了一张。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走近一个摄影记者，要求他不要将摄下的相片见报。为了尽量不让琼见到我的姿势，我抓住他的肘子使劲地推他，问他几点钟在什么地方可以见到他。

两小时之后，我将琼留在旅店，就去了“公共摄影社”，在海螺广场一幢楼的二层上，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

那个摄影师叫甘道尔夫，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身材，黑胡子，一双眼睛非常机灵的。我一半用语言，一半用微笑向他解释说，确实非常希望照片不要登出来，这是个非常微妙的问题，牵涉到女人，罗马的报纸远发各地…我想暗示他，不是在罗马而是在别处一个什么地方有个女人不能知道我结过婚，或至少不能知道我这次来了意大利。

一边说我一边伸手去拿钱包。甘道尔夫及时带笑制止了我，但并不见怪。他说这是很简单的事，答应我将底片毁掉，并要求他的同事

也这样做。

我走了，但心里并不很相信他的允诺，这一切似乎太容易了。再说，我要求甘道尔夫保证做到这一切，一方面对他有侮辱性，另一方面则是危险的。如果他是个正派人，那就是对他的侮辱；如果他不是正派人，那就很危险，他可以利用我的害怕进行勒索。在一片疑虑之中我走了出去，临走前看了他一眼：他那微笑着的狡黠的脸，可以作以上任何一种解释。

第二天早晨我急切地翻阅所有的报纸，没有一张登有相片，松了口气，但稍迟当我下楼到大厅准备出去，经过古利埃莫面前时，见他向我鞠了一躬，低声说道：

“祝贺您，上校先生……”

我转过身去，见古利埃莫在殷勤地微笑，并从高高的柜台上又向我欠了欠身子。

“什么事祝贺我？”

“祝贺您照了张好相，您真上照，夫人也是。”

我好不容易控制了自己。

“我什么相片也没见到，”尽量装得满不在乎，甚至有些好奇的样子说，“登在哪儿啊？”

“就在‘美国罗马报’上呀，上校先生！今天早上您房间里没有报纸吗？”说着便递了一份给我，把照片指给我看，还有大号字的说明，我和琼的名字异常醒目，另有一篇报告这可恨的授奖事宜的短文。

我特意让人买了所有的意大利报纸，并且非常仔细地查阅了，可是却疏忽了罗马的美国报纸。这是旅店经理通常每天早晨在早餐盘中送发给美国客人的一份报纸。

甘道尔夫很守信用，制止了所有的意大利报刊登我们的相片；他认为“美国罗马报”我自己自然会考虑到的。我立即平静下来，想到“美国罗马报”几乎只有英美籍人才看，朵拉也许压根就不知道有这

么一份报纸。

上午去了教育部，人们对我说第二天意大利国家主席将接见我，并亲自隆重颁发勋章。一点钟我回旅店接琼，带她到纳沃那广场吃午饭，至于朵拉则连想也没有想过要见她，相片事件使我没有见她的愿望了。

又是夏天和琼一起在罗马，像四年前一样。在回忆中，在对我们的初恋的怀念中，我们一起度过了很久没有过的幸福而宁静的几小时时光。温馨、充满阳光的广场，小餐馆好客地遮下的一片荫凉，活跃的气氛和自如的意大利语，极为新鲜的食品，淡黄色冰凉的白葡萄酒以及那即使在最炎热的夏天也总是在下午两点吹遍全城的"西风"（海上的微风）——这一切使我们暂时又和我们的命运妥协了；又回心转意去接受和热爱生活。这当然是一种异教徒的心情，然而却也是一种宗教的精神。

一种短暂的感觉也促使这种心情的形成。因为由于女儿唐纳黛拉的出世，我们已分手了几个月，仅在三天前我才在巴黎拥抱了琼；现在，就在这个周末，她又要回美国去了，因为杜卓的保姆要休假，她必须回去。机票已经订好，琼星期六启程，从罗马直飞纽约的航班就在这几天开航。

因此，我们在一起感到幸福，也许是知道不久等待着我们的是又一次离别的缘故。

我们坐出租车回到旅店。葡萄酒、温暖和困倦使人产生一种甜蜜的欢欣。我们脱了衣服倒在床上，自然地相爱，没有任何思想，就像两个少年，我相信两个少年应是这样相爱的。这是我们生活中唯一的一次。

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夕阳已经西斜，打开了由于怕阳光辐射热而关闭了的窗户。燕子带着长长的凄凉的叫声在特尔曼花园里的树上，在蓝色的天空中飞翔，几乎擦到窗户。举目向远处的埃赛特拉东站那

边望去，只见空中布满着急促地运动着的小黑点。

琼在我身边，一言不发。

我们与这宁静不相称，我想着，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长叹。

这时，电话铃响了。琼走了过去，拿起话筒，是个不会说英语的人。琼也许因为意语不好而回答得很费力，她低声说着。房间很大，我在靠窗户这边，窗外的噪声使我听不清她说的话，只听到一个“信”字。我想琼可能说意语有困难，便离开窗边走过去帮助她。我穿过房间向她走去，看到她脸色苍白，下意识的作出一个让我停下的手势，一个推开我的手势，而她的目光……

亲爱的马里奥，这里我回到了我小说的起点。

当我徐徐向她走去，毫不起疑地悄悄问她“是谁”的时候，琼在那一刻的眼光，在大旅店房间的电话旁的眼光，对我是，而且永远是无法忘记的。她那阴森的、斜视着的、忧郁的目光，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无法理解其含意，因此我非常惶恐不安，觉得这是一种严厉的指责的目光。见到它，我心里立即一阵剧痛，想一定有人在电话里向琼揭露了我的过错，非常肯定，就仿佛亲自听到一样。是谁呢？也许是朵拉，也许是朵拉的朋友，是她指派来敲诈的。那个姐夫或是那个手戴金饰的年青人。

我颤抖的手从琼颤抖的手中接过了电话，大声说：

“喂！”

回答我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哦！是您呀，上校先生？”

“是我，您是谁？”

“我在和您夫人说话……”

“请问您是谁？”我重复着，自制着，在琼面前尽量将害怕和羞耻变为一个接到匿名电话的正派人应有的不耐烦和愤慨。

“这么说是这样啰，啊！”那声音不回答我的问题，仍是开玩笑和

威胁似地说，“你们就这样把老朋友给忘了，是吗？”

是意大利人的声音，带着南方口音（听来是个下等人），是罗马人，或是拿波里人。意大利的下层有一种愚蠢的、令人讨厌的习惯，在和外国人说话时用动词原形，以为这样能使别人易懂，而这种扭曲了的语言却使人更加难懂。

我看看琼，她一直退到了床脚边，脸色苍白，并总带着责难的目光。那阴郁的大眼睛，似乎第一次见到一种从未见过的可怕的东西。

“对不起，您究竟告不告诉我，您是谁？”

“上校先生，这样不太好，我对夫人也说了，到了罗马忘了这么久的老朋友可做得不漂亮……我们还在一起吃过饭！我们还有过共同的老朋友，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我把电话挂上了。现在我已非常清楚，一定是朵拉那边的一个什么人，在“美国罗马报”上看到了我和琼的照片。我挂上电话，那人也许不敢再来电话了，至少暂时不会。我转向琼，对她笑笑说：

“是个什么蠢家伙在开玩笑，也许是记者……”

可是琼什么也没说，去了浴室。

这对我正好，我实在无法忍受她的目光，过一会就把一切都向她坦白。点着了一支烟，我慢慢地穿衣服。

琼从浴室出来后，整整一个晚上避开我的目光，我也同样避开她的。至于那个电话，无论是我，是她，谁也没有再提起。

但现在我们之间有了一种窘迫感，一种保留的态度。晚上吃晚饭时常常沉默，有时话说到一半戛然中止。晚饭后幸而有约会，道立特斯请我们去他们的别墅（在去古阿比亚路上）。来了很多人，跳舞、聊天、喝酒，直到深夜两点。W·K也在，是好莱坞的演员，来意大利度夏，那时这是一种时髦。我们和他一起坐车回旅店。当只剩下我们俩时，已非常疲劳，而且有些醉意，对晚会，朵拉，W·K以及所看到的种种发了一阵牢骚。

第二天早晨根据安排我去见国家主席，琼陪我同往。

下午思忖着要设法见到朵拉并恫吓她，必要的时候付钱给她，让她沉默。我拿旅行支票换了一笔数量很大的现款，将钱分成相等的两份，一边口袋放一叠，都是一万里拉一张的大票。这样，如果一半够了就不用拿出另一半，以免见到我拿出这么多钱而张口要大价。

我让古利埃莫当琼的面通知我7点钟有人等我，使馆新闻处有紧急通知。这样的事他是一点就明白的。

七点差十分我出去，对琼说回来吃饭，但是会很晚，可能要九点以后。

从大旅店到朵拉家仅几步之远，然而我上了威内托大街没有就近在埃赛索大旅店的角上立即拐进蓬刚巴诺路，而想理一下我的思路，斟酌哪些话该对她说，哪些不该说。一直走到宾恰那门，穿过意大利大街，到了博尔盖塞公园。我想，先不要对她提到相片和我结婚的事，尽管在内心深处我肯定是她指使人打的电话。最好我能掌握证据让她自己说出来，因为……因为即使电话不是朵拉指使人打的可能性很少，我也不能不考虑：首先是对朵拉的最低限度的尊重，这么多年来我从没有什么可指责她的；其次是为我的利益要谨慎。如果电话确实与朵拉无关，那就是说她并不知道我已结婚，如果我轻举妄动岂不是自己向她泄露吗？

当我从博尔盖塞公园出来时，已夜色朦胧，突然，我又穿过意大利大街，开始下到皮埃蒙特街再向蓬刚巴诺路走去，似乎是发生了什么变化。直到那一刻以前，我一直举止冷静，准备平静地、谨慎地，以一个自由派欧洲人的明智（而不是像一个美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那样）来妥善处理这一显然有朵拉参与的敲诈事件。突然，在我走上皮埃蒙特街的最初几步之后，就明白不完全是这样。人行道的一边是私人花园的铁栅栏。就在这个地方，1944年9、10月间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大约两点钟左右，我和朵拉停留过很长时间。我记得，她穿着薄薄的

黑绸子连衣裙，双臂完全裸在外面，天气还很热；腰上扎着一条发亮的带黄铜球饰的皮带。琼和朋友们在旅店等着我，我们要一起去吃饭，到波尔塞那湖畔去度周末。我迟些去，因为想见朵拉，告诉她那天晚上和星期天不能到她那里去。我赶到时见她正要出去，到惯常的威内托大街去散步。没敢让她回楼上去，就和她并排走着，对她解释。当然，我害怕我那些认识琼的同事，或甚至琼自己，会看见我们，所以挽着朵拉那赤裸、丰腴、凉净的手臂和她拐到了皮埃蒙特街，那儿遇到熟人的危险性较小；而在威内托大街则是不可避免的。记得走上皮埃蒙特街时，我左右张望，唯恐见到穿美国军装的人，又尽量不让朵拉察觉我的神色。这种双重害怕的心情，由于与朵拉的接近（与她赤裸的手臂和柔软、隆起的臀部的接触），由于她低级的香水味，由于急切地对她的需要，而并不是不愉快的；甚至相反觉得与琼面对面相遇的危险，更增加了我和朵拉在一起的愉快感。于是将几句话便可结束的短暂的会晤延长到半个小时以上。我记得，由于罗马人有午休的习惯，皮埃蒙特街上行人渐渐地稀少了；还记得，我停留在铁栅栏旁边小公园的树荫下，对着朵拉金绿色的眼睛不知注视了多久。虽有强烈的愿望，却不能立即在这里吻她、拥抱她；于是我盯着她的眼睛，握着她一只手臂，喃喃地向她诉说突然间涌进脑海的疯狂的愿望，和后天准备和她在床上做的一切。记得当时如此这般地和她说话的时候，由于愿望是如此强烈，而又必须仅限于语言和眼神的表达，限于手的简单接触，刹时间觉得就要窒息，觉得朵拉的脸，她身后马路对面的房子，都在摇晃，像有一层薄薄的雾笼罩着。我停止了说话，失神地望着无人的街道……唉！为什么我不能将生命奉献给那个女人？为什么她是人们教我称之为邪恶的那类女人？不知为什么，我只知道如果她不是那样的，我就不会愿意将生命奉献给她。

现在我又走在那个铁栅栏前，想起了那遥远的时刻。拍拍上衣口袋里的两扎钞票，我明白了：我以为自己是明智的，谨慎的，其实是发

了狂。因为与害怕的同时，我正希望是朵拉主使打的电话，是她想敲诈我；希望她尽可能多地敲诈我，远远多于我口袋里所有的钱！

我害怕，然而同时却希望，而希望正是由于害怕。看看时间，已八点钟，我几乎跑了起来，也许就因为迟几秒钟而在家里找不到她。我想跪倒在她脚下，求她原谅；对她说我理解她的怨恨、不满，因为我既没有打电话也没有写信告诉她来了罗马，更从未坦白过我结了婚；我想将身上所有的钱给她，作为一种不相称的、暂时的补偿。

在这种心情下，我急急忙忙出了皮埃蒙特街(今天回想起来觉得是过分的狂热，近于疯狂)。路上见到两只猫像在旋风中那样互相追逐；顽童们在戏耍；一个老人坐在大门角上抽烟斗。这是些很平常的事，在任何其他时刻都不会有特殊的意义，而在当时却使我觉得这是向我暗示，一种动物的自由幸福的生活，是劝我坚决做我将要做的一切。

我转入了蓬刚巴诺路，到了大门口。这个门即使在以前心情很平静的时候，我也总是迫不及待地匆匆跨过。走过门厅时，我放慢了脚步，以免引起门卫的疑心，他从瞭望亭的窗口可以看到我。我走上了幽黑的楼梯。

一登上楼梯便可见到假二层楼的拐角和朵拉的房门。我骤然停下，因为听到了开门的声音。见到那扇门打开了，琼从里面走了出来。她下意识地往下看了一眼，我这边很暗，希望她没有认出我来。她又转向那边，向站在半掩着门里面的人伸手告别。我急忙走下楼梯，可是却不向大门跑去，因为必须经过院子才能到达门口，而从楼梯上可以看到院子，会将我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继续向下走，到了地下室的栅栏门口，不巧门关着，我只能靠在墙上，在一个最暗的角落里等着。听到了琼安详地下楼来的脚步声，再过一会见到了她纤细的双腿，娇小挺直的身材。一到楼下，她就停住了脚步，向四周张望，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最后，她不径直走向大门，而是犹豫了一

下，转身向楼梯深处往下走去。在黑暗中发现了我，再走下几个台阶，肯定是我了。以极度痛苦的嘶哑的声音对我说：

"哈雷，你在这儿干什么？你上去找那个女人是没有用的，我都对你说……"

尽管声音充满痛苦，但话语之中却有一种情意使我感动。

我走上几步，到她跟前，不敢看她一眼，喃喃说：

"你知道，琼，我……"

"什么也别说，"她挽着我的手臂，很奇怪像是一个要求支持和保护的人，"现在什么也别说，求求你，哈雷！我讨厌在街上出丑，我们回旅店去，我向你解释一切。来，我们走吧。我求你了。"

她祈求着我。

这是为什么？

一路上我们一言不发。看得出来，她陷于沉思之中，我将所发生的事默默理了一下，对于不需要马上解释也感到满意，激动地准备着我的辩词。我想，毫无疑问，琼盯了我的梢；或者是有人向她提供了情报。可能是头一天打电话来的那个人；也可能是朵拉本人给她打的电话，给了她姓名地址。她来了，见到朵拉，和她谈了话，现在什么都知道了。她的亲切、和蔼，不但没有令人安心之处，甚至使我害怕。琼要怎么样？她是个恪守教规的天主教徒，跟她离婚是不现实的，我不止一次听到过她那坚决相反的意见，也许她会要求我从此永不再见朵拉？最严厉的法官也不会作出比这个更令人痛苦的裁决。当然我将会尽量避免见她，但这对我是可能的吗？我了解琼，了解她的坚决，她的执拗。我立刻准备起我的辩词来。我仅有几次跟那个女人在一起，仅仅几次，没有别的。再说，是琼自己把她介绍给我的，不记得了吗？好多年以前了，1944 年的夏天，在一个小饭馆里。后来又偶然遇见了她——当然我不会承认是我回到那家小饭馆寻找她的——是偶然在一天晚上，在琼去了法国留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灯红酒绿的罗

马的时候，碰上她的。就见过她几次，每次不超过十分钟。这是肉体上的弱点，是的，只是一时的寻花问柳。男人毕竟是男人，只要长久地住在意大利，即使是最规矩的美国人也会变得像意大利人一样的。琼应该懂得，即使是结过婚的男人，去嫖职业妓女并不是件严重的过错。然而要是朵拉对她说了1947年春天我们在意大利北部的旅行呢？那我就不承认，就说这是朵拉胡说。同时焦急地搜索枯肠，想找出朵拉可能掌握的有关那次旅行的证据：地点？时间？那些事情她有可能是听我说的，我到罗马和她相会时可能会对她提到过。不，朵拉不可能有任何证据说明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比我自己承认的更多。

我们回到了旅店。一进房间，琼又用一种恳求的口吻叫我不要开灯。

窗户向着特尔曼公园，时间已是夜晚，但外面仍传来阵阵车辆的隆隆声。琼脱去薄绒上衣，关上窗户，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既不靠近我也不面向我。

我感到忏悔和请求宽恕的时刻已经来到。鼓起勇气说：

“琼……”

但她立刻制止了我。

“不要说，哈雷，我求求你！你什么也不知道。我求你现在不要说，什么也别对我说。你应该先听我说，别以为我不感到有罪。哦，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哭过多少次，祈祷过多少回！我祈求这一时刻永远不会到来；祈求你，你的地位，你的前程，不会因我的不可饶恕的轻浮而受到损害。仅仅是轻浮吗？不，是罪过，是我犯的过错，是从未对你说过的过错。皮埃尔神父对我说还是不说为好。如果现在这一切没有发生，当然最好是你永远不知道。我仍然希望不要发生任何不可挽回的事，那些信……唉！我甚至不敢求你宽恕我，你是那么善良！”

说着跪在地下，双手捧着头，无望地抽搐着，哭泣着，全身哆嗦。

我走过来，在她身旁跪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短发。

虽然对她所说的严重的过错、我的前程、信等等还未完全明白，但为她的眼泪所感动。我立刻喃喃地对她说："我也有我的错，你也什么都不知道。你会有什么错呢，我可怜的琼！"

我在那一刻是如此地意外，如此地为她的眼泪所感动，以至感到非常惭愧，有一种首先向她忏悔的冲动，而且完全不像刚才那样，想把我和朵拉的关系说得轻描淡写。

可是琼哭得很伤心，听不到我的话；或者自己感到所犯的过错是那么严重，从而把我说的一切都归结于我的容忍、爱护和宽恕。我立刻看出来，她现在更需要的是倾诉、忏悔而不是我的宽恕。那一切就像一座山压在她身上，这座山也许并不是所作的行为，而是思想；是内心的痛苦，长期的孤独，于是她想解脱出来。不是为了逃避，而正是为了理解、接受，或甚至是为了爱。她想对我说，因为曾隐约地说过，只有对我才能坦率地、详尽地诉说。在叙说这一过错时——也许是一个没有完全地、充分地完成的过错——会有一种怀旧的感情。因此，对皮埃尔神父她是不能这么忏悔的；因为一边忏悔，一边又在某种意义上继续犯罪，而对我则可以。

于是，稍稍平静之后，她拿起我的一只手，吻着说：

"谢谢你，哈雷，你对我是那么好，我实在不配。我对你坦白说，前天那个无赖来电话时，我从你的眼光里看出来你知道了，或至少是猜到了真情。今天下午从那个女人的家里出来，见到你在楼梯底下，就知道你跟踪了我。我以为永远也不会有勇气对你说的，可是现在看到你是这么善良，这么深情，你是我真正的朋友……"

我深受感动，十分惭愧。虽然对她非常好奇，仍然说：

"琼，还是下次等你冷静些的时候再……"

"不，哈雷，现在说。你耐心点儿。我要现在把一切都告诉你。不只是为我，也是为了你。明天我们就应该行动，要设法找到那些信。那个掌握了信的坏蛋可能肇事。在电话里他的口气有威胁的意思，可能

危及你的前程。这是我的过错，我的过错！唉！哈雷，要是你知道了还会原谅我吗？”

“会的，琼，”我心情沉重地回答说，“我也是有错的。不管你做了什么，你已经得到了宽恕。你说吧。”

十五

谁曾经历过——谁又未曾经历过——发现自己深深信赖的女子（即使并不是忠诚地爱着的）不贞，就会知道在嫉妒的折磨之中还混杂着另一种痛苦：就是对一个长期以来朝夕相处的人突然一无所知了。瞬刻之间变得完全不同于平日之所见，仿佛参加了一场发生在眼前的残酷的幻变。一向以来如此亲昵的面庞，她的目光、仪态、体形，她的一举手，一投足，顷刻之间变了，变得陌生、神秘、生疏，再也不属于我们了。我们会想：她曾以我们从不了解的微笑高兴地笑过；她的眼睛曾以特有的表情凝视过那个我们不认识的男人；她的手曾以我们不知道的柔情颤抖着抚摸过另一个男人的身体，从而有与我们温存时不相同的感受。就在这悲痛的一刻，我们心中自觉不自觉地燃起一种新的欲望，有时是由于我们的虚荣心和偏见；有时则是自发地，不可抗拒地，要在刚刚所发现的新的品质之中立即占有这个我们生活中的神秘的伴侣。也许这并不公正，但当时我们觉得这是唯一真实的她。我们想立刻彻底了解这个突然变化了的她，在一次奋力的做爱中战胜我们受到的伤害。

当琼重新坐到沙发的角落上，佝偻着几乎缩成一团的身子，避开我的眼光，开始叙述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感受。我惊讶、愤懑、痛苦地望着她，就像望着一个陌生人，一个敌人，尽管她是与我休戚相关

的人，一个当时需要我的爱，需要我理解的人，但过去她肯定暗中恨过我，如今至少为了她没有背弃的那一部分过去，还会恨我。

我虽然有虚荣心，也有偏见，然而自己有过错的想法却是非常现实的；担心不得不承认错误的恐惧还是一刹那之前的事。因此无论是嫉妒、痛苦、宽恕和色欲等等反应都不能不受到抑止，同时交织在一起而变得复杂。

从蓬刚巴诺路到大旅店，我在她身边走了十分钟。在罗马活跃的黄昏气氛中，我准备着忏悔，和为减轻我的过错而编造着谎言，或说是事实和谎言的混合。在我走进这间房的几分钟之前，心里万分惭愧。以惊怕的目光偷看着琼最后的表情，不敢正视她，将她看成是美德的化身，是责备我、审判我的良心。而正当我无限艰难地启口向她承认过错的时候，她跨出了同样的一步，以痛哭完成同样的努力，抬起了和我一样重的巨石。我突然犹如在镜中见到了自己。如果我因琼所做过的事，和将要对我说的一切而恨她，那就不能不更恨自己。我还一点也没有忏悔，只有原谅了她，才能原谅我自己。

如果我因她新的变化而燃起了对她的欲望，我想她只要一知道朵拉的事，也会以同样的方式需要我。那我们就会不是为我们自己，而几乎是为了他人而相爱。于是我感到迷惘，于是我退却了，仿佛在解开一个纷乱的、怪诞的、野兽般的缠结，到最后已是不可能的了……

……我究竟写了些什么？重读了最后的句子，我觉得词句很美：迷惘、退却、缠结……但只是些空洞的词句，仅此而已。我觉得这是一种虚伪，是为了博得虚伪的、不愿受打扰的读者随时的赞同，这里也有你，亲爱的马里奥。这种虚伪掩饰了虚荣心、偏见，特别是懦弱。

为什么？一个妓女和她的嫖客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吗？那么他们之间谦逊的、诚挚的相互爱慕之情又是什么呢？他们给予自己堕落的世界那种勇敢的场面又是什么呢？将自己的堕落公布于众，意

味着承认道德上的等级，承认他们是从那个高度堕落下来的；为了得到宽恕，更不需要对此表示遗恨，而只要每天过屈辱的生活，只要与别人——那些更多、更强的人——谴责的东西分开，只要接受社会的审判。

这并不是说我和琼应改变生活，成为嫖客和妓女。每个人都不仅只做好事，也尽可能做坏事。

我们的责任只是不要欺骗自己。由于我们的出身、教育、文化，决定了我和琼不得不是虚伪的，即对别人说谎。我们的责任是至少不要在内心的深度欺骗自己。对于我和她是必须如此的，因为有孩子，有社会准则。

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有秘密，我们的责任是承认哪些是我们最深切的爱好，以及它们之间有多少相似之处。我们，我和她，都羡慕妓女与嫖客之间的堕落关系。谁知道，也许只有将这种堕落公诸于众，我们急切的期望才会平静；只有在全世界面前承认自己的堕落，我们俩才会以一种完全的、过去从未有过的爱相爱。一切都是有代价的，有得必有失。

"哈雷，"琼接着说，"1944 年罗马光复后不久……我们在莱因上校的晚会上相识了，之后也许不到一个月……你就认识了我刚才去蓬刚巴诺路找的那个女人。是我给你介绍的。我想她是一个妓女，你当然不会有印象，不记得了。"

她对我说起那家小饭馆，慢慢地给我讲些细节，以为这样可以帮助我回忆。我不知说什么好，我又能说什么呢？在那种时刻我能对她说，从那次在小饭馆见面以后的四年中，直到如今，朵拉一直是我的情妇，我心里折腾着，很难过，而我的表情也许愈来愈具欺骗性，她更努力地向我描述那家小饭馆，那次吃饭的情景，时间，以及朵拉本人。直到我作出一个痛苦的、意思不明确的（她也许以为我不耐烦了）手势，对她说我记得，往下说吧。于是琼继续说：

“那个名叫朵拉的女人，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认识我所爱的那个青年的人。我给他写过很多信，哈雷。两年前当我们回到意大利时，我从卡不里给他写了信，可是他向我发誓说从未收到过。我相信了他，但昨天晚上的电话里……”

“是谁打的电话，”我打断她说，“是他吗?”

“不，不是他的声音。”

“你肯定吗?”

“非常肯定，是一个陌生的声音，马上向我提到了那些信。”

“对我并没有提到。”我说，清楚地记得那个人并没有说到过信。

“当然，”琼急忙说，“他当然不会对你说。信是勒索的工具，是唯一的证据。没有信，我总可以否认，而有了信，他可以持信向我勒索。如果我向你坦白了，就像现在这样；则他可以用信对付你，向你要挟，如不给钱就张扬出去传为丑闻。

“那么那个持信的人可能是谁呢?是他吗?那个打电话的人和他是一伙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哈雷。”她哭着说，我正是为此才去找朵拉的。朵拉非常肯定说不是他。我觉得朵拉是个心地很好，很能干的女人，但她也可能看错。

“那么你呢?既然认识了他那么久，给他写过信，会对他有个看法。他会干出那样的事来吗?”我提醒说。

“不，我想他不会的，至少我认为他不会，我永远也不会说是他……不过当局者迷，也许，可能，不，几乎可以肯定，我对他的责备是不公正的，不过我并不责怪他。哈雷，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上帝，对不起杜卓和唐纳黛拉。我害怕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需要付出代价，花钱买那些信。朵拉说阿尔多的确没有收到过信，他是诚实的。如果收到信，他会对她谈起的，他们常常见面；不过朵拉又说阿尔多也不可能跟那电话完全没有关系。”

"那他在哪儿呢？为什么你不去看他，那样不更简单吗？"

"他不在罗马，在米兰，而这又不是在电话里和信里可以说得清楚的事。"

"那些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琼？为什么你那么害怕？情书，一些浪漫的词句？我并不是说我无所谓，可是你为什么要那么害怕呢？"

"不，不，我在写那些信的时候是疯了。你别问了。我现在就告诉你，什么都告诉你。你想着我是狂热者、着了魔的疯子，我必须对你说。"

"如果他确是与此不相干，真的没收到过那些信，那么信又到哪里去了呢？"

"我怀疑一个人。"

"谁？"

"别着急，哈雷，我要先对你说说。"

"先别说其他的，只告诉我是谁，你怀疑的是谁？"

她沉默不语，更加沉思起来，几乎蜷缩成一团。说出这个名字似乎比什么都难。情人的名字她已说出来了，并重复了几次，我似乎觉得她还很乐意重复。而这个人的名字——只是一个她怀疑拿着信想敲诈我们的人——却难以启口。她深深地叹着气，流着泪，感到非常痛苦，默默地一声不响。

"是我认识的吗？"我想帮助她，这么问道。

不回答。我又重复了一次，补充说：

"告诉我，琼。要是需要行动，至少也该让我知道他的名字，我认识他吗？"

终于她抽泣着细声回答了：

"认识。"

"那是谁呢？"

又沉寂了一会，（我则在一边猜测着她痛苦的原因。）她说出了：

“唐·拉菲尔。”

克服骄傲对于她比克服道德上的问题更为困难。说出唐·拉菲尔的名字比说出情人的名字更难。再说我对阿尔多了解什么呢？因此也就不能看不起他，可是唐·拉菲尔我却是非常了解。我又见到了他那剃得光溜溜的脸，那些假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规矩，一言一行令人难以置信的粗俗，甜蜜的假笑和斜睨着的眼睛。他，唐·拉菲尔，和他的卑鄙怎么会进入琼的生活之中？我感到震惊和恶心。听到唐·拉菲尔的名字，我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过错，忘记了朵拉和她的房东；忘记了那天晚上在小饭馆里认识的她那些朋友。他们的粗俗绝对不在卡不里岛的唐·拉菲尔之下。

“为什么是唐·拉菲尔呢？”我问道。

“因为电话里的声音……”

琼无法准确地向我重述那句她相信曾在电话里听到过并使她变得脸色苍白的意大利话，可是她觉得电话里那个人对她说了，信从来也未寄出过。

“而这些信我正是交给唐·拉菲尔拿去寄的。”她最后说。

“我不明白。”我说。

“我知道，事情多难，我很难向你解释，哈雷。再说，这已是一件过去的事，对于我，这一切已是遥远的过去。唉，我曾希望过一切真的都结束了，希望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永远不会因此而难过。如果没有那些信，就可能会是这样了。我是 1944 年 2 月在拿波里认识阿尔多的。”

“那是在认识我之前啰？”

“是的，认识你之前六个月。”

“为什么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过什么？”我不自觉地充当着审判者的角色问道。

而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希望我是她的审判者。我发现我提的问题

和我表面上的严厉使她得到安慰，这正是她所寻求的，也是她对我讲述这一切的目的。我开始意识到，她向我忏悔那些遥远的，也许从未彻底完成过的过错，正是为了能以一种方式再次见到它；这是她能有勇气重新见到这一切的唯一的方式。我对她充满了怜悯之情，望着她，忧伤地对她说话，而她则乐意将我的忧伤看成是严厉。

“我什么也没告诉过你，哈雷……因为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你对我始终是那么崇高……”

“琼，别那么说。我的过错肯定比你严重得多，要是你知道……”

她笑笑，不相信。我该打断她？在这个时刻向她说出一切？使她永远对我失望？

我发誓我的沉默不是为了自己，不是因为胆怯，而正是为了她。在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到我应作出的牺牲不是坦白而是沉默。我的责任是继续装得如她所说的那么崇高，至少暂时应该如此。

“哈雷，我从认识你的那一刻起，不知怎么就在你身上看到了一种责备我和阿尔多关系的东西。它吸引着我，给我解脱的希望。我想正是因为这样我才爱上了你；让你在你的画、你的研究、你的思想之中将我和你一起带到一个一切都是美好的、纯洁的、崇高的境界去……”

“琼，我亲爱的、美丽的、温柔的琼……”我感到自己的可卑而失声痛哭。我拥抱了她，把她紧紧搂在怀中，沉溺在一片柔情之中。这是一种什么感情？我思索着，为什么我们不是天使而需要它？也许只有死亡才能结束这种折磨人的感情。

生活的法则是一切都要付出代价。每一种崇高都有相应的卑下；最神圣的爱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兽性的情欲相交替，最超脱的精神冲动也需要补偿，会立即召唤我们认为已摆脱了的本能。

“我 1944 年 2 月在拿波里认识了阿尔多。”我们长时间极为温情的拥抱结束之后，琼又继续说，于是我们又重新分开，离得远远的；她

坐在沙发的一角，我站在窗户旁边。“我当时在卡玛尔道利大医院工作，这是拿波里一家最大、最现代化、为盟军所占领的医院。战争在意大利处于很严峻的时刻，那里有加里良诺战线，桥头堡在安齐奥。每天有好几百伤员送来，我们工作很忙。”

“医院前的小广场……”

我又重新见到了战时的拿波里。琼在讲述的时候，我仿佛在这一刹那又见到了那种特有的充满着混乱、生活气息和冒险精神的环境。这个城市、这些人们，在正常时期是世界上富有生机、自在、活跃和疯狂的。我又见到了医院前面的小广场。热闹非凡，人群如蚁。有小贩们的流动售货摊，转圈游戏，乞丐，各种年龄和各种阶层的游手好闲之徒，难民，擦皮鞋的，当街理发师，像苍蝇一样到处乱钻的小孩儿们。有老百姓，有军人；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意大利人和黑人，各种语言和姿势都混杂在一起。卖火柴的、卖烟的和为士兵们找女人的都在进行交易；各种各样的人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黑市交易。而我们的宪兵在泛滥如潮的人群中，完全无法维持即使是最基本的秩序，仅限于监视特别危险的过火行为，即美国兵明显的酗酒闹事。

琼不说我也能理解她工作了一天之后需要出来，穿过广场，到城市去消遣几个小时的心情。

一连几个小时艰辛的护理工作；使人可怕而又可怜的痛苦和死亡；手术折磨后伤员的呻吟和喊叫；令人作呕的药物气味；在这一切之后是蔚蓝的天空，清新的空气，初春的二月天气和照耀着一切的拿波里的阳光。

“一天上午十一点，我和艾蒂斯(也许你还记得她)一起出去。那天直到下午六点我们都是空闲的。但是她的动作总是比我慢，让人等。有时人一生的命运竟取决于一些微不足道的事！如果艾蒂斯没有拖拉的毛病，我也就不会遇见阿尔多了。当时我急着想出去，想呼

吸新鲜空气，就对艾蒂斯说在下面广场上等她，让她快下来。

“是异常晴朗的一天。我穿着短上衣和裙子，没穿风衣。气候宜人，我觉得浑身是劲，很高兴，想娱乐一下，便想到了卡不里岛。几分钟之前，我在医院最高一层我的房间里换衣服的时候，从窗口凝视着这个灰色的岛，它在远处的天空与海洋之间，我从未去过。但一个月以后轮到我们休息的时候，我和艾蒂斯也许会去；在填写休假申请表的时候，地点一栏我们自然会写上卡不里岛。可那天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想进城，到海边一家餐馆吃海鲜，然后去划船。我在医院前徘徊着，在太阳下等着艾蒂斯，不时地闭着眼睛，感受着晒在身上的阳光。

“在人群中有个青年人站在太阳下，正好站在大楼的拐角上。我从正门口走到拐角上，又走回来；这么来回走着，每次到拐角都清楚地看到他。我不得不看他，他也看着我。

“他个子很高，对于意大利人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也很魁梧，但由于身高而显得颀长。头发是褐色的，短而卷曲，五官端正、线条柔和的脸庞有些稚气，就像古代一些塑像里的样子，浅色的眼睛像是黄色的，嘴唇厚而肉感。他使我立即就产生好感。他的衣著很讲究，几乎有些过分，像那些不太严肃的意大利人：漂亮，整齐，无可挑剔，几乎有些女性化。

“我记得，当我第三次或第四次向他走去时，不再为艾蒂斯的迟到而生气了。甚至担心她真的随时都会来到，不时地看着表，但她迟迟不来，现在每次我向那青年走去时，我们的目光不能不相遇而笑；他是轻轻的微笑，我则是带着一种不易觉察的笑。我立即转而看表，似乎要让他知道我是在等人；我和他的微笑不应暗示别的，而只能是对我等人的窘态的一种嘲笑。

“但忽然间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和他说话，即使说那么一会儿，不管什么话题。于是我向他走去，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支放到嘴

上，然后，将近走到跟前时，转身开始离去，装作在提包里、上衣口袋里寻找火柴的样子，假装找不到。他立刻走上前来，伸出左手——是一只很大的手，戴着金戒指、金镯子和金表——亮出打火机，同时用英语和我说了几句。”

毫无疑问，我也认识他，就是那天在特拉斯台维莱的那个年青人，朵拉的朋友。肯定是他，我不记得他的长相，可是那只手，怎么会忘记呢？

“他说的英语带着很重的意大利口音，但相当准确。我们说了些什么呢？我不知道，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不外是天气，拿波里、战争，卡不里岛等等，结结巴巴那么几句，然后是冗长的沉默。我开始有些担心：如果有上级从医院里进出，就会见到我和一个意大利人在一起，而且又是那么一个惹眼的、可疑的意大利人！可是却又不眨眼地盯着他那双带有笑意的黄眼睛。很清楚，只要艾蒂斯不出来，我便没有勇气离开这里。”

你是意大利人，也许是以意大利人的眼光回忆这一段光复时期的。因此你一定记得在美国占领下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对于你们意大利人奇怪，对于我们美国人则很正常，谁也不觉得奇怪。美国士兵们毫无顾忌地、毫不犹豫地以各种目的与各种各样的意大利女孩子交往，从与所谓的“小姐们”最狂乱的私通到与良家女子的柔情绵绵；而美国陆军妇女队以及所有一切在我们军队里服务的女人，如护士，职员，打字员，秘书等，如果和意大利人即使仅有后一种关系都是不可思议的。更不用说是前一种关系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军队中根深蒂固的习惯，就像一种思想方法的自由表现一样；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一个美国姑娘在大庭广众和一个意大利人在一起。不需要这种条文，因为这并不构成罪行，然而它从来不发生，如果发生了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在拿波里，在罗马，乃至在米兰，我很多次在一些与英、美人联了

姻的贵族家庭参加派对；在这里吃饭、跳舞、消磨时光，几乎和在东部或伦敦西区的贵族住宅区那些正规和令人厌烦的客厅里一模一样。客厅里挤满着盟军军官，然而却从未见过哪怕是一个我们的姑娘。没有邀请她们，也从没人提出问题，这个问题不存在。

这并不是什么理论问题。如果你责备任何一个美国军队中的姑娘，因看不起意大利男人而回避他们，则会引起她们的讪笑或说你是傻瓜。战前战后没有美国女孩子和意大利青年结婚的例子，特别如后者出自上层的家庭。可是战争时期没有任何女子这样做；而美国男子与意大利姑娘结婚的事，则无论在战时或战后都是屡见不鲜的。

于是我非常理解当时琼欲尝禁果的心情，同时她的过错亦使我想起了我的。如果说士兵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带着“小姐们”招摇过市而没有任何危险的话，对军官这则是过分放肆的行为；特别是如果“小姐”十分引人注目，像朵拉那样。而且逢场作戏还情有可原，长期关系则罪不可恕。

“艾蒂斯终于过来了，见到我和一个意大利男人在一起非常惊奇。由于她的在场，我和那位意大利青年的告别是比较冷淡，连手也没有伸给他，他在向我道别时，仪态庄重地鞠了个躬。

“我和艾蒂斯走了，希望以后不再见到他。

“也许我并不是真心希望这样。当我们企求着什么，希望克服某种企图时，也许总不是真心实意的。唉，哈雷，我强烈地感觉到，那个漂亮、庸俗的意大利人是由于我生平最蔑视的一切而使我喜欢，但同时又感到强烈的欲望，是与这一蔑视唯一联系在一起的，我该怎么办呢？

“希望以后不再见到他。

“可是第二天我在换衣服准备去的时候，几乎无意识地对艾蒂斯撒了个谎，我对她说，一进城我们就要分手，因为我要去教堂忏悔。拿波里有一个法国的，或是说法语的神父主持的教堂。艾蒂斯不是天主

教徒，她就会让我一个人去，然后我们在餐馆见面。我是真的想忏悔，第二天是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我像和往常一样去领圣餐。但我能真诚地说，在内心深处没有一个阴暗的角落希望有可能与那个意大利青年再见一次面吗？

“事实真是这样。我们一走出门口到广场上，我本能地在耀眼的阳光下，在混乱的人群中，搜寻阿尔多的影子。他像所有的意大利人那样狡猾，机警地没有站在昨天艾蒂斯看见我们的地方，那里离大门口较近，而是站得很远。然而我还是一眼就看见了他；他也立即见到了我，并不打招呼而是丢掉嘴里衔的烟，挺起胸膛径直向我们这边走来。艾蒂斯也立即看见了他，他确实太令人注目了；或者是她也喜欢他。她指着他说，话音里有一种恶意：

“琼，你看那是谁！不是昨天晚上跟你说话的那个漂亮的意大利人吗？”

“‘那个漂亮的意大利人’，她真是那么说的。我忖思了一下，自己也暗暗吃惊。因为艾蒂斯恶意的语气虽然伤害了我，却同时激起了我的骄傲。当我们穿过人群进城的时候，在我复杂的感情之中最强烈的正是骄傲；一种看到一个如此俊美的男子的骄傲。同时感到一种愉悦的需要；这种需要是如此强烈，如此新鲜，至少在那一刻足以使我非常满足。

“当时我没有任何想法，任何计划，只是远远地在太阳下，在人群中看他一眼，仅仅短暂的一瞥，就觉得很满足了。如果这时有个魔鬼出现在我身边，在我耳边悄悄问：‘琼，你要那个青年跟着你来吗？’我会回答说，不要。为什么？看到他，我就幸福了，不需要别的。

“魔鬼真的来了，他非常狡猾，以一个小贩的面目出现在我身边。那几个月拿波里充斥着无数的小贩，似乎全城的居民都从早到晚在街上叫卖，他就是其中之一。个子非常瘦小，佝偻得几乎像个驼子；肮脏不堪，满脸胡子；双颊下陷，眼睛却像金钢钻那样闪闪发光；那干

瘦、污秽的手中拿着纪念卡或护身符一类的东西，也许两样都有，我记不清了。在一条小巷的拐弯处，路非常之窄，石子路上一边是鳞次栉比的房子，另一边是卖油炸食品的柜台，他站在我们前面，挡住了去路，使我和艾蒂斯停了下来。我们为他这种态度感到困惑和厌恶，不愿买他的东西。他坚持要我们买，于是很自然我转身向后看去，想找别的路走。一转身便见到了阿尔多，他远远地站在高处的一个石级上，就在刚才我们走过的小巷里。小巷处在阴影中，但有一缕阳光照在石级上，我一眼看见他屹立在上下的人群中。

"他一直小心翼翼地跟踪着我，这次竟然用手给我打招呼，但在指手划脚的人群中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艾蒂斯也没有，她什么也没有见到，因为正在给魔鬼掏钱。他终于让我们过去了。

"这时我心跳得厉害，阿尔多肯定是在跟踪我了，但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这迷阵一般的小巷中，也可能会跟不上而将我丢失。我既希望，又害怕他丢失我；不知是希望什么，心里有些焦虑，便不再向后看了。听其自然，任凭命运的摆布，听天由命吧。那一刻我不知自己是否还有信仰。

"走到教堂门口时，我急急忙忙和艾蒂斯告别，再次叮嘱她在前一天吃过饭的餐馆见面。至少我想做到在阿尔多见到我进教堂之前就进去，如果他走近我，我就无法不停下来和他说话，唯一能做到的是逃走、遁匿和祈祷。

"和艾蒂斯道别后，我猛地走上教堂的台阶，在推开沉重包皮大门时，我偷偷向后望了一眼，他不在，轻松而又苦涩地嘘了口气后，我走进了教堂。

"教堂里很暗，我走到边殿，那里点着施行圣事的灯。没有一个人影。向神父忏悔要到祭衣室去，但我先要祷告。我绝望地跪下，向我们的主，耶稣的圣十字架祈祷……明天是主的日子，主的形象就在我面前的祭台上，使我感动流泪。点着的灯不是电灯而是真正的火，在

红色的玻璃心脏里跳动；我的心和那火焰一起跳动着，于是祈祷自然而然从我口中吐出：

“我说：耶稣，你曾在橄榄园里有过痛苦的经历，所以会理解我自见到那男子后所感受到的一切。你知道我的焦虑并不可笑。如果我向艾蒂斯讲述我的感受，肯定会遭她的耻笑，但是你是我的主，我的上帝，你曾原谅了玛达莲娜，你不会生我的气，告诉我，主，如果我再见到那个男子；如果他又一次跟踪我，要和我说话，我该怎么做。我不爱他，我的主；我知道这是一种可耻的、低级的情欲，他的俊美是异教徒和魔鬼式的。我该继续躲开他吗？可是我越躲避他就越想他。如现在我就感到失望和痛苦，非常后悔跑进教堂使他见不到我。也许此刻他正在教堂门前的广场上张望，在附近的路上寻找我，想不到我已进了这个教堂。我做得对不对？如果做得对，为什么会后悔？为什么你的平静不能降临到我的身上？如果做得不对，为什么心里并不深信。为什么在两者之间无法抉择？我的耶稣，我的主，我相信你的裁决。

“我刚祈祷完就觉得边殿里似有什么人。我跪着，蜷伏着，紧紧捂着脸，抽泣得喘不过气来，手指和手掌都被泪水浸湿了。稍一抬头就见到了那只戴着金饰的手，认出了阿尔多。他在我旁边挨得很近，那只手正慢慢地、轻轻地、用指尖放到跪椅的边上。我见到了他的身影，比我想象中更加魁梧。

“我当时觉得有一阵强烈的幸福感向我袭来。久久地在原地不动，双手捂着脸，仍像是在祈祷；其实什么也不想了，再也没有任何思想。跪着，闭上眼睛，非常幸福。突然一切都消逝了，他实实在在在我身旁，我就感到满足。”

十六

这是对审判者的坦白吗？

琼不知道我连做证人的资格都没有，她是在向一个和她同样的人坦白一切。

多少次我曾有过与她相同的感受，唯一的区别是从未祈祷。祈祷对她有用吗？

不但不能平息痛苦反而使之加剧；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使之变得更为复杂。所以祈祷只能得到相反的结果。

但谁又能说这种折磨，这种痛苦和欢乐的滋味不就是一种结果呢？与我相比，这是一种更为高尚、更为真实的感情。

“后来我抬起了头，”琼继续说，“擦干眼泪，但没有说话。因为正如刚才所说的，什么也不想：没有打算，没有想法，也没有愿望。如果阿尔多也继续沉默，那我在这个教堂里，在他的旁边，不知要跪多久。可是他说话了。

“您哭了？”他悄声说，“为什么哭？我很遗憾！”

“您走开！”他一开口，全部魅力就荡然无存。我要求他：“您走，您马上走开！让我一个人呆在这里。”

“这是为什么呢？”他不但不走，反而在我旁边跪了下来，用他的手臂碰着我的手臂，脸颊蹭着我的脸。我两眼望着前面的祭台，而他却看着我，并低声对我说：“为什么您要我走开，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我们是在教堂里，你不知耻吗？我是来祈祷的！”

“知耻，为什么？你不知道我爱你吗？”

“别胡说了，您认都不认识我。”

“爱必须认识吗？您知道并不如此，我对您一见倾心。我是个大学生，您愿意嫁给我吗？”

“唉，哈雷，你知道这些意大利人是怎么样的。他们非常自信，总是直视别人的眼睛，只要在女人的眼光里看到一点反应，一丝好感的笑意，便认为这是对他们的许诺，是允许他们继续发展的一种表示。而我们对个人的感情并不过分重视，不相信应按心灵本能的冲动而行动，不习惯于把真诚和天真混为一谈，于是就突然被俘了。

“对于这个荒谬的提议，我本应付之一笑，然而却局促不安。当然我并非傻瓜，立即明白他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使我有好的印象，使我相信他的热情是严肃的，从而立即得到我的好感。如果我也同样荒谬地同意和他结婚，他也丝毫不会有任何损失。但当时我是如此地局促不安，根本没有往这方面想，而是当真想看事情真实一面：嫁给这么一个庸俗、轻浮的意大利人？那就一辈子把灵魂给了魔鬼。

“我觉得我心里曾想过答应他；绝望地，出乎他意料之外地说同意。他就在我面前平静地微笑着，我则像在地狱里。

“我急促地站起来，惊惶不定，只有逃跑。

“再见，我说着便跑步走向门口。

“他在教堂中间赶上了我，抓住我的手臂让我停下。我想挣脱，但有两位老太太在一旁看着我们，没敢这么做。于是我的一只手臂便抓在他手中，这只手的接触，顷刻之间使我的意志崩溃了。

“‘这边走’，他陪着我彬彬有礼地说，不走向我进来时的中门，而向边门走去。在揭起圣堂二门的布帘前，他走向石盆要向我点圣水。

“我惊愕地望着他，就像面临渎圣行为，就像看见魔鬼亲自向我点圣水，但他这时的表情是那么单纯、善意，几乎近于天真；我碰了碰他湿了圣水的指肚，转身向祭台画了十字便走出去了。在黑暗的圣堂二门里，我伸手要推向街的大门，然而门上都有粗粗的铁链锁着，我

还来不及设法去打开，他已在我身后关上了内门，走上前来将我抱在怀里，紧紧搂住，开始吻我。

“我不是有这类经验的女子，我的情人屈指可数。

“不过这是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我从未想到过可以这样亲吻。突然发现，在此之前我还完全是个孩子。接吻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是十分强烈而又原始的事。我觉得头发晕，似乎要昏过去；周围的世界——艾蒂斯、朋友们、妈妈、家庭、战争、正义的思想，以前我生活中的一切——全都崩溃了，从我的良心中抹掉了，不复存在了。有的只是他口中特有的滋味，和它们无穷的变化；准确而又合乎逻辑，犹如各种概念一样，而这不需要用语言表达，每一种都能在感觉中找到其涵义。”

“琼”，这时我想到了朵拉的吻，便苦楚地对她说，“琼，为什么你不和他而是和我结婚呢？我想你的责任正是和他结婚。”

她抬头望着我，这是说话至今的第一次，似乎是从遥远的回忆中望着我。

“我的责任？也许……”她回答说，声音中含有比我更多的苦涩，是对永远失去了的机会的悔恨，以及对不幸的懦怯的回忆。“可是那时我看不到什么是我的责任。一切都相反，我的责任……也许你是对的，哈雷，只是表达得还不确切。”她最后露出了一丝苦笑，比一直留在唇边的忧郁更为凄苦，“应该说，我的责任是不要尽我的责任。”

“正是这样，琼。”

“但我当时怎么能知道呢？假如不是我亲自遇见他，而是一个女友向我夸耀、描述他的俊美，那只会使我厌恶和反感。事实上，如果我冷静地想一想，他身上集中了我自幼所厌恶的一切。他是意大利人；尽管我爱意大利，却对意大利男人从没有好感和敬意。他俊美，而我从来对男子的美十分冷淡；从学校里开始我便只是以才智取人而不重外貌。他俗气；稍有一丝庸俗，便足以使任何男子失去对我的魅力。

通常我们总是等待突然出现符合我们情趣的，在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与我们相当的人，甚至应是与我们的父兄相似的人，或是某个在幼时就倾心的人。总之，我们的对象应是我们教育的再现。

“然而阿尔多完全与我所喜爱的、所梦想的一切相反，你知道，哈雷，我从来都讨厌手上戴上首饰，我自己手上都不戴，更不用说是男人。你很清楚，在你送我这个镯子之前，我从未戴过任何的首饰，连手表都讨厌戴，常常放在皮包里，这你是知道的。甚至结婚戒指开始时我也不戴，怎么也习惯不了，你记得吗？那些金属的表链，那些带有刻着名字的小牌子的手链，战时在军人中是那么时髦，几乎人人毫不例外地都带，不知为什么总让我讨厌。

“可是他的左手……我怎么解释呢？成了一件盲目的崇拜物，是着了魔，是疯狂！我从来不能冷静地看他那只手，当他从我生活中消失后，那只手仍深深地留在记忆中。

“我想去找个精神分析专家，但皮埃尔神父说无用，而且会更糟。祈祷也无用，他说，当魔鬼能如此在肉体上、精神上引诱我们，反对我们理智的每一个论据时，祈祷已不能战胜它了。我们只能去想别的事使自己分心，而不要去祈祷。祈祷会不自觉地，更强烈地，不断想到这种愿望。

“那天，当他在圣堂二门的黑暗之中紧紧地搂着我，吻我的时候，由于极度的苦恼，我自己也看到了这点。突然我感到惊慌；魔鬼为了把我拖到地狱而亲自来抱我，吻我了。我应该设法逃走。但我知道，现在强烈的反抗会适得其反，使我会永远和他有联系。于是我佯作温柔，使了个计，不尽是对他也是对我自己。我想，如果我从他怀里挣脱出来逃走，并对他说我永远也不想再见他，第二天就会为此决定而非常痛苦，这我很清楚。我会无法战胜强烈的愿望而到广场上的人群中去寻找他，设法和他在一起。于是我施了一计。

“‘你听着’，我慢慢地，温情地从他怀里滑出来，使他不敢不放开

我，'在这里，拿波里，我们是很难见面的。我总是和我的女朋友在一起，这你已经见到了。而她是什么也不能知道的，因为她无法理解；而且我在医院也很忙。但一个月以后我有十五天假期……'

"'一个月以后！一个月以后战争就结束了！'他懊丧地悄声说，'而你要是不想嫁给我，就回美国去了！我爱你！想和你结婚。但我知道，你在答应我之前应了解我，要是我们不在一起相处一段，你又怎么能了解我呢？一个月以后！'

"'不'，我说，'战争不会那么快结束，谁知还要打多久呢。一个月以后我有十五天休假，我要去卡不里岛……你能不能来卡不里？那里方便些，也许我们能见面……'

"他高兴地笑了，我问他为什么。

"'因为我就住在卡不里，而并不是拿波里，'他说，'我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当翻译，和李维斯顿上校一起工作，几乎每天都来拿波里，但住却是住在卡不里。明天就给我发军装了。'

"我们从圣堂二门里出来，重新穿过教堂，慢慢走向正门。我挽着他的手，卡不里的巧合应使我安心，可是相反却又使我激动起来。我想带着重新见到他的希望离开他，但只是一种可能，并不肯定。我对他说艾蒂斯是我们在拿波里见面的主要障碍，这是事实，然而却没有对他说，她也和我一起去卡不里。想到谁也没有命令我去卡不里，就比较安心了。我当时希望，一个月以后欲念会平息下去，我就可以另选休假地点……

"后来却……

"后来我去了卡不里，正是因为相信自己已战胜了那种欲念。自那天以后一直没有再见到他，他也没有再到广场上来。过了几天，我确实做到了不再想他，几乎已忘记了他，我便对自己说，那只是一时的疯狂。于是毫不犹豫，非常自信地和艾蒂斯出发了。皮埃尔神父说，这是魔鬼给我的平静和信心，因为魔鬼知道唯一能使我肯定去卡不

里的办法，是使我没有对干坏事的恐惧和不再想起那甜蜜的种种……但奇怪的是——我对皮埃尔神父说——阿尔多也没有再出现，好像他也知道，好像他和魔鬼商量过似的。但实际上这纯属巧合。李维斯顿上校突然离任了，新的上级很少离开卡不里，即使出去也不带翻译。

“三月的一个早晨，我和艾蒂斯上了船。我心情很轻松，敢向你发誓一切都忘了。欣赏着大海，享受着阳光和净洁的空气；和艾蒂斯聊天，讨论这十五天在卡不里的计划。艾蒂斯想画画，她带了色盒；我则带了很多书，想久久地晒太阳，把皮肤晒成棕色。我们还谈到水，如果水暖则可游泳，就这些，再没有想到别的了。后来我们觉得冷，也饿了；便进到舱内，到酒吧里坐下。一边啜着苦艾酒，吃着三明治；一边继续聊天。突然感到船渐渐慢下来，便向外望去。

“岛就呈现在我们眼前，是一个庞然大物。背着光，是一幅意想不到令人不愉快的景象。

“心里一阵抽搐。在那些扭曲了的线条中；在这离奇、古怪、没有色彩的形状中，我感到恐怖、不祥、灾难和一种敌意，于是阿尔多便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月的忘却之后，现在，在寒冷、阴森的海岛背景上我又见到了他。我清楚地看到他的脸庞，他的目光，他的身躯以及以为已经忘却了的一切。

“我看着高处的岩石和散布在各处的一幢幢小楼说，阿尔多在这上面，阿尔多是在上面。我一直瞒着艾蒂斯也瞒着自己要去他那儿。

“当天晚上，我就在广场上看见了他。他就像上次曾对我说的，已穿上了美国军装，和许多在我们机关工作的意大利人一样。见到我，他明智地谨慎。我和艾蒂斯一起坐在咖啡馆里；他坐在对面一家咖啡馆，和几个我们的军官在一起。一见到我，并相信我也已见到他时，便戴上了墨镜。也许因为这样可以自由地向我这边看，但也许是为怕艾蒂斯认出他来。我很感激他的谨慎，但又想如果我想和他在一起，该

怎么办，再说我究竟想吗？

“我在愿望与恐惧之间激烈地斗争着，害怕和他在一起会给艾蒂斯知道，会给美国人看见，还怕会出事。前一种害怕促进了后一种，要和他在一起是那么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切使我相信有可能会犯严重的错误。

“幸而艾蒂斯转过了身去背对着他，什么也看不见。我也戴上了太阳镜。那天我就满足于看着他；满足于从远处对面咖啡馆的桌子旁，观察他的每一个姿势。很高兴地想着：我们两人都在岛上了，明天、后天，最近这几天，自然会有机会见面的。

“后来艾蒂斯看了一下表说我们该走了。我们住在上卡不里一位丹麦太太的公寓里。公寓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可是那位太太多次强调要准时回去就餐，交通车过几分钟就要开了。

“公共汽车站在广场另一端的教堂旁边，要走到那里，我们必须经过阿尔多的面前。我怕艾蒂斯认出他来，同时也希望把看到他的愉快尽可能延长到最后一刻，于是便对艾蒂斯说我不饿，这儿空气那么新鲜，在咖啡馆里喝着马丁多好。一年多来我们总是守着烦人的时刻表生活，现在是休假，稍晚一些，丹麦太太也许会不安心，但这没什么。必要时我们可以雇出租车回去。艾蒂斯笑着同意了。可是就在这时我看到和阿尔多在一起的军官们站起身来走了，当然他也和他们一起去。他最后一个走，一直凝视着我们这边，直到消失在特拉加拉的拱门下。

“第二天我又来这里。此后每天两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来这家咖啡馆，喝开胃酒成了我们的惯例。每次都见到阿尔多，他也每次都看到我。。这样下去不行，我内心很快滋长了焦急和烦躁的情绪，以至茶饭不思，夜不成眠，对这次旅行毫不感到兴趣，而且变得苍白、憔悴。艾蒂斯很担心，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不太舒服，也许是丹麦太太的伙食对我不合适。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们来卡不里岛已一

个星期，再过一个星期就要离去了。这时我正在通常来的那个咖啡馆里，阿尔多也在平时所坐的位置上。我来不及细想，就像给一个弹簧推着似地霍地站了起来，决定要跟他说话。

“在太阳下看着书的艾蒂斯问我去哪儿。我找了个借口，现在记不起来是说了什么……哦，对了，我说在小巷的一个铺子里看见一双凉鞋，想去买。一边说，一边怕她站起来陪我去，想到这点都有些发抖。可是她坐着没动，继续看书，这是命运在帮助我！

“我鼓起勇气，穿过广场，向阿尔多坐着的咖啡馆走去。我走过他身边时，用眼睛盯着他（我们俩总是戴着墨镜），并且靠得很近，几乎是擦身而过。走到教堂边的一条小巷时，我转过身来，不一会见到阿尔多已站起来，他明白了。

“我几乎是跑步走进了巷子，直走到广场再也不可能见到的地方才停下。一秒钟之后阿尔多来了，将我抱在怀里，幸好周围没有一个人，然而我还是使劲挣脱出来，继续往前走；一边向他解释怎么才能见到我。

“这一切你当然都是早已想好的！”我几乎不由自主带有讥讽地对琼说。

“是的，哈雷，就像在玩一场游戏。”她坦率地承认说。

“一场危险的游戏！”这句挖苦的话也是不由自主吐出来的。

“哈雷，你应当相信我！”

“我相信你，相信你。”我真的相信，相信她是真诚的。但我又说，“可相信又怎么样？”

“你要相信，一切都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而自然发生的。我知道无论怎么说我都有错。我并不想找借口，哈雷，我只是想把事实告诉你。

“我什么都想好了；在上卡不里的房间里，我幻想着夜里可能发生的一切。那个执拗的念头使我无法入睡。听到橄榄树被风吹得沙

沙作响，我打开窗户走到阳台上，看着屋子周围密密麻麻的橄榄树丛和开着花一直爬到我窗口的紫藤；头上是星光灿烂的夜空，远处是黑黝黝的大海和小船上的灯火。我想着，把一切都想得很周密，就像真的会发生一样，但又深信这一切是不会发生的。

“现在，在小巷里再也没有时间改变这个计划了，尽管它可能不完善，但已没有时间另作考虑。我告诉了阿尔多。后来，我要他不要紧随着我，最好从广场的另一边回去。

“晚上见！”我对他说，说完便跑着走开了。

“凉鞋呢？”艾蒂斯见到我问道。

“没有我的尺码。”

“阿尔多今晚十二点以后，从上校那儿一脱身（上校的工作时间一般不固定，有时直到深夜）就到我这里来。丹麦太太通常十点左右就寝；而艾蒂斯则是个极爱睡觉的人，那天晚上也不例外。十点半我锁上了门呆在屋里。我的房间通浴室，浴室的另一个门和艾蒂斯的房间相通，而钥匙都是一样的。

“我让他开汽车来，但十二点半之前不可能来到。于是我以写家信，看书报来消磨时间。简直没有办法，我有生以来还从未这么激动过。全部思想只能停留在幻想与阿尔多的幽会上，他两三个小时之内就会来到，无论如何今夜一定会来。这使我无法分心想别的事情，不一会更是进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我不停地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为了不发出响声，把鞋也脱了，又不停地照镜子，把头发梳好了又整乱，乱了再梳。觉得似乎喘不过气来，打开阳台门走出去，但立即又走进来。这是一种从未经受过的感觉；是一种尖锐的痛苦和无穷的喜悦的混合。虽然我深深地感受着这种喜悦，却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

“猝然间，觉得有无法忍受的痛苦，需要痛哭，需要喊叫。我任凭本能和躯体的自发来支配行动：脱光了衣服，裸体躺在地上，像动物一样蜷曲着，最后俯卧在冰凉、光滑的地砖上，把表放在前面。就这样

一动不动地盯着表面看。是我那只小小的手表，现在还在。表上没有秒针，所以表上的时间似乎也是停住了。想到他可能会直到两点以后才来，我觉得无法等到那个时刻。

“房间里仅有一丝亮光（我用围巾遮住了床头灯），我的眼睛费力地注视着小小的表面上两条时针的行程。表在走，但慢得几乎觉察不到，使人感到无法言状的痛苦；似乎要一秒钟一秒钟地把我撕裂，将我的愿望撕成碎片；要折磨我，驯服我，让我离企求的目标愈来愈远。远离它？怎么对你说呢？事实是，愿望增强的程度远比时间的缩短要快。我在地上俯卧了一刻钟之后，觉得一小时三刻钟的时间是漫长而无止境的，远比我在二小时一刻钟之前所想象的要长得多。

“今天我重新回忆那可怕的夜晚，可以肯定地说那是一种病态。不管那个男子有多大的吸引力，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明我当时的心态是正常的。这是我的疯狂，我的问题（就像我们平时在报上读到的新闻，如一个农民用斧子砍死了他平常一贯热爱的妻儿）。我现在对你讲述这一切就像讲别人的事；因为这样，我才什么都可以对你讲，我当时完全是另一个人，否则我怎么会选择一个自己所看不起的人呢？”

我默不作声，在想我和朵拉的事。我知道琼错了，这并不是她撒谎，她相信她说的是实话。但我现在已懂得，我们的天性在爱情中寻找的，有时候正是相反的东西。这不是病态，而是一种补偿。是为了想了解我们通常所摒弃的那一部分现实；是想和别人一样的一种愿望。这是一种正常的需要。

“我不记得在等他的时候还做了哪些荒谬的事，只记得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愈来愈痛苦。在开始时与痛苦交织在一起的那种喜悦已渐渐消失，直到完全不复存在。到一点钟的时候，我甚至希望他不要再来了，仅希望能有人告知我。我祈求着尽快结束这种痛苦。

“从十二点半起，我就站在外面阳台上，靠着墙，站在一个能看到

别墅大铁门的角落里。铁门在两边种着橘子树的林荫道尽头。没有上锁，推一下便能打开，这些我都跟他说了。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看，颈部和脸上的肌肉都紧张得发痛。好像一切取决于我，取决于我的目光；只要我执拗地注视，便能使阿尔多的身影随时出现。

“我不止一次地这样对自己说，喏，我这么数着数，数到九之后他就会出现了。我数着，很自信地数着，但数着、数着就慢下来了，不过仍是充满信心地数到了七、八。

“数到了九，没有出现任何奇迹。只吹来一阵风，打着橄榄树上的叶子，发出沙沙的响声，此外便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丹麦太太和女佣人睡在对面屋里；艾蒂斯睡在与我相邻的拐角上的房间里。她即使醒着，也听不到铁门打开和有人在卵石路上走路的声音。

“我不看天空是否有星星，也不看海上渔舟的灯火（像以前晚上思念他，思想集中在他身上的时候那样），而只是盯着铁门看。甚至思想中也没有他，只想着眼前所见的东西：铁门。就像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瞪着眼睛只看着那旋转着的轮盘，而把赢的希望置于一边。我是疯了，哈雷，你信不信，我当时是疯了。”

“信，我知道，琼，”我不由自主地说，“我理解你，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你不可能经历过！”她几乎嚷了起来。我又一次看到，我的坦白在那天晚上是不可能的。即使说了她也不会相信，还以为我是为了安慰她而编造出来的。她似乎由于自己的过错而万分激动，似乎由于时间的消逝而对记忆有所怀疑，因而无论如何要说明自己有错。

“突然我听到了脚步声，”她又接着说，“是很远、很轻的脚步声；踩在从上卡不里一直通到这里的一条延伸在别墅和花园之间的水泥路上，像是村子里什么人赤着脚走路的声音。

“我屏住呼吸，眼睛总是盯着铁门。会是他吗？要是他记错了一直往下走呢？我给他解释得很清楚，但那条路还通下去，下面还有别

的花园、别墅和铁门。脚步声渐渐近了，非常轻捷，不可能是他。我早就这么想了，也许是渔夫下海去收网，不可能是他。

“一个黑影在铁门外一闪，是个女孩子。我多么憎恶她！我发现自己下意识地希望是他。恨不得杀了那女孩！肯定是幽会回来，或是去赴幽会，因此特别恨她。脚步声渐渐远去，并开始跑了起来，最后听到铁门吱嘎的响声，也许就在下面的别墅。又恢复了一片寂静，只有飕飕的风声和橄榄树的沙沙声。

“我直挺挺地靠墙站着，墙上每一条纹路，每一个凸面，我的背部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已站了多久？现在是几点了？

“我没有戴表，急匆匆跑到阳台上没记得带上它。现在离开这个观察点进屋去，即使是短暂的一刻，我觉得也是不可能的。

“铁门在黝黑的橘子树丛泛着白色。”

十七

不过他并没有让琼白白等待，以后他每晚都来，琼在卡不里岛的一个星期中，他每天夜里都来，一点多钟到，从紫藤爬上去，天亮前离开。

无论是房东还是艾蒂斯都没有发现。仅有一次使琼非常害怕。一天夜里，他对琼说第二天整天有空，因为上校要去拿波里，提议琼在约定的时间到小海滩后面一个静僻之处，等他摇船过来接她，如果天气好——一般总是好天气——可以一起去游泳。琼没有同意，于是到了天亮他该走的时候躺在床上不走，要留下来睡觉。琼惊慌不已，生了气，反对他这样做。但无可奈何，只好让步，就把他偷偷留在房间里一整天，直到第二天夜里才走。

把他锁在屋里，不让艾蒂斯和女佣人进来是很不容易的。于是琼假装头痛得厉害，需要休息，谁也不想见。艾蒂斯多次来敲门，有一次竟问琼是不是有人在里面，她似乎听到有人说话。

等着艾蒂斯去了卡不里，琼锁了房门到厨房去拿了些三明治和饮料。

艾蒂斯从卡不里回来后又来敲门，见琼不让她进来非常奇怪，也很担心。太阳终于下山，夜晚降临了，他才可能找到机会离去。

琼把这个有点喜剧性的插曲告诉我，是因为由艾蒂斯的疑心而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后果。

而这一后果实际上比她所想的更为严重！如果不是由于艾蒂斯的疑心，我就不会认识朵拉了。

已是最后一个夜晚。琼想，出了那件事之后如果不和艾蒂斯一起去参加她们都熟悉的军官们开的派对，就太不谨慎了。

所以在前一天晚上就向他告别了。在那个男子的坚决要求下，(他说非常爱琼总是说要和她结婚)琼同意和他再相会，但只能在罗马。大家都清楚罗马的光复已指日可待，医院很快就会搬去。琼让他一到罗马就给她写信，便把战地医院的地址给了他，于是他们便分手了。

琼知道把地址留给他是个错误。她对我说，狂热已经过去，她已恢复了平静，盼望早日离开卡不里，结束这一切。给他地址是怕他纠缠，怕他会到拿波里的卡玛尔道利医院去找她。

因此告别时，琼很冷淡，毫无热情，当见到他终于最后走到小径上，出了铁门，消失在视线中时，她松了一口气。

最后一天是和艾蒂斯一起度过的，晚上和她去参加派对。在一家餐馆里，和邀请她们的那些美国军官一起吃了饭，然后，像通常习惯的那样，军官们将她们一家家地带到他们的朋友家里去，喝威士忌，跳舞。琼很高兴又回到自己人中间，也许正是和那个意大利人度过的

夜晚，使她相信她并未改变自己的爱好；她仍然需要，也希望遇到一个以另一种方式使她喜欢的美国人。于是一个多月以后，当我们在罗马相遇时，我便得到了她的青睐。

半夜十二点，他们一起到了特拉加拉一家十分豪华的别墅。琼在威士忌的作用下，在同伴们的陪同下，心情愉快。但一进门，就在走廊尽头洁白的厨房门闪开的那一刻看见了阿尔多。他正在切着从冰箱里取出的冰块，准备饮料。恰恰到了上校的家。阿尔多也立刻认出了她，但却没和她打招呼，继续干他的活儿。琼想肯定谁也不会察觉什么，可是艾蒂斯呢？

走进客厅后，琼本能地背向走廊的门，而艾蒂斯却面向走廊。

于是从艾蒂斯面部表情，琼见到了阿尔多捧着饮料进来了。她惊跳了起来，向琼靠近，紧紧抓住她的手臂，对着她耳朵说：

"琼，你那个拿波里朋友！"

"什么朋友"？琼说。

"是他，你看，那个漂亮的意大利人！"

琼看了一眼，还来不及细想便冲口否定了。不，是艾蒂斯看错了，很像那个人，但并不是他。

艾蒂斯肯定地坚持说是他，琼也不认输。可是后来在晚会的过程中，当她和艾蒂斯相隔一定距离时，（她们分别在不同的朋友堆里），她突然感到了艾蒂斯注视她的目光。这不是善意的目光，而是一种惊讶、气愤和审视的目光。

阿尔多在客厅里只是端端杯盘，送冰块，或收去用过的杯子，拿了东西就回到厨房，从不参加谈话，也没给大家介绍。尽管他的正式职务是翻译，干的却是服务员的事。

他从不抬眼看琼，不对她使任何眼色。琼自然非常担心，特别是在艾蒂斯的目光中发现了她的疑心和仇视之后。终于该走了。走到外面花园的时候，艾蒂斯向她走过去，回头对别墅瞥了一眼之后低声

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否认显而易见的事实。”

“那你去，你去问他本人，那就会弄清楚了。”琼愤然对她说。

她相信阿尔多是机警的。但艾蒂斯并不坚持，她既没去问阿尔多，也不再提这件事。琼懂得，以后艾蒂斯对她再也不是一个可以指望的朋友了。

大约一个月之后，罗马光复了。她一到那儿，便收到了阿尔多的信，约她在宾丘高地瞭望处见面。琼去了，这次她没有充分戒备。远离了阿尔多，渐渐的又有了对他的需要；又到了疯狂、病态的地步。琼这种冷热交替的心情。精神分析家称之为周期。

病态？不。我完全理解，尽管对于一个女人，无论从生理上和社会角度看这件事的后果都是严重的，但我又怎么能不原谅她呢？

碰巧艾蒂斯坐着出租的马车到宾丘去，见到她和阿尔多在一起，这次没有任何疑问了。琼搪塞说是在宾丘碰到了那个卡不里的年青人，不是拿波里那个，但当时他们俩手挽着手，这一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艾蒂斯的态度使她感到意外。那天晚上她们见面时，艾蒂斯什么也没说，但从那天起便对她比较冷淡，而且不时以那种奇怪的目光看她，在这种目光中琼不仅见到了愤懑和责备，而且还有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偏见，还有不自觉的嫉妒。

几个星期之后，琼肯定自己怀孕了。她感到厌恶、害怕。尽管思想意识不允许这样做，但却立刻想到要摆脱这种状况。唯一可以求援的人是他们科的军医，但这个人恰恰正是艾蒂斯的未婚夫，即使他不是个饶舌之徒，也不可能对艾蒂斯隐瞒一切。

必须立刻行动。经过一夜痛苦的斗争，她对阿尔多说出了一切。阿尔多介绍她认识了朵拉，朵拉则和据说曾当过护士的房东一起把她带到了另一个护士那儿，后者为她做了手术。

就在这些日子里，琼遇见了我。由于绝望，由于不久前所经受的惊骇；由于仍然感到的内疚；由于对未来的恐怖，就像见到一个拯救者，一个天使一样爱上了我。

可是直到离开罗马之前，她并没有完全中断和阿尔多的来往。偶而，自我斗争失败之后，还去那间他租下的房间里找他，甚至夜里也去。也许我们在一起用毕晚餐后，我怕她打电话到旅店而不敢去朵拉那儿，但她却去找阿尔多了。

"你出发去拿波里的那个晚上，就是从那儿第二天起航去法国的那次"，我突然想起来问琼，"我到营地去接你，在等你的时候，见你走来走去忙于工作。可突然我见你去打电话，你说是给一个神父，你的忏悔者打的，我想你是跟他告别，对吗？"

"不，"琼低着头说，"是有一个忏悔神父，一个美国基督教神甫；就是他后来给了我皮埃尔神父在巴黎的地址。我是跟阿尔多告别过，不过那是前几天在格里高里安纳大学。那次的电话并不是给他打的。"

我们久久沉默不语。我在回忆那个晚上的情景：医院将要开拔，救护车和卡车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与琼别离的痛苦和迫不及待见到朵拉的焦急心情，二者交织在一起。我又见到琼在小小的电话室里打电话的情景。小屋里灯光微弱，透过肮脏的玻璃纸窗，琼是那么遥远，几乎是在幻觉之中。她对着电话不停的讲啊讲，不知道我在外面虽听不到她的声音然而看得见她。也许因为琼要离去了，可使我完全和朵拉在一起；或是正因为她要离去，而使我觉得她对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么珍贵，觉得她命中注定是属于我的。现在发现，原来事实不完全是这样。我感到痛苦！当然也感到受了伤害，但我觉得没有权利埋怨，除非是虚荣心作怪，因为虽然琼对我说了谎，其实并未欺骗我。她对我的背叛并不更多于她对自己的背叛，而在这个背叛中，我是她的同谋者。她的过错是有一天将她带到了朵拉那儿；而我的过错是由她

的过错而引起的。是苦涩的安慰吗？也许更甚。她在打电话，我以为她是打给神甫，她却在给情人打。而我在看着她、想着她是属于我的时候，也在想着朵拉，并把朵拉的形象加在她的身上。我不是跟她一样虚伪吗？事实上，在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琼对我已不再是忠诚的，亲近的，也不再属于我了。因为就在那一刻，她和我一样分成了两半。

我愈想愈明白，琼和我是命中注定结合在一起，是休戚相关的。其实世上所有的人也都以不同的形式连在一起。叛变者和被叛变的人；被叛变的人和叛变者。人人在自己的自私之中相信有一天能屈尊享受一下懦怯的乐趣而不会有害于未来，然而这是自欺欺人。因为这种懦怯从来不是无害的，它会很快传播、扩大、蔓延。总之，罪孽也是受管辖美德的规律所控制，和美德一样也是一种爱的形式。

琼说："哈雷，我对你说过一次谎，向你隐瞒过一件更严重的事。是圣诞节那次，大战中最后一个圣诞节。那时，我在法国，你在罗马，可是到了圣诞节那天，我却来了罗马，瞒着你在那儿呆了两天，后来也从没对你说过。我利用一次休假，搭乘了送我们医院两位医生去罗马的便机，从法国到了罗马，正是为了看望你，想给你一个意外的高兴，和你一起过圣诞。

"可是，一到罗马突然产生再见一次他的愿望，在这一愿望之中有一种绝望的、极端的东西。尽管你还没有问过我，但我知道战争一结束，我们就会结婚。所以我对自己说，想最后一次见见阿尔多，和他在一起。然后回到法国，以后是美国，这一切便永远结束了。

"我一下飞机，就从机场给他打电话。他在家，我在去旅店之前，就去了他那儿，和他一直呆到晚上。那是圣诞之夜，阿尔多要和朋友们一起共进晚餐，不能推辞，于是约我第二天再见便径自走了。我去了旅店下榻。

"尽管时间不早（已是九点多了），我还是给基督教神甫格里高里

安纳打了电话。我对所做过事后悔不已，想去忏悔，做晚祷，进圣餐。神甫说这时教堂已关门，不能接见我。我坚持要见他，于是他告诉我有一个英语说得很好的德国神父，晚上十二点要去为神学院的德国修女作晚间弥撒。他给了我地址，答应通知神父并给修女打电话。

“你记得地址吧？”我问琼。

“干吗？记得不很确切；好像是在诺明唐纳大街一带。为什么你要知道那个地址？”

“因为那天晚上我见到你了，琼。你坐着一辆出租车，是吗？”

“是的。”她说。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

“是”。

“我开着吉普，在皇后大街的路口看见你在出租车里。一刹那间，我看见了美国军服，想那是一个很像你的姑娘，我怎么可能想到你会在罗马呢？我那天晚上也是去一个教堂，是圣·彼得教堂。”

我没谈别的。

我们不敢互相对望。

要是我能对她说有多好！可怎么说呢？以后，有一天，我会把一切都告诉她的；一有可能就告诉她。

“在修女那里见到了神甫，我作了忏悔。然后参加了弥撒，这是个小教堂，左边凳子上坐着十来个神学院的修女；右边是应邀前来的几个住在罗马的德国家庭。在神父布道作弥撒时，修女们唱着诗，有一个年龄较大的修女弹管风琴，她的手非常之美，我从未见过这么洁白、细嫩的手。

“所有的修女都加入了合唱，唱的是他们的圣诞赞美诗。有一首的旋律和我们的赞美诗一样。唱的声音甜美而有些颤抖。幸福和忠诚浮现在她们的脸上。她们望着祭台，看到了我再也见不到的东西：她们的童年，童年中最美好的时刻，对于她们是尚未失去的。她们仍

然忠于最美好的回忆。于是这些最美好的回忆,(也许就是在巴伐利亚乡村山区之中一个遥远的圣诞之夜)便完整无缺地回到了她们的心中,心还是那时的心,那颗相信、希望和爱之心。她们拒绝了尘世,然而却保留了尘世所能够给予的最美好的一切:肉体和精神的一致。

“看着她们我明白了。把献身宗教的女人看成是扼杀自己感情的人是多么错误。相反她们使这种感情纯化而变得高尚。我见到她们以全部的激情融入于祈祷和歌声中,这时她们的肉体也同样感到幸福。当她们从桌边站起来,合着掌,挺直身子,慢慢走着,以炽热的目光凝视祭台去受圣餐时,我看到了在她们身上完成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

“在那一刻我问自己是否应该以她们为榜样,并不是去做修女,而是嫁给阿尔多。向她们那样将生命投向所爱,彻底地去相信和彻底地去爱,全心全意地爱,我也要纯化我的感情。阿尔多不配吗?为什么不配?什么样的人不配?配不上什么?配不上我吗?我很清楚,我们俩人之中真有罪恶的是我,周旋在你与他之间,背叛了他,背叛了你,也背叛了我自己。他不是一再说,甚至在几个小时前还重复说着要和我结婚吗?现在我又见到了他对我说这番话的情景。好吧!即使是他有所图,这是一宗提高他社会地位的婚姻。然而只要他有拯救的可能,只要有一丝生命之芽(为什么没有),我的责任就是要采集这个胚芽,使它成长。

“可是我并没有这个勇气,第二天我没有去赴约,没有再见他,甚至没有打电话告诉他,晚上就乘飞机回了尼斯。我相信,永远从他的生活中离去了。”

“琼,”我完全理解她,“琼,真的,我现在相信,你的责任是和他结婚。”

“我忘了他,我相信已经把他忘了。战争的结束,巴黎,美国,我们的婚礼,新的生活,然后是杜卓的诞生。可是,就在普林斯顿,当你去

上课或到图书馆去的时候，我独自一个人久久地留在家里，渐渐地又想起了他。似乎这不会有任何坏处，任何危险。你懂吗？只是幻想，是一种游戏；可是慢慢地着了魔。我不断地想他，也因此而变得如此神经质，就像你所见到的那样。正因为这一切，我坚持要去卡不里。你是对的，气候不适宜杜卓去，但我又像以前一样疯狂，总是想着在卡不里与他重逢。怎么对你说呢，我就想在卡不里试一试我的梦：确定我究竟是不是真爱他。我觉得现在再也没有疑问了，或是爱或是不爱。如果爱，我决定把一切都告诉你，违反我的信仰，违反一切，去离婚，去嫁给他。

"于是便决定去卡不里。一到罗马我就给他打电话，可是他早就不在那里了，也没给任何人留下地址。我还有那个女人朵拉的电话，给她打了电话，但她也不知道阿尔多那些日子在那儿；她安慰我说，可以通过一位亲戚找到他。她问我如果找到他怎么对他说，我说让他给我写信。哪里？卡不里。但我立刻想到可能阿尔多的信寄到时，你仍在那儿，于是做了一件错事，极大的错事。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件事的严重，但我已无法控制自己。在我打电话的时候，恰巧在小桌上有张纸，是古里埃莫为我们写的卡不里岛的地址和唐·拉菲尔的名字。这时他为我们介绍的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到了卡不里就要请他为我们找住所。于是我请朵拉让阿尔多把写给我的信封好后，放在另一个信封里，上面写上唐·拉菲尔收。阿尔多只知道我婚前的姓，于是我把一切都告诉了朵拉，对她说我已结婚了。"

"那你的信怎么寄呢？"我问道。

"我一到卡不里……我不想对你说这些，哈雷。你看我什么都告诉你了，可这个我实在难以启口，好吧，做了错事就要有报应。"

她沉默了一会，似乎是要鼓足勇气，双手抱着头，又继续说下去：

"第一天在圭西撒纳，一有机会单独和唐·拉菲尔在一起，就立即对他说（你不知为什么走开了，也许是去广场买报纸），他会收到一

封信，要把它瞒着你交给我。"

"你找了什么借口呢？"

"我胡诌说和你结婚前是离过婚的，说我的前夫现在在罗马，不时会给我写信。我不希望你知道这事。你看我什么都告诉你了。"

"可是你的信，你那些信呢？"

"阿尔多的信来的时候你还在那儿。那天的经历就像是在地狱里。你和我一起在别墅的起居室，外面阳光灿烂。唐·拉菲尔走了进来，像往常一样，鞠躬，问候，然后交给你一张买东西的账单。当你把账单放在茶几上，一边看一边拿出钱包数钱时，他就在你背后向我使眼色。于是，那一刻我就跌入了地狱，唐·拉菲尔就是魔鬼。"

琼挤着眼睛学唐·拉菲尔的样子，这时她的脸色十分苍白。见到她这样，我似乎也感到哆嗦，心里油然激起对她的怜悯。是什么迫使琼这么一位如此高贵，如此坦率，如此正直的人变得这样卑下，备受这样的折磨？

"你是知道人们怎样谈论卡不里邮局的，也说得有些夸张。不过我相信唐·拉菲尔，其实也是一种诱惑；这是我决定投身的更大的诱惑中的部分；是的，我愿意，荒谬地愿意信任唐·拉菲尔。我害怕邮局会打开我的信，或说很愿意相信邮局会打开我的信，所以你一走，我就把一封没有写地址的信交给了唐·拉菲尔，让他亲自写上地址。邮局认识他的笔迹；这样，信当然就不会被拆开了。"

"于是对于唐·拉菲尔，你的前夫是意大利人了。你相信他不会拆开信吗？"

"也许他根本就没寄出。我想那个电话里说得很清楚，他根本就没寄出那些信。后来我见到阿尔多时，他发誓说从未收到过我的任何信。不过直到昨天，直到听了那个电话，我一直以为他没讲真话。"

"可他为什么要撒谎呢？如果他收到了信，为什么要说没有？为了什么目的？"

“我不知道，我想那些信是那么荒唐，那么疯狂，他没有勇气回答我；也许仅是因为懒而没回信，却又不敢承认。”

“你把信寄往哪里了？”

“按他说的地址，在他唯一的一封来信中告诉我的。是罗马埃赛索旅店。”

“他住在埃赛索吗？”

“我想是的。”

“你记得一共是几封信？”

“六封，有几封很长。”

“都对他说些什么？”

“那些日子里的感觉和所希望的一切；我对他说我如何等待他，为什么等待他；我头脑里一切疯狂的想法。要是我不写这些信，不把这一切发泄出来，我想我真会疯的。”

“难道你没想过，这样就把你完全置于他的手中了吗？”

“想过。可你知道吗？我正愿意这样，愿意在他手中。危险是我在写信时感到的愉快中的一部分。”

“没有想到过我，杜卓？”

“想过。但我已准备走极端来解决了，即使是不名誉的解决。我对你说过，我准备离婚，嫁给他。”

“在信里你也将这些对他说了吗？”

“没有。也许是唯一没对他说的事，因为我决定先见他，两年多过去了，我不敢肯定再见到他时，是否仍会如我所想象的，所相信的那样爱他。我等了一个半月，六封信是很少的。我可以每天都写一封，可是他不回信；我克制了自己，最后十五天不再写信了。杜卓开始生病，我想是主要惩罚我了。我生活在不可饶恕的罪恶之中，思想、道德、欲望的罪恶，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对在卡不里见到阿尔多已不再抱有希望。

十八

五月十四日是卡不里岛的守护神柯斯唐佐的节日，节日以前很早就开始准备了。五月最初几天的下午，在这吹着令人窒息的焚风的荒凉的岛上，琼就开始听到了恼火的鞭炮声，和单调无休止的钟声。孩子听到鞭炮声吓得惊跳起来：如果睡着被吓醒了，再也不能入睡；如果在吃奶，就把奶瓶推开，不愿再吃了。似乎不仅是琼由于等待阿尔多的出现而烦躁、不安和激动；而且季节本身，令人疲乏的气候和准备过节的整个岛屿都是如此。

琼执拗地在等待着，但内心深处已不再抱有希望，觉得自己是无谓的受到了伤害。

节日终于来到了。在巴黎她对我解释为什么恢复虔诚的宗教习惯时，曾对我说过那天的事，就是杜卓突发的腹绞痛使她万分惊慌；在观看宗教仪式行列的人群中艰难地寻找大夫，以及对圣母的许愿。除了最重要的，其它一切都对我讲了。许愿的真正原因，那时她没说，现在，她边哭边祈求我原谅，说出了真情：

"十五天来，见到他不回信，我不再写那些疯狂的信了。对于重见阿尔多已不再抱有希望，然而并不是不再想他。在遇到唐·拉菲尔时，我感到对他深深的憎恨。这是一种与气愤交织在一起的憎恶，因为使自己无谓的落到了他的手中。每见到他，我感到痛苦而后悔；由于希望得到但未能得到的愉快而使自己蒙受耻辱感到后悔。没有慰藉也没有任何补偿，既受伤害又遭人耻笑。由于卡不里的气候，杜卓真的病了，吃得很少，睡不安宁，这一冒险也是白费。我几乎迫不及待地等着你回来，这一日期已愈来愈近了。到这一天就意味着我一切梦

想的结束，所以难以平静。难道我的命运果真是这样吗？几个月漫长的等待之后，长久的幻想之后，这一生都不能再见到阿尔多了？

“我走出别墅，像疯子似地在岛上游荡，我走上通向特拉加拉无人行走的小径，走到最后几幢孤零零的别墅后面。牧草上的草已剪短、发黄、枯萎，草地上挺立着一些多孔的巨石，我在这些巨石之间徘徊。后来躺在一块这样的巨石上——它粗糙而灼热——久久地一动不动，望着远处深深的大海、天空；或用一块薄网，一顶草帽盖上眼睛。于是见到了一团不定形的炽热的黄色阴影。

“像第一次我在上卡不里的公寓阳台上等他一样，这次也数着数，数到九，但是这次数数更为荒谬！

“我羞于对你讲这些事，但又不能不对你说，因为要让你知道这一疯狂将我导致了何等歇斯底里的程度。

“就像那次我靠在阳台的墙上一样，现在岩石的粗硬似乎也给了我某种慰藉。躺在岩石上过了一会，身上有几处觉得疼痛，这种疼痛的感觉几乎是愉快的。因为这样我的躯体受着痛苦，就不再感到孤独了。

“有一天散步回来，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继续受到痛楚。对肉体上痛苦的需要是与我当时的等待和欲望一体的，是一种小小的安慰。我寻思着怎样才能得到这种（肉体上的）痛苦；与此同时感到有一种被挤、被压、被窒息的需要。

“夜里，当佣人们做完工离去，弗劳琳和杜卓睡了之后，我便下去，到花园里拿一条晾衣服用的粗绳，剪下很长的一段，然后到屋里锁上门把它缠在腰间；一转、二转、三转，尽量使劲缠、拉，几乎直到无法呼吸。想象着是他用双手这么紧紧地搂住我。我痛楚地倒在床上，至少因痛苦而感到幸福。于是我睡着了。

“又一天，我走到上卡不里，重走那天夜里他到我这里来所走过的路。看到那藏在橘子树丛中的白色小别墅，和爬在我的窗户外面阳

台上开着花朵的紫藤。我走进去，见到了丹麦太太。她更显老，脸上的皱纹更多了。见到我，她向我问好。她现在没有房客，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处女作家。我看看我的房间，一切都像以前那样：浅色的木制家具，窗幔，提花布的床罩和小摆设；还有空气，阳光，清香，外面树林子里传来的噪音和橄榄树丛中的风声。当然，如果阿尔多来了，我就会和他一起回到这儿来。我没对夫人说已结婚了，只对她说我来卡不里住几天，一个人住在旅店；如果停留的时间长，也许会搬到她这里来住。

"可这只是最初几天我还比较平静的时候，还仍然相信他会回信，会来的。

"后来，渐渐地，我愈来愈不安，激动，狂热。我不断地到广场去，在咖啡馆的桌子中间转；在一堆外国旅游者中间转；每次都希望见到他。或者到缆车站——每次拿波里有船到，便有缆车上来——不知疲倦地仔细端详客人的容貌。唐·拉菲尔总是在那儿，带着暧昧的笑容，和过分恭敬像个勒索者的问候。见到他的样子，我觉得受到迫害。如果下午一点回家时，在静寂无人的胡同里见到他，还没问他什么，他就会张开两臂，带着忧郁的表情说：

"什么也没有，夫人，还是什么也没有……"

我强作镇定笑着说：

"没什么，唐·拉菲尔，没关系，谢谢，再见。"

"再往下稍走几步，我便在一扇木门前停了下来，是一幢别墅在白色矮墙中开的一扇门。

"这是战时我在卡不里度过最后一个夜晚的地方，是阿尔多为之工作过的美国上校的别墅。（我似乎记得是这里，但不敢十分肯定）

"我在这褪了色、裂纹斑斑的绿色旧木门前停了下来。荒唐地觉得阿尔多会在这里留下踪迹；在斑斑驳驳的纹路中会有他用刀刻下的名字。于是我逐个逐个循着门上的纹路去寻找，阿尔多，有几次似

乎见到了这几个字，阿尔多，阿尔多。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能是，如果确实能够在这扇门上找到他写下的名字，会如他本人来卡不里一样，给我一种安慰。也许是由于我久久地生活在期待之中，觉得太痛苦了，已对他存在的真实性发生了怀疑——尽管一个月前，他从罗马给我来过信——因此需要外界的实体对此加以证实。

“我看着这象形文字一般的符号，眼睛发酸，疼痛。这是一些年代久远，由于天气的变化而在门上形成的斑剥；也有些是人为的符号，确实有人将名字、日期和一些句子刻在门上。我在狂热之中，责问为什么阿尔多不把名字刻上去？可是，我能肯定这是上校的别墅吗？那遥远的夜晚，我是和艾蒂斯一起来的，是在喝了许多威士忌之后来的，我怎么能肯定呢？

“圣·柯斯唐佐的节日终于来临了。节日前夕，就像我在巴黎时对你说过的弗劳琳下海边时扭伤了脚踝不能行走，两个女佣人告了两天假走了。

“下午三点时——钟声和鞭炮声几个小时以来从未间断——可听到远处随风吹来的宗教仪式行列中的阵阵合唱歌声，和铜管乐演奏的赞美诗曲。我躺在床上，关在幽黑的房间里，徒然寻找着那即使在祖国也无法得到的梦。突然弗劳琳喊我，声音很焦急，‘孩子不好了！’

“杜卓一身绀紫，眼睛发直，浑身僵硬，像是停止了呼吸。

“我把他抱起，喊着他的名字，摇着，但看来他听不到我说话，也看不见我。

“弗劳琳略通儿科，我们什么办法都试了：用水喷，拍打他的脸，倒拎着脚，做人工呼吸。

“最后，终于有了转机，虽然脸色没有好转，却已把眼光转向我，认出我来了。他不笑也不哭，睁大着忧伤的眼睛望着我，一副懂事的痛苦的表情。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成人的表情。因为除了痛苦之外，他

的表情里有一种对人类痛苦的惊讶！这是一双惊奇和气忿的眼睛，似乎在责问我，'为什么你没对我说，为什么你没告诉我，人会这么痛苦的？'突然他的两只小手开始在空中乱抓，忽又痛苦地颤抖。

"我从弗劳琳的脸上看出情况严重。她不能行走，我便跑了出去。隔壁别墅里有电话，可是大门关着。我去按铃，叫人，大声喊叫，没有任何人，都出去赶节了。我急急忙忙快步跑向通向广场的小径。

"一路上到广场都没有遇到一个行人，到广场时，我的心跳到了嗓门。广场上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人们站到了咖啡馆的椅子上，桌子上，为了争看过来的宗教仪式行列。钟不断地在敲，钟声在巷子的围墙之间隆隆回响；鞭炮就在近处放，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我开始劈开人群，挤到广场另一头的药房去。在人的身躯之间，在污垢、窒息、闷热发臭的空气中挤着。所有的人，男人和女人，当地人和外国游客，都在挤着，都想从站在前面鼓掌、发笑、喊叫的人们的肩膀上看过去，于是便使劲地挤，简直不能令人相信这是个宗教节。到药房之前，我在街角一家咖啡馆二楼的窗户上看见了唐·拉菲尔，我大声地喊他，问他是否见到过医生。

"'他就在那儿！'唐·拉菲尔从窗口回答道，指着教堂对我说，'他就在那儿，在教堂的台阶上。'见到我不知所措的样子便说，'我这就下来，太太。'

"我向教堂那边冲去，但只能很慢地挤。唐·拉菲尔走到我跟前时，我才刚走了几步。一边继续尽力慢慢向前挤，一边对他说，杜卓病了，情况严重，我去找医生，让他去药房。

'今天药房不开门，太太！'

"唐·拉菲尔安慰我说，别着急，放心，孩子们都是这样的。也帮我向前挤，给我开路。

"可是当我们挤到了教堂的台阶上时，医生已不在了。

"唐·拉菲尔向人们打听，谁也没见过他。于是他急了，生气地说

几分钟之前，亲眼见到他就在我们现在站着的地方，大家都说没有，唐·拉菲尔争辩。

“终于有个妇女说曾见过他，说医生是在她旁边站着来的，刚才还在，后来走到那边，不，这边，左边去了，穿过广场到缆车站去了。那个妇女是当地人，和唐·拉菲尔说着方言，说得快极了，我几乎一点儿都听不懂他们说什么。我不明白为什么她指出了医生去向后还要不停地说。在她一连串的话语之中，我不断地听到医生，唔，医生；唔，古奥美医生，不明白为什么唐·拉菲尔不断地回答她和问她，而不去追踪医生，有什么可说的呢？我猛地抓住唐·拉菲尔的一只手臂，对他说，请快去找医生吧！并对他指着那个女人指过的那个方向。

“可是不行。拉菲尔做手势让我别出声，等等，再等一会儿，便又喋喋不休地和那个女人说方言了。

“我茫然看看四周，眼前浮现出杜卓和他那双受惊的被激怒的眼睛和祈求的目光。这时教友会的女孩子们穿着浅蓝色的衣服领头走进广场，她们那颤抖、刺耳、走调的合唱声，混杂在人们的掌声和喊叫声中很不协调。挤在这肮脏的人群中，在这一片闷热喧闹之中，我觉得为拯救杜卓我完全无能为力，于是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痛苦。

‘唐·拉菲尔！唐·拉菲尔！我求求你！’我使劲用两只手摇着他说。

‘哎，安静，太太，安静，’他无动于衷地向我转过身来回答说，你这么急有什么用呢？

‘可是医生是从那儿走的！’我又指着缆车站那个方向喊道。

‘不是，没向那边走，是他太太向那边走了，医生的太太，刚才和他一起在这儿的，而医生是到一个产妇家去了，这个女人就是在跟我解释那个产妇住在哪儿。’

‘远吗？’

‘我想不远。’

‘我们马上去！’

‘请等一等，这个女人还没说清楚，还没有听明白是在哪儿。’

“他又开始和那个女人说话了，而她则不断地很快做着手势向他解释，一会儿指左，一会儿指右，一会儿指上，一会儿指下。让他向左拐，向右拐，上坡，下坡，上台阶，钻拱廊，走小径。

“这时在玛利娅之女的队伍进入广场之后，随着鞭炮的爆裂声，乐队以隆隆的胜利号角和一声巨响开始奏乐。

“在乐队后面穿着红色长袍并用粗绳紧扎腰部的八个汉子，用两条横木抬着圣·巴特罗诺的镀金塑像晃悠着进来了。我厌恶地看着圣像的红脸和滞呆的眼睛，厌恶地看着三个披金的神父。他们随着圣像，对周围的喧闹露出倦怠、厌烦、冷漠的神情，并不时相互低声交谈，和人群中靠近他们的女人说句话，交换一个眼神散散心。我厌恶那些拼命摇晃香炉，散发出难闻的哈喇香味的小孩们。我憎恶一切，憎恶所有的人。

“这时唐·拉菲尔站在我旁边听那个女人向他解释如何去找医生，乐队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在教堂的台阶上不停使劲地重复吹奏着胜利进行曲中的一个乐句。就在这时，我在行进队伍的那边，几个披着貂皮披肩的胖牧师后面，一群衣着漂亮的仕女们中看见了阿尔多。我一眼就看见了他，毫无疑问，这是他。

“是他，漂亮而年轻。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卡不里的阳光下，身上穿着一件短袖浅蓝色的针织衫，手上戴着金镯，他笑盈盈地看着行进的队伍。一手搂着一位姑娘的腰，另一边紧挨着一位上了年纪浓妆艳抹、珠光宝气的胖女人，在和她热烈地谈论着什么。乐队震耳欲聋的声响，平庸夸张的乐曲再也不令人不快了，突然变成了美妙无比的音乐，真正的凯旋曲。

“我忘了一切，这么说他是来了，但显然不是为我而来，是与人结伴而来的，是与女人们一起来的。难怪没有再给我写信，意外的见到

他活生生的在眼前，在咫尺之间，是如此地令我高兴，丝毫也不因那两个女人而失望和嫉妒；仿佛这是与他的出现不可分割的，是他应有的随从，对他非常合适。

“我这么看着阿尔多，不知冥想了多久？唐·拉菲尔的声音仿佛来自梦中，我完全把杜卓给忘了。唐·拉菲尔对我说他跑去叫医生，让我在这里等他。

“可是我没有等他，唐·拉菲尔在人群中一走远，我完全不由自主地，不加思索地，像是在催眠术的作用下，又把杜卓忘了。因为仪式就要结束，我便穿过广场去追赶阿尔多。

“他看见了我，并毫无窘态地认出了我，似乎这是在他意料之中。确实应该在他意料之中，因为他知道我在卡不里。他很坦然地给我介绍了两个朋友，较年轻的是个电影演员，至少他是这么介绍的；而那个年长的胖女人则竟是位名流，是意大利电台和联合演出的著名歌唱家。我当然不知道她的名字，当时听说之后也就忘了。年轻的长得不错，然而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且我看得出来，她不是阿尔多的女朋友，而只是那个歌手的朋友，是应了她的邀请来卡不里的。那个歌手却使我感到是个有性格的女人：放任、活跃，豁达、泼辣、专横，毫无疑问，她和阿尔多之间有关系。我甚至觉得她爱上他了。不过外表(我只说外表，因为我不喜欢寻根问底)可惜与阿尔多不般配。

琼说的这一切使我很感兴趣，但是我更关心的是尽可能制止用信对我们的讹诈；设法找到打电话的人和了解这个阿尔多究竟是什么人物。

“你是说，”我问琼，“那个歌手给他钱？”

“我什么也不知道，哈雷；那只是我见到他们在一起所得到的印象。”

“他有工作吗？什么工作？真是大学生吗？”

“我不清楚，我想他是在电影厂里干些事，一面等待毕业。不过，

他的收入肯定不会很高，今天朵拉对我说，他现在在米兰的一家杂志社工作。”

“你问了他有关信的事吗？”

“仪式结束后，在混杂的人群中，我仅有短短的时间和他单独在一起，就是那个歌手和她的女友先走了几步的时候。当时就立即问了这件事。”

“怎么说？”

“他没有收到，立刻断然否认。他说，如果收到为什么不回信？我是按他信上的地址寄的：罗马，埃赛索旅店。为什么他没收到？我怀疑唐·拉菲尔扣留了信。可是在那一刻有阿尔多在场，活生生的他终于来到了我身边；同时又对杜卓的思念，关心杜卓曾使我无暇顾及阿尔多以致失去他，在这两种矛盾的思想感情的焦虑之中，对那些信我也就不以为意了。而且，那时两位女士立即又和我们走到了一起。阿尔多要和她们一起下到圭西撒那去喝茶。我没有勇气离开他，便和他们一起去了。唐·拉菲尔和医生回到广场，见我不在会怎么样？于是离不开阿尔多，怕失去他，和为杜卓的担忧在此交锋了。在这种犹豫之中，表面上做到了唐·拉菲尔慰劝我而没能做到的那种平静。没关系，我自慰说：唐·拉菲尔和医生见到我不在广场自然以为我回别墅去了，他们就会径自去那儿，医生便立即给杜卓看病，给他作必要的治疗。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平静。和阿尔多及他的朋友们一起坐在圭西撒那的平台上喝茶，要讲话，要说笑，要装得讨人喜欢；而此刻杜卓正在难受，也许正在危险中，也许……，因此内心我感到极度痛苦。然而看着坐在我对面的阿尔多，觉得他无比英俊，比任何时候都美。我虽想离开，却没有力量站起来，坐在椅子上无法动弹。我既有强烈的欲望又无比的内疚；既幸福却又绝望。我为自己感到无限羞愧，但这一羞愧是我对此刻坐在我对面的，我敬若神明的人全部感情的结果。因此这羞愧也给我一种愉快的感觉，是极大的愉快。我觉得我有罪

过，但只是在完成这一罪过的时刻上的错误，罪过本身，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是正确的，甚至是完美的。你能理解我吗？

“阿尔多和那两位女士的谈话愈是枯燥无味，愈是愚昧，愈是嬉笑，我在想到杜卓时就越感痛苦。就在此时此刻，杜卓正在受病魔的折磨，也许正在用眼光四处寻找我；他虽还不会说话，但已能用眼睛认人了，首先会认出妈妈。可是正因为这样，我觉得我的迷恋才有价值，因为这已不再是迷恋，而是真正的爱情了。我曾希望得到这种爱情。在远离他的三年，在美国孤独和苦思的长长岁月中；以至在卡不里的病态等待和思念中，我不是总在等待机会以证明（向他也向自己证明）我对他的爱胜于一切吗？于是命运，哦，是上帝给了我这一机会，把我放到了这一处境里，要以杜卓（我在这个世上最强烈的爱）的生命来冒险，我要残酷地表现出我这一愿望的严肃性。

“哈雷，你知道吗？这些事情只是现在，在我对你诉说之后才清楚的。甚至正因为对你讲了，我自己才清楚。那时，甚至后来在思考时，总是一团模糊纷乱的感情和无穷的苦闷。

“那个歌唱家和她的女友决定在傍晚之前去上卡不里游览，她们从未去过那里。于是她们上楼去换装了，我也就和阿尔多有一刻来钟的时间可以单独在一起。这是个机会，应该和他说说杜卓的事然后离去，可是他不知道我已结婚了。我怕失去他，愚蠢地想和他再幽会一次之后说出这一切。想立刻就去，我毫不犹豫地对他说了出来，目光转向别处，我的愿望似乎使他十分感动，再说他也已看出来了，但是他道歉说现在不可能，会在两位朋友面前出丑。

“那什么时候呢？”

“明天，她们俩就走了，他说他设法留下来，或是把她们送到拿波里之后他再回来。不，我仍然是眼睛看着别处对他说，或是当天晚上，或是永远都不。当天晚上？不可能，他想能把我说服同时又不得罪我，吞吞吐吐地说着。想让我明白，他是和别人一起做伴来的，是两位女

士的客人，绝对不可能在当天晚上就弃她们而去，这样会得罪她们。得罪又怎么样，有什么了不起，我说。为了他，我所受的委屈远甚于这些。可是她们会因此和他断交，他解释说，永远不再见他。于是我说，如果今晚他不跟我去，那就永远不见他了，你就选择吧。他仍然犹豫，一言不发。在沉默中我想看杜卓，又见到了他的小手在一阵奇怪的颤抖后抽搐着在空中乱抓乱划。现在他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我再重新吻那双小手？最后阿尔多说话了，说好，就今晚上吧！在哪儿呢？在上卡不里，我说，在丹麦太太的公寓，像上次一样。我去过，那儿是可以的。10 点钟我在铁门前的小径上等他。十二点吧，他恳求说。就十二点。十二点就有更多的时间呆在杜卓身边，我同意。

"这时我才抬头望他，盯着他看，看到他那双含情脉脉黄色的眼睛正注视着我；眼光里有欲望，也有捉摸不定的神色，几乎有一种恐惧。我怎么能相信他呢？我问他，怎么能肯定他一定会来呢？

"他不知怎么回答我好，不知能给我怎样的保证，只是重复地对我说他会来的，让我安心。我说难以安心，口头允诺我不够，我需要保证。他不知所措地左右张望，看看手表。我以为他是担心两位朋友回来，可是他却从这里有了主意。他脱下了金手表，顽童似地对我说：这是我的全部财产，你拿着，放在提包里别让任何人看见。如果我不来，你就永远拿着。

"我苦笑了一下，心里作出了决定，想到杜卓和我所作的牺牲，不由地激起了一种报复心理。他的金镯子对我有什么重要？我一笑。

'我知道你很富有，'他接着说，'可是这对我是十分宝贵的。你看，你仔细看看，这是名牌的。光是手工就值二十万里拉，再加上外壳和 18K 金的表链总共要值五十多万，要是我不来取不是傻瓜吗？你不是要保证吗？我再也没有别的可给你了。'

"我感到自己很坏，现在我已豁出去了，还有什么要紧的？把表拿在手里掂掂，看看，然后笑着说：

“谁知道，也许我仍是不放心，今晚你如果把一切都告诉那个歌手，也许她会送个金钢钻的给你。

“他并不生气，伤感地低下头对我悄声说，‘你放心吧！’

“他有些见老，似乎对他来说不是过了三年，而是十年。躯体还是很年轻，可是丰满的脸颊上已出现了几处皱纹；眼圈发黑，露出倦怠的神情。

“那两个女人一老一少，一胖一瘦回来了，都重新涂了脂粉，修饰了一番，一个吵吵嚷嚷，一个喋喋不休。

“我们一起走到了广场。他们去上卡不里游览，就是租一辆车去，到那儿停五分钟，看看全景，然后就回来。

“我和他们告别，现在不再需要和他们在一起了，可以跑回家，而同时肯定不会失去阿尔多。可是却像是有一种神秘的荒诞的力量抓住了我，使我迟疑，使我不愿，不愿把眼光离开阿尔多。第一次和他们道别后，我一直把他们送到那辆租来的旧式大鱼雷型敞篷车旁，直到他们上车时，我仍犹豫不决地站在一边。

“我们又一次告别。那位总是彬彬有礼，非常活跃的歌手在伸手向我握别时，发现了我的迟疑，便邀我同去，见我并不拒绝，就顺手把我拉上了车，几乎是将我拽了上去。

“我是疯了。当那辆大车摇摇晃晃地登上最初几个弯道向上卡不里的岩石上驶去时，我对我自己说我是疯了，反常了。我怎么在这里，挤在两个满身香水味的女人中间，离杜卓愈来愈远？我还是母亲吗？是什么样的母亲！可是我不愿放弃做母亲的责任，我要紧紧地抱住杜卓，亲他，感到他活生生的在我怀里，活的……我第一次意识到了如果杜卓死了将会怎么样。这并不是荒谬的想象，而是现实中可能的事。多少孩子死在这样的年龄，特别是那些娇弱的。杜卓并不娇弱，他很结实健康；可是卡不里岛的气候使他很受罪。要是我回家见到他死了呢？哦，我怎么才能救他？

“我祈祷，终于全心全意地祈祷了一刻。可是我可以祈祷吗？我已在道德的罪孽之中陷了多久？不是从一、两个小时前在仪式进行中见到阿尔多那一刻起，而是从我来到卡不里开始等待他那一天起；是从普林斯顿那天晚上你见了奥夫纳教授回来对我说要去意大利，我暗自决定去卡不里的那时起；甚至更早，更早以前。我是在放纵自己的过程中，逐步陷入了深重的罪孽之中。开始像是尝试，或玩笑，后来在回忆和阿尔多一起在休假营地度过的遥远的时刻中，在想象将来与他一起的时刻时，在一种无穷遥远而又恍惚的思念中，渐渐地愈来愈严重。我能祈祷吗？我的祈祷配得到主的垂听吗？不，肯定不能。于是我不敢再祈祷，唯一能做的是：竭力使自己想我不配祈祷，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那时汽车开到了最后一个最陡的斜坡上，渐渐发出隆隆的声音，几米之后便停下了。

“就在这半山腰的岩石中，在一个小洞穴的壁龛中，有一尊圣母像，周围都是前人许愿的还愿物和许愿灯。开车的胖司机让我们下来，最后一段坡要步行上去，他利用这时间检修一下马达。

“最高处的岩石，在黄昏灰暗的光线中，屹立在我们头顶上。这是一块黑色的巨石，黑压压的一片，使蓝白色的圣母像在微弱的光线下难以辨认。

“两个女人和阿尔多没有往这边看；他们向栏杆那边，看着头上的山峰，脚下的深渊，无色的海平面，和远处拿波里的灯光。然后说说笑笑，按胖司机所指引的路，开始向上走去。

“我稍稍留在后面，看了看圣母像，然后看着阿尔多修长匀称的身影，走在两个女人之间，在白色的路上远去。是的，我可以祈祷，但应该以某种形式付出代价。为使我的祷告实现而付出代价；为得到使杜卓生还的恩泽而付出代价。我注视着圣母，她给我出了主意，并给了我勇气。是的，她给了我勇气。

“只有一瞬间，仅仅一瞬间的犹豫。看着那一刻远去的阿尔多，我觉得我永远失去了什么。不是阿尔多，而是我自己更重要的什么东西，我也说不清楚。在那一刻我明白了，我是处于攸关重要的时刻，我的全部生命在孤注一掷之中，什么时刻，什么赌注，我都不知道，但在这样自问的时候，心里已拿定了主意。

“我已许了愿，如果杜卓活着，我就永远放弃阿尔多。”

十九

不久，我们又重新坐上了汽车。在上卡不里游览别墅的时候，那位女歌手发现阿尔多手上没有了表，我立即说在我这儿，说着便从提包里取出来交给阿尔多。他疑惑地看着我，我对歌手说，我们在赌一种游戏，阿尔多输了，就把表当作抵押给了我。

“‘可是，阿尔多要拿回抵压物，该受罚才是啊！为什么不罚他呢？’那个歌手戏谑地说，然而却以审视的目光看着我和阿尔多。

“我说不想罚他，没有兴趣再玩了。下到卡不里后，我决然和这伙人道别。

“我找到了一个机会，很快地向阿尔多耳语了几句，说我刚才是开玩笑，他说得对，晚上最好不要见面了。

我跑着回去，一路上不停地向圣母祈祷，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圣母经。到家看见弗劳琳站在门口，手里抱着杜卓。杜卓很好，我跑出去叫医生仅仅五分钟之后，他立即就好了。吃了那份正常的午餐，并睡了一觉。医生和唐·拉菲尔来过了，说这是激烈的腹绞痛症，但绝无不良予后。而我久久不回，却令弗劳琳非常担心……

“我无法回答弗劳琳的询问，因幸福而哭泣。搂着微笑的杜卓亲

吻，什么也不想。

“有两天时间我什么也不想，照顾着杜卓，不时地想到圣母，心里感激她。

“第三天上午，正当我准备带杜卓到小海滩去的时候，女仆来说有位先生来访，要找我谈谈，我没听明白来访者的名字。

“下楼时，心想可能是那位英国音乐家巴格斯托先生——你去之前我们在广场上认识他的，出发后来来喝过二、三次茶。但不料却是阿尔多。

“我一见到他就感到非常需要他，但并不像以前那样是心里需要他。怎么对你解释呢？就是说，他已不再是我的神，而只是一种欲念，也许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欲念，但也仅仅只是一种欲念而已。

“那你是怎么了，琼？你许的愿呢？”

“我毁了所许的愿，毫不犹豫，就在那天晚上毁了愿。”

“毫不犹豫？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圣母曾听了你的誓言，难道你不害怕吗？”

“不，因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并没有许愿永远不见他，而只是许的那天晚上，仅仅是这样。那天当我相信杜卓病得很重的那一刻，我许了愿，为那个晚上许了愿。我以为回家来会看到杜卓病得很重，我不能丢下病危中的杜卓，和阿尔多晚上到上卡不里去，所以在圣母前许愿放弃。我许愿是为了求杜卓能活着，不是别的。现在跟阿尔多去，已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了，而只是一种愉快，但也仅仅是一种愉快而已，怎么对你说呢？如果我没有许愿，如果没有把表还他，也许那天夜里我就会去上卡不里，那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与这种感受相比，后来的幽会就如同淡淡的清水一般，没有任何悲剧色彩，也没有任何决定性意义。

“你知道吗？如果我没有许愿，那天晚上和他一起去了上卡不里，就意味着向你提出离婚，嫁给阿尔多。在祈祷和许愿的念头之后，即

使我回到家里见到杜卓已完全康复也是一样，因为我只是履行在担心杜卓生命的时候所作出的决定。

我提醒琼，说她曾亲自在巴黎对我说过关于许愿的事，尽管当时没说出最本质那一部分。我觉得可以对她重复那些说过的话，即是：如果上帝存在，则对上帝是不存在先后的，在他面前一切都是同时的。因此，我认为她应可视作是遵守誓言的。

“皮埃尔神父也对我这么说。我曾想为自己辩护，并不是认为自己没有罪孽，而只是想说明我毁誓所犯的罪孽要比我有了许愿的意念，不去履行而当晚跟阿尔多去上卡不里要轻得多。如果那样做了，则实实在在是犯了天大的罪孽，是使人绝望得要下地狱的；或永世追悔不及。我没有这样做。”

“你庆幸自己没有去做，是吗！琼？”

“是的，我为此而庆幸，但有时也有疑问，有一种很奇怪的，折磨人的疑虑。也许那一次的罪孽是应该犯的，是必要的。譬如现在，我为你担心；现在，当唐·拉菲尔用那些信勒索我们时……我那时如果一不做二不休和你离了婚，不是更好吗？那你现在不是什么事也没有了？”

第二天，琼本应该从强比诺机场直飞纽约，但我们取消了预订的机票，在三天后由巴黎起飞的一班机上订了座，然后便去卡不里。显然，那些信一定是在唐·拉菲尔手里，而电话则是他指使熟人打的。

我们租了一辆汽车，清早从罗马出发，10点钟便到了拿波里，赶上了渡船，中午就在卡不里上了岸。唐·拉菲尔惯常地在大海滩。他正和财政警长在堤上散步，等着渡船。他一见到我们便热情地迎上来，伸开两臂，展现出最开诚的微笑。

不过见到我们没带行李，听说当天下午就走，似乎很是意外并有些黯然。

“怎么不住几天呢？这真是不应该！怎么能来卡不里而一个晚上

都不住呢？啊呀呀！”

“我们就是来和您谈谈的，唐·拉菲尔，”我神情严肃地说。他的热情使我恼火。我不愿使自己表现失态，但也不想和他过于随便，愈快解决问题愈好。

“和我谈谈？太荣幸了，我完全听凭尊意。说吧，谈吧，上校先生。”

“我们到哪儿去？”我向琼征求意见。

“愿意到上面广场那儿去吗？如果允许的话，我邀请你们喝杯苦艾酒，这次该我请客。”

“我要跟您谈正经事，唐·拉菲尔。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去您家吗？也许更合适些。”我想他自然是把信藏在家里的，可以等他一接受我提出的数目，我就想立即得到那几封信。

“到我家？！哦，上校先生，对不起，那对夫人来说可太远了，要步行半个小时，我非常荣幸在寒舍接待你们，怎么不是呢，上校先生。可是这对你们太不方便了，请相信我。我们在咖啡馆谈谈好吗？”

“这是件很不寻常的事，唐·拉菲尔，”我眼睛盯着他说。

尽管他是个非常有心机，而且是善于察颜观色的人，这次却似乎并没有发觉我眼光中所含有的力量和意图。

“一件不寻常的事？”他闭上了一会儿眼睛，像是在思索，“我们可以到圭西撒纳去，在大厅里或在平台上，好吗？”

“也不行，唐·拉菲尔，我希望你明白，我要在没有第三者的情况下和你单独谈，不要在公共场合。”

“好极了，那就去市政厅吧，这时候那里没有人了。”

“市政厅？”

“是啊，看来您什么也不知道。对不起，我要谈谈自己了。我现在是市长，卡不里的市长，已经六个多月了。我的市民们信任我，请吧，请，夫人……”

说着便请我们到缆车站去。见我走到售票处的窗口，骤然将我挡

住。

“请别费心！你们是和我一起来的，谁和市长一起来，不用买票。看！至少还有这点儿意思！”

在缆车上，一路谈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天气，外国旅游者，卡不里缺水问题；然后他又问起了孩子。琼虽然内心反感——有时由于他那过分的客气——却克制着自己，平心静气地回答他。告诉他有关杜卓的事，甚至还提到了唐纳黛拉的出世等等。我则注视着这个不一会便要与之进行一场不光彩较量的人。我打量着他，观察他那刮得光光的脸，薄薄的嘴唇，灰色的带笑而不可捉摸的眼睛，和嘴角上隐约可见的皱纹。是一副清秀而可疑的容貌，是祖上遗传的面具。曾经过多少代人的演变：宫廷的弄臣、商人、仆人、神父；从最古老的地中海文明逐渐经过腓尼基、希腊、亚历山大、古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文明，一直到带着这副面具的这个粗俗的人。面具从不脱下，有如最有力的武器。我从这个面具衡量他狡猾的传统力量，并与我即兴的力量作比较，我怎么能取胜呢？我该付多少昂贵的代价？

毫无疑问，他对我们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知道琼的家很富有；知道我们曾住在巴黎；知道我在教科文组织的地位。他什么也没有说，可他那毕恭毕敬的态度——甚至更甚于去年所惯常对我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切。

我看着唐·拉菲尔，见到他在笑，在开玩笑，在恭维琼，但已听不到他说话的涵义了。只是绝望地想着钱数，只是想着数目：一千美元？两千？伍千？一万？我摸摸口袋里的支票薄对自己说，我在巴黎美国 Express 的存款不够，要让琼向她父亲求援。也许这第一笔款子能弄到几封信，可是还需要多少钱才能得到所有的信呢？

广场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现在是伏天，又是中午时分，全部外国游客都躲在树荫下，咖啡馆正面向阳的空地上没有一个人影。天气是那么热，人人都坐在桌边懒得动，半裸身躯的男男女女，戴着墨镜，在

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吮着大瓶的冰镇饮料。

我们穿过广场走进了市政厅，上了二楼，唐·拉菲尔有钥匙。他在一间宽大简朴的办公室里接待了我们，因护窗板关着，屋里显得幽暗。

"这儿要是不把上衣脱了就会热死的，"唐·拉菲尔解释说，"夫人允许吗？"于是他脱了上衣，在一张堆满了纸的大书桌后面坐下了，这是市长的位置，我们坐在另一边的两张柳条椅上。

说话之前，我鼓足了勇气，克制着厌恶的情绪。最后看了一眼唐·拉菲尔，他坐在椅子上穿着灰色短袖的T恤，用手绢擦着脖子上和后脑勺上的汗。在他身后白色石灰墙的上方是教皇和共和国主席的画像，再往上便是十字架。

"唐·拉菲尔，"我说，"我开门见山说了，我夫人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一直停留在唐·拉菲尔薄薄的嘴唇上一丝淡淡的殷勤的笑意骤然消失了，他的脸变得严肃、安详，朝琼看了一下之后又重新转向我。

我继续说：

"因此我知道我夫人一年前在卡不里时曾收到过一封她前夫的来信，信是通过您转收的。于是您转交给了我夫人。唐·拉菲尔，我夫人并不是想欺骗我，而只是为了不让我感到不安；同时也为了避免邮局有人可能拆开她要写给前夫的信……"

"对不起，我打断您了，上校先生。非常正确，过去卡不里岛上的邮局没有保障，正是我首先提醒您夫人的。可是我有幸告诉您，自我就任市长之后，这种事情不再发生了。这种损害一个文明民族最基本权利的前所未闻的陋习，在卡不里岛已结束了。上校先生，请您告诉大家，告诉您的同胞，这是我上任后第一个措施。您知道，尽管邮局并不属市政厅管辖，而是直属国家的，我一当选后便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去了罗马——是自费去的——。我治愈了这个顽疾，六个月以来，卡

不里的邮局和华盛顿邮局一样保险。对不起我打断了您，上校先生，现在您说吧，说吧，请继续说……”

继续？我找不到话语来重新开始这番谈话。唐·拉菲尔突然以邮局信誉捍卫者自居；而我却在考虑向他提出多少钱才能取回那些信，这二者之间似乎没有任何逻辑上的联系。然而当听他说到“治愈了顽疾”时，我却更加踌躇了，从而也就更增大了我向他提出这笔款子的数目。

唐·拉菲尔当然早已预见到这番效果，因此才用这么多的废话打断了我，并如此炫耀他的德政。

他是市长，他纠正了邮局工作中的偏差，因此信的代价也就远比我想的要高。

我找不到话语来重新开始这番谈话，幸好琼插话了：

“唐·拉菲尔，”她说，“我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丈夫，就是说我把交给你的六封信让你在外面再套上信封写上地址寄出去的事都对我丈夫说了。”

“很好，太太，”唐·拉菲尔说。

“那六封信你要多少钱？”我猛地站起来用拳头捶着桌子说。

唐·拉菲尔惊骇地向后退去，靠在椅背上。

“我不明白，”他结巴着说，“我不懂您的意思，上校先生。”

“唉！您非常清楚，别装蒜了，来吧，这六封信你究竟要多少钱？我给你一千美元，行吗？”

“我很乐意，上校先生，非常乐意……。不用那一千美元也行，可是那些信我都寄走了呀！”

我站起来，弯下身去，对着唐·拉菲尔，他望着我，渐渐向后靠，愈来愈害怕。我个子很高，几乎俯视着他，目光中充满着极度的憎恶。

“行了，别胡诌了！够了！”我对他说，“信根本未寄到收信人那里，这你很清楚。前天给我们打电话到罗马来的是谁？是你指派的。行

了！你到底要多少？一千美元嫌少吗？说吧！至少有这个勇气说么？”

我发现唐·拉菲尔在发抖。他颤抖着，气吁着，脸色因惊怕而变得苍白。

“上校先生，”他用恳求的口气说着，“冷静些，我求求您，请让我站起来……”

他用双手撑着椅臂，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把脸转向墙，向上看，伸出右手指着十字架的方向。

“您看，上校先生，”几乎是哭着说，“我对十字架起誓，对十字架起誓，这六封信我都封上……您说是六封我也不否认，可我完全不记得是几封……我没有看就封上了，然后放在另外的信封里，亲手写上了那个名字，现在我已记不清这个名字了，可是地址是罗马埃赛索旅店。我密封好之后就寄出去，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再说一次，我对着十字架发誓，要是我说的不是实话，我的侄女儿此时此刻就死去。她只有十六岁零四个月，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因为我妻子没有生养。

他发誓说着，一会看看十字架，一会转头望着我们，看看我们对他所说的有什么反应。最后放下手臂回到大书桌旁，用刚才抹汗抹湿了的手绢擦着眼泪，仍然惊恐地注视我们。我沉默不语，看看琼；她低着头坐在椅子上也一言不发。

经过冗长的沉默后，他说：

“您可不该这样，”唐·拉菲尔低声说着，战战兢兢向我伸出了手，然后用谦和的，甚至父辈的口吻接着说：“您听一个比你年岁长得多的人说几句话，请冷静些，不要那么激动，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幸，那么多的痛苦。比起亲人沉重的疾病，比起不治之症面前的不幸，即使是丑事又算得了什么呢？没什么，您信我说，没什么的……我是个鳏夫，我妻子死于癌症，七年的折磨，这才是生活中的不幸。上校先生，感谢上天和圣母，您夫人很好，您也很好，你们在美国的孩子也很

好。其它的……其它的就冷静地、慎重地解决，不要那么激动。上校先生，您要珍重啊！”

一阵激动的热流从胸口一直涌到喉咙，无法抑制。我十分羞愧地向那位曾让我如此不公正，如此恶毒地诬蔑过的人伸出了手，希望他能握住它。

“请原谅我，唐·拉菲尔，我是疯了，请原谅我，您能原谅我吗？”

“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上校先生，”唐·拉菲尔双手握住我的手说，“这些事情，人人都会遇到的：一时自己也不知道干了些什么，以后也什么都记不得了。上校先生，请接受我良好的祝愿。”

“也请您原谅我，唐·拉菲尔，”琼说着站起来，走到书桌旁，也向他伸出了手。

“好了，别再提什么原谅不原谅了！”唐·拉菲尔站起身来，躬身握住琼的手吻了一下，回答说，“难道我是耶稣不成？我是卡不里的市长，作为市长我是非常严厉的，对谁也不原谅！如果有人在路上乱扔碎纸，而不把它丢进我让人安放在路角上的铁篮子里，就要罚款；如果外国旅游者在夜间大声喧闹，吵醒了入睡的人们，就要罚款；如果可爱的小姐们的泳装不合规矩要罚款。明白吗？罚款，罚款，罚款。”

他放声大笑起来，然后把我们带出去喝苦艾酒。

“上校先生，您回美国去？是乘飞机吗？”

他并不知道巴黎的事，也不知道教科文组织，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把他想象为一个消息灵通、神通又广大的人，其实并不如此。

喝完苦艾酒，他很快就告辞了，是两点钟光景，他说不早了，侄女在等他吃饭。事实是他很聪明，懂得虽然我们深信他的无辜，然而他总是与这些奇怪的信，与我们的焦虑有关的人，因此他的离去会使我们感到轻松。

事情就是这样。从那时起一直到最后，我和琼之间一切都很好。为了不至赶不上下午四点的汽船，我们立即下到大海滩，去那里用

餐。

那天晚上，我们下榻在拿波里的旅店，行李早就留在那里了。第二天一早，坐直通卧车去巴黎。

想到了唐·拉菲尔，我们觉得放心了，心情平静。那些信呢？讹诈的丑事呢？听其自然吧，谁拿着那些信，如是想要钱，在公布之前肯定会来找我们的，像我们这样激动实在太愚蠢了。

现在我相信是琼在电话里没有听明白，我试着猜测那些造成误解的句子。琼由于内心的悔恨、焦虑以及被可能受敲诈这一想法所折磨，也许会先提到那些信。于是那个人——不管他是谁——可能会用意大利语故作天真地说："信？从没听说过。"就是说，信吗？没听说过。"没听说"，"没寄出"琼听成了信没有寄出，于是立即就想到了唐·拉菲尔，谁知道呢？

我把这些想法告诉琼，尽管是无稽不可置信，却多少能使我们安心些。

我们神奇般地平静之后，深深留在我们脑海中的首先是唐·拉菲尔的出奇的谦逊。这个狡猾的、贪财的、无疑在一生中干了不少下流勾当的事，一旦被无缘无故责难之后，既没有反抗，也没有愤慨，而几乎是逆来顺受，仅仅用害怕来自卫。

这就是意大利人！谦卑到懦怯的程度，明哲到背信弃义；总是那么人道，从没有英雄气概，有时却犹如圣贤。

这个唐·拉菲尔，我们当初认识他的时候，觉得他是个魔鬼。在最后五分钟发现他竟犹如圣者。圣者的所为不就是为我们做善事吗？

在卧车内，我和琼平静地谈论着这些事情，所发生的种种就像是一场恶梦。夜色降临了，在黑暗的山坡上爬行的火车渐渐接近边境，我们没有开灯；当火车在两个隧道之间和海边陡峭的山谷旁行驶时，从窗口吹进了亚平宁山区夜间清新的空气。我仰面躺在卧铺上，望着黑色的山顶，深蓝色的天空和闪烁的星星。

我忘掉了一切，甚至忘了朵拉，眷恋着琼。

我很幸福，为什么不承认？为什么不承认生活中的这种逆转和矛盾？为什么总去寻找像谜一样的逻辑？也许有一种更高的，为我们所忽视的，无法理解的逻辑？

我很幸福，和琼一起觉得幸福，更甚于和朵拉在一起的时候，我不记得当时想些什么，究竟感受到了什么，只记得在火车里我很幸福。

可是，事完之后，琼的第一句话伤害了我，令我沮丧，使我充满苦恼。我以为琼和我在一起也感到幸福，可是并不如此。

事完之后，琼柔情地抚摸着我说：

“我们彼此相爱，我知道，哈雷。我们之间是真正的爱情，但是，哈雷，可惜我们在做爱时并不相爱！”

那时火车渐渐慢下来，到了意大利最后一个站。群山黑色的轮廓，天空、星星都渐渐地静止、停留在窗框里。我听到列车员和少数几个乘客的脚步声，稀稀落落的说话声，和远处的喊叫声、哨声。接着便是夜间山区的寂静和溪流的潺潺声，村子里的钟楼敲打了十一下，我立刻又重复着琼的话，它像一个判决一样，已经牢牢记在我心间：“可惜我们在做爱时并不相爱！”这么说对于她，在这方面我仅稍胜于凉水而已。凉水，这也是她的说法。

我什么也没回答。她依在我身上，将脸挨在我的肩膀。我紧紧搂着她，感到她瘦弱、娇小的身躯已和我溶为一体。我没有反驳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望着山，听着流水。

我在继续遐想。很可能琼是错了。也许她也幸福，只是由于悲观的天性而没有发现近在身边的幸福。

也许是由于我乐观的天性使我如此自负？

然而再想了想之后，我怀疑之所以和琼觉得如此幸福是因为这是她忏悔后的第一次，也许有一天当她听了我的忏悔之后也会同样

幸福的……。那天晚上和她提朵拉是荒谬的。琼明天一早去美国，九月份她回到巴黎时，我再慢慢地把一切都告诉她。不是为别的，而是要她别太折磨自己，不感觉太对不起我。和她相比，我背叛她的次数要多的多！不仅和朵拉，而且和其它许多女人；在这些其它女人之中，我想到了盖基娜，由她而又想到了那条金链和有圣母——那个琼曾向她起誓的圣母——在上面的坠子。可怜的盖基娜给我的时候，要我答应好好保存，如要送人只能送给我的妻子。

于是我去找那条链子，我总是带着它，放在公文包里面的口袋里。找出来之后和坠子一起给了琼。

"我也曾做过有负于你的事，"我对她说，"你回巴黎后，我把一切都告诉你。这个带圣母像坠子的项链是一个女人，一个意大利女人送给我的。当你在卡不里时，我曾和她在一起，以后我再告诉你。"

"为什么要给我？"琼起疑说，"我不要。"

"我求你拿着吧，"我坚持说。"你看着它就不会自责了。再说她曾是个很好的女孩子。"

"为什么你说曾是，她死了吗？"

"没有。但我想我再也不会遇见她了，是个很好的姑娘。你的阿尔多其实也是个好小伙子。琼，过错从来不在别人，而总是在我们这些有欲望的人自己身上。"

她望着链子没有立即回答。我看她是在努力回忆着什么，而却没有勇气说出来，最后，她说：

"阿尔多也在脖子上带这样的链子。"

她带上了项链。也许是在一种新想法促使下，开始热情地吻我。于是我想起了盖基娜在劝我收下这链子时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它会给你带来幸福，你看吧！"

谁知道，也许那次琼很幸福。

直到最后一刻，直到第二天晚上在奥列机场上我最后吻别她时，

琼看来都很幸福。

在机场的告别是最令人痛苦的。穿制服的官员将旅客们像把动物送进屠场一样带进狭窄的过道里，两边是低矮的玻璃栅栏，这样虽然仍同在一个地方，我们就被分开了。

我在外面等着，在黑夜里我望着琼将乘之离去的庞然大物——星座式客机。螺旋桨在试动，可旅客还没有离开大厅，最后寥寥无几的人群才稀稀落落地，看来很勉强地，像为一些看不见的刽子手们推着，向那个要把他们带到大洋彼岸的怪物那里走去。在黑暗中，隔着相当的距离，我无法分辨琼的身影，于是便挥手作告别的姿式，希望她能看到我。

人群上了飞机，舷梯撑开了，四个马达的螺旋桨又一个个开始转动，做最后一次试转，然后四个一起开动，飞机开始慢慢滑动。

起初很慢，但须臾之间便已消失在黑暗之中，向机场的中心驰去了。

我上了汽车，离开机场向巴黎方向开去。走了五百米之后，我停了车，走出来，向机场望去。听到马达的隆隆响声，看到远处的灯光，照明灯和着陆灯。琼的飞机在哪里呢？

几分钟之后，我似乎辨认出了它的形状，银色的飞机在夜空中上下升降。

一红一绿两盏灯交替地在天空闪现，不一会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只有马达的声音渐渐远去。我突然发现夜空和田野充满了蟋蟀不停的鸣叫声。

天气很热，天空云层密集，不见一颗星星。

（到此哈雷的打字稿中断了。）

二十

我作为导演应立即声明，哈雷的故事……可是导演——这个到处滥用的名词——有多难听！没办法，我不喜欢，我不习惯用这个词，沿用以前的称呼不更好吗？称 metteur en scenne。或称场务主任，或干脆叫主任。

总之我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要声明，哈雷的故事无论思想、内容或情节方面无疑都是很丰富的，然而要得到任何一位制片人经济上的赞助，即使是最有教养的、毫无偏见的人，也必须要完全重新改写。

我一看完稿子，就把这层意思告诉了哈雷。我对他说他所叙述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要设法结束它，并尽快将结尾寄给我，两个月之后我回到罗马时肯定会有主意。我们可以合作，把它改写成一个电影脚本。

我并不希望拍摄这么一部电影，这两个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太复杂、太特殊，如果不说是荒唐的话。我只是希望能卖掉这个脚本，(因为演员表里有可能安排两个美国大演员)，从而使哈雷赚到几百万元钱。

不过我并没有把我这一个最低计划告诉哈雷，不使他失去结束故事的信心；也没有告诉他，我看稿子所发现的矛盾与荒谬之处。有时这些情节使我对事情的真实性发生怀疑，譬如说，怎么可能他们会因为那个奇怪的电话而贸然去找唐·拉菲尔，弄出这么荒唐的一幕？而我最不喜欢的还是那个电话本身。据哈雷所写，那个人在电话中言辞之间有恐吓之意，然而并没有提到要钱，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至于说到唐·拉菲尔这个人，我肯定哈雷和琼在两方面都作了夸大：起先是把他想得太坏，后来又太好，事实则介于二者之间。他既非魔鬼也非圣人，不会像他们最初所怕的那样进行敲诈勒索；然而也不会那么道貌岸然，谦逊如圣者，致使他们感动流泪。很可能是唐·拉菲尔发现来找他的这两个人疯疯颠颠不太正常，认为愤怒是无用的，与人为善则比较谨慎也较为明智，无论如何要尽快说些什么能摆脱这种处境。尽管信确实不在他那里，可那是美国人，他这个新上任的市长，要不惜一切不让他们在将来任何时候对他的廉正有丝毫的怀疑，也不向任何人诉说他们的疑心。这个目的在他向十字架起誓之后，以他的眼泪，他的亲切，他的温良而完全达到了。

可是那些信到哪儿去了呢？那个年轻人是真的从未收到过吗？那个电话确实不是他打的吗？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像哈雷和琼那么乐观。

后来在哈雷和琼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哈雷离开了巴黎，放弃了教科文组织的职位和朵拉一起贫穷地住在玛尔古达街上？究竟他们离婚没有？我见到哈雷的那次，他和那个女人似已是生死与共了，他看来很沮丧，潦倒，像个漂泊无定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过了不久，坦白说，我开始十分焦急地等待哈雷故事的结尾。每天晚上从制片厂回到旅店，首先是问门房是否有我的邮包或信件。

可是哈雷连我的信都没有回。我又给他写了几次信，如石沉大海，这样过了两个月。九月初我回到罗马后，立即去了玛尔古达街。

走上肮脏的楼梯时，我心情有些沉重，再也不去想那次对漂亮的乔恰拉女人的追求了。我想着哈雷，他的经历。现在对于他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我已完全了解了。一切，然而不是朵拉；在读完了这一冗长而详细的叙述之后，朵拉仍然是一个谜，因为她对哈雷本人是个谜。

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是个出卖肉体的妓女还是个高尚纯朴的女人？是爱哈雷还是只为了钱才和他一起生活，仅仅根据哈雷的

自白是很难有答案的。之所以难，是因为哈雷并不爱事实上的她，不管她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女人，而只爱他想象中的，愿意要的那个她。而且顽固地把她想象为自私、邪恶、淫乱、冷酷和专横的。

这也有些与唐·拉菲尔的情形相似。哈雷不接受现实的朵拉，尽管很希望了解她。而是急切地希望能证实他第一次见到她时外表所造成荒谬的、神话色彩的瞬间印象。

事实上，朵拉是一个谦逊、平凡、善良的女人，并不符合哈雷对她神话般的想象，然而这事实与想象的不一致，不但不破坏他心中的神话，反而更肯定它。哈雷看不到，也不想看到他的女神实际上是个什么人，他将她不断给予他的失望变为充满神秘和魅力的谜，这些谜的增长与女神给予他的失望是同步的。譬如有时发现她并不像他想的那样专横和邪恶。别人都会推论朵拉是温顺和善良的；他却不然，认为她是专横和邪恶的，而据他看她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不想表现而已，而那个“不想”的原因是不解释的。只要她愿意，她的魅力就更大了，于是这神力是无限的，用之不竭的；因为不是来自她的现实本质，也不是来自他的想象，而是来自他不断感受的失望。

然而，如果哈雷发现朵拉确确实实是邪恶和愚蠢之神，那么，瞬间之内便不会再崇拜她了。作为一个聪明善良的人，哈雷会在极短时间内，对真正的愚蠢和邪恶产生强烈的反感和厌恶。不，他之所以能继续和朵拉在一起，只是因为朵拉完全不同于他所想象的。

这是我的解释，然而这只是读了哈雷的稿子所推论出来的。我自然希望能在事实中得到证实。

我走过画家们的工作室，穿过铺着旧瓷砖地的小院子，按了他们的门铃。

等了很久没有回音，我又按，仍是徒劳。想必他们是出去了，我便离去。但下午再来，还是闭门无人。

我想给他们一个意外，执拗地不愿打电话。可是到了晚上，我改

变主意了：11 点，12 点，1 点，一连打了几次，最后一次是第二天清早。电话铃响，可始终没有人接。

我又回到了玛尔古达街，再次到他们的寓所，试叫了门之后便下来和门房聊天。哈雷走了十多天了，看门人不知道他去哪儿，没有对她说什么，也没有留下地址。我问到“太太”，看门人什么也不知道，她也是同一天离去的。那么说是一起走的了？看门人无可奉告。有一点可以肯定：直到最后一刻朵拉和哈雷是在一起的，是带着行李在门口儿一起坐上出租车走的。乘出租车？不是吉普车吗？没有吉普车了，卖掉有一个多月了。

我想起了，哈雷曾在外国出版协会那里工作过，但人们对我说已有很久没见他了，听说去了美国。

于是我想起了鲍罗索，曾借给哈雷五十万里拉的卧铺车厢列车员，他曾给我留下罗马的地址，但鲍罗索出差去了，过几天才能回来。

当我终于见到他时，他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哈雷是搬回美国去了。临行前曾去找他，把钱还了他，他说把吉普车卖了。他回美国去，重新回大学教书，可是也没给他留地址。我问他哈雷是否单身一个人走的，没有提到朵拉，因为我想他不一定知道朵拉的事。

“一个人？是啊，为什么这么问？不是一个人还能有谁？他在这里是单身，我觉得……”

“我想，他回美国是到妻子那里去了。”我说。

鲍罗索惊讶地望了我一眼：

“到妻子那儿去？他又结婚了吗？我没听说。”

“不是啊，到他妻子那儿，还是那个妻子……”

“是琼夫人吗？”于是鲍罗索说，“您不知道她死了吗？两年前她死于飞机失事。记得六月底那次从巴黎到纽约的飞机吗？是从阿佐雷坠下的那架，拳击冠军也在上面……”

原来琼是死了，于是哈雷的故事现在有了另一种意义。我回到家

里，重读了手稿的某些章节，特别是提到琼的那些：最后一次从拿波里到巴黎的旅行，带有圣母像坠子的项链。

我和琼不熟，以前只见过她两、三次。听到她的死讯，没有更多的感受和怜悯，就像听到一些不相识的人——受苦、相爱、生活着的人们——突然不幸痛苦地死去而得到了解脱那样。然而哈雷笔下她那种冲动和备受折磨的性格，苗条、羸弱的身影却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面前。我想象着她临死前那短暂的可怕的时刻。我自问道，那时她想着谁？想孩子们，想哈雷，还是想阿尔多；或是在这对生命的意义极端怀疑的痛苦之中想着他们大家？死亡是什么？尽管迟早有一天总必须经历死亡——或是从容地、事先知道有所准备地、或是在瞬间的折磨中经受一切痛苦中最至高无上的和无法避免的痛苦——然而人们活着时，总甘愿不断地去受折磨，就像永远不会死的，这是为什么呢？

我很长时间没有再得到哈雷的消息。

直到第二年的二月初才终于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上说：

亲爱的马里奥：

“经过这么长久的沉默之后，我该做的第一件事是请求你的原谅。最近所发生的事使我的生活发生很大变化，并迫使我做我不太愿意做的和未曾预见的事，但这一切并不足以为我的懒惰辩解。我承认本来是可以也应该给你写个短简或至少发份电报到巴黎，告诉你我和朵拉结婚，以及我和她一起回美国的事。

“但由于你不知道琼的死讯，而以前在我所写的，给你寄去巴黎的故事中，我一直没有勇气提到，于是这使我十分痛苦的，比任何一切都沉重的自白就一天天在犹豫中给拖延了下来。

“一星期前，为了请鲍罗索给朵拉办件小事，我给他写了几行字。现在我刚收到他的回信，他说到曾见过你，偶然把不幸的事告诉了你。

事情发生在1948年7月28日，在阿佐雷岛附近。

从那一天起，两年多来，我总觉得琼的死是我的过错。直到现在朵拉取代了她的位置，而且以我从未能预见的方式接受了我的孩子，才使我想到我的自责其实是不公正的，从而得到一些宁静——不是平静，平静我从未曾有过。现在我又在经受着一种新的痛苦——无聊。这是以前从未经受过的，至少从未达到过现在这种程度。

我厌恶美国，只求一件事，回到意大利去。以什么样的借口都可以。朵拉当然愿留在这里，这对我实在无关紧要。我非常愿意将她和孩子留在这里，这会使她很高兴的。我一个人去，我需要，你知道吗？“需要”回到罗马去。你不能找到一个借口吗？至少短期的二三个月。你相信我，只要很少的钱就够了，三万里拉一星期就够了。重要的不是钱，而是走的“理由”：电影方面的工作，撰写脚本，翻译，你愿怎么说都行，但需要一个真正的符合事实的理由，尽管事实是可以虚构的。

“我随时可以向大学请假，告诉他们这与我的研究工作有关。尽管有上次在教科文出走的那件事，奥夫纳仍然保护我，因此我不怕丢掉工作。同时，琼的父母——我记得似曾对你说过——是有家业的，每个月给孩子们和朵拉一笔钱，足够维持他们优越的生活。现在琼的父母已相当熟悉朵拉了，并经常去看望她，有时逗留很久，出人意外地对她夸奖不已并无限信任。在我潦倒的生活中，至少这一点还是不错的。你能够理解，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也是绝对没有指望过的。

所以，亲爱的马里奥，你要施展你的神通设法让我去。从我这方面，要把中断的故事再写下去，尽快结束之后寄给你。我复写一份，这样我就比较放心了。你在巴黎收到我第一部份稿件后给我写过二三封热情的信，你说适当删改后可以拍成电影，你还说有可能找到脚本的买主，因为有两个可由美国大演员主演的角色。希望你现在仍是这么想。你还补充说急于看到结尾部分，同时结尾最能给予想象力贫乏

的制片人以深刻的印象。

“我不知道这个将寄给你的结尾是否适合于电影。我担心它不理想，但是像写第一部分一样，我不能不忠于事实。

“请你尽速回信，我需要你的鼓励。

热情拥抱你！

你的老朋友

哈雷

“P.S. 现在你可以完全放心地给我写信了。朵拉自来美国后非常幸福，没有任何地方使我讨厌，整天干活，照顾孩子，做家务，为厨房的设施高兴得不知所措，学会了驾车，在上课学习英语，再也不拆我的信看了。可是这美国有多无聊。

又及

我收到这信的同一天，鲍罗索来告诉我哈雷的地址，我感谢他的好意，并告诉他哈雷也给我来了信。鲍罗索告诉我说明天将通过在TWA 做职员的好朋友给哈雷捎个包裹到美国去，带去他所要求的东西。如果我想写信或捎点什么就不要客气。我有了个主意，想托鲍带个米兰大蛋糕去，不过不知是否会太麻烦？

于是我给朵拉和哈雷的孩子们捎去了一个米兰蛋糕。而哈雷要求为朵拉带的小包裹里又是些什么呢？

当我把蛋糕送到了鲍罗索家时，我的好奇心立刻得到了满足。

原来就是那些朵拉常用来撒在著名甜食斯卡契拉上各种颜色的糖粉珠，这可能在全美洲也是难以找得到的。

二十一

大约两个月之后我收到了哈雷的续稿。译文如下：

我在应该告诉你琼的死讯的时候中断了我的故事。琼的死标志着一个停顿，就像我生活中一段极大的空白，因此，写到这里很自然便没有勇气再继续了。这件事，这个罪过，在我的记忆中还太清晰。我说这是罪过，因为去年当我在罗马，在玛尔古达街，写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把琼的死看作是我一手造成的。

确实是，如果我不是那么愚蠢地、反常地、错误地跟踪琼的疑虑和悔恨，我就不会因那个电话而惊慌失措，就不会和她一起去卡不里找唐·拉菲尔。我就会使她冷静，说服她从强比诺机场乘坐预定的飞机去纽约，但我心里有鬼，我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过错和琼的过错混在一起。如我一直相信勒索来自朵拉方面，口袋里准备了成扎一万里拉的钞票，几乎是向她跪着迎上去，后来又激动地去卡不里，希望看到唐·拉菲尔是同样的无赖。我还把带圣母坠子的项链给了琼……

我是从晚报上得到消息的，当时我从办公室出来，报童们在街上大声喊叫着飞机坠落的消息。（我想把我从那一刻开始到确证她的死讯为止每分钟、每小时的感受如实记载下来）在一开始听到那些叫喊声的刹那间，我还没有想到什么，为什么偏偏就是琼乘坐的那架飞机呢？但另一个念头不由自主地一闪而过，希望是它，希望琼死，以摆脱她和朵拉结婚。后来我买了报纸，跑到美联社，给法国航空公司，给我们领事馆打电话，得到了令人绝望的消息。我不相信事实，三天三夜不吃不睡，只是抽烟和喝酒，直至消息完全证实。我给在费城的岳父

母打了电报，幸而唐纳黛拉还只有几个月，连杜卓也才两岁。

可是我为什么要把那些日子的事情如此详尽地记录下来？即使我写上一百页，也不能使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再发生。琼离开了人世，琼死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了。从那一刻起，死亡不再令我害怕。或者说，是的，它总令我害怕，但当我想到死，我就想到琼，想到她已先走了一步，已经知道那一刻是怎么样的了，于是我想，我亦应该有同样的感受，不管有没有另一个世界，不管我和琼能否再相见和相认，死亡从那时起，对我已不再陌生。现在我比以前更愿意谈到和想到死亡，因为琼已死了。有时我觉得我们不再相见是不可能的。当我喝下半瓶威士忌后，琼就在这儿，在我身旁等我，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或几年，或几天，或许仅是几小时几分钟的事。没关系，她在那儿等着我，我就很高兴。

很多次我梦见琼死了，她在地狱里，（如果我相信梦见的一切，但没有勇气说了）。似乎是由于恶魔画了符和神明不可测知的允诺，她得以回到世上呆几天，死了的，在地狱里的琼，现在在这里，可以见到她的躯体、脸庞，她的眼神，她的动作，甚至她的衣服。她在我们这里，而我知道她是从地狱来的，并仍然要回到那里去。她要回到地狱去，她永远属于地狱。我绝望地拥抱她，搂着她。这就发生在街上，在圣·杰门林荫道和契西沃斯大街的拐角处；一间我们有时晚上去用餐的意大利餐馆附近，和我下榻的旅店在同一个区内。我把车停在契西沃斯大街拐角的林荫道上。是一个黑黑的夜晚，旧式的铺子都已关门，上了门板插上了门闩。就在这里，我下车后，在人行道附近遇见了琼，我把她抱在怀里端详着她。她双颊有一种奇怪的、令人害怕的红晕。活着的时候，她的脸总是比较苍白，然而是正常的，是一种干瘦的、神经质的脸色。现在却脸颊泛红，像是烤了火似的。我知道这红色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可怜的琼是从哪里来的。她发亮的眼睛看着我，默默无言；但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发

出可怕的光。目光里几乎再也没有对我的爱，也没有对任何其他人的爱，因为那是一双见过那个地方的眼睛，而且还要回去再看它，要永远看着它。即使像现在这样紧挨在我身旁，挽着我的手，她还是像害着一种可怕的病，一种无法治愈的病，一种罪恶症；地狱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这种罪恶感。是她要去地狱的，即使是现在，仍然要去。虽然烤红了脸，眼睛露出绝望的光芒，清楚地知道已被判为永恒的不幸，因而处于自己愿望的可怕的扭曲之中。她愿意去，她不能不愿意。她对我再也没有爱；我对她几乎也再没有怜悯。我因不再怜悯而痛苦，像殉难而受苦；我因不感到怜悯而怜悯。

"琼，"我和她一起走向意大利餐馆时说，"真的什么办法也没有？就这样了？真是永远就这样了？"

她望着我，没有作答……唉，她哭红了的眼睛充满着恐惧、憎恨和绝望！我心里痛苦得抽搐。那么说，上帝即使做坏事也是对的？使他的造物永远受折磨也是对的？我们徒然指望他的仁慈了？看着绝望地注视着我的琼，我再也不能向这上帝祈祷了。我唯一能做的便是爱琼，即使要反对一切，即使要反对上帝，我也要爱她。因为是我的琼，是我的罪友。我知道她有多么善良；我知道她是多么温柔；我知道在她的心灵深处有的是纯洁和仁爱。上帝怎么不以她的本人，而是以她一时所做，或所想，来裁决她呢？现在又为什么让她出现在人世间，出现在契西沃斯街的拐角上？为什么？琼还有希望吗？

于是我问琼，紧握着她的手臂问道：

"琼，我的爱，还有希望吗？"

可是琼只是用一种可怕的眼光看着我，没有作答。她的眼光阴沉、忧郁，就像那次在罗马大旅店听电话时一样斜视着，只是闪烁着更可怕的光。有希望吗？究竟有没有？

更糟的是有时在梦里我疑心是在做梦。因为我想这是不可能的，琼已死了，飞机已坠毁在阿佐雷岛附近的大西洋里，因此琼不可能出

现在这里，在契西沃斯拐角的林荫道上。我所见到的、听到的和碰到的都不是真的。我是在梦境中。可是就在这时一辆汽车在林荫道上驶过；或有个人在轻快地吹着口哨。于是我在梦里发现自己不是在做梦：一切都是真的，一切都毋容置疑地真实。琼的身体在这里，而她要回地狱去，她应该回去。可她为什么要来呢？是为了使我知道吗？她的罪过究竟是什么？是使她失魂落魄的那些事吗？

在梦中我没有对可怜的琼讲，但心里想她的罪孽也许就是和阿尔多的种种：首先是和他的私通；后来是思想上的眷恋，这是思想上的罪孽；最后则是没有遵守誓言的渎圣罪和通奸。我醒来了，猛地从床上坐起，冷汗涔涔，心跳突突；双眼凝视着暗处，惊惶地打开了灯。我是一个人在旅馆的房间里，这是个很熟悉的小旅店，我和老板、服务人员和许多旅客都很稔熟；可是晚上从这些可怕的梦中惊醒过来时，我感到孤独，不能再这样下去，应该有一个夜间的伴侣。在床上，她那裸露的身躯将会驱走我房里的魔鬼，我想到了朵拉，并不是需要她，而只是因为她是琼在世时我最熟悉的女人。

我醒来为这只是一个梦而轻松地嘘了口气。眼睛里含着泪水，忍住了没有流出来，但想到在梦中见到的琼的样子，不禁失声哭了出来，抽泣不已。我为琼如此短暂的一生而痛惜，而怜悯。可是上帝怎么能惩罚她呢？不，不，这不可能。而且她真正的错误并不在此，而是别的。现在我是醒着在想，在回忆；她的错，也就是她自己在向我坦述时最后所自责的，是没有勇敢地错到底。错在想得太坏，不相信好的；错在没有嫁给阿尔多；错在没能制止自己想发誓和那天夜里没有和阿尔多去上卡不里。好吧，即使这些都是她的错，为什么不能宽恕她？为什么不能怜悯她？耶稣原谅了曾在受苦之前爱过和享乐过的玛达莲娜；为什么不能原谅受苦之前害怕去爱和害怕去享受的琼？她的害怕，她的保留，她的抑制，她面对爱的退缩，这一切难道不是爱的一种表现吗？

于是我下床，第一次在遥远的童年之后开始祈祷。祈祷上帝怜悯琼，怜悯我和我的孩子，也怜悯朵拉和所有的人。

我觉得上帝不可能不赐怜悯予琼，但当我重新把灯熄灭之后，似乎觉得在我床边，在黑暗之中有一个看不见的、邪恶的魔鬼。我怕见到他红红的眼睛（也许我在梦中见到的琼不是真的琼，而是魔鬼的化身），然而似乎已听到他发出了吱嘎声，几乎能感到他呼吸时呵在我脸上的气，和听到他低声的嗤笑。于是我又开始祷告：上帝，请你宽恕我们，使我们免除苦难，阿门。

从那以后过了好几个月，我才有对女人的需要……你了解我，听了我这些话可能不相信，会觉得我虚伪。我承认我的表达有些暧昧、保留，而你又只能从字面上理解我。好吧，我就坦白说吧。有好几个月我没有对女人的需要，这并不是说我未曾有过女人。我希望能有这种需要，我想折磨自己，使自己疲劳，然而没有完全达到这一目的，我又恢复了以前的旧习惯，夜里出去，踱步在妓女云集的街上。很多次我仅是给她们一些钱，要她们在肮脏的酒吧间里，在一杯阿玛尼亚克烧酒前，陪我坐上半个小时左右，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要求。

我没有做爱的需要，只要有人相伴。唯一可以忍受的伴侣就是妓女。为什么？谁知道？任何虚伪，任何俗套，任何上层的一切都使我厌恶，无法忍受。我要真实，而这只能在这些女孩子毫不做作的谦卑之中找到，特别是那些既不漂亮又不年轻的。她们把我当作傻子，有的怀疑我没有性能力，有的以为我有病。我并不想纠正她们的想法，有什么必要？听任她们去想，怎么想我都行。我只要她们每晚给我做伴，听我的闲谈、自白，回答我的问题，谈谈她们的生活，她们的趣味，她们的过去和将来。我发现她们中间各人的性格、观点迥然不同：有悲观的、绝望的和怀疑论者；有充满反抗精神的和颠覆分子；有天真、乐观、充满信任感的；也有随波逐流者和保守分子。不过人人都幻想着希望发财，虽然对这一理想的实现也感到失望。在这个问题上，我

也不和她们争辩；我怎么敢，怎么有勇气向她们解释，说钱无论是用什么方法得到，总是以失去什么重要的东西作为代价的，然而决不是失去痛苦。如果我这样对她们说，就会令她们无缘无故地生气，因为她们不可能理解。

钱！她们为之而牺牲了自己的生活。现在，随着渐渐地远离琼的死，我又开始需要它。然而只是为了失去它而需要，甚至是为了被偷去而需要它。

琼死后的几个月，我陷于痛苦的悔恨之中。夜间惊恐，白天对一切都异常冷漠。使我从对生活的厌倦之中重新振作起来的第一件事(这件事也与琼的死有关)是想到了那些从卡不里岛寄出的信。那些信去哪里了？是谁拿了这些信？我又开始想着这一切。琼在电话里没听清楚是不太可能的。我当时尽力把它设想为误解，首先是为宽慰琼，这样的解释没有根据，冷静下来想想，不太可能。

无论是谁拿着信(是阿尔多还是别的什么人)仍然可以进行勒索。想到这里，就像触到了皮肤上麻醉之后唯一的痛点。我惊跳了一下，有一瞬间，像心脏突然缺氧那样有窒息感，一阵抽搐，感到有一种企求愉快的愿望，这种愿望本身比得到愉快更令人神往。我已很久没有感受过，以为永远不会再有了。琼的六封信！我对自己说，设法找到这些信是我的责任。这不仅是为了使我和我的孩子免于陷入可能发生的丑闻；也是为了琼的形象不致受到糟蹋。但与责任心混杂在一起的还有我内心强烈的好奇心，如果隐瞒这一点我将是不诚实的。而且不单纯是好奇心，其中还夹杂着对琼的怜悯、羡慕和嫉妒心；也许还想探明可怜的琼究竟荒唐到什么程度；同时还有看这些信时可能暗中带给我的愉快，似乎我愿意使她的过错发展、完善并进一步继续下去。

当然这些都是我两年之后今天的分析，当时只是那些想法的混合。每次当我想到那些信的时候(而渐渐地我经常会想起它们)感到

这些混杂在一起的感受，在我心中愈来愈活跃，直至有一天，这一想法慢慢成熟而变为一种行动，这是一个自然而又突然的结果，于是我去了罗马。

这是在复活节前的几天。我突然去找朵拉。是中午12点钟光景，她丰满的腰际系着一条围裙，头上戴着条头巾，两只手在和面粉。脸上没有施脂粉，嘴唇没有涂口红，眼睛也不像平时画着深褐色的眼影。有一种惊人的古朴的美，仿佛我从未见过。她不能伸手给我，便抬了抬手臂，将肘子伸给我握，我照她的意思做了。尽管我原来没有任何其它念头，但一接触到她丰满的身躯，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已忘却了的种种欢乐又突然回到了脑海中，使我忘记了这次来罗马找她的目的。

朵拉在和面粉做点心。这是一种甜食，我以前多次尝过，她一年中总要做几次。在复活节做这种甜食，在她家乡是一种规矩。她不能停下手中的活，我就跟她呆在厨房里，在一张草垫椅子上坐下。这是比较意外的场面。朵拉在和着面粉，她的动作优美而诱人，是一种古典的、有力度的美，带着节日欢乐的气氛。我尽量不去注意她，开始说到我的来意，当然要提到阿尔多和信。我要从头说起，要把总是瞒着她的已结了婚的事说出来；要告诉她，我的妻子就是她认识的那个琼。

我说着，而朵拉在和着面粉，她几乎是背对着我。我觉得很奇怪，她对我的话并不感到意外，干着手里的活儿，好像没有听到我说，或是好像我说的事没有什么新鲜。事情是那么奇怪，我不得不停了下来。

“你怎么啦？”我对她说，“没听懂我的话？”

“懂了，往下说吧。”她毫不在乎地对我说，一边仍和着面粉。我觉得她在拼命使劲地加快动作。“说下去，到底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就真的按原来准备的开场白说了。在把事情说出来之前，

我先对她说需要她帮个忙，说这次我来另有其他目的，这她等一下就会明白的；但我会同样感谢她，也会向她证明这点的。

“说正题吧。”她眼睛都不抬，一边和面粉一边说，口气里不仅是不在乎而且还有些不满。我想她是想表示她生气了，或者真是生气了；因为我把结过婚有了孩子的事一直瞒着她，于是我站起来向她走去，双手搂住她的腰，喃喃地说：

“怎么啦，朵拉？这些事我一直瞒着你，你生气了？”

她略为转过身子，稍稍放慢了动作，对我柔声地，几乎像慈母似地，笑了笑说：

“你想到哪儿去了？别傻了！你并没有瞒我，因为我早就知道。你结婚前，我就知道你是她的未婚夫。我什么都知道，你说不说又有什么关系？我认识她，可怜见的，是个多么好的人！”

“你也知道那不幸的事？”

她停下手，把脸转过来，正视着我，严肃而平静地说：

“当然，信息报不是把遇难者的姓名都登出来了吗？打开报纸看到你的姓我还以为是你，后来见到下面的文章写着，是你头一天从意大利把她送到巴黎的，她本应从罗马走，凑巧才搭了那班机，是吗？”

“是的，是这样。”我说。

“可怜见的，三、四天前你们在罗马的时候，她还来找过我。是那么可爱，那么斯文，那么漂亮。你知道吗，哈雷，我有多难过，为她，也为你难过。你信吗？那天晚上我哭了，也睡不着，你问房东太太……”

为了告诉我房东在哪里，她抬头指了指那间房。

我看着朵拉，惊讶的程度不亚于那次听完琼的自白，只是这次的惊讶中没有痛苦，只有赞美。那么说，朵拉是一直知道的，但一直都沉默着，装着相信我说的一切，我却总因怕她勒索而隐瞒我的婚姻。无

疑她也早已猜到这长久以来愚蠢地掩饰着的原因，但却不生气而仍依从我，表现了她的气度和美德。

这一切太不寻常，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实在难以令人置信。我望着朵拉，似乎见到了一个新人，一个精神高尚、体态优美的她。即使她的躯体，现在也似乎与过去不同了；不再有迷人的地方，至少直至瞬间之前所具有的那种罪恶的情欲与性感的魅力已不复存在。

我自问道，这种富有眼力的良家妇女和慈母式的善良本性是我一时的印象还是她真实的品质，对这些，过去在她表面的职业习惯下我也曾有所觉察。

她又重新使劲地揉面。我则默默地看着她，感到内心非常平静，同时也很伤感。再也没有任何欲念，思想又回到了信上。现在这真正是唯一能引起我激情的事了。

我非常严肃地向朵拉问起阿尔多，信是否可能在他那里？如果朵拉认为是，就请她告诉我。只要能拿回那些信，我不惜任何代价，即使要再多的钱也给他。

朵拉毫不犹豫，十分肯定地回答我说，信决不会在阿尔多那里，他从来就没有收到过那些信。她对我解释了为什么没有收到；而琼问她的那次她没能解释，因为那时阿尔多在米兰，朵拉没有见到他。这是后来才听他说的。

阿尔多给琼写过一封信寄到卡不里，信中让琼把回信寄到埃赛索大旅店。给琼这个地址，一方面是因羞于给她自己的住址——一家最低级的小旅馆；另一方面是为了向琼显示，使她相信他现在已是电影界的名演员，可以出入威内托大街这些豪华的地方了。其实他只是一个群众演员，或叫做跑龙套的角色；有时偶而也在杂志上当个模特；或因为长得不错而与某个女演员、某个女歌星有些结交。现在，阿尔多见到自己俘虏了琼，就想利用这个机会让她离婚，然后嫁给自己。谁知道呢，也许真有可能，但这些只是说说而已，甚

至连说说都不是，仅停留在他的幻想中。因为阿尔多虽然自以为是个城府很深，玩世不恭，心有算计的人，指望有朝一日会碰到好机会而发迹；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好小伙子，生性胆怯，还有点懒惰。怎么也不是那种伺机而待，一拼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所以，虽然给了琼埃赛索大旅店的地址，后来却并没有勇气走进旅店的大堂，给门房一点小费，拿走那几封信。

"你看吧，要是你去找埃赛索大旅店的门房，说不定还能找回那些信呢。"朵拉最后说。

过了两年之久？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还是立即回到了大旅店，请古利埃莫去设法寻找信的下落，答应给他一笔可观的酬金。

夜幕降临之前，信已到了我手中，一共六封。我飞快驶向机场，回到了巴黎。甚至忘了打电话给朵拉，向她表示感谢。

二十二

我从窗口眺望着这座我们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古老的城市，它在夕阳的余辉中渐渐暗淡、远去。目光移到了手中的六封信上，没有任何私自拆封的痕迹，全部完好无缺，仅在角上有些发黄。这么说，电话里的声音并没有提到信，是琼由于惊慌不安而自己误解了。

我按邮戳上的日期把信顺序排好。一封接着一封打开来看。唉，再把它们原原本本抄录在下面：

(一)

阿尔多，我的爱：

谢谢。我首先想对你说的，应该对你说的，是谢谢，谢谢！

你的信放在我的面前，自我收到这封信的那一刻起——是自从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以来最幸福、最激动、最有生气的一刻——它就是我生命的一切。我不停地读着，看着，摸着，吻着它。信上这些字都是你在思念我的时候，用你的手写下的。每个字的形状我都记住了，那些弯弯曲曲的线条都已深深印在我脑海之中。

思念我！你思念过我！思念过这个丝毫不值得你思念的人。因为你是那么高大，我却对你犯下了如此严重的罪愆。

是的，我深深感到我的罪过，这就是我对你的全部感情。长久以来我未能做我应做的事，从而加重了我的罪孽。我应该跪倒在你面前的尘埃中，哭泣着向你祈求宽恕。

我现在，现在就跪。你看，我赤身扑倒在地，要像在上卡不里丹麦太太的公寓里等待你时那样，将胸部贴在冰凉的地砖上。我的面前放着一叠信纸，我应该这样在痛苦和谦卑的姿势中给你写信。

我的爱，自1944年圣诞前夕以来，我未能有幸再见到你。你曾约我第二天再见，还记得吗?是圣诞日中午在圣·玛丽娅大教堂旁边的比加罗齐咖啡馆相见。我们本应一起用午餐，一起度过整整的一天，但我竟然没有赴约，高傲无礼地将你的一片深情拒之于千里之外。我侮辱了你，深深地伤害了你。现在，我写信的时候，手在颤抖。我不但没有去赴约——似乎这样的侮辱还不够——甚至没有打个电话通知你，向你道歉，向你告别。我应该向你……不，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我的狂妄、高傲，为我的错误辩解。但我应该告诉你，我糊涂到什么程度；告诉你使我荒唐地作出不再见你的决定的原因。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圣诞前夕的下午，你以你的善良、英俊和伟大而使我无比幸福，充满欢乐，并到达了一种天堂的境界，以至晚上在做弥撒时我清楚地在心里听到了一个声音。它对我说，接受你的求婚和你终身在一起，生死与共成为你忠实的妻子和生命的伴侣。这是你

给予我这个可怜的人儿的至高无上的荣幸，可是我没有勇气，只能忍心拒绝了你。这就是我不辞而别的原因。因为在那一刻我绝不可能有别的选择：或是结婚，或是断绝一切。你能理解吗？

现在一切都完了。你从朵萝苔娅那里可能已经知道我嫁给了一个美国人。一个非常能干、非常可爱的男人，然而我不爱他。不，也许我爱他，但这是一种对父、兄和儿子的爱，是这三种混为一体的爱，而不是对丈夫、对情人的爱。我从未像爱一个丈夫、爱一个情人那样爱过他，那怕是一瞬间。我已有了一个孩子。孩子和你是我在这个世上最爱的人。

希望能很快在卡不里见到你。我丈夫明天出发，要五月底、六月初才回来，所以我们将有整整两个月的幸福。你看，我是多么高傲，多么愚蠢，多么自私！我说幸福，想到的只是自己。你呢？你会幸福吗？你还喜欢我吗？你的信写得非常谦和，非常温存，但我不知道你是否还像以前那样爱我。

不过，我要由衷地向你吐露。即使你不再爱我了，只要你来卡不里愿重新用双臂将我抱住，我将仍然感到幸福。我是多么怀念你有力的臂膀和宽厚的双肩！

我曾是那么狂妄地拒绝了你的要求，对你希望确定终身的约会临阵脱逃，而嫁给了一个虽然深深地敬重却并不爱的男人。我怎么还能要求你爱我呢？

我什么也不要求，阿尔多，我的阿尔多，原谅我把你叫做我的阿尔多。我没有任何要求，只是恳求你来，快来重新占有你最谦卑的奴仆。

琼

1947.4.6

于卡不里

P.S. 如果因故不能在接信后立刻赶来，就立即写信给我；写两行字，就写两行字，告诉我你要推迟行程，别让我久久处在痛苦的等待中。崇拜你，吻你的手。那只左手，记得吗？是我主人的手。我吻它，吻它，吻它。

你的琼

（二）

我生命的主人：

已经三天了，我等着你的信，毫无音讯。我觉得我要疯了，我需要你，你知道吗？至少我要看到你的笔迹。

你的笔迹犹如你本人，因为是你的手写的（是右手，不是那只主人的手，是它的伙伴）。

今天早晨五点钟，孩子的哭声把我惊醒了。有保姆照看孩子，我不用操心。醒后便立即想到你，再也无法入睡。

唯一的安慰，唯一的生活，是给你写信。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二封信。可是你知道我曾给你写过多少信！这些信从未寄出过。一年多来我不断给你写信，在美国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都写，后来都烧了。

我一直等到邮件来，也就是一直等到那个转信的人收到邮件后可能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重复一下他的名字，怕你万一丢失了：卡不里唐·拉菲尔·克里斯古奥罗上士收）。可是没有等着。于是我又给你写信，我的爱。

阿尔多，我的爱，为什么你不给我写信？为什么？我究竟对你做了什么？

我知道我不值得你给我写信，什么也不值得。可是只要一行字，一个字！你不能对我那么狠心！是的，我知道，我再重复一次，我在你面前是有错的，而且也在自己面前有错，错在忘了你曾给予我的真正

的欢乐，但为什么你现在要如此残酷地惩罚我？

我又想，也许你不给我写信，是因为已出发了，或是正在出发到这里来，因此就不再写信了。

每当接汽船的缆车到达时，我就去广场。早、晚两次都去，看你是否来了。

也许你今天会到？谁知道呢？

可是假如你还没有启程；假如你要推迟行程，那就给我写信。

收到你的信，我要亲吻信上的每一个字。你知道吗，我无数次地读着你的第一封信，也是唯一的一封信。人们说，从笔迹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我看出了你的性格，它表现在你的字体中是如此地完美。我喜欢你写的元音：o和a是那么浑圆、可爱。每一个o和a，我觉得都是你用身体裹绕而成的，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你的签名；名字里有a，有o，还有那个e我也喜欢。你的签名有如其人：生机勃勃，热忱，持重，深情，俊美。阿尔多，阿尔多！

我吻你的签名，吻你的右手，特别要吻你的左手。

我是你的，时刻都在等待着你。

琼

（三）

我的主人！

从我第一次给你回信至今已过去十一天了。你的信写得亲切而热情，我总是把它带在身边，睡觉时放在枕下。为了使我鼓起勇气，我每时每刻都读着它。过了十一天，还没有收到你的信，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三封信了。你为我的心打开了希望之门，可又为什么现在使我如此痛苦？在某种意义上我知道这是对的；我应该等待，苦苦地等待，这样多少能偿清我对你欠下的情，欠下的债，因为这样才能更清楚、更确实地衡量我一生中铸成的大错。如果你这样做是为了这个，你的沉

默是为了这个目的，如果你迟迟不来是为了惩罚我，以使我意识到你现实的存在和你的重要，那我将感激你，我将永远深深地祝福你。

但是，我跪着在哭泣中哀求你，求你让我结束这种痛苦；求你让我重睹你英俊的面容，多情的双眼，你的嘴唇和那只神奇的手。纵使我不配，我有罪过，但在等待中已经自新，即使未能涤罪而得到赦免。

你的那只手（左手，主人的手）总是呈现在我面前。你来的时候我要表现出对它无限的崇敬，它是你对我权力的象征。我要久久地吻着它，让你这样将它放在我脸上。它是如此硕大，竟可盖住我整个脸庞；它是那么有力，可以毫不费力地置我于死地；它又是那么温柔，仅以它的接触便可使我无限幸福。我要你躺在床上，将你我置于度外，就把手放在我脸上，直至我入睡。那将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个夜晚！

很多次我自问为什么那么喜爱你那只手，没能找到答案，这是一个谜。我只是想到：狗也很喜爱它们主人的手。

我愿做你的狗。你来了之后（这也是我很久以来多次想做的一件事）要把皮带套在我颈上，拉着我在房里踱步，而我则在地上爬行。可笑吗？当然，非常可笑，我知道。这对你是一种消遣，对我则是长期以来梦寐以求，向往不已而最终得以实现的欢乐。

在想到你的手时，我多次想倾我之所有买一只，譬如说，最漂亮的钻石戒指送给你，你犹如接受我忠诚的象征一样接受我的奉献。大战刚结束我在巴黎的时候，几乎每次走过首饰店我都会这么想。有时候丈夫和我在一起，我在橱窗前停下，他以为我想给自己买些什么；也高兴地停下来，久久凝视着那些首饰。他是那么善良！对我没有丝毫怀疑，真的一点也不怀疑。我只能说他不了解我。

可是你在拿波里那个教堂里，仅仅和我交谈了五分钟便看透了我的灵魂。你还记得吗？

你记得第一次的吻吗？在圣堂二门里，你突然将我紧紧抱住，吻了我。如果我的话语，我的目光，我的举止还不能使你了解我是谁，那

么这个长吻就对你说明了一切:我的过去和我的现在。

一切都消失了,任何事情都不再重要。在我的心灵深处,在我的躯体之中,只有爱,只有对你的爱。我是你的影子,除了你,我内心一无所有,我全身充满着你,你懂吗?

可是有很多事情,你并不知道。很久以来我是为你而活着,我的生活中只有你。即使是在没有任何希望与你再次相见时,我也把我秘密的、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奉献给你。如在美国时,常常是我丈夫去了学校(那时他在大学执教),我独自一人整个下午久久地留在家里。于是我去洗澡,浴池里放着芳香油,浴毕出来全身散发出香味。我想着你,想着你在卧室等我,可是屋里空无一人。我赤裸着进来,上床,闻着自己身上的芳香,想象着是你在闻;我使尽一切力量用纤弱的双手搂着自己的腰,想象着是你在紧紧地搂抱我。渐渐地似乎疯了一般,想象着被一个不存在的你紧紧地抱着。

我给你寄上一帧照片,这是两天前在小海滩摄的。我特意穿上出发前在纽约第五大街买的泳衣去拍,想万一你不能立即来看我,就把它寄给你。不想你真的推迟了行程。你还没有来,也没有给我来信。所有的照片中就这张最像我。你看我仍是那么年轻,虽已生了孩子并无太大变化,你还喜欢我吗?

我的爱,我的宝贝;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生命,我的主宰。我吻你,就像那次在拿波里教堂的圣堂二门里那样吻你,而且更热烈,更热烈地吻你。

你的琼

4月17于卡不里

(四)

我的阿尔多:

昨晚我去了上卡不里。

这并不是一次伤感、念旧之行，而是为了看看丹麦太太的公寓是否还在，是否可以借住在那里。这次你就不用偷偷摸摸来，也不用顺着紫藤爬上去了。

是的，公寓还在。一切都和以前一样。丹麦太太认出了我，很殷勤地接待我。你来的时候可以下榻在她这里，就租我上次住的那间房间，现在空着。这次该要我来找你了。

要知道，在我家里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来一、二次，看看孩子，可是不能常来，我们在那儿也不能呆在一起。

丹麦太太公寓里，我那间房间与过去完全一样。床上仍是那条毯子；印花布的窗帘依然如旧地挂着；两扇窗户之间的角落里，还是那个带梳妆台的镜子。百叶窗虚掩着，一缕金色的阳光洒在绿釉砖的地板上；窗外有母鸡咯咯的叫声，一片宁静的气氛。想到你将会来到，我心头涌起一阵欢乐。我想起了那次你整整一天藏在这里，多让人害怕！而那害怕又是多么甜蜜！你困极了，多少个夜晚你不曾阖眼了？所以那天当你终于可以有一天假期时（上校有事离开卡不里），就再也不想像前几天那样在天亮前起身离去了。你睡着，几乎整整睡了一天。我踮着脚尖在房里走来走去，眼睛却总也没有离开过你。你赤身睡在我床上，只穿一条短裤。我的床显得多么小，因为你是那么魁梧！你一只手曲臂放在枕下；而另一只，那只“主人的手”则悬在另一边，它也在睡。我记得我跪在床前用嘴唇轻轻碰着它，怕惊醒你。后来你醒了，觉得饿，你记得你饿成什么样吗？我把门锁上，下去到厨房拿面包和香肠。

我又回到了卡不里，身心更加充满着你——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我尽量回忆每一次我们在一起的时刻。最初是在上卡不里，后来在罗马；要准确回忆每一次的一切是不可能的，只记得那些地方：上卡不里的房间；罗马特拉斯戴维列区你的那间房间；然后是在波拉底；最

后是在圣·玛丽娅大教堂附近，我圣诞前夕从法国来找你的那次……还有弗莱杰纳的松树林。九月的一天，我们坐着公共汽车去那里。我在篮子里带了些三明治和啤酒，我们在树林里一直走啊，走啊，直到海边一个完全静僻无人的地方，我们是那么幸福！

我从未对你说过，可是你知道吗，每次我们完事之后我都想些什么？我躺在你身上，将头藏在"窝"里（你记得吗，我们把你肩膀和颈脖之间叫作"窝"，我总是把头靠在那里），每次这么躺着，和你共呼吸时，我不知为什么总想到死。瞬间前曾是那么幸福，现在仍是那么幸福，可是却想到死，除了死没有其他。是的，这是真的，可是还不止如此；这是一种更为复杂、更为深沉的感觉。你所给予我的充分的爱是唯一与死的想法相联的。你的爱是确确实实的，死亡也是确确实实的，二者一样地确实，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如此确实。我从未有过任何其他东西有如你的爱和死亡那样确实。当时我躺在你身上；静静地、安宁地、在一种忧伤而无限的幸福之中；我已经死了，已经平静了，已经真正得到了我们只能得到的两样确实的东西：爱情和死亡。爱情会逝去，而死亡则是永恒的。

我的阿尔多！必须告诉你，我从未和世上任何一个男子经受过和你在一起的种种。在你之前，和学校的同学那只是胡闹，后来便是我的丈夫。哦，和丈夫在一起，我从来没有一次会想到死。

和丈夫的爱是什么？是凉水，而和你则是令人陶醉的美酒；和他是勉强的例行公事，和你则是全部身心不可控制的放纵；和他在一起冷静的思想、辛辣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存在，和你则任何思想都被忘却，我全部融于感觉、感情之中，犹如迎风的鲜花，阳光下的巨石和水中的游鱼。

和你，睡梦会不知不觉突然来到；和他，则迟迟不能进入梦乡，要焦急地祈求、等待，甚至假装。有多少次和丈夫在一起，我事后假装睡着，他总是相信我的作假，没有丝毫怀疑。他柔情绵绵地（他爱我胜于

世上的一切)用手臂搂着我,由于怕我惊醒而始终不敢将手抽出来。我发现他醒着,被压着的手臂令他酸痛难忍……然而我仍然假装睡着,因为如果让他知道我的假装和不满足,会使他精神上更加痛苦,我于心不忍。

经常是,为了不拒绝他的拥抱,我想着你。闭上眼睛,深深地叹着气,想象着是你在紧紧地拥抱我。这样不好吗?当然,这样不好,可是我又该怎么办呢?我愚蠢地躲开了你,把你当作一个错误,已受到了惩罚。事实是你才是我真正的爱,是我的道路和我的生命。

错误是我的丈夫,为此我渐渐达到了憎恨他的地步,但不是理智上憎恨他,他对我一直非常好,无可指摘;总是那么关怀,那么体贴,那么殷勤,我因他所表现的爱情不能引起我的共鸣而痛苦。

不,我从未在理智上憎恨他,而只是在感情上和肉体上,这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时在饭桌上,特别当他咬嚼芹菜、面包头或苹果时,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厌恶。要是有可能,我会杀了他,我觉得在那一刻我会毫不悔恨地这样做的。

我再对你说一次,我并没有什么事反对他。他聪明、能干、善良,在想到他和说到他的时候只有好的。在这个世界上他只爱我、我们的孩子和他的工作。

可是在他身上,我一天天愈来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错误。我恨他,因为他代表了我的错误;要是我没有嫁给他,就会和你结婚。

这是我给你写的第四封信了,我的爱。

我希望,并祈求上帝,这将是最后一封。

不知谁能给我力量,使我这样继续生活下去。

如果你由于工作或其他原因确实不能来,就坦率地告诉我,我将会找到借口去罗马。可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要如实告诉我。

你喜欢我那张照片吗?我把它寄给你做得对吗?

好,时候不早了,已经是半夜两点多钟,夜深了。手因疾书而酸

果，然而别无选择，唯有这样，我才能生活下去。

我中断片刻，出去站在阳台上。天气很闷热，这儿的热风，你是知道的。通过树丛，在一片黑压压的别墅和花园后面，我看到了上面旅馆和广场上的灯光。如果你已经来了；如果你已经来了而我却全然不知呢？今天晚班汽船到达后，缆车上仍然未见到你，但你可能会坐汽车，或步行上来。如果你已经来了，即使有什么原因使我们暂时不能相见，那一切就完全不同了。现在，没有你，这卡不里岛……就像一座监狱，一种酷刑，何时才能了？

你的琼

4月23日于卡不里

（五）

我的宝贝，我的生命：

我是个傻瓜、笨蛋；我生气得几乎要打自己的耳光！

今晚，因思念你而痛苦得无法入睡。一连好几个夜晚都是这样。

突然，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十分恼怒为什么没有早想到。

你迟迟不来也许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而你又不愿对我说，所以就连信也都不回了。

我随信附上一张拾万里拉的支票，如果真是这样，我求你去兑了现，立即就来。将来你拍了片之后还我；你在信上说今年夏天有希望找到一份好工作，那你就把这作为制片人给你的预支吧。

你千万不要因此而生气，尽量理解我现在的心情，我为了在这里见到你，什么傻事都干得出来。

现在每天夜里临睡之前，我都用一条粗大的绳索贴肉勒紧腰部，想象着这是你的手在紧紧搂着我。绳子把我勒得很痛，几乎无法呼吸。早晨解下时，腰际留下一圈红褐色的印痕，皮肤也破损了。最初几天，留下的印痕到傍晚时就能褪去，可是现在已褪不掉了。我觉得

如不这样做，我就会做其他的疯事；也许会打孩子或恶待保姆。于是我想还是这样好：只让我自己痛苦。

这几天以来，我每天上午独自步行很久到特拉加拉高点去。起初沿小径，后来踏着草地走，草短而硬，被太阳晒得发烫。阳光下炎热如夏。我走了整整一个多小时，然后在一块粗糙而多孔的岩石上躺下。那一片地上有许多这样的岩石。我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将草帽遮住眼睛，直到背上被烙得发痛，但我忍着痛楚仍是不动。肉体上的痛苦是唯一能使我摆脱对你的可怕的需要的一种方法。最初正是由于躺在岩石上而使我懂得了这一点，所以后来才想到晚上用绳子勒自己。

最后终于忍受不住，浑身疼痛地站了起来，刺眼的阳光照得我眼睛也发痛。眼前是畸形的岩石，不规则地堆放着，像是地震后所残留，构成了一幅严峻、枯槁，而又刺激性的画面；脚下是深绿近乎黑色的大海，岸边耸立着形状怪诞的悬崖；远处朦胧中是阿玛尔菲达纳海岸；灰蓝色的群山隐约可见；海岸中间呈白色的则是村庄和零星住房的模糊轮廓。我看着这一切，想那里也有生活，也有眼泪和痛苦，以及和我一样的痛苦的欲望。突然间，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痛苦凝成的；就在这看来如此明亮平静的大海深处，一定也有令人痛苦而纷乱的生活，有撕心裂肺的斗争，有死亡和不幸。

不过我仍不禁要幻想。也许就在此刻你来到了卡不里，找到了唐·拉菲尔。你依着他的指点来到了别墅，保姆告诉你我去了特拉加拉散步，于是你就来了。你现在正在向我走来，我没有听到你走在草地上的脚步声；也许是听到了，但不敢相信。你看见了我，走到我后面，将我一把抱住……

琼

5月2日于卡不里

（六）

阿尔多：

如果你再不回信，也不来，这就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了。

我倒在你的脚下，愿像你的仆人一样生活；如果你需要，我将设法让我的丈夫和儿子也成为你的仆人。

你的要求应莫过于此了。

但也许你并不要求我这样，你什么也不要求，你只是不要我。

可是我向你起誓，只要你愿意，我可以……

（以下几页是如此的荒唐，我无法抄写。跳过三页，下面是信的结尾——哈雷）

今天早晨天亮时分我仍未入睡，就像那些日子每天早晨一样。在远处海浪的拍打下，我聆听着燕子的啾啾声，叫声非常清脆、悦耳，但渐渐地，声音愈来愈大，充满宇空，直至盖过了大海的隆隆响声。

我从令人痛苦的床上起来，走到阳台上。在蓝色、寒冷的曙光中，异常安静，一切都静止了；也没有任何色彩，只有面前穿梭于空中的黑白相间的燕子。

回到床上，我闭上眼睛仰卧着，仍然听到燕子的欢叫声。于是我第一次想到了一件早已熟知的事：燕子这么叫是因为张嘴在空中穿梭以吞食飞虫；它们上下飞翔，是为了吞食和杀害，除此没有别的目的。我想象着它们那张着的喙和贪婪嗜食的灵活的小眼睛。突然，这曾使我那么喜爱的啾啾声变得令人可怕。我关上了窗，将头藏到枕下，声音虽然减弱了，但仍然还是听到那骇人的叫声，直至太阳升起才渐渐停止。我也在朦胧中睡去。

一直睡到中午，当然就没有去特拉加拉高点。

阿尔多，别了！我还将等你吗？

我一生都将等待你。

你也像燕子一样，在吞食我，杀害我，也许你并不知道。

但我仍然爱你，永远以整个身心爱你。

琼

5月6日

我回到巴黎的当天晚上就给朵萝苔娅打了电话。半夜十二点接通了，当然她不在家。

“她看电影去了，”房东对我说。

“你告诉她，我很抱歉临行前没能给她打电话。请对她说，听了她的劝告，我已找到了想找的东西。很感谢她。一切顺利，我们很快就会相见。”

看完信后的第一个反应；一种本能的、不可解释的、无法控制的反应，便是给朵拉打电话。为什么？

我自问，她是否真的去看电影了？也许是，也许不是。是和谁一起去的？什么时候回家？是独自回家吗？我想着她，无法入睡。

看信的时候，我就想着她，只想她。琼对阿尔多的感情使我想起了我对朵拉的种种。

朵拉最后一次给我的印象，在我阅看第一封信时完全变了。她不再是妓女装扮成的家庭主妇，而相反是家庭主妇装扮的妓女。我第一次和琼在那家小饭馆里遇见她的最初一瞬间在她身上所见到的一切才是她真正的本性。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如果刚才的电话……我无法入睡。到半夜三点我又打了一次电话，来接的仍然是女房东。她睡意朦胧，尽管平时对我很尊重，这次也生气了，说没有，朵拉还没有回家。

然而现在家庭主妇的形象已和另一个形象重迭、混合在一起了。那是一个邪恶，冷酷，精力充沛，为了金钱可以每天晚上和不同的男

人睡觉的女人形象。腰间系着围裙，袖口挽到坚实的臂膀上，以熟练和典雅的动作揉面粉做甜食的形象，渗入到那涂脂抹粉，戴着俗不可耐的首饰的女人形象（也许还像“解放”时期的“小姐”那样，勾引坐在威内托大街上喝咖啡的路人）中，讽刺性地使她变得贤淑，其实是使她变得更诱人而已。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小姐”，这就是我的朵拉。正如我过去所发现的，她那黄褐色略为发青的脸部肤色和野兽一般炯炯发光的眼睛，令人想起赛巴斯迪安诺·德·比奥姆波（Sebastiano del Piombo）的模特。而她不施脂粉穿着家常便装时，——就像我最近一次所见到的——那丰满而匀称的身材则令人想起皮埃罗·德·弗朗切斯加（Piero della Francesca）。

我又看了看夹在一封信里那张可怜的琼的相片。她竭力想扮成一个有魅力的女人，使我看了难受，就像是受到一种伤害。在第五大街买的比基尼游泳衣，故意叉着大腿的姿势，想做出调情的样子却成了歇斯底里的讪笑……这一切只说明她是个良家女儿，是业余剧团里一个化装得不太成功的妓女角色。我的上帝！这是真正的琼吗？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仍然未成为一个成熟的女人而得到了这样的结局；从未尽情而为，却要因此而受到惩罚？

我一直躺在床上，在法国一家大旅店那张可怕而令人痛苦的床上，又重新见到了在梦中见过的琼。她一声不响默默地凝视着我，以前那双灰色温柔的眼睛现在发出一种异样的光芒，由于绝望而几乎变成了黑色，平时苍白的脸上，泛出一种奇怪的红色。

也许我也会有这样的下场？

信中每一页、每一行我都是那么熟悉：有同样的感情，同样的欲望，同样的疯狂。

当我们同时站在首饰铺的橱窗前看首饰时，她望着那些象征钱财的金银和宝石，想的是阿尔多；我看着那些，也想着朵拉。

最后的第二封信里有一张拾万里拉的支票，谁也没去兑现，现在

又回到了我的手中。可是那些歇斯底里的狂热、企求和冲动究竟说明了什么？

我不相信上帝会那么残忍，琼不会在地狱里。她受的苦够多了，在这个世界上，她已是如在地狱。我为她哭泣，我更深情地爱她；像爱一个妹妹，更甚于妹妹；就像爱我自己的另一半，是个女的。她在离去的时候给我留下了这些信，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二十三

我去了罗马，租下玛尔古达街上的工作室，邀朵拉来和我同住，她略为犹豫之后便同意了。

每星期一早晨我乘飞机去巴黎上班，每星期五坐夜班机回罗马。每周仅和朵拉度过两天：星期六和星期日。

为什么我不把她带去巴黎呢？

既然决定和她一起生活，为什么不走这一步？

是一种模糊的、矛盾的感情阻止我这样做，然而这一感情却最接近我爱她的真正原因。如果我以后也遵循这种感情的支配，就不会带她去美国了。可是发生的事是注定要发生的，抱怨和哀叹都无补于事。

我怕将她这个连米兰都未去过的人带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后会一切都从属于我，于是便会使我失去对她的兴趣，也就失去了她。因为我爱的是在贫苦中独立的她；在蓬刚巴诺路上与鸨母苟合同住的她；神秘的夜间活动频繁的她。是这样一个她。

那你会问我为什么要租下玛尔古达街上的工作室？为什么让她去那儿住？你会问，不带她去巴黎而将她留在罗马是为了怕她失去魅

力而不再需要她，然而现在这样做，难道不是使她失去魅力的开始吗？

是这样，正是这样。我害怕不再需要她，这种恐惧像一股不自觉的力量隐藏着，渐渐地，几乎感觉不到地，通过逐渐减弱的，令人痛苦的，希望和失望的交替，而使我终于不再需要她，现在我已不需要她了。

如果我把她带到巴黎，一切就发生得太急，这是我极为讨厌的事情。因为我们虽然愿意堕落，但希望是慢慢地，谨小慎微地，同时还要自我安慰说，我们还在逐渐拯救自己。

我在巴黎的日子里，朵拉向我保证住在蓬刚巴诺路，然而我总是怀疑（直到现在我也难以说清这种怀疑令我高兴还是令我痛苦。也许既令我高兴，又令我痛苦）她就在玛尔古达街幽会她的情人。

当然，自我租下玛尔古达街的工作室并每周和朵拉共度周末之后，就把她视作正式的女伴。一星期中，我经常晚上从巴黎打电话监视她。而在我规定的时间（十二点半）之后，我总是能在蓬刚巴诺路的家里找到她。

可是她完全可以在其他时间，在其他地方，甚至也可以在玛尔古达街干她所想干的事。

于是我每次回来总有些荒唐的嫉妒场面。说荒唐是因为如果我没有在烟灰缸里找到与她平时所抽的烟不相同的烟头就会感到失望。事实是这些烟头我从未发现过。

“昨天夜里有谁来过？我要赶走你！杀了你！”我表面上因嫉妒而喊叫着，但如果我是诚实的话，就应该跪在她面前，对她喃喃地说：“我求求你，对我说昨天这里是有人来过；说你就在这里，在我们的床上做过爱！你说，不，最好给我证据，我就会祝福你，吻遍你！”

换句话说，我和朵拉同居是为了和一个妓女一起生活，并不是要把她改造为一个妻子，但没有和她商量，她不是这样理解的，或是理

解得太好了。

我每次回来都找不到她背叛我的任何证据，很是恼怒，便让私人侦探来监视她。然而每星期的报告中没有任何可以引起丝毫怀疑的证据，使我很失望。侦探公司的职员把报告送给我时满意地微笑；我拿了报告也报之以微笑。就这样，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过着。我不能说在我的失望之中没有满足。我究竟想要什么呢？一种痛苦。然而对于能避免痛苦的结果，却又觉得有某种程度的满意。

我甚至要求侦探公司在见到朵拉跟任何一个男人走进玛尔古达街的工作室或蓬刚巴诺路或任何其他地方时，就立刻给我打电报。我将乘第一班飞机赶回来，会使她很突然，然后……

然而没有发生任何这类事情，跟踪的费用又很高，见到毫无用处也就停止了。

最后我向教科文组织告了一个月假，说要回美国去看望儿子，却去了罗马。

我和朵拉日夜相处了一个月之后，再也没有勇气离开她回到巴黎去了。莫名的嫉妒心使我发狂。我仍然怀疑她不忠于我，但从未有任何证据。似乎朵拉什么都明白了。如果说以前一星期中有五天不在，就足以使我每次回来都处于疑心之中；现在则需要更多的东西使我生疑：总是微微激奋的情绪；奇怪的电话（我突然回家时总有些电话使我生疑，也许是我多心，也许是电话真有些神秘）；较长时间的外出；赴约的迟到等等。如果我们一起在罗马街上散步，则我总怀疑她的目光和微笑是对着别的男人的，虽然不敢那么肯定。

我总不能肯定这些事实，她在回答我的责问时总是躲躲闪闪。时而柔情地拥抱我向我起誓她是忠实的；时而吞吞吐吐含糊其词地搪塞，而脸上总是露出一种奇怪的、流气的笑容，眼睛深处闪着亮光，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有时急躁起来，她大发雷霆，会使我愣在一边，缄口无言，然而对她的真诚，我并不深信。

总之，我卷入了这场游戏之中，无法使自己摆脱而回到巴黎去，虽然应该回去。把行期一拖再拖，后来又向教科文组织的领导称病。这样又过了一个月，或一个多月。直到我的某位好心的同胞（我不想指出姓名）向我的上级汇报了实情，说我根本没有按请假时所说回美国去，并揭发了我称病的真相。

在我接到巴黎要我回去的紧急通知时，当然并不知道这一英雄的告密行为，然而预感到事情的不妙，揣测着我的答复可能引起的后果。于是我尽量拖延时间，在罗马按兵不动。十天以后我被教科文组织解雇了。这是去年一月初的事。

我的经济来源突然减少，于是和朵拉开始过一种地狱般的生活。是朵拉把我推向离开教科文组织这一步的。我曾经对她说过可以带她去巴黎，但不知为什么她对巴黎不感兴趣，愿意留在罗马，固执到无法解释的程度。我想这也许是一种自卑感。她会说几句英语，是在光复期间学会的，你可以想象她是怎么学的，然而法语却一句都不会。谁知道，也许巴黎这个美丽、文明的女人的城市使她胆怯，使她惊恐。当时我这么认为，而事情的真实情况是后来才逐渐发现的。因为朵拉有个很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对她攸关重要，所以尽一切可能避免引起我的反对，在向我公开的时候也是非常小心谨慎的。

自光复之初，也许更早，当她还在幼年的时候，见到人们移民去美国，当了百万富翁回来，她就做美国梦，把美国看成是人间天堂。这个思想是根深蒂固，任何情况下不会动摇的。谁了解意大利南方，就懂得这一点。

确实，美国如果不是人间天堂就不会那么难以进去了。在疯狂的光复时期，能嫁给一个美国兵，对一个意大利姑娘来说（不管她是不是“小姐”）是交了好运。那时的美国军人对朵拉和其他姑娘就好像是天使，如果运气好，就能为她们打开通往天堂之门。在这些天使中，我这个上校军官就简直成了天使长。这就是为什么她对我如此温文尔

雅，百依百顺；为什么对我的无礼言行如此逆来顺受的原因。她从我身上看到了自由女神像，看到了纽约的进港处；即使在我跪倒在她脚下的时候也仍是这么看我的。为此她才爱我，不为别的，也没有什么算计。我们相识之初，她可能希望我带她去美国，但后来知道我结了婚，知道我当了父亲，她并没有对我说什么，还是和以前一样顺从。唉！她并没有什么算计，只是对美国有一种神秘的爱，而我则是这爱的一部分，是这种爱的活生生的对象和象征。

算计是后来才有的，为什么不应该有？

当我把她带到玛尔古达街；当我开始明确地向她表示不仅需要她的肉体而且需要她的灵魂；当最后放弃了教科文组织的工作而和她留在罗马，她第一次发现了幻想可以变为现实。我不再是天使长，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美国人，可以并且应该娶她，并把她带到那里去。巴黎？巴黎算得了什么？比不上阿肯色最蹩脚的村子。在巴黎我会很快厌倦、变心，她感觉到了这一点，当然她是对的。不，不，我应和她在这里，在玛尔古达街，一直到那伟大时刻的到来。

她这副牌玩得十分出色，简直天衣无缝。我直到现在，结婚十一个月，在美国生活了十个月之后，才看到了她的牌，最后一张牌昨天晚上才见到。

在玛尔古达街时，我一无所知。

先不提美国，朵拉也许爱我这个人，也许不爱，这并不重要；因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她都不愿失去我。而为了不失去我，她知道只有一个极为困难而且非常令人讨厌的办法，就是每天使我生疑，然而不能使我确信她的不忠实。为了在任何情况下不冒被我发现的危险，她实际上对我是忠诚的。尽管她可能并不爱我，但这个位置对她十分重要，任何牺牲都值得。虽然我愿意她背叛我，可她并没有愚蠢到看不见我可笑的狂热所表现的不正常意愿后面那种急切的嫉妒。而她那古朴的善良和农民固有的不信任感还使她看到了我所见不到的东

西：后果，将来的后果；她迁就我的狂热，使我终于看到了渴望的目的之后的结果。朵拉会以她简单的、罗马女子的观点审视我说："他这个人，死活想要我给他戴绿帽子，还要给他真凭实据。然后是吵嘴，打架，最后做爱。可是我知道，我知道这些事情会怎么收场。两、三次，不会太多，事情就完了。他仍是好样的，因为本来就是好样的。可我会让他看了就恶心。既然让他戴了绿帽子（有证据！）那就只能给赶走，美国也就拜拜了。是我自己亲手毁了这一切！不，不，要认真注意，好自为之。到一定时候他自己也会明白的，都是些疯狂。"

这番道理的妙处在于：一个真情实意爱着的女人可以发表同样的见解，或几乎是相同的见解。

而我怎么想呢？我今天能说朵拉不曾爱过我，不爱我吗？

当然不能。

而且即使她不曾爱过我，没有以真正的爱情爱我，我也应该说她对我十分柔情，尊重我，并深深地感激我。朵拉是个正直的人，这没有任何疑问。她没有忘记在我改变她的生活之前过的是什么日子。终日焦虑，每天必须为自己和为乡下年迈多病的母亲和姨母操心，要负担她们的生活，为此而选择了妓女的职业。她能有其他的选择吗？难道这真是她自己的选择吗？她到底有多少过错？都是生活所造成。不过，即使在结婚十一个月之后，她也仍然没有忘记我给予她的恩惠，并以她的深情向我表示感激。

为什么我说她不爱我？

亲爱的马里奥，大约一年前在玛尔古达街遇见你的时候，正是我和朵拉共同生活的危机时刻。这也许你当时已看出来了。

你肯定知道我发现你也喜欢朵拉。对我们的海滨之行，我记忆犹新。朵拉在吉普车里坐在我们两个之间。我看到，明白了，感觉到了一切。你也许知道我明白了，然而，怎么说呢，我的嫉妒并不明显。朵拉对你卖弄风情，我肯定你试过运气，要是你成功该多好啊！但我相

信你没有。朵拉是不可攻克的堡垒，是斯大林格勒，我亲爱的！

渐渐地手头日益拮据，最后终于入不敷出了。以前我和朵拉谈到去美国时，总是随便地，泛泛地，像是谈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现在却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

美国有奥夫纳，我和他一直有通讯联系，时常为他做些零碎工作：照几张相，量一些画的尺寸和核对目录等等。于是我给奥夫纳写了信。他回了一封航空信，要我立即回美国到纽约大学任教，因为他不想再在纽约大学的夏季班授课，我可以接替他，他说我是最理想的人选。

这对朵拉也最理想。

一星期之后，我娶了她。她的证婚人是那个假姐夫，做焰火效果的那个人，和蓬刚巴诺路女房东的一个老朋友，七十多岁的医生，大肚子傻瓜。我则请了托姆拨金斯和达莱·麦克阿多做证婚人。曾想打电话去巴黎把你请来，可是知道你忙于拍电影，不可能来。而且，我还需要向你解释太多的事情。

七月二十九日，朵拉亲眼见到了自由女神像，我们是坐船去的，朵拉害怕坐飞机。

是什么使我作出了结婚和回美国的决定？

是因为缺钱？是后来我必须抛弃朵拉的处境？

还是必须抛弃她是如此可怕，以致我无法面对？

不，亲爱的，我完全是因为其他原因才决定和朵拉结婚并把她带去美国的，或至少是在别的冲动下作出的决定。这是一种次要的、一时的冲动，然而没有这一冲动，我是不会和她结婚的。

收到奥夫纳来信的那天晚上是作出决定的时刻。我给奥夫纳写信是由于朵拉的催促，信虽然写了，我仍然希望回答是否定的，或至少暂时如此。

然而奥夫纳来信了。很清楚，我将会立即在美国有钱，有工作，而

且是长期的。仅取决于我，是要她还是弃她而去；是留下她，带她一起去美国，还是我一个人留在欧洲。于是我第一次面对现实，第一次真正想到如果我和朵拉结婚，把她带到美国会怎么样？把她介绍给琼的父母吗？介绍给她的兄弟和叔伯们？介绍给我那些像突斯一类的同事们？介绍给那些比他们更糟糕、更虚伪、更迂腐、更愚蠢的家伙们？介绍给那些我从心底里憎恶的人们？介绍给那个庸俗的世界？——可怜的琼错误的一生和悲惨的死亡的罪魁祸首？

我可以想象我那些同胞们的反应——一种清教徒式的和地方主义的反应。我会多么高兴见到那精采的场面！来到他们中间，向他们介绍我的妻子，一个妓女。

这样做，我会亵渎对琼的怀念吗？想到她那些信，我觉得我是在按她的意思做，是在完成她的遗愿。我和朵拉要做琼和阿尔多没有做而感到自责的事。我选择了这条路，与一个我相信与之造孽最深的造物结婚；与一个我既轻视而又比任何人更需要的人结婚。

然而，不管怎么说，心里总有一种轻微的，几乎是无法承认的亵渎感。朵拉将做我孩子的母亲，我把孩子的纯洁送给她。我的父爱由于对她的感情而受到亵渎，这种渎圣的……想到这些，我觉得内心在反抗，在拒绝，感到厌恶。不，这太过分了，我说，即使我和朵拉结婚，即使把她带到美国去，我们也不和孩子们一起生活。我的本性——生理的遗传，教育，传统观念，宗教，文化，骄傲与怜悯，混合为一体——在反抗。

但正是这个，也仅是这个原因，使多少往事化为云烟，对我作出了新的允诺，从而使我断然作出了决定。

那天晚上九点钟光景，我回到玛尔古达街的工作室，见到了奥夫纳的信，看完之后便翻译给朵拉听。她什么也没说，我念信的时候，及至后来，她总是在厨房进进出出，准备晚餐。我念完信之后也一言不发；看看信，也看着不时从厨房里出来的朵拉。我看着她，希望从她脸

上看出她在想什么。唉，她想什么，我是太清楚了；我希望知道她决定要说话的时候说些什么。

终于她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出来了，放在桌子中间，盛了汤，坐下，这才开声。

“来吧，”她说，“先吃饭，然后你再作决定。”

于是我便吃饭。一边吃一边看着她；一边看着她，一边想着我刚才对你说的那些，也就是第一次想到真的和她结婚，带她去美国这件现实的事。当我想到孩子们的时候，极端痛苦，无法下咽，我停下来，从桌子旁站了起来。

走到阳台上。

朵拉没有对我说什么，也许她明白，也许她意识到了。

我走到平台上，小院子在层层小屋的包围之中，我眼前是黑压压高大的宾丘。

上面山坡上，在马路边的树枝之间，路灯有规则地排列着；下面汽车的前灯互相照射着；情侣们在缓步行走，有的倚傍着栏杆脸向暗处。

想到孩子，想到我和琼的孩子，我十分痛苦。痛苦地想着我给孩子们的后母是个妓女，却又无法抗拒这种引诱；而且正是这个痛苦的思想及其所希望得到的结果，才使我跨出这重要的一步。

我向上看看黑黝黝的宾丘说，如果我真是个男子汉，就有力量和朵拉结婚，带她去美国，同时有能力使孩子们免于污浊。

或是知道自己没有这种力量而永远彻底放弃朵拉。

但我不是个男子汉；我只是一个长了年岁的大小伙子，一个个人主义者，优柔寡断的人，一个懦夫。

我伤感，充其量是因为喜爱孩子和欣赏童年所受的那些传统教育；如果置孩子与传统于不顾而能满足情欲，则我玩世不恭的态度足以使我更看重后者。

我继续不断地问自己，似乎并不知道自我斗争的最后结果：为什么我不是男子汉；为什么我没有这个勇气？于是想象着第一、第二种解决办法的结果，而避开现在已做到的第三种。是抛弃朵拉？还是和她结婚，带她去美国，但不和孩子住在一起？

自然我倾向于后一种。因为尽管我对自己许下了庄严的诺言，但到了美国，还是可以改变主意的。

如果我现在说，当时并不知道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就是不诚实。我们为了减轻过去的罪过而往往在回忆中把它说成是注定的，从而使自己相信曾为犹豫和自私而斗争过；实际是一开始就明白，毫无办法，诱惑太强烈。如果我们是坦诚的，如果回忆一下这些时刻中悲剧性的细节（哦，这些时刻有时是那么短暂！）我们就会记得，当时在作出决定的时候——是牺牲情欲或是放弃责任——是完全自由的，于是便有了今天的悔恨。

看着宾丘黑压压的一片和上面马路上的汽车在两排树之间射出的灯光，我知道朵拉在我身后，坐在桌旁，通过开着的阳台门从后面望着我。我已感到激情越过顶峰开始下降，我是否要牺牲以往的深情而放弃她。

夜空中传来一个女孩子的喊叫声，嗓音异常清脆：

“南多！玛丽娅！”

哦，上帝，我的上帝，我该作出决定了。

不，这种牺牲只能在以后，我最后对自己说，于是深深地叹了口气，向后转过身去，朵拉坐在桌边，但不在吃饭，也没有望着我，她在看一本画报。

我进去，把一只手搭在她肩上，她抬起眼睛向上看着我。

“那么，”她很平静地说，“你决定了？”

她那闪着金光的绿眼睛，那双神秘的眼睛，曾使我多少次久久地望着它们遐想；然而在那一刻对我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再也不包含任

何神秘的色彩。她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了，我看到了这一点。这不是坏事，也不是好事；她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有她自己特有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跟我没有关系。

“决定了。”我笑笑说，像一个跳崖自杀的人跃了出去，跌入了深渊之中。

二十四

到了美国，一切都与原来的预料相反，直至现在仍使我惊诧不已。这些你在我两个月之前给你的信中已经都知道了。

我们是七月二十九日抵达纽约的，我在纽约大学开课的时间是九月份，这样我们便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第一个星期是在纽约度过的，奥夫纳了解了我的近况后非常慷慨仗义，无论如何要我收下二千美元，作为我在意大利给他所作的工作的补偿。

于是我给朵拉从头到脚都换成了美国妇女的打扮，让她剪了头发，修了指甲等等。一个星期之后把她带到了大西洋高地，我的岳父母在那里有一幢别墅，他们正带着孩子们在那里洗海水浴。

我的岳父、母从见面的那一刻起，就对朵拉亲切、热情，甚至没有最初的不信任感。同时，尽管我并不愿意，他们都坚持要孩子们跟她亲近。从来没有亲眼看过我和她女儿婚姻的岳父，现在似乎第一次感到满意。“可怜的琼死了，这当然是天大的不幸，但现在一切都慢慢好起来了。”他似乎在这么想。深知他对欧洲、欧洲人的厌恶，和历来对拉丁族，特别是意大利人的轻视，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对朵拉如此好感和信任。

至于我的岳母，她是那么爱自己的女儿，总是毫无保留地赞同她

所作的任何决定，因此，事情就更出人意料和难以理解了。

我想，尽管他们很爱外孙，然而两个孩子活泼调皮的吵闹和为之所负的责任，已使他们内心有些厌烦。所有的老人，特别是家境富裕的老人，那种有规律、有条理和自私的生活让孩子们搞乱了。他们盼望从这纷乱之中解脱出来，朵拉便成了救星。

当然，如果朵拉没有给他们如此良好的印象，他们仍会忠实地继续照顾孩子们，而牺牲自己的安逸。

但朵拉是无懈可击的。首先她几乎从不说话；其次，在我们逗留在大西洋高地的十五天中，她全部都投身厨房。

每天都亲手做一道没有品尝过的菜，每天更换菜谱：面条，饺子，面片儿，土豆疙瘩，把意大利菜谱中的传统菜式让我岳父母尝了个遍。还有著名的甜食斯加拉，不过这个除了我和孩子之外不太受欢迎。

朵拉是个出色的厨师。我的岳父母和星期天到大西洋高地来的舅兄们都说，做得出那些菜来就不能不是个能干的女子。"当然，是来自民间的。"当然，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女子，但是能干、诚实、讨人喜欢。再说，即使是最保守的，最反对消灭社会等级差别的人，遇上外国人而又有通婚关系时，也就不会太计较。朵拉是一个贱民，但因为是意大利人，又不说英语，所以几乎觉察不出来，于是一切都很好。

九月和孩子们一起搬到了长岛。我租了一幢很雅致的小楼，四周有漂亮的花园。到位于曼哈顿的大学去要乘坐将近一小时的地铁，但这里环境好：四周有这么多树木，空气是那么清新，离海又不远。正是孩子们所需要的。朵拉呢？

朵拉很幸福。

但对于我，朵拉已失去了一切魅力。她眼睛里的光彩在我自由的最后一刻已经熄灭，再也没有复燃。我的岳父母完全正确，现在朵拉是个能干的女子，我再也没有需要她的欲望了。每天晚上又像和琼在

一起的时候一样，是勉强、失望、理智的一幕。

我不断地反复自问，怎么会是这样的？她那曾经征服我的魅力，犹如从她体内放出的射线，是至死不尽的，怎么会消失呢？

也许这正是我不自觉地所追求的？

如果是这样，则可以说我已达到目的了。

已是半夜三点，朵拉和孩子们在楼上睡觉。

我在长岛的家里写着这最后几页。在这里已住了一年，现在仍住着。工作顺利，孩子们在成长，朵拉在发胖，一切都很好，只有我感到无聊之极。你不能找个什么借口叫我去罗马吗？

我想着大旅店里我和琼接到的那个神秘的电话。是谁打的？谁要向我们勒索？是朵拉的朋友，还是阿尔多的朋友？我也许想去罗马认识这个阿尔多？谁知道。

昨天晚上，朵拉摊了最后一张牌：她怀孕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于是今天下午五点多钟，我下课之后给她打了个电话，说要很晚才回去，让她别等我吃晚饭；晚上也别等我，自己先睡。我头痛，需要活动。要做件异乎寻常的事：步行回家。这确是异乎寻常，因为有十多公里，将近二十公里左右的路程。

我这样做了，徒步走回家。经过了布鲁克林大桥，然后走了整个布鲁克林区，又过了东河上的桥，非常之美，可是再往前走就不堪入目了。所有这些路，这些房子，都是一堆拼凑的建筑；没有风格，没有特色，仅实用而已，除了考虑实用以外，没有任何企求。前面是电影院、停车房、杂货铺、公寓；又经过一个电影院，又是一个停车房，又是一个杂货铺，又是一个公寓。这些颜色，这些广告画也都是实用的。不错，古老的城市在当时建设的时候也讲究实用，但现在有了更先进的，它们就不再实用而成为没有实用价值的了。正因为没有用或不实用才成为美的。

我走着，走着，夜幕渐渐地降落在布鲁克林和长岛的街上，像在巴黎、卡不里岛和罗马一样。长岛上不见尽头的大街上点缀着前后拥有草坪、树木的房子。窗户亮着灯，传出说话声和电视里的音乐声——能干的美国人的家庭在用晚餐。不时见到一堆堆密集在一起的房子，又是商店、杂货铺、公司和电影院。我停下来，吃一块三明治，喝一杯饮料，又继续往前走。觉得热了，脚开始酸痛。我脱了上衣，挽在手上，手臂碰到了上衣里面口袋里的一包信。是琼的信。虽然我从不再去看它们，却总是带在身上。

我仍然走着，夜已深了。草坪上、树丛中的房子已经灯火全熄，雀然无声。走啊，走啊，我的家还远着呢。在一个旷无一人的十字路口，我停下来休息十分钟。在人行道的台阶上坐下，抽支烟，看着眼前所能见到的一切：几条前面有蓝色路灯的路消失在黑夜之中；树丛中一幢幢的房子；粗糙而干净的柏油路，路上的白线和钉子；几块广告牌；长方形的路牌清楚地各指各的地方；另一些专门的黄色牌子上，是指向附近小城镇的箭头。

海上刮起了风，一盏蓝色的大路灯在十字路口的中间晃悠。红绿灯有规则地交替着。过往的车辆很少，然而车速极快。遇到红灯，来车就停下，等着，然后再继续走。

看着在夜空中被风刮得拼命地摇晃的那盏蓝色的路灯，我不禁问道：我的上帝，难道我该在这里度过我的一生？

这一切对我并不生疏，我童年时代所见到的景象就是这样，或类似这样的，但是为什么我想着罗马？

最后我站起来，继续我的行程。

两小时后，将近午夜一点光景，我见到了家。那是我的家，那里睡着朵拉和我的孩子。我累了，想到家里喝一杯威士忌，还想抽一口烟斗里的烟，再把稿子写完。然而我却在离家一百米的地方停了下来，看着这个家。窗户里没有灯光，漆黑一片。想到要进去，心里抽搐了

一下。如果我出走呢？就这样，不辞而别，消失在这个世上。去哪里？西部？墨西哥？

不，不，我要回到罗马去。

我又在人行道的台阶上坐了下来，拿出上衣口袋里琼的那包信，决定把它们烧掉，早就想这么做了。把信一封封从信封里取出来，我半闭着眼睛，以免无意中看到那上面的句子。慢慢地，一张张，一个信封一个信封地将它们撕碎，再在近处草地上找一根树枝，把它折断，做成一个小小的支架，靠在人行道的台阶上，然后，还是半闭着眼睛，把撕碎的信和信封放在上面。刮起一阵风，吹走了两张碎片，于是我把其余的碎片都塞进口袋里，去追赶那吹走的两片。然后又重新将它们全部放在树枝上。看准风向，点起了火，我跪在地上挡风，信很快就烧了起来。

全部都烧完了，我站起身来。

有一个男人走过来，是个中年人，胡子很长，穿件布衣服，像是爱尔兰人或是德国人。他恶意地看着我，我以为他要过来向我求乞，然而没有，只是用那恶意的、仇视的、轻蔑的，也许是冷漠的眼光望了望，便消失在黑暗中。

我已站在家门口，要决定是否进去。刚才走过的那个人……我似乎觉得这一切都曾经历过，也许是在普林斯顿和琼在一起的时候。

现在我该进去了。已经到了，只要穿过马路就是。我从口袋里取出了大门钥匙。

下次还能出走吗？我自问道。

什么时候呢？

你什么时候召唤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卡不里岛来信
作者＝吕同六主编　　索尔达蒂著　　周智韵译
页数＝２２５
ＳＳ号＝１１１０６８５０
出版日期＝１９９１年０８月第１版